



以文学之名

小鳥

以文学之名
卷三十五 2023.11

与革命者的对话 | 田野中国

两段托尼·朱特，一个博尔赫斯 | 小鸟问答
“佛”不是躺平，而是一种行动 | 接力访问
未经同意的同意 | 新书





小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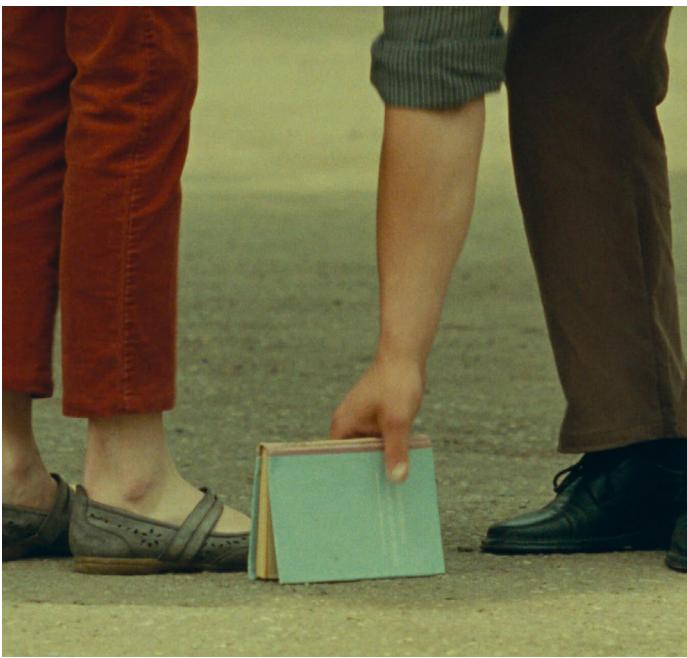
- 新书试读 | P.05 爱，鸡尾酒与行尸走肉 赵艺恩
P.17 平乐县志 颜歌
P.25 一切笼子里的事物 奇诺洛·奥卡帕然塔
P.33 孔雀 叶昕昀

非虚构

- 田野中国 | P.39 争执从何而起 | 一个精英家庭和它的教育问题② /
P.45 柴子亮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 一个精英家庭和它的教育问题③ /
P.49 通往大众的道路 | 革命者陈一真① /
学术之争 | P.57 革命者陈一真② 伊险峰
新书试读 | P.65 52 封真实信件，一个上海少女的港漂故事 张乐天
P.73 性别收入差距的核心究竟为何？以律师和药师为例 克劳迪娅·戈尔丁
P.83 人生短暂，你也应该听听欧亚鸽的歌声 查理·科贝特
P.91 知识分子应该承担什么以及如何承担责任？ 诺姆·乔姆斯基

专 栏

- 接力访问 | P.97 074 大智：一个云南旅游区店主经历的这两三年 /
P.101 075 顺顺：2008 年到成都之后，这个城市改变了我 /
P.105 076 大鹏：明明什么人都不想搭理，他却开放了自己的家 /
P.109 077 怡宁：通过身体探索，让人性互助不只停留在一些危急时刻 /
P.113 078 Lucan：给社区长辈做脱口秀，是他了解历史的一种方式 /
P.117 079 董吗子：哪怕是挣钱，我都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
P.121 080 33：她的生活，就是一次次尝试完成某种看似不可完成之事 /
P.125 081 武老白：我不光在面对一个公共事件，我是在不停地打开自己 杨樱



题图为电影《当我们仰望天空时看见什么？》(2021) 剧照

小鸟问答 Vol.35

小鸟 | 小鸟问答

又到了属于我们的十一月。

i

很高兴十月里我们又发出一篇“24 小时文学聚会”。记得月初时我们还说，近来投稿量有所恢复，但愿有好的作品。

果然。这是让我们开心的一件事。

ii

更高兴可能还在于作者所选取的题材。它不回避真实，它让我们看到在狰狞的、但是真实的世界里人性的光辉。这篇小说让我想起加缪的那句话：“错误的观念最终造成流血，但在每一种情况下，流的都是别人的血。”我们的小说作者看到了这一点。

iii

我们的成熟作家们不敢触碰那些稍微显得敏感一点的题材，实际上他们是被站队、表态、立场之类的词吓坏了，他们甚至因此而放弃了触碰人性。

他们或者就沉浸在另外一些站队、表态、立场里乐此不疲。就像同样在这个月里，你多多少少都会感受到身边的人在为巴以冲突这样的事而割裂，你多多少少会看到他们为此高谈阔论，互相攻讦。他们不能自拔的和他们恐惧的是同一个东西，它叫身份政治。它让愚蠢更愚蠢。因为它远离人性，它鼓励远离人性。

iv

很多情况下，如果我们相信一切应当从人性出发，也许可以回避这么多的愚蠢。分享两段托尼·朱特的话：

正如少数巴勒斯坦人可能总是怨恨他们的犹太邻居一样，某些以色列人也完全可能因为自己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而绝不会原谅他们。但是根据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解，巴勒斯坦人由于被忽略而产生受委屈感，以色列人则坚持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是正直的，这两点对于解决他们共同的两难问题而言是一对孪生的障碍。任何一方自身都不可能“看到”另一方。正如奥威尔在《关于民族主义的札记》里指出的，“假如一个人在自己的心中持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忠诚或仇恨，那么某些事实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家都认为是真实的，也不会得到承认。”

(2004, 《民族》)

巴勒斯坦人记得 1948 年发生的大规模驱逐，记得土地征用、经济剥削、约旦河西岸地区被殖民、政治暗杀以及每天发生的数以百计的各种微小的羞辱。以色列人记得 1948 年的战争，记得阿拉伯国家从 1967 年以前到现在都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并且反复威胁要把犹太人赶入地中海，记得去年发生的平民被随意屠杀这样的可怕事件。但是中东的记忆并不独特，甚至在记忆的痛苦程度上也并不突出。

20 年中，爱尔兰共和军频繁地发动袭击，他们将信仰新教的平民当着他们的孩子的面枪杀在自家门口。新教徒们也开枪予以还击。目前暴力事件仍然有，虽然发生的次数大大减少，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温和的新教徒与新芬党中的温和派进行公开谈判……1944 年，德国党卫军在法国奥拉尔村活活烧死了 700 名法国人，其中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屠杀发生后不到 6 年，法国和德国便走到一起，两者合作（舒曼计划）成为新欧洲建设的核心。

(2002, 《此路不通》)

v

有人问，你们上期（十月）小鸟问答中提到博尔赫斯的那段话在他的哪本书里？

这段话出自《探讨别集》中《关于切斯特顿》一文。我们在重新看这段文字时，再度被这其中一句话所吸引：“这道门是只为你而存在的，现在我要关门了”。我们暗自揣摩，这似乎与一些大人物的宿命有某种关联。我们决定再抄一遍。

这是一个要求被法律承认的人的故事。第一道门的看守对他说，里面还有好多道门，每个大厅都有一个看守把门，他们一个比一个强壮。那人就坐下来等。日子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那人就死了。临终时他问：“在我等待的岁月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想进去，这可能吗？”看守回答他：“没有人想进去，因为这道门是只为你而存在的。现在我要关门了。”

看完之后，不知为什么感觉到巨大的孤独。想到最近看到多篇作家自我剖析，有理想高远者，有岁月静好者，都一样，你不知道那门只是为你单独而设，你还想着如何找到结伴而行或者抱团取暖的人，等着等着就是倏忽一世。

vi

博尔赫斯在接受访问时曾说，他最好的一篇小说是《第三者》，“那并不是一个故弄玄虚的故事……”“我试图表现的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感，这样一来故事的结局也就不出人意料了。”“《第三者》的情节固然可怕，在我眼中却非常真实，同时也非常悲哀。”

作家的伟大，就在于他在虚构之中，提供最真实的、真正的真实，让我们知晓不可避免的宿命感。

vii

本卷封面的鸟叫黑水鸡。

viii

联系我们。

微博留言 @ 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写邮件到 info@aves.art

还有一个博尔赫斯。来自《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这篇文章，收在《为六弦琴而作·影子的颂歌》这个集子里。

那个很短的故事开始说：“我想把我们历史上最奇特、最悲惨的事件之一用文字记载下来，也许前人从没有这么做过。我认为最好是叙述时不加评论，不添枝加叶，不作任何没有根据的猜测。”一贯的博尔赫斯风格，他接着说，“主角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独裁者巨大的阴影……然后，他讲独裁者的手下闯进了主角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的家，萨尔瓦多雷斯无处可逃，他钻到客厅桌子底下，掀开桌子底下的地毯，下面是一个地下室的入口。独裁者的手下没有抓到萨尔瓦多雷斯，放言他们还会再来。

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的故事从这里才算真正开始。他在地下室住了整整九年。尽管我们常想，年月由日子组成，日子由钟点组成，九年是个抽象的期限，是个难以想象的数目，这个故事还是骇人听闻的。我猜想，他在眼睛努力辨认的黑暗里，什么都不想，甚至不去想他的仇恨和危险处境。他蹲在地下室。上面那个对他已经无缘的世界会传来一些回声，他妻子的脚步声，水桶在井栏的撞击声，天井里的大雨声。此外，每天都可能是他的末日。

妻子怕仆人举报，陆续辞退了他们。她对亲戚们说萨尔瓦多雷斯在乌拉圭。她替军队缝缝补补，挣些钱养活两人。几年中，她生了两个孩子；亲戚们唾弃她，说孩子是野种。独裁者垮台后，他们跪在地上请求她原谅。

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把他禁闭起来的是不是恐惧、爱情、可及而不可望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终于养成的习惯？他妻子为了不让他离她而去，告诉他一些不确实的阴谋与胜利的消息。他也许是个懦夫，他妻子心中有数，只是因为忠于他而不对他明说而已。他在地下室里没有烛光，不能看书消遣，或许也想到了这一点。黑暗使他整天陷于迷梦。最初他梦到月黑风高，钢剑直逼咽喉，梦到空旷的街道，梦到平原。几年后，他已没有能力逃亡，梦到的是地下室。起初他是一个受到追捕、受到威胁的人；后来我们就说不清楚了，也许是一头守在巢穴里的温顺的野兽，也许是一个神秘的神。

这一切持续到一八五二年夏罗萨斯仓皇出走的那天。那时候，那个暗藏的人才来到光天化日之下：我祖父同他谈过话。他长得虚胖，脸色苍白像蜡，说话老是压低嗓音。他被充公的乡间产业始终没有发还，据说他贫困而死。

正如一切事物一样，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的遭遇仿佛是我们即将领悟的某件事情的象征。

起初回忆起这个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的故事，同样是在几天前的惊愕当中：是啊，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想到，这何尝不是我们自己啊。

我们把博尔赫斯，献给我们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献给我们的城市，献给又一个属于我们的十一月。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题图来自 Susan Wilkinson on Unsplash

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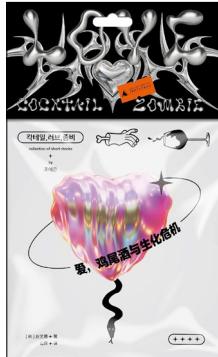
爱，鸡尾酒与行尸走肉

赵艺恩 | 新书推荐

“我希望可以透过超越常识的丧尸，
激起读者对日常生活的感念。”

《爱，鸡尾酒与生化危机》是韩国90后代表作家赵艺恩的首部中短篇小说集，包含《邀请》、《爱，鸡尾酒与行尸走肉》、《湿地的爱情》、《刀，重叠的刀》四篇都市异色复仇怪谈。执掌时间回溯的谜之恶魔，古神病毒创造的新型丧尸，纯情的林中游魂、水中猛鬼，伴随恶女诞生复苏的富江，纷纷在末日都市与现代山林登场，对以爱之名的压迫，伪装成日常的暴力、变异的家庭和亲密关系发起了大快人心、充满暴力美学色彩的复仇。

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爱，鸡尾酒与行尸走肉》分享给读者。



1

这个周日的清晨一如往常，至少表面看上去是如此。泡菜豆芽汤的辛辣刺激着嗅觉，耳边不时传来餐具碰撞的声音。

珠妍一边蹂躏着无辜的饭粒，一边看着坐在对面的妈妈，握着勺子、把饭舀到汤里的

那只手上凸起遒劲的青筋。

“你怎么不吃饭？”

在妈妈的询问下，珠妍放下勺子。

“要是现在还能若无其事地吃饭，那才更奇怪吧？”

妈妈给珠妍夹了一片泡菜。“有什么奇怪的！”

珠妍指了指坐在正方形餐桌前的爸爸。脸色苍白的爸爸正缓慢地眨着眼睛，在空荡荡的碗里拨动着勺子，眼神涣散，周身萦绕着隐隐的馊味。珠妍努力压抑内心不知是愤怒还是恐惧的感情，故作冷静地说道：

“爸爸现在太奇怪了。”

“你爸怎么了？”

“丧尸！他变成丧尸了！你觉得他还活着不成？”

妈妈的手停了下来，珠妍这时才发现，妈妈碗里的饭也并未见少。妈妈双眼通红地看着珠妍，没说一句话。爸爸依然在对着空气比画着什么。啪嗒，干燥的汤匙刮碰陶瓷碗的声音让氛围重新平静下来。妈妈终于还是开了口：

“他怎么不是活着的？喝上一夜的酒，凌晨坐首班地铁回家睡一整天，又睡到凌晨起来看足球比赛，看完坐在饭桌前催早饭，他不是你爸是谁？他只是病了，很快就能好起……”

妈妈扭过头，还是没能把话说完。她深呼吸了几次，站起身整理餐桌。

“不想吃就起来。老公，你也起来吧。”

妈妈一把夺过爸爸手里的勺子。爸爸凝视了一会儿空荡荡的手，便歪着身子向里屋走去。短短几步路，他踉跄了好几次，却神奇地没有摔倒。妈妈将餐具端到洗碗池，自言自语起来

“该死的糟老头，吃那么多反而瘦了。”

严格来说，爸爸并没有进食，丧尸吃不了人类的食物。珠妍没有特意反驳妈妈，反而附和了她的抱怨。

“爸爸这样厚颜无耻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珠妍本想帮妈妈洗碗，但妈妈却以洗碗池太小，挤不了两个人为由，将她赶回了客厅。她只能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有关昨夜事件的新闻。

“关于病毒的传播途径，暂无任何研究结果。请各位市民尽量避免室外活动……”

新闻没有具体提及丧尸病毒的传播途径和发病症状，只是简单地播报了几条注意事项。茫然的感觉让珠妍烦躁不已。她一边感受着周末清晨和煦的阳光，一边思考未来会发生的事。

正常来说，丧尸的出现预示着世界的灭亡，珠妍看过的丧尸电影无一例外都是如此。想要避免灭亡，只有靠拥有超乎常人的正义感、体力和头脑的英雄找到疫苗。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什么英雄，所以这个世界终将灭亡，而且会很快。即使世界不灭亡，至少出现丧尸的首尔，乃至整个韩国也会灭亡。嗯……即使韩国不灭亡，至少他们家也必定玩完了。不对，他们现在已经玩完了！珠妍想起初中时写的日记，里面就充斥着“玩完”二字。对了，现在重要的并不是这个。珠妍好不容易才抓回到处流窜的思绪，重新整理起眼前的情况。

昨天开始，丧尸出现在了首尔各处。官方报道的第一个丧尸是个个体户 B 某，他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攻击了他的妻子 C 某和医生，逃跑时被警方击毙。医生从 B 某体内共取出十二发子弹，据目击者说，在眉间中了第十二发子弹之前，他一直都在动。

同样的事情还有三例。

时间回到昨晚。在珠妍与辅导机构的同事聚餐期间，整个白天都深受宿醉折磨的爸爸突然口吐黑血，失去了意识。妈妈赶忙打了急救电话，但她一直没有等来救护车。珠妍烂醉如泥地回到家中时，爸爸的嘴唇和牙齿都已变得乌黑。妈妈手中握着手机，茫然地坐在漆黑的客厅里，好像丢了魂。

“你爸爸……好像病了。”

新闻报道中的丧尸均被射杀了。妈妈不忍心看到爸爸也变成那样，认为国家总能有什么办法，所以直到国家拿出对策之前，她想先让爸爸留在家里。珠妍默许了。也许会觉得她们愚蠢，指责他们的做法会危害人类，但又有多少人能亲手送自己的亲人去死呢？就算那是一个自己一直埋怨不已的亲人。

○

爸爸变成丧尸的第三天，珠妍发现了一个事实：丧尸会重复生前的作息。每逢饭点，爸

爸都会坐在餐桌前，示威般地向妈妈讨要食物，明明他根本吃不了。每每看到爸爸这样，珠妍的心情都无比烦闷。好吧，丧尸当然会饿了，可是她们又不能真给他端人肉上来。

“是不是该把他绑起来呢？”

“绑起来？你说要把你爸绑起来？”

妈妈像听到了什么不可理喻的话一样反问珠妍。珠妍叹了口气，抬手将头发揉乱。因为不忍心让妈妈独自扛起照顾爸爸的重任，她已经三天没去辅导机构上班了。虽然请了假，手头也没什么紧急的工作，但她也不知道自己这样还能坚持多久。

即使爸爸成了丧尸，生活也要继续下去，前提是得有生活费。妈妈是家庭主妇，自己在升学辅导机构上班。尽管在这里工作了很久，但她很清楚这是一份不稳定的工作，所以她早动了攒钱念研究生的打算。可现在这个情况，她也拿不定主意了。身旁的妈妈一边盛饭，一边说道：

“没关系，会好起来的。”

不会好起来的。珠妍认为他们家已经完了的理由就是生活费，爸爸每个月按时领回家的钱，那该死的钱。珠妍赚回来的钱只能应付母女俩当下的生活，压根无法奢望存下来，别说为养老做准备了，也许连最低生活标准都达不到。就算她从辅导机构离职，另寻高就，只要无法奇迹般地入职大企业，她们的情况就不会有太大好转。

妈妈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家里究竟有多少积蓄？难不成得卖掉房子出去做点小生意？那如果失败了怎么办？珠妍越想越迷茫，越想越绝望。她面无表情地盯着电视，沉默着换台。所有频道都在播差不多的内容。

“市内发生难以置信的丧尸伤人事件，暂时无法确定第一批丧尸病毒感染者数量。现急需各位市民迅速做好应急措施，积极协助公务人员。如遇丧尸，请拨打 999 举报，请各位市民务必牢记在心。”

爸爸感染后的第三天，国家才发布关于丧尸的正式公告，表示暂未查明感染源。新闻播出公务人员穿着杀气腾腾的防护服穿梭在城市各个角落的画面，可仍然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提及。丧尸电影里，一旦出现感染者，世界便会乱套。现实中的病毒是不是危害太小了？她站在公寓阳台往下望去，街道和往常一样平静。除了偶尔传来的警铃声，以及街头多出的武装警察，世界并没有多少改变。

这么快又到饭点了？她看到爸爸从里屋走了出来。珠妍凝视着正在一点点腐烂的爸爸。他面对空空如也的碗、颤抖着拨动勺子的模样让她心酸不已。这寒碜的模样看起来与之前似乎并没两样，让她甚至产生了短暂的疑惑：爸爸真的已经“死”了吗？

除此以外，爸爸也会重复生前其他生活模式——周末睡到下午四点，无所事事地按着电视遥控器，偶尔还会拿出一本书倒举在手中。最难搞的是工作日的早上。爸爸会胡乱给自己套上一件西装外套，说什么也要出门上班。珠妍和妈妈会早早起床，用高尔夫球棒、头盔与绳索武装自己，阻止爸爸上班。每天早上都是一场恶战。

珠妍还差点被反抗的爸爸咬到。网上流传着许多关于第二轮感染的怪谈，每一个都很逼真。在这身不由己的假期中，珠妍时常会在网上检索“若成为第二批感染者，是不是自杀会比较好”之类的问题。

○

爸爸感染的第七天，一个星期六的清晨，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情况还是发生了。也许是因為已经饿到濒临极限，爸爸试图撕咬正在收拾厨房的妈妈。好在从洗手间出来的珠妍及时将椅子甩在他身上，制止了他，要是稍晚一步，就真的大事不妙了。

爸爸被珠妍扔来的椅子砸中了腰，在原地挣扎了好久都没能站起来。珠妍前往储藏室，拿出了绳子与胶带。

“没办法了，妈，必须要把他绑起来。他已经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爸爸了。他随时可能再次攻击我们，被丧尸咬了自己也会感染的，你也看过《僵尸世界大战》吧？”

“.....”

爸爸腐烂得越来越厉害，身体散发的恶臭已经无法再用香薰与通风换气来掩盖，一直未能进食也让他越发暴躁，而新闻依然只字不提疫苗的进展。珠妍握住妈妈的手，低声说道：

“妈，我们真的要打起精神来。”妈妈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那天傍晚，珠妍与妈妈紧紧抓着绳子两端，等待爸爸坐到厨房的餐桌前。影子在夕阳

的拉扯下渐渐变得斜长，到时间了。爸爸一瘸一拐从里屋走进厨房，抽出椅子坐了下来。他随意拿起筷子，拨弄面前的空碟子。在旁看着的珠妍起了恻隐之心，但她还是将绳子套向了爸爸的头顶。粗重的绳子快速缠住爸爸的上半身，爸爸像掉入陷阱的野兽一般挣扎起来。珠妍迅速用在登山社团学到的手法给绳子打上了结。

忙完之后，珠妍和妈妈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被她们禁锢在椅背上的爸爸就像一个被绑架的人质，手上还死死地握着那双筷子。珠妍眼也不眨地将筷子抢了过来。

“你又吃不了东西，一直握着它做什么？”

“啊啊！啊啊！”

爸爸剧烈晃动着身体。看到爸爸空洞的眼神，珠妍无奈地放低了声音：

“对不起，爸。可我们也没有办法，总不能为了你去杀人吧？你再坚持一下吧，总能找到办法的。”

珠妍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她完全看不到希望。爸爸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又有什么疫苗能起作用？早从几天前开始，珠妍的脑袋里便一直重复着那个声音——“如遇丧尸，请拨打 999 举报”。

与妈妈合力将爸爸连同椅子一起搬到里屋后，珠妍回到客厅打开了电视。最近她们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多，之前追得一集不落的周末电视剧早已停播，取而代之的是紧急新闻。

“现已查明丧尸病毒的感染源。在江南一家汤饭店里发现的.....”

2

爸爸到底是怎么变成丧尸的？其实这才是珠妍最想知道的。因为在变异之前，爸爸只是度过了对他来说极其普通的一天：下班后与几个同事到烤肉店吃晚饭，吃完就去 KTV 唱歌，然后再去啤酒屋小酌一杯，最后赶在凌晨首班车运营前去校友开的汤饭店里醒个酒。虽然他贪杯，而且固执得无法交流，但也只是个常见的父权家长，从没惹出过什么大事。他在制药公司上班，人前是个老实本分的职场人士，在家里却像皇帝一样颐指气使，很典型的不到六十岁的庆尚道男人做派。

难道问题出在这里？因为爸爸上班的那家制药公司？丧尸病毒好像都是这么传播的，她随时都能列出几部讲述制药公司的阴谋导致全世界面临危机的末日电影。

可这病毒的传染性未免也太弱了吧？而且尽管爸爸在制药公司干了很多年，也没有爬到可以接触丧尸病毒的级别，他只是个跑业务的。

珠妍想破脑袋都没想出个所以然来。那天的爸爸只不过是喝了一整晚的酒，烂醉如泥，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异常之处。

“相关部门表示，现已查明丧尸病毒的感染源正是该汤饭店供应的蛇酒。寄生在野生爬虫类动物体内的变种寄生虫入侵了饮酒者的身体。希望各位观众现阶段不要服用蛇酒等浸泡酒。卫生部将在十点举行正式的新闻发布会。”

现在才说问题出在酒上，真是荒唐——珠妍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这样想道。摇晃的镜头正对着滚倒在汤饭店地板上的透明酒缸，一条蛇蜷缩在里面，它大得简直不像真蛇，倒像个模型。

用活蛇浸泡而成的酒，蛇酒。珠妍哑然失笑，她知道这时候不该笑，但她发现妈妈的反应也与自己大同小异。母女俩看着彼此，笑了出来。到头来，还是因为该死的酒。

据说那条蟒蛇活了很久，体内的寄生虫在接触酒精后一直没有死去，反而进化了。它们侵蚀饮酒人的大脑，寄生在感染者的头颅里，让他们的器官逐渐腐烂，将他们变成失去人性和理智的丧尸，进而操控比自己庞大数百数千倍的生命体。

珠妍想起，自己看过拍摄蛇酒制作过程的纪录片。纪录片中提到，为了让蛇的“精气”彻底融入酒液，蛇必须要在活着的状态下被塞进酒缸。爸爸怎么连那么恶心的酒都下得了嘴？这种对爸爸毫无意义的埋怨，渐渐让珠妍委屈起来。为什么明明每次惹是生非的都是爸爸，痛苦的却是她和妈妈？

绝不拒绝别人劝的酒，这是爸爸毕生的信条。他一周里至少有三天都会醉眼迷离地回家，和珠妍念叨什么因为接了别人劝的酒，喝着喝着便喝到了这一步。当时还在青春期的珠妍并不能理解爸爸的说辞。

“别人劝的酒就都得喝掉吗？喝不下当然要拒绝了！”

喝下那杯蛇酒，也是爸爸的一次无可奈何吗？珠妍怎么想都觉得，那只是他找的借口。爸爸是一个喜欢为自己找借口的人。不熟悉股票赔了钱后，他找借口；当着别人的面嘲讽

一周才出门一次的妈妈是个命好的贱婆娘后，他找借口；把妈妈气哭，又将全家旅行时买的大象木雕扔向妈妈后，他找借口；甚至在被发现把手机里一个女人的号码命名为和家里往来不多的大姑父时，他也找借口了。珠妍望向再也无法找借口的爸爸，心里嘲讽道：

“找的什么破烂借口，看看你自己，现在变成丧尸了吧！”

新闻的最后一个画面是蛇酒和寄生虫在显微镜下的放大照片。珠妍呆呆地看着画面中缓慢移动的寄生虫。它们薄如发丝，表面却有各种细胞在蠕动。那么小的生物都会进化，都会为了生存而变异，可我们为什么还是这副模样呢？

珠妍关掉电视，里屋又传来了呻吟声，吵醒了睡在沙发上的妈妈。妈妈揉了揉眼睛，嘀咕起来：

“你爸可能又饿了吧。”

○

辅导机构的课程会从下午六点持续到晚上十点。珠妍紧了紧爸爸身上的绳索，还是有点不放心，又为他铐上了自己从网上买的手铐。也不知妈妈在想些什么，整天都愣愣地坐在家里发呆。即便现在已经不需要她准备一日三餐了，她仍然不愿迈出家门。珠妍突然感到有点胸闷，逃似的离开了家。

街头一个行人都没有，车道上却挤满了车辆，现在人们已经恐慌到再近的距离也选择开车出行。珠妍今天出门有点早，她打算一路走到辅导机构。走着走着，她不禁再次感慨起韩国人对升学的执着和狂热，在此时局之下，辅导机构也依然不停课。珠妍一到辅导机构就去找了校长，主动表示自己愿意担起这个时间段的全部专题课。每到开专题课的时期，辅导机构都苦于人手不足，因此校长欣然接受了珠妍的申请。

课堂上发生了一次短暂的骚动，起因是电视里的新闻速报。速报上说，政府已经掌握了汤饭店里的首批感染者信息，将在今晚十一点发布第二批感染者的临床研究结果。可想而知，即将发表的名单里必然有爸爸的名字。

政府会派人过来吗？我们是不是得把爸爸交出去？网上流传的怪谈中也有政府为了研发疫苗，正在到处抓感染者回去进行人体实验的说法，珠妍并不认为这是空穴来风，毕竟现在的情况已经足够离奇。珠妍合眼稍作休息，明明什么都没吃，她却觉得肚子里胀得厉害。

下了班，珠妍也决定步行回家。晚上十点，她走在充斥着辅导机构的街头，身边挤满了前来接孩子回家的车辆。各种声音向她传来：有的在询问成绩，有的在夸赞孩子，有的在谈论钱的问题……疲惫与抱怨、担忧与爱意相互穿插，正是无数个家庭的声音。

珠妍开始思考，家人对自己来说究竟是什么呢？她爱爸爸吗？她爱，但并不是只有爱。在他随意欺侮妈妈、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对的、固执己见的时候，她也常常产生不想再见到他的想法。老实说，讨厌爸爸的时候更多。对妈妈也是一样。她很爱妈妈，但她无法理解与爸爸一起生活时的妈妈，有时甚至会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当妈妈把在爸爸那儿受的气撒在自己身上时，珠妍觉得她和爸爸一样讨厌。

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珠妍还是会笑着面对他们，用他们的钱考大学，用他们的钱生活。她偶尔还会对爸爸妈妈说“我爱你”。她很清楚，父母对自己的爱其实比任何人都多，所以有时甚至讨厌起这样的自己。原来铺垫在所有憎恶最底层的，仍然是爱。

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的吧？只有爱没有恨的家庭应该只存在于电视里吧！但那些都是假的。因为她知道，只有适当的虚伪才能维持世界的运转。呼吸着夜间寒冷的空气，珠妍感觉神清气爽多了。远远看到妈妈与丧尸爸爸生活的公寓，客厅隐约透出灯光，看来妈妈还没睡下。珠妍做了一个深呼吸，按下电梯按钮。是时候结束虚伪了。

打开大门，香薰蜡烛的人造花香与里屋发出的酸腐味混合成的诡异气味扑鼻而来，尤其在珠妍外出了一整天之后，显得格外浓郁。妈妈开着电视，孤零零地坐在昏黑的客厅里，和珠妍离开时的状态是一样的。珠妍走近无精打采的妈妈。

“妈，我们把爸送走吧。”

妈妈只是愣愣地握着遥控器，没有言语。珠妍抢过遥控器，关掉了吵闹的电视机。客厅里寂静无声，妈妈的声音是那么微弱。

“我……我也不知道了。”

“妈。”

“你爸不在了，我们要怎么过下去？”

“我们要学着过好自己的生活。”

妈妈无声地凝视着珠妍，珠妍揉着隐隐作痛的额头。

“你看到今天的新闻速报没？公务人员很快就会上门来确认爸的情况了。他已经没救了。”

妈妈叹了口气，强忍着泪水说道：

“我害怕，珠妍。没了那个粗鲁的糟老头，我要怎么活下去？”

“那也没办法啊。”

“是没办法，你说得对。”

妈妈点了点头，仿佛默许了将要发生的事。然后她抬起头，仰视珠妍。

“我有时候会觉得……你真的很像你爸。”

客厅里安静得可怕。妈妈不停用手揉搓着脸颊，珠妍则是一脸发蒙地坐在妈妈面前。

不知过去了多久，妈妈终于安抚好自己的情绪，打破了沉默。

“今天你出去上班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

“谁打来的？”

妈妈掏出手机递给珠妍，对方是爸爸的同事，珠妍曾见过几次。

“他说公司愿意在规定的基础上多给我们一些离职补偿，只希望我们能在消息传出去之前将你爸处理成病死或者是事故死。”

“离职补偿……”

“那家公司不想再引起任何话题了，这还用说吗？公司里都要乱套了，至今为止的感染者全是他们公司的员工，偏偏他们还是一家制药公司，外面当然会议论纷纷了。”

珠妍点了一下对方发来的图片，是一张名片的照片，红底上印着一排老土的黑体大字：

从死亡到火葬，一站式丧尸处理服务！

——Z 殡葬公司

“这是什么？”

珠妍失神地问妈妈，妈妈回答的口气近乎虚脱：

“还能是什么，他让我们打这个电话，说会有人来处理你爸呗。”

珠妍想起来了，自己这几天在网上看到过相关信息，最近有人开辟了这种生意。当然，感染者的亲属要付相应的报酬。据说，若是将感染者交给政府，亲属最后连尸体都要不回，这个传闻早已成了公认的事实。所以大部分想要给丧尸亲人留个全尸的人都会选择这种私人服务。妈妈又开始在旁嘟囔起来：

“我给他收拾了一辈子的烂摊子，到头来，死了还要我推一把。对了，今天政府是不是要发表什么？快把电视打开吧。”

妈妈的眼睛里满是血丝。珠妍捡起地上的遥控器递给她，她用力按下开机键，殷红的血都涌向了指尖。珠妍突然明白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妈妈应该都是这样熬过来的——使出全身力气，强压住内心瞬间涌上的各种感情。

电视里正在直播新闻发布会现场，十五个穿着研究服的专家坐在一起，其中看起来年岁最大的人站起来，走向讲台。

“首批感染者引起的二次感染率是 50%，目前暂未发现其他影响感染的因素。首批感染者牙齿里分泌的细菌与非感染者的血液混合时会发生反应，被感染者的嘴唇与牙齿会出现发黑的症状。若看到有类似症状的人，请立刻拨打 999 进行举报。”

专家用各种难懂的专业用语与图表进行了说明，但最终概括起来不外乎就是以上内容。专家结束说明后，记者们接连不断地提出有关疫苗的问题。专家表示，在研发疫苗的同时，他们也会致力于感染者的隔离工作，然后便结束了发布会。妈妈关掉电视，在客厅里整理被子。

“明早打过去问问吧。”

妈妈裹着被子，背靠珠妍躺下，她看起来是那么的弱小，和珠妍心里以前那个妈妈完全不一样。自从里屋被爸爸占据后，珠妍和妈妈便一同睡在了客厅。也是在爸爸变成丧尸后，她才知道妈妈在睡觉时也磨牙。

3

“等等，这和你昨天说的不一样吧！”

[昨天的承诺不算数了，这是上面的决定，我们也没办法，也很抱歉。但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

改不了了。]

珠妍烦躁地挂了电话，她怕再听下去自己真的会说出粗话来。

“他说离职补偿只能按照规定给。明显是因为首批感染者的名单公开了，政府会出面处理，所以他们不想贴太多钱了。”

珠妍早上一起来便打给了爸爸就职的公司，谁知公司一夜之间变了说辞，表示只能按照规定支付离职补偿。

起初珠妍并不在乎离职补偿的金额，但在问了殡葬公司的收费标准之后，她彻底改变了主意。这些公司的收费标准高得超乎想象，她需要钱。结果她只能放弃正规殡葬公司，转而选择私人公司。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价格公道的公司，但对方的服务只包括提供工具并协助举行葬礼，处理丧尸的环节还是得自己上手。

珠妍焦急地计算着即将进账的钱与未来的开销。爸爸在制药公司工作的年头不短，相应的离职补偿可以用来委托一家不错的殡葬公司；可如果真用在这上面，以后母女俩的生活便成了问题，因为根本剩不下多少钱让她与妈妈开始新生活。

里屋传来了咆哮声，饥肠辘辘的爸爸变得一天比一天凶暴。楼下的邻居已经因为噪声的问题上来找过好几次了。不能再拖下去了。珠妍一脸复杂地自言自语起来。

“怎么办？”

与其说这是寻求答案的提问，不如说更接近心烦意乱下的抱怨。这时，一直都在默默看着珠妍的妈妈突然站起身向厨房走去。她在碗柜里翻了很久，回来后递给珠妍一个东西。是一本存折。

“这是我存的应急资金，本想等你结婚时再给你的。先拿去用吧，你爸的离职补偿和保险金还是先存下来吧。”

珠妍定定地看着妈妈递来的存折，至于金额多少，她压根没往心里去。妈妈拿起珠妍的手机，打开刚刚的通话记录，漫不经心得就像在点一碗炸酱面。

“我们是刚刚打来咨询的人。我们决定好了，想和您那边定个日子。”

她们将送走爸爸的日期定在了三天后。

第二天，好久不打扮的珠妍简单化了个妆，带着妈妈一起出了门。她们先去银行将定金汇了过去，收到确认短信后，又取了点现金，以便结束后支付尾款。中午，珠妍带着妈妈去吃了好久没吃的意大利面。妈妈虽然觉得不好吃，但却表示很开心，心情轻松了不少。下午母女俩又去了书店，买了妈妈之前帮珠妍看好的资格证备考教材。

“都忘了咱们俩有多久没一起出来了。”

“是啊！”

珠妍紧紧靠在妈妈身旁，和妈妈肩膀贴着肩膀。看到她这个样子，妈妈抿着嘴微笑起来。一股莫名的希望从心里滋生，珠妍觉得她们以后一定能生活得很好。她们也必须好好活下去，若只因为少了个爸爸就落魄下去，那岂不是太冤了。她们要好好活下去，即使没有爸爸。

一直逛到傍晚时分，两人才回家。珠妍手上提着超市的购物袋站在一旁，妈妈按下了电子锁的开门键。门一打开，臭烘烘的气味直冲玄关，远比平常刺鼻得多。珠妍满心狐疑地与妈妈一同迈进家门。这时，离玄关最近的洗手间门突然被推开，爸爸怪叫着跑了出来。粗大的绳索和手铐还挂在他的胳膊上，也不知他是如何挣脱的。

珠妍下意识地将妈妈推开，挡在她前面。妈妈的背撞在鞋柜上，踉跄着就要摔倒。珠妍紧紧闭上眼睛，她感到爸爸粗短的牙齿正在用力嵌入她的脖子。那黑不溜秋的牙龈上冒出的牙齿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珠妍痛得一点声音都发不出，妈妈却在这时尖叫起来：

“你，你这老头子！”

妈妈出现在了珠妍的视线里，不知何时，她站在了想要撕咬自己皮肉的爸爸身后。珠妍重新闭上眼睛，耳边传来“砰”的一声，爸爸瘫倒在地。珠妍摸着渗出淡淡血痕的脖颈，睁开了眼睛。她震惊地看着眼前异常又陌生的场景，妈妈正用高尔夫球杆殴打爸爸。

回过神的珠妍急忙拿起绳索，骑上爸爸满是疮痍的躯体，手忙脚乱地捆绑起来。爸爸踢着双腿，拼命挣扎，于是珠妍把他的腿也绑了起来。脖子不时传来刺痛，好在并没有掉块肉下来。

勉勉强强将爸爸绑紧后，珠妍和妈妈才终于坐了下来。似是还未从打击中走出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人说话。随后，悔恨涌上珠妍的心头。和丧尸一起生活，理当做好万全的准备，是她太大意了。妈妈慌里慌张地爬到珠妍身边，想要抚摸她的脖颈，珠妍打开妈妈的手。

“以防万一，还是不要摸了。”

珠妍照了照镜子，脖颈上留有清晰的牙齿印。妈妈挂掉电话，走到珠妍面前。

“我，我去拿药箱过来，你等一下。”

每动一下脖子，都会感到刺痛。珠妍依稀能看到妈妈在阳台储物柜里翻找药箱的背影。她闭上眼睛，回想刚刚的场景。妈妈竟然会用高尔夫球杆殴打爸爸，有点可笑。想到这里，珠妍露出了一个没心没肺的笑容。她看向被紧紧绑着、还不放弃挣扎的爸爸，嘀咕了一句：

“爸，现在在你眼里，连女儿都成食物了吗？”珠妍一瘸一拐地走向客厅，之后可能打了几个盹

吧，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妈妈正在用浸满消毒药水的酒精棉为她擦拭伤口。每当棉花糖般的触感扫过脖子珠妍的肩膀都会颤抖一下。妈妈的手法细腻又温柔。珠妍这才想起，妈妈在与爸爸结婚前，曾是一名护士。

“不会有事的。”

妈妈一边这样说着，一边点了点头。那句话听起来就像安慰自己的咒语。妈妈出乎意料地没有哭，珠妍却感到自己快要忍不住泪水了，于是将头蒙在被子里。她对躺在身旁的妈妈说：

“不要躺在我旁边，要是我突然变成丧尸怎么办？去我房间睡吧。”

“没关系。如果你真的变成丧尸了，一定要咬妈妈。”

“别说这些奇怪的话。”

“妈妈是说真的，你一定要咬妈妈。”

妈妈隔着被子紧紧拥住珠妍，珠妍吸溜着鼻涕闭上了眼睛。她睡不着，便一直安静地蜷缩在妈妈怀中。过了一会儿，头顶传来均匀的呼吸声。珠妍睁开眼睛，抬眼看向妈妈。妈妈又磨着牙睡着了，从她紧闭的双眼与嘴角，可以看到岁月留下的抓痕。珠妍抬起手，抚摸着妈妈的脸。

耳边是爸爸的低吼声，一整晚都没有停。一家人也曾有过很幸福的时候，可那已经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呢？珠妍一边回想着过去，一边进入了浅浅的梦境。

她梦到了小时候，那时的她小巧得甚至能一屁股坐在爸爸脚背上。零点前微醺着赶回家的爸爸心情很是不错，他先将妈妈递来的汤喝完，然后便会举起珠妍，一边叫着“坐飞机喽”，一边晃动手臂。那时的珠妍总是笑得很开心，仿佛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如果爸爸将她放在地板上，她又会摇摇晃晃地爬回去，抱住爸爸的脚踝，一屁股坐在他的脚背上。就像古树上的蝉，还像一只可爱的小树懒。爸爸会故意发出滑稽的声音，大步向前走起来，她就会咯咯笑个不停，一如坐在游乐设施上那般。每当那种时刻，爸爸都会豪爽地大笑出声，妈妈也会在旁抿着嘴笑，大家都在笑着。明明他们也曾那么幸福。

一觉醒来，珠妍的嘴唇已经开始泛出紫色。妈妈安慰珠妍：

“没事的，珠妍。妈妈陪着你呢。”

怎么可能没事？珠妍像个孩子似的，在妈妈面前哭了起来。

4

殡葬公司派来的女人脸上爬着一道长长的疤痕，从下巴一直延伸到额头。她让珠妍母亲叫她敏，然后便毫无顾忌地拿出各种可怕的工具，摆在餐桌上。小斧头，电锯，霰弹枪，长镐。从她泰然自若的表情来看，她确实像个有经验的老手。珠妍小心翼翼地提出心中的疑惑：

“请问您是如何做上这一行的？”

女人瞥了一眼珠妍，不耐烦地答道：

“都是赚钱的事，莫名其妙地就做上了。我爷爷以前是猎户，没想到我现在也靠这手艺谋生了。”

珠妍沉默着点点头。当敏看向她脖颈上的伤口时，她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

“你被咬了？”

“对。”

敏拿起霰弹枪。

“我小时候听奶奶说过，巨蟒的诅咒会持续三代，所以我猜这次的事件也要到第三批感染者才能结束。”

她的推理听起来还是很有可信度的。和新闻上说的变异寄生虫、感染、病毒之类的专业名词比起来，敏口中的迷信说法反倒更像那么回事。珠妍脑海里浮现了不妨一试的念头。

“没有补救的方法吗？”

敏突然抬起头来看向珠妍。不知为何，珠妍觉得女人的视线与蛇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

随即女人又转过头去给霰弹枪上油，咔嚓地组装起来。她一边从简易口袋里拿出弹药，装填上去，一边回答珠妍：

“我们猎户确实知道一个方法，等完事后再来说吧。”

在此期间妈妈就像在准备什么仪式一样，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爸爸，脸上的表情无比悲壮。珠妍看不透妈妈的视线里掺杂了什么。上一秒妈妈还像是在看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一样，眼神里充满了同情与怜悯，下一秒面部似乎就会突然扭曲起来，仿佛面前站着什么可怕的东西。珠妍想象着即将发生的事情：为了彻底消灭作祟的寄生虫，她们必须先把被寄生虫感染的脑部打碎。这时，完成组装的敏将霰弹枪递给珠妍。

价格低廉的代价，便是制伏与射杀必须由委托人自己完成。珠妍接过枪，不知为何，嘴巴里格外干涩。这样真的可以了结一切吗？真的可以就这样送走爸爸吗？这是对的吗？为什么一切结局都是如此让人难以面对呢？

无意间，珠妍的手扫过脖子上的牙印，它应该会成为爸爸最后留给自己的痕迹。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案，自己应该会步爸爸的后尘，说不定就连妈妈也……一家人相亲相爱地共赴黄泉，这样的结局可真是惨绝人寰、不留一丝悬念啊。突然，珠妍莫名想起昨夜梦里的那三张笑颜。

“等等，等一下，我……”

珠妍放下枪，痛苦地喊道。敏皱了皱眉头，转身疑惑地望向珠妍。

“一分钱一分服务，你知道的。”

“我知道，我知道……请先等一下。”

爸爸被绑在珠妍面前，一边流着口水，一边扭动着身体。珠妍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她也不知道自己想要怎样。她应该处理掉爸爸的，现在不开枪，只会让他们的结局更加难堪。可她依然犹豫了。她这时才恍然发现，自己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和爸爸说，但爸爸应该已经听不到了。

“唉，白忙活了！”敏捡起枪。就在这时，一直缩在后面的妈妈突然从两人之间挤了进来，一把抢走了敏的霰弹枪。

“直接这样一拉就可以了吗？”

敏稀里糊涂地点了点头。

嘶。也不知是谁倒抽了一口气，是自己，是敏，还是妈妈？珠妍抬起头，望向眼前。妈妈站在离她一步远的地方，正拿枪瞄准爸爸。虽然妈妈的姿势无比松垮，端着厚重又修长的霰弹枪的手看起来是那么吃力，但枪口却没有丝毫偏移地对准了爸爸。妈妈的声音里充满了郁结与愤怒：

“你这该死的糟老头子，到死还要拖累孩子。”

“妈！”

所有动作都在那一瞬间完成了。砰的一声，腐臭的血味钻进鼻孔。妈妈双腿的力气仿佛也被出膛的子弹抽走，她瘫软在地上。再一次，妈妈打破了珠妍的预期，她没有呜咽，就只是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地板，仅此而已。霰弹枪被她随意丢在地上。

敏面无表情地收起自己的装备。珠妍回过神来，望向眼前的惨状。爸爸破碎的脑袋里流出近乎黑色的血液。珠妍伸手扶起妈妈，妈妈则像是撞了鬼，脸色惨白。珠妍将妈妈扶到沙发上，随后又回到尸体旁。尸体，直到这一刻，爸爸才终于变成了尸体。珠妍抬起头，鞋柜旁墙壁上的镜子里映出自己的模样。嘴唇的颜色好像又深了一点，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可笑的是，她突然有种预感，自己的生命也需要交由妈妈来决定。想到这里，她心里蓦地舒服了一点。

敏一直缩在尸体前没有起身，她戴着医用手套，在爸爸爆裂的脑袋里翻来找去。“找到了！”她从爸爸脑袋里抽出了一条长长的东西。

珠妍皱起眉头，那个突然多出来的东西让她难以置信。那是一条蛇，从爸爸脑袋里钻出一条小蛇！它是那样小巧，甚至很难辨别出它是蛇还是泥鳅。敏一把掐住它的脖子，将它扔进细网兜里。在旁看着的珠妍问：

“要扔掉吗？”

“拿去给巫婆。直接扔掉可是会出大事的。”

“对了，您之前说要在完事之后告诉我的是什么？”

敏突然抬起头，看了看珠妍，又看了看妈妈。珠妍焦急地催促起来：“请告诉我吧！”

敏一边紧紧系着网兜一边说：“我爷爷也是因为喝了蛇酒去世的，而且我当时也病得快死了。后来听奶奶说，给爷爷举行葬礼的时候，爷爷的胸口里突然钻出了一条蛇。”

“……”

“奶奶抓住了那条蛇，带着它去找了巫婆。你们知道巫婆说了什么吗？她竟然让奶奶回

去给蛇举行一场祭祀。奶奶回去操办了祭祀后，那条蛇就化为灰烬，消失不见了。而我的病居然也痊愈了。”

敏晃了晃手中装着小蛇的网兜，一脸呆滞地听完整个故事的妈妈猛地抢过网兜。

交代完蛇的事情后，敏帮珠妍一同处理了爸爸的尸体。费用里包含处理尸体的服务，所以珠妍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她的帮助。妈妈觉得自己已经亲手送走了爸爸，无须再跟着去火葬场，便和那条小蛇一起留在了家里。

珠妍将尸体装进一个巨大的塑料袋，坐着敏的货车，来到首尔郊外的一家火葬场，火化了爸爸。与其说这里是火葬场，不如说更接近焚烧厂。风推着黑烟，席卷而来的热气擦过珠妍的脸颊。看着摇曳的火光，珠妍喃喃自语。

“爸，一路走好。”

珠妍再没能说出其他话。敏送回珠妍后便离开了。珠妍把装有爸爸骨灰的缸子递给了妈妈。

“都结束了，妈。”

妈妈抬起头看着珠妍，眼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

“不，还没结束。”

妈妈攥紧了手中的网兜。“你好好活着才算结束。”

○

那天珠妍回到家，餐桌上已经摆满妈妈买回来的祭祀食材。妈妈凭借二十多年来一手帮婆家操办祭祀的本事，为蛇准备了祭祀桌。她将水果摆好，处理了所有食材，最后将装有小蛇的网兜放在了最前面。神奇的事发生了，之前还时不时盘动一下、以此凸显存在感的小蛇在妈妈点燃线香后突然安静了下来。珠妍与妈妈肩并肩站在祭祀桌前，不禁哑然失笑，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做什么。“快点行礼啊，傻孩子！”

妈妈拍了一下珠妍的背，接着很认真地给小蛇行礼。珠妍只好跟着妈妈一起弯下了腰。

○

吃完饭后，珠妍与妈妈肩并肩坐在沙发上，一边吃着前几天祭祀撤下的水果，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一群巫婆共同举行法事的场面。

她们是在山上举行的法事。据说共有三座山里可能栖息着那种蟒蛇，而电视里这座山已经是其中的最后一座了。很久之后人们才知道，当时政府一直在研究蛇的皮肤组织与品种，并不是为了研发疫苗，而是为了确定举行法事的场所。

直到最后，政府也没能成功研发出疫苗，包含爸爸在内的十五名首批感染者全都死了。光是政府掌握到的第二批感染者便超过了二十名，其中差不多有一半人并没有真正被感染；剩下的十几个人则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变成了丧尸，也都死了。珠妍不属于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她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感染者。

身穿防护服的公务人员在三天后才来找珠妍家。一向都是如此，不管什么事情，官方处理都要比个人慢得多。当时她们已经完成了爸爸的死亡登记，珠妍将爸爸的骨灰缸拿出来后，公务人员便一脸狼狈地打道回府了。

所幸没有出现第三批感染者。也许病毒本会传播到第三批，政府好不容易才成功阻止了。那时政府刚完成第一次慰灵祭。他们猜测那条蛇可能来自三座山中的某一座，于是决定干脆在每一座山上都举行法事。

这已经是最后一场慰灵祭了。镜头里的那具蛇尸足有一米多长。珠妍很诧异，竟然会有人想用那样的蛇泡酒喝。她有点好奇，它是原本便那么粗壮，还是在窄小的酒缸里变大的。

法事快结束的时候，村庄里那棵与山相连的大树突然开始剧烈晃动，四面没有一丝风，树叶却哗啦啦地往下掉。突然，不知从何处钻出一条巨大的蟒蛇，横卧在法事现场。巫婆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恭敬地跪拜起来。这条蟒蛇绕着死去的蛇缠了一圈后便消失不见了。法事结束，所有画面都粗劣得像十年前的猎奇节目，但这场法事确实是由政府主办的。

家中弥漫着淡淡的香味。法事结束后，巫婆们将蛇的尸体埋在了那棵大树下。珠妍想起，前天自己也与妈妈一起将祭祀后化作齑粉的小蛇埋在了小区后的小山里。看着电视的妈妈忽然喃喃自语起来：

“真是丢国家的脸，这是在做什么啊！”

“妈不是也祭祀了那条蛇吗？”

“那能一样吗？”

妈妈迅速转移了话题。

“下周去看看你爸吧。”

珠妍点点头，抚摸起脖颈上爸爸留下的牙齿印。虽然牙印消褪得很慢，但它确实在一点点变淡，最终会在某一天彻底消失。



赵艺恩

1993 年生。凭借《刀，重叠的刀》获“黄金枝出版征文赛”优秀奖，后凭借《转嫁》获第四届“教保文库故事大赛”金奖。作为从征文赛事崭露头角的“90 后”代表作家被誉为“韩国文学的宝石”仍在为打磨出好故事不断创作中。其他代表作品有：《新首尔公园果冻贩大屠杀》《雪球疾走》《热带之夜》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Akinori UEMURA](#) on Unsplash

小说

平乐县志

颜歌 | 新书试读

一个年轻女孩的归来与出走，
一座世相起落的川西小镇和它背后的时代。

《平乐县志》是作家颜歌最新长篇小说，也是其“平乐镇系列”终曲。全书共十四章，以平乐镇东街为故事发生地。以即将退休的县志办副主任傅祺红和其儿媳陈地菊为双主人公，串起一对青年男女的成长离合与小镇官场的世相起落。人人都各具心事，欲求圆满而不得。当这两条线交汇，织成一个被精心设计的陷阱，丝丝缕缕剖开局中之局，生死残酷的机关一触即发。整部小说像平乐镇的一份文学档案，全景式地记录下 2010 年左右平乐镇东街的全貌与人心浮动，折射出小镇的城市化、互联网经济发展等诸多时代变迁的印迹。

经理想国授权，我们节选了本书第十四章分享给读者。



县志办办公室里头最近很有点人仰马翻，鸡犬不宁说起来还不是因为四个字君心难测，再补四个：想些来整。本来，今年子县志办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完成二十年大县志的初纂一审，因此其他的年鉴啊地情文献啊之类的工作都统统排到后头去了，全办公室的人加班加点地理资料、撰稿、统稿，眼看胜利在望了。哪想到，十一假期才刚刚过完，忽然咚

地下来一个手谕，说要求县志办务必在年底之前把二〇〇七到二〇〇九年的三年年鉴整出来，最好是十二月份就要拿定稿来给上头过审。

这一下满办公室的人都是瞠目结舌的，彻底成了铁棍杆上的耗子——没了抓拿。苏聪说的这不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吗，吴文丽说死倒是简单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分钟都要不到。问题是这三大三年的年鉴，虽然每年各乡镇单位的资料都交上来了，但是还全部都堆在资料室里头生灰，黄瓜都还没起蒂蒂这就喊我们整个菜出来马上要等到吃，请问是不是在搞笑？

当然了，会议室里头坐了一圈没哪个笑。傅祺红就更笑不出来了，他一双眼睛盯着他底下的人愁眉苦脸，心头不免有些火烧火燎。这些做事的人还懵懵懂懂，但他老傅这管事的却心头有谱：下这异想天开的指令的不是其他人，正是我们县上的一把手，县委书记熊国正。而这姓熊的忽然慌到赶到想要这二〇〇七到二〇〇九年鉴的原因也不难猜，大概是因为（据小道消息说）中央纪委的人已经下来了，正在彻查市委李书记的贪污腐败案，估计李下台是早晚的事了——那么你就算一算嘛，所谓的巢倾卵破，再加上一个萝卜一个坑，李书记下课必定要牵动一堆人遭殃，紧接着组织上就要蹭蹭把人朝上头提了。而我们的熊书记呢，眼看着也就只能再坐一届了，这一趟再不上就真的上不到了，因此肯定是要铆足了劲，调动各方资源来颂他的政绩表他的成果。那一九八六到二〇〇五的二十年县志记的都是前朝旧事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这人才下了急令，喊县志办必须要把这二〇〇七到二〇〇九年的年鉴赶出来，真真个急功近利、公报私用。

傅祺红默默把心头这口气吞了，脑壳抬起来，脸皮也拉长了都是肃穆。“既然上头话都下来了，”他说，“我们这些人也只有好生做，尽快把任务完成了。这样，我来弄概况和政治部分；苏聪，你和小曾搭手来整经济——这个是重头戏，得多费些心；吴主任，你就和小杨一起负责把文化和社会生活搞了，剩下的人物乡镇企业和其他的我再来想想办法，不然就去党史办，不然去中学里头借调两个笔杆子过来，帮我们一起整，大家这个月辛苦一点，先把头手其他事都放了，加班加点一下，应该可以……”

他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吴文丽把手高高举起来，长梭梭像一根白萝卜。“傅主任，我就有点不懂了。”她说，“我一直都是带小曾的，我们两个一起做事也早就做顺了，这咋又换了个人给我？”她瞟一眼小杨，对她一笑。“不是说我对其他人有意见，问题是我们既然现在都在赶时间，我哪儿还有空来又要重新磨合，不是反而把多的都耽搁了？”

吴文丽的话赤瞎瞎地说出来，满屋的人一下都有点尴尬。傅祺红心头清楚得很这女人是舍不得人家小曾能干，想到搭个会写稿的她就好梭边边，遇到小杨不如小曾灵性，她就生怕自己要多干事了，因此当然不安逸要发杂音。他眼睛扫过去看一看小杨，就看到她满脸通红，嘴巴撇起来像个要煮破的饺子。再看看苏聪呢，便见这小子是静如处子，脑壳埋下去，把圆珠笔死捏在手上，一动不动——早在放假之前，傅祺红就把苏聪喊到他办公室里头来跟他摊了牌，说他跟小杨的事他已经了解到了，也把人家小杨那边暂时安抚下来了，那么这一回姑且既往不咎，但是这种原则性错误以后绝对不能再犯。

当时，苏聪那张本来一向白生生的脸居然涨一涨地发了紫，嘴皮也白了，哆哆嗦嗦半天，终于说：“谢，谢谢傅主任。”

“唉小苏啊，”傅祺红说，“人这一辈子总是要犯点错，特别是你还年轻，就更是难免。我呢，也不是啥老学究，更不想教育你在男女关系应该如何去处，但这件事情里头你最不该犯的其实是扯这个谎，跟小杨说我们这儿有转正的指标。你看你扯了一个谎，我们就都要源源不断地编出些假话来圆这个谎——这就像是吸毒一样，一旦进去了，就轻易都出不来了。”

“是，”苏聪说，“傅主任你教育的是。”

“我不是要教育你，”傅祺红说，“这道理也是我看多了血淋淋的例子才学来的。特别是我们这政府里头，人与人之间更加复杂。说不好今天要帮你的，明天就要害你，因此千万不要万事谨慎，站够脚步。不然你看嘛，一旦你有个把柄落到其他人手头了，你就这辈子都不要想安生了。”

他这话慢吞吞地说出来，声音虽轻，分量却重，压得苏聪脑壳埋得死死的，身身缩起来像是个淋了雨的秧鸡儿。“对，”他说，“你说得对。”

傅祺红叹一口气：“小苏啊，我是真的希望你这一回到教训了。这事呢我反正就尽量帮你压嘛——但你这幌子确实扯得有点太大了，你说我们哪个有那本事，去给那小杨伸手一抓就抓个名额回来给她？也就看嘛，我们只有先把她安抚到，走一步算一步嘛。”

苏聪还是没抬脑壳，心头想的是办公室里头早就传遍了的八卦：傅主任找了关系要把他儿媳妇调到政府办去了，而且是先上车后买票，公务员都先不用考的！

“谢谢傅主任，”他说，“谢谢傅主任。”

傅祺红看他那造孽兮兮的样子，又叹了一口气出来。“你不用谢我，”他说，“你好生工作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你看嘛，我们这办公室里头除了你，哪儿还找得出来第二个真正能写文章的？”——是这道理啊，当时傅祺红想，安顿自己懦懦的良心和跃跃的私心，所以我帮他也是帮我自己，不然他要是再遭整起走了，这一箩筐的事还有哪个来帮我做？

还有哪个来做事啊？傅祺红又把这话默默地跟自己说了一遍，再看一圈这几个散兵游勇一个个坐得又胖叉巴，最后才把眼睛落在吴文丽的身上。他说：“那这样嘛，吴主任，既然你不想麻烦带人就干脆跟我调算了你来弄概况和政治我来跟小杨做文化和社会生活，这下总对了嘛？”

陈地菊坐下来，才发现她的写字台上已经积了薄薄的一层灰，手放上去就是一个印子。转眼间，她搬到傅家去已经要一年了。最开始她还经常回天然气公司家属院，吃个饭，跟她妈妈摆会龙门阵，然后再去她的寝室里头拿点衣服，找两本书——那一阵，每一次走进来她的寝室里都是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据她爸说，叶小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来把她寝室抹一遍，“就跟打扫神龛一样”。

她妈妈是多久没来收拾过她的寝室了？陈地菊想。她甚至一下都想起来自己上一回来，坐到这张写字台前是什么时候。她本来想去厨房里面拿张抹布，但犹豫了几秒钟又算了——反正总归都是要积灰的，又何必抹它？

有诗为证：

秋光秋影入秋室，红稀香淡，旧台无心扫。
一番风雨一番凉，往事流连，何处梦明朝。

她弓下腰来，一把拉开写字台抽屉最下面那一个，里面一叠叠摞起的都是她高中大学时候的纸纸片片。她把它们都搬到写字台上，一张一本地翻过去：笔记本叠起笔记本卷了边边，模拟卷贴考试卷粘成了一饼，还有复习时候写的提纲，课上传的纸条条，同学和笔友写给她的信，零碎碎的光写了个开头的文章，以及各种成绩单、卡、学生证、图书馆证，上头是她十五六岁十七八岁二十二岁时候青寡的脸，有时候圆些，有时候又尖了。

她翻过她大学时候宏观经济学课上的笔记，上头的字草得她自己都认不到了，红笔画了些圈圈，记号笔写的“必须背”“默写三遍”。又有她高考前模考的卷子，像是掉到水里头又捞出来了，和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卷子皱起糊起在一起，凝成了一块硬邦邦。还有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她南京的笔友写给她的信：“……最终差了三分没上复旦，哭了整整一周。算了，同济就同济吧，我总是下了决心不复读的。明年寒假你来上海吗？或者我可以到九寨沟玩，顺便找你……”

这么多年了，陈地菊看到这信心头还是一紧，手腕子一翻把这几页旧纸卡回去，又接着往下找。她拿起来一本薄薄的笔记本，封面上一只泰迪熊，四个彩虹色的字：“美好生活”。她一下想不起来这本子是哪儿来的，翻开才发现是她曾经的日记本。实际上也算不上日记，就是她断断续续写下来的一些随想，用了大概有半个月就荒废了，难怪她没印象。那时候她的字要端正些，陈地菊翻了几页，看到这么一段：

“想不出来明年这个时候我会在哪里。每个人都说考不上大学你就毁了。那么说不定明年这时候我已经死了。但或许，可能死根本不是最可怕的事，大学没考上还要活下去才是最可怕的，一天天的都看不到尽头还要一直活着是最可怕的。周老师说的话虽然很残酷，但的确是有道理的，我这种成绩现在才想去拼上海交大肯定是来不及了，的确是西南财大要更加实际一些。‘实际’，意思大概就是要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吧。”

陈地菊忍不住笑了起来。一瞬间，她希望她可以时光穿越回去，跟那个十六七岁的她自己说：能考上西南财大就已经很不普通了。她不知道那一个陈地菊会作何感想，当她得知自己根本没有考上西南财大，只不过上了一所本地的二本，工作了几年也没有长进，依然是个一文不值的前柜。最终，她不但没有考上外地的大学，甚至干脆嫁了个东门上一条街长大的，还和他爸妈住在一起，每天睁眼睛出门，闭眼睛睡觉，周而复始，终而复始。

陈地菊叹了一口气，出来的这一声是那样沉沉，把她自己都吓了一跳。她眨了几下眼睛，把这本子放回去，又继续在这一堆纸里面翻下去——她是下了决心了，这个抽屉找不到就找下一个抽屉，写字台抽屉里面没有就去找床底下的纸箱子，总之不把东西找到绝不放弃。

皇天不负苦心人，最后还是遭她找到了两个齐崭崭的蓝本子，她的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陈地菊翻开，看着照片里面她自己那瓜兮兮的样子，头发扎起来一个马尾，脸上没有打粉，又偏偏专门擦了口红，太红了，落在那黄垮垮的脸上，像是哪个拿红笔画上去肇要的。

她站起来一下觉得脑壳有点晕，把手扶在椅子背上站稳了，也不管一桌一地的狼藉，把椅子推进去了，拿着这两个本本走出寝室去，走到客厅里面坐下来，狠狠地吸了两口气，才慢慢地听到了她自己的心在跳。咚。咚。咚。

伸手过去她把她的手提包拿过来，摸出一张对折好的A4纸，打开来，再把里面的内容最后看了一眼：

辞职信

尊敬的代行长……

她把这信折了回去，拿手掌抹了几抹展平了放到毕业证里面去，确保它不得遭压皱，又把两个蓝本本都放进了包包里——陈地菊站起来，趁她爸妈还没回来之前，几步走出了陈家的大门。

往年家，每到重阳一过，秋意愈见浓重了，傅祺红就总要诗兴发作起来作两首七绝，再不然填一阙“清平乐”或者“减字木兰花”，赋些秋风落叶，黄菊散满庭之类——也就是看到物候变化了，之前妖娆兴盛的都渐平淡萧索了，他老傅心头的愁绪就汨汨地泛滥开来，掩不住，硬是要化成些形销骨立的截句。每到这个时候，唯一能宽他心的就是去畅想他退休以后的生活，想到到时候闲下来了正好把这么多年写的文章都整理出来，弄个集子，再把几十年记下来的日记好生看几遍，说不定就能触发些灵感，整一个长篇出来，以他个人这一辈子的沉浮来折射我们国家这五六十年来的蓬勃变化，还正好可以利用他县志办工作这些年积累下来的观察和数据，真正做到包罗万象，写尽众生百态，写透人情世故——每一回，一想到这里，傅祺红再是消沉的意志也要重新被振奋起来，胸口里头激荡起少有的昂然。甚至，他连书名都想好了，不如就叫作“大志”，而他自己也可以仿效前人取个笔名，类似于：平乐孤翁。

——这是往年家的情况。

到了今年子，也说不清楚是哪儿不对，重阳早就过了，眼看都霜降了，马上就要说立冬的话，傅祺红却一首诗都没写出来。他估摸大概是这一阵事情实在太多，有他办公室里面的人事纠纷，上头下来的各种任务压力，又有他儿媳妇调工作的事，还有他那宝器儿子欠的账。你看他这一大清早就到了办公室，茶水泡了，端端坐下来在他的办公桌前，手上捏着从他儿子那抄来的周在鑫的号码，眼睛盯着桌子上方方的座机，就硬是提不起气来打这个电话。

当然了，电话本身他是打得来的，无非就是把话筒先提起来，手指拇指照着纸条条上的号码按下去一、八、六……十一个数字按完听筒里头就该响起嘟嘟的声音，声音响一阵电话那边就该有人接起来说话，十有八九说的都是“喂”。

接下来麻烦就来了。傅祺红在脑壳头想了又想，腹稿打了一遍遍，硬是没有一稿满意。他是该说：“周总，你好啊，好久没联系了。不晓得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以前项目办跟你打过交道的傅祺红。”或者说：“请问是周先生吗？我是县政府的，姓傅，以前在项目办当副主任，现在是县志办的主任。”不然干脆说：“周在鑫，是我，傅祺红。以前你们天山找政府买七仙桥那块地的时候，我帮过你的忙呢……”

傅祺红正在揪心挠肺地搞排练，就听到办公室门吱呀一响，打开来走进来一个亭亭玉立的小杨，手上抱一堆资料，脚后跟一带把门关了。

“哎，哎，”傅祺红赶忙说，手头的纸飞飞塞到抽屉里，“你不关门嘛，不用关门。”

小杨抱的资料垒起来抵到了她的下巴尖尖。她直端端走过来把这些都放在傅祺红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文化局和旅游局交上来的二〇〇七到二〇〇九年的全部大型活动、社区活动、园区开发的文件，我把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都用红笔勾出来了。”

傅祺红把资料柜的门关了，转过身来，一双眉毛皱拢了。“你这女子！”他叹口气，“我给你说了几回了，红笔只能我改稿的时候用，其他情况一律只用蓝色或者黑色的签字笔。”

“我是害怕你看不到嘛。”小杨说，有点委屈。

傅祺红笑一声：“白底黑字，我又不是瞎了，咋会看不到？”

两个人话说到一半，忽然听到门上又是咚咚两声。今天才闹热的，傅祺红想，就看到门一开走进来一个脸上笑眯了小胡子收拾得油光水滑的，可不正是他的老熟人，组织部的副部长夏定青。

傅祺红心头咯噔一声，料到此人此时来到此地来肯定是有好事，面子上他还是绷起了，喊一声：“老夏啊，好久不见！难得你还想得到我们，大驾光临到我们这……里头来，简直蓬荜生辉了。”

夏定青本来手抱起来要作揖，结果眼角一扫看到端端还站了个年轻女娃娃，不禁把她多打量了两眼。

“这是小杨，”傅祺红说，“我们这儿的实习生。小杨，这是组织部的夏部长。”
小杨脸上立马露出一个笑来，眼睛里面也莹莹的。“夏部长好！你喝茶嘛？我来泡。”
她话一说完没等两个老的有多余的反应，便脱免一般两步走到饮水机边上的柜子前面，轻车熟路地拿出来杯子和茶叶罐子，又问：“傅主任，我也给你泡一杯啊？”

“我这儿有茶了，你不管我。”傅祺红说，觉得有点尴尬。
夏定青倒是笑呵呵的，说：“老傅啊，你看你简直福气好。手底下一个二个都能干得很嘛！”他一边笑，一边闲步踱过去，走到傅祺红办工作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一副要在此安营扎寨的样子。

傅祺红的心跳得更快了。他勉强把自己稳住了，走过去把桌子上那堆文件抱下来放到地下，再转进去在自己位子上安顿下来，隔着一个空荡荡的办公桌和夏定青双目对着两眼，好似蛾儿向着蟾蜍。

“来，夏主任，你的茶。”小杨走过来把杯子放下来，再把茶杯盖斜起盖好漏出些缝缝散气。“有点烫，你稍微等会儿喝。”她把这过场做完了，就再笑起来，一边退了出去。“那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聊。”轻手轻脚地把门掩起来关了。

“哎你这实习生确实是有点灵性，可以，可以。”夏定青又说了一次。

忽然间傅祺红脑壳里头灵光一闪，想这姓夏的莫不是走哪儿听说了苏聪和这女子的事，要理抹我手下的人？要真是那样，他老傅也就再没他法了，只能把苏聪交出去喊组织上处理，反正他对这小子也是仁至义尽了——他一边想入非非，一边隐隐松了口气。

“老傅啊，我也不跟你卖关子，”夏定青说，“我这趟来是给你说你儿媳妇调工作的事。”傅祺红的心掉下去了，哐当一声把他的脾胃肠都砸穿了。

夏定青看他脸上那样子，呵呵笑了起来。“哎呀呀，我话还没说完呢，”他说，“你不要捞起一半就开跑嘛。你儿媳妇这工作是肯定要调的——我们都给你说好了，人家肖主任那儿的位置也给你留起了，绝对不得反悔。”他把桌子上的茶杯拿起来，吹了两口，杯子倾一倾将那茶水在嘴唇上沾了沾，的确是滚烫，就又放回去了。“只不过现在有这么个问题。你也听说了嘛，中央纪委的人下来了，主要是要调查市上那个人的问题。”他顿一顿，手指摸朝天花板一指。“现在估计李是要下来了，下来了哪个要上去就都等到在看——这真正是个紧要关头啊。所以书记格外交代了，喊我们大家都要更加谨言慎行，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整娄子出来。我们现在的意思呢，就是看能不能把你这调动的事情缓一缓，等中央的人调查完了走了，该下的人下了该上的人上了，再来做计较。”

所以你看这官场上是不是波谲云诡，丝丝相扣，真正是投一石则起千层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方。傅祺红哪想得到上两星期市上开会听来的闲龙门阵居然扭起绕起跟他这区区小官搭上关系，不只把他的事业牵动了，现在还有家庭——先要加班加点搞年鉴就不说了，现在居然连他屋头的妻小都要遭连累！

他缓缓地点了点头，好像他那脑壳有几千斤重。“老夏啊，他说：‘你们在位子上的硬是不一样，是要比我考虑得周全得多。’的确是这道理，本来我们这里里外外就人多嘴杂，眼下这关口调人确实是有点冒险——唉，也是怪我儿媳妇那单位上那领导，紧到不放人，拖到现在，拖得这样不上不下的。”

“这事我刚刚才听德霖摆起来，”夏定青点点头，“我也是觉得奇怪啊，这都三四个月了，咋还没办下来？根据他的分析啊，他估计肯定是有聂那边的人到你儿媳妇那行长那儿去递话了。”

“不可能哦！”傅祺红说，“我这么小个事情咋可能惊得动他聂县长？”

夏定青一皱眉，说：“这个人啊心细得很，心眼又小，而且他做事情都是不按章法的，他要是想整你不安逸，啥子下三流的法子都使得出来。”

傅祺红颈项背后没来由地一凉。好像是有个啥重要的事情他该是要记得的，又偏偏想不起来了。

“哎呀你放心！”夏定青手一摆，嘴张开来一笑。“我都给人事局蒯局长打了招呼了，喊他过了年直接去你儿媳妇那儿调档案，那么他邮政银行那头再哪个横也不可能不给的，到时候直接就把你儿媳妇调过去到老肖那了。”

“蒯局长愿意帮这么大个忙啊？”傅祺红说。

“人心所向呐！”夏定青又把茶盅子拿起来吹了两口，这下终于像是水温对了，伸伸展展喝了一口。“你看嘛老傅，我把这话给你说在这儿放起。等到后年子换届的时候，那姓聂的肯定是坐不住的！”

各位看官，你看这夏定青来的时候把傅祺红吓得心跳跳的，等夏把话说完了人走了，他的心依然是跳得咚咚响，但这声响里面又有份不一样的激昂。默默地把他县委常委这几个人数了一串，姓熊的要上，姓聂的要下，那留下来的坑坑又是要哪些人去填呢？

他觉得很是遗憾，自己年龄到了只能退休了，再没想头了。但好在还有下一代——等陈地菊年后进了政府办，万象俱新，哪个又说得清楚会有怎样的事情要发生呢？

骑起自行车回家的路上，他很久以来第一次留意到路是那么宽，天是那样蓝。在家属院门口他跳下车来，笑眯眯地跟门卫齐师傅打了个招呼。

也是巧了，傅祺红刚刚在楼门口把自行车停好，就看到陈地菊走了进来。她少见地穿了一件橘粉色的毛衣，配着米色的灯芯绒半裙，衬得她一向惨白的脸上有几分红润。

傅祺红想这女子今天是轮休啊，就听到陈地菊喊他：“爸，你下班回来啦。”

“啊。”傅祺红说，把钥匙捏到手上，都要上楼了，又忍不住（再看到也没其他人），转头来把话热喷喷地说了出来：“小陈呐，我给你说，今天人家的组织部的领导专门来关心了你调工作的事。他们现在给我保证了，你这事年后马上就办，而且是由人事局的局长亲自去办——至于现在嘛，就暂且缓一缓。你呢，反正就拖起拖起把事情做起嘛，也不要再去找你们那领导了。等过了年，他们上头的人来处理。”

他这话说完了，想到他儿媳妇该是要对他笑一笑的，哪想到她却忽然嘴巴一扁，眉毛皱起来，一副要哭的样子。

“哎呀小陈，你咋了？没事嘛？”傅祺红说，又左右看了看有没有邻居要走过来。

“我没事。”陈地菊说，就是觉得多感动的，爹啊，你对我太好了，对我调工作的事这么上心嘛，其实，”她停下来，咬了咬下嘴皮，又接下去说，“这事我本来不想跟其他人说的——傅丹心是知道的，但我爸妈都没说——其实我前几天已经给我们单位上递了辞职信，这个月底就正式离职了。我是想反正我也做不到好久了，他不放我就自己走了算了。不过，爹你千万不要多心，我也不是为了调到政府里头去才辞职的。因为我这正好有个朋友的生意让我去帮忙，我就准备先去她那帮她们一阵再说——不管咋样，至少不用再受我们那行长的窝囊气了。”

傅祺红一下有点天旋地转的，赶忙把楼梯扶手捏紧了。硬是不进一家门呐，他想，他这儿媳妇做这事咋很有点他儿子的风格呢？这儿眼看河都还没过完就反手把桥拆了。

“哎呀小陈呐，”他好不容易挤出来一句话，“你放心。年后你那政府办的工作肯定是要落实下来的，绝对万无一失！”

一直到公证处出来了，陈地菊才觉得自己那颗悬了好几天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她的手也才实实在在地搭在了傅丹心的手腕上。傅丹心脑壳转过来对她一笑。“走哇？要不要去哪儿坐一会儿？”他说，“我请你喝个奶茶，暖和一下。”

陈地菊没说话，像是失神了一般望着街对面的银杏树。那些枝条都萧索了，落下来脆黄黄的叶子铺满了街沿，好似一条金色的地毯。她把这故乡的美景勾勒了几遍，细细地镶嵌到心窝子里了，才对她的爱人笑一笑，说：“我倒想去喝奶茶啊，那哪个帮我把这公证书拿过去给吴三娘嘛？”

“这还不简单，”傅丹心说，“我开车带你过去宝生巷，你把东西拿给她就可以走了。我在路边等你，火都不用熄的。”

“你啊，硬是少爷命，”陈地菊说，“三娘本来就是给我们帮忙的，背到我妈帮我们卖房子，连中介费也不收我们的——你倒好，就把委托书给人家一丢就算了？感谢的话也不说两句？再说了，我下午这马上还有事。”

傅丹心吞了一口气，眉心忍不住一皱。“我就不是很理解，”他还是把话说了，“为啥你现在在啥事都要把你妈瞒到？辞职也不给她说，这卖房子也要背到她来弄？实际上你不拿你那点死工资，出来投资生意是好事啊。你妈不像我爸他们，她本来就是脑壳活套的，你给她解释一下现在电子商务的红火，她肯定是要支持我们的啊。”

陈地菊说：“我妈那人在我这女婿面前装得很潇洒，实际上还不是老古板一个，特别是工作啊房子啊这些事对她来说更是比命都重。我们这生意还没成之前千万不要跟她说，不然她一个不对歇斯底里发作了，你去把她收拾到嘛。”

傅丹心一下想起他那父母娘横起来的样子，陡地寒战就走背心子蹿上来了。“对嘛，他说，‘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两个人说话间已经走到了街边上停的雪铁龙旁边。这一阵天天都雨稀稀的，本来雪白的车身身溅满了到处都是污泥巴。“这车啊硬是不经脏，”傅丹心说，眉毛一皱，“算了算了，只有再去洗趟车了——你要不要把我载到宝生巷嘛？”

“不了，”陈地菊说，“我两步就走过去了。”

傅丹心看到陈地菊把手提包打开，把那份公证了的房产交易委托书放进去，忽然莫名其妙地心头一跳。他不由地伸手出去把他爱人抱拢过来，嘴亲下来在她脸上像是要盖一个章。“辛苦了，老婆。那卖我们这房子的事情就都交给你了。”他说。

“没啥辛苦的，”陈地菊说，笑起微微把脸往后一缩，提包也挎回到肩膀上，“既然都想好了，就一步步地去做就对了。”

一步步来就对了。她心头默默把这句话又念了几遍，望着雪铁龙钻到车流里头往北门上去了，才转过身来，穿过了街，朝摊贩市场里面走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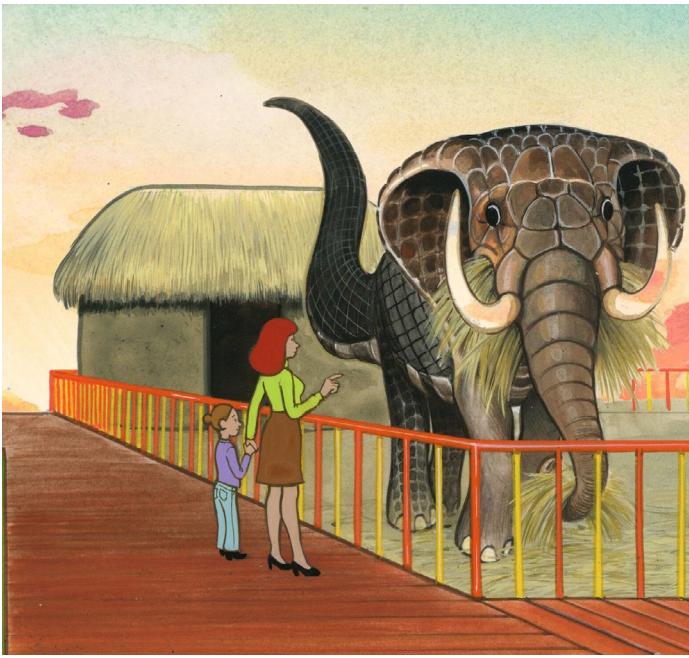


颜歌

小说家，1984 年生于四川成都，中文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我们家》《五月女王》和短篇小说集《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未来大家 TOP20”、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新人奖等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等十一国文字出版。获得英国笔会翻译奖、2021 年华威女性翻译文学奖银奖及 2021 年《纽约时报》年度关注图书。她是 2019 年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的五位评委之一，又于 2021 年作为终审评委参与了爱尔兰国家桂冠文人的评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变种动物园》(2021)剧照

小说

一切笼子里的事物

奇诺洛·奥卡帕然塔 | 新书试读

老牌文学杂志《格兰塔》
十年一次重磅特辑

《格兰塔》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杂志之一，1889年创刊于英国剑桥大学。每隔十年，《格兰塔》编辑部都会推出一本美国小说特辑，聚焦美国文坛极出色且深有潜力的、年龄在二十岁到四十岁间的小说家。

在这本《格兰塔：美国最佳青年小说家》特辑中，二十一位杰出的作家敏锐地把握了现代美国的脉搏：有描绘人们如何逐渐走出创伤的孤独和伤痛（本·勒纳《光环》；卡兰·马哈扬《选集》；萨娜·克拉西科夫《纪念维斯盖特》），有移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和精神疾病（埃斯梅·玮珺·王《多么可怕的事》；雅·杰西《告别哥谭市》），有年轻的以色列士兵面对战争、冲突的虚无感受（乔舒亚·科恩《乌里》）；有反乌托邦色彩浓郁的小品（格雷格·杰克逊《国家和东部》；马克·多滕《川普天空阿尔法号》）；有颠覆传统骑士小说的暗黑作品（戴莎·莫思斐《布洛姆》）；有不幸的童年带来的疯狂和悲剧（杰西·鲍尔《木头的味道代表河坝》；迪奈·门格斯图《这是我们的血统》）；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揭示了美国生活的无聊和苍白（奇诺洛·奥卡帕然塔《一切笼子里的事物》；艾玛·克莱恩《洛杉矶》；凯瑟琳·莱西《答案》）。

经99读书人授权，我们摘选了奇诺洛·奥卡帕然塔的作品《一切笼子里的事物》分享给读者。



“看啊，它们真漂亮。”女孩无意间听到那个女人说。那是一个穿着无袖九分工装连身裤的高个金发女人——连身裤是浅蓝色的，这让她看起来仿佛穿着天空。而蓝绿色的双肩背包像是天空中的一块斑点，一片乌云。她的手上上下下地摆弄肩上的背包肩带。包相当大：她可能是远足者，甚至可能是海外游客，只是她的口音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普通的美国口音。她不时用手指拨弄一下及肩长发。这让女孩想起自己的英语老师阿布拉姆太太，她发卷垂落下来的样子像煮过的意大利面，是奶油色螺旋状的，只是更加蓬松，有点像是黄色的泡沫。

另外一个女人站在金发女人身边她的红头发在脖子后面绑成一个髻她也提着一个包，是拎包，垮在肩上。她说：“真的很漂亮。我只想抱抱它们，亲亲它们。”

这里是女孩最喜欢的地方，动物园。华盛顿国际学校离得不远，从马库姆西北街到康涅狄格西北大道，步行十五分钟。走得从容一些的话，大概二十分钟。当然冬天的时候路不好走，但是旁边人行道上的积雪到下午总是已经清除干净了，即便还有黑色的冰，二十分钟也能走到。而如今是夏天，时间就更充裕了。

通常一星期里至少有两天，女孩一下课就会去立刻去动物园。但是这次她十一点四十分便离开了学校，比她平时下午三点半到动物园的时间要早得多。学校这一学年快要结束了——这是六月的最后两个星期，下午都匆匆忙忙的，老师们很容易被骗过。要想早退只需要说有家长在等就行。就算被抓到，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课后留校。她是好学生。她是拿了奖学金进华盛顿国际学校的，这让她的父母很高兴。不会有比课后留校更严厉的惩罚。再说，她不会被抓到的，没有迹象表明她会被抓到。

在过去的一学年里，女孩花了很多时间观察动物和人，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动物园不收门票，所以她能频繁过来。她和动物在一起的时候，梦想自己也能成为其中一员。她常常回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如果她不能成为动物中的一员，至少她能和它们在一起。

今天不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两个女人。第一次是上周一，但当时她没挨得那么近，以至于能听到她们的对话。

一开始她只是偷偷打量她们，但是现在她正大光明地注视她们，分别观察她们苍白的生着雀斑的脸，她们的脸看起来既严肃又悲伤。她们紧紧噘起嘴的样子，是两个面带愁容的人。

这是星期三的下午。上个星期一，她听见大象园的饲养员说很快要来两头新的亚洲象。今天，新来的大象已经在了和其他大象一起吃着旁边树上的叶子。女孩站在那里看着它们，靠在围绕大象园的带刺铁丝网上，偷听那两个女人交谈。

金发女人说：“我忘了那片苜蓿干叶。是五片叶子，还是六片来着？”

“我不记得了。”红发女人说。

“还有你给我的钥匙圈。我应该是再也找不到了。我不可能回去找。”

“没关系。”红发女人说，“还有会更多苜蓿叶的。”她的视线转向一只飞到铁丝网角落里的斑点麻雀。她问：“你觉得眼皮抽搐说明什么？”她用握成杯状的手掌捂住右眼，飞快摇头，像一只狗在抖去身上水珠，仿佛是要摆脱这个问题，或者摆脱眼皮的抽搐。现在她的视线回到大象身上。“好吧，”她说，“至少他们不再把大象关起来了。也没好到哪里去，但总比以前好。总比关在那个房间里要自由一些。”

女孩知道，大象确实不是一直被放养在外面的园子里。有一段时间，它们被关在室内，在沙坑房间里，它们站在粗粗的圆柱中间，围着粗粗的绳子，让她想起摔跤场。它们一跺脚就从沙子里扬起烟尘。或许动物管理员把它们都放到外面是因为新来的大象。或许里面实在挤不下了。不管是在里面还是外面，她想成为大象。她嫉妒它们被照顾得那么好，总有人喂它们，满足它们全部的需求，跟在它们身后打扫。她来动物园的次数太多了，见过大象排泄。每次她都想移开眼睛，给动物一些隐私。但是她又想，这不就是成为动物园动物的妙处之一吗？如果你是一只动物园的动物，你就不会在乎隐私！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你想做的一切，排泄和其他所有事情，不会感到羞耻。

在沙坑房间里有一块常见的动物身份标示牌，上面写着动物的拉丁名，种类，起源地。但是那块标示牌上方，还有另外一块锃亮的匾牌，上面写着：

一头大象平均一天产生200磅排泄物。

她反反复复读过动物园里的全部标识牌——每次来都再读一遍——尽管它们很少有变化。读标示牌就像是一种不由自主的习惯。她上次来的时候，试图想象那么多粪便看起

来会是怎样的。200 磅要装多少碗或者桶？能不能装满一个正常大小的浴缸？能装满多少浴缸？她和父母合用的浴室很小，只比衣橱大一点点。能装满他们的浴室吗？她不确定。她能确定的是，200 磅是很多粪便，而总有人能替大象打扫干净。上次来，它们还被关在室内的时候，她这样想过，这种生活！像一个大象的五星级酒店，拥有完美的天窗，阳光斜射在室内的沙坑和大象光光的后背上。还有一个二十四小时年中无休的动物管理员 / 女佣。“关起来。”金发女人说。谁说动物不喜欢待在动物园里的？谁说动物不把这看成是一次长假？一次终身长假？关起来和女孩对动物的想法正相反。关起来是把你关在你不想去的地方。但是谁不想住在一个舒服的酒店里，还有一个二十四小时年中无休的女佣随时待命呢？

她和父母住的大楼在银泉市中心的罗德路上：坐地铁红线到动物园要四十五分钟。是一套廉租房，这是他们能住在这里的唯一原因。三个人合住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她的床在客厅辟出来的角落里，用一个棕色的木架和灰色的金属文件柜隔开。每次她做梦在梦里动得太厉害就会撞到金属柜的背面，震耳欲聋。雷鸣般的睡眠。起初她还觉得有趣，伴随着新奇感，但现在她为了不被震耳欲聋的柜子吓到，在睡觉时一动不动。

他们十楼的公寓在公用走廊里有一个洗衣房，还有一个阳台，可以俯瞰埃尔斯沃思广场上明亮的荧光灯和红蓝相间的剧院和商店招牌。她的母亲每天歌颂隔壁的洗衣房。（不用再去地下室，或是拖着一包脏衣服去街对面的自助洗衣店！）女孩本想告诉母亲，学校里的其他人家里就有洗衣机，还有清洁工洗衣服。不需要叠衣服，更不需要每次都在洗衣日搜刮硬币。但是说这样的话会夺去母亲的快乐，她不想夺去母亲的快乐。在过去的两年里，每次她的母亲歌颂洗衣房，她就点头附和，再加上自己对阳台的赞美，晚上她能从阳台上眺望来自埃尔斯沃思广场明亮的光，闪亮的钢筋大楼，一直到远处暗下去的天空，想象自己回到了康涅狄格西北大街，和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在一起。

但是她的母亲当然会歌颂这小小的奇迹。她的父亲也一样，不是歌颂隔壁的洗衣房，而是歌颂这整个地方。即便是廉租房，他们也得干活才能住在这里：他们要负责这里的清洁工作，除此之外她父母晚上还要在乔治城大学做清洁，他们既是那里的工友，同时也在那里念书。有时候——他们下课晚了——回到家的时候她已经上床了。他们不在乎没什么关系：她负责除了压缩垃圾之外的所有清洁工作：从十层楼每一层垃圾房的蓝色大垃圾箱里收集垃圾。扔进垃圾槽。用红色的小拖把和水桶拖干净垃圾房的地板，当心不要把脏水泼洒出来。她最痛恨的不是洗拖把的水的臭味，或者拖把脱落下来的破破烂烂的线头。而是她打扫干净以后，空荡荡的垃圾房亮晶晶、冷冰冰的。有一次她在八楼的垃圾箱里找到一个掉了一边睫毛的布娃娃。娃娃坐在垃圾堆上一只用条纹纸折出来的小船里。在另外一个时空，在真实的世界里，这只船可能已经翻了，而这个娃娃是落难者。女孩轻轻对娃娃说：

像上来透口气的鱼，
鱼娃娃，漂浮在一堆垃圾上，
鱼娃娃翻船了，
鱼娃娃回家了，
翻船了，
上来透口气。

接着她自己思考了一下，对鱼娃娃来说家意味着什么。家在那里的海洋里，在那堆被忽略的被抛弃的垃圾里，还是家在这里，在温和的透明的空洞的空气里？家在这里还是那里？当然是在那里——那个地方的记忆在鱼娃娃的心里挥之不去，那个地方存在的时间至少和她自己存在的时间一样长，是身体和地点的同时存在。即便现在，家和她在一起，家却依然在那里，如果她只有一片海洋要征服，那么有一天她肯定会游泳回家。游泳回家要多久？游泳穿越大西洋要多久？那里会有需要超越的海豚或者鲨鱼吗？

想到家让女孩感到难过，渴望某种遥不可及的东西，某种她甚至不确定自己能真的回忆起来的东西。她折起纸船，在手心里捏成一团。她把少了睫毛的娃娃深深埋进垃圾箱的边缘。

等她清理完垃圾还要打扫全部十层楼的洗衣房，用湿抹布清洁洗衣机和烘干机的内部。用扫帚和拖把清洁地上的花砖。她擦洗完整栋楼每一层的走廊。最终，回到地下室，那里和大楼的车库相连。她要确保所有扔进垃圾槽的垃圾都真的滑进了大垃圾桶里。她捡起遗漏在外面的垃圾袋和垃圾，扔进大垃圾桶。那时候已经九点左右了。一个小时以后，她知道，她的父母会回来压缩垃圾。但在此之前，他们要在乔治城大学做完工友的工作。

有时候女孩想象自己的父母在他们的学校大楼里拖地板——大片大片铺着闪亮花砖的一尘不染的区域，要不是因为有像她父母这样的工人，绝对不会那么闪亮，那么干净。有时候她想象父母收集和清空垃圾箱，打扫洗手间，擦拭窗户和墙。然而有时候，特别是重读大象粪便的标示牌之后，她喜欢想象他们像大象一样：放松地坐在一个舒服的酒店里。

她想象她的父母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做一只动物园里的动物意味着你不再需要担心工作之类的事情。做一只动物园里的动物意味着你可以放松坐着，被悉心照料，你想要多悉心就有多悉心。她用眼角余光看到一个男人把一个小孩扛在肩膀上。小孩指着前方远处什么东西。女孩心想：真不公平。好吧，真的，他多么幸运。他能够坐在父亲肩膀上，只需要抬抬手指，甚至不需要自己走路。

太阳现在非常明亮，金发女人从包里取出遮阳帽。她的身体精瘦，像是那种四处走动、完成工作的身体。女人的脸红了，女孩注意到她有些举止不安。她的眼睛瞟来瞟去的。女孩想起来，她上一次就感觉到了这种焦躁——上星期——她第一次看到这两个女人的时候。她们今天刚开始交谈的时候也相当焦躁。但是在女孩看来，现在变得更为严重。

女孩无法忍受如此焦躁，于是她离开了那两个女人和大象园里的焦躁气氛。接下来，她要去看看大型猫科动物。这是她在动物园里惯常的第二站：先看大象，再看大熊猫。

但在去看大型猫科动物之前，她先在大橡树的树荫底下找了一块石头坐下。她知道自己午休前会溜出学校，于是早晨给自己做了一个沙丁鱼三明治。自她记事起，沙丁鱼三明治便是她最喜欢的三明治。是能让她想起家的事物之一，真正的家，在哈科特港的那个家，在生活和其他人的梦想把她带到这个新世界之前的那个家。她在华盛顿国际学校里认识的人不会喜欢沙丁鱼三明治。她第一次告诉同学她喜欢吃沙丁鱼三明治的时候，他们说，呃，好吧，她心想，这是他们的损失。

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卷发小男孩牵着他母亲的手，距离女孩坐着的那片树荫不远，正自己哼哼。她观察了这个男孩一会儿，他手的大小看起来只有他母亲的手的一小部分。他跪在地上，把沙子捧在手心里。沙子像下雨一样从他小小的指缝中散去。

现在女孩从包里拿出三明治，剥去外面的铝纸。那两个女人正好经过。红发女人说：“你好啊，小家伙。你好吗？”她的声音温柔亲切，起初女孩以为自己旁边有什么动物，那个女人是在和动物说话。她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女人是在和她讲话。女孩礼貌地微笑，女人继续说着，似乎把她当成比实际年龄更小的孩子，似乎她是五岁而不是十二岁，似乎她是一年级而不是八年级。就她读的年级来说，她年龄确实更小，但这是因为她聪明。

“愚蠢的工作。愚蠢的办公室。愚蠢，愚蠢，愚蠢。最好是这样，我想，”金发女人说，“反正我恨马希公司。没见过更坏的老板了。”

“是啊，听起来是这样，”红发女人说，“在那里似乎很不开心。”

“两年彻彻底底的不开心。”

“还有之前那年，在味可美公司的那年。也不开心。还有再之前在帕里西亚和奥索公司的那年也不开心。”

“这世界上就没有好工作。”金发女人说。

“她真可爱不是吗？”红发女人对金发女人说，“我真想把她带回家！”女孩只是微笑着继续吃她的三明治。她到底哪里可以称得上可爱？她穿着一条破破烂烂的卡其色短裤，一件简单朴素的白 T 恤。她的帆布鞋还挺好的——是一双旧的棕白色条纹的罗克西球鞋——但鞋子是从新罕布什尔大街的救世军慈善商店买的，旧得褪色了，甚至看起来有点脏。鞋带的头子像旧流苏一样松开她的发辫已经编了很久，看起来像是起球严重的毛衣，没有花时间温柔地滋养过，都是一簇簇的小毛球。

她承认她有过可爱的日子，但是此刻她显然不觉得自己可爱，于是她无视了那个女人的评价，专心品尝她的三明治——浓郁的鱼味混着一点点黄油和一点点牛奶。她还有一袋浓缩果汁。现在她戳了一个孔，小口喝着温热的液体。水果潘趣。有一点点像是过去在哈科特港，母亲给她从格里森的小商店里买回来的里贝纳果汁。

走到大型猫科动物那里的时候，她没有感到自己多可爱，却感到精力十足。

大型猫科动物——狮子和老虎——差不多在同一个地方，也就是在同一座小山的两边。狮子总是在它们这一边的山上吼叫，来参观的小孩子们就学它们吼。老虎只是漫步，不太吼叫。狮子妈妈不久前刚刚生了四只幼崽。

“看看这个。”女孩认出了那个噪音。太阳依然很猛烈，女孩眯起眼睛抬头看。看见红发女人和她的金发同伴。

“你能想象吗？”金发女人说，“他们真的敢这么写。”她继续读着大型猫科动物山腰上张贴的标示牌：

非洲狮幼崽起名叫佐伊、艾比、莎伦和南希；动物管理员也可以根据刻在它们屁股和肩膀上的独一无二的印记来辨别。

“难以置信，”红发女人说，“他们在它们身上刻记号，好像它们是财产一样！我们是回到奴隶时代了吗？我们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有这块标示牌吗？”

“没有，”金发女人回答，“我不相信会有。他们好像越来越失控。竟然把这样一个东西弄得人尽皆知。”

如果女孩对此有什么异议的话，她会说：“这些名字对于非洲狮来说算是怎么回事？”据她所知，这些名字和非洲一点关系都没有。她不能代表整个非洲，但确实如此。然而女孩思索着金发女人刚刚说的话。在她的社会学课堂上，他们读过一本书叫《一个奴隶女孩一生中的小事》。还有其他书，刻画了奴隶的恐惧，人类被当成畜生或者家具，身体被打上标签。女孩足以明白金发女人说得有道理。

但她不需要在意这种微不足道的不幸。她试图不去想动物园的这一方面，而是像她平常那样享受其中的乐趣。她离开了那两个女人待的地方，去看猪。

她刚和猪待了一会儿，就抬头看到那两个女人也来了，又开始讲。

“你听说猪瘟的事情了吗？”红发女人问。

“你从哪里听来的？”她的朋友问。

“今天早上从电台里听来的。死了八百万头猪。没人知道猪瘟是从哪里来的。”

“把它们关在猪圈里就会发生这种事情。猪应该自由。在动物园里或者在农场里，它们都应该自由。所有的动物都应该自由。”

现在金发女人皱起眉头，用食指轻叩嘴唇，仿佛刚刚想起重要的事情。接着女孩看到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手机，拨了号码，开始讲电话。她用肩膀夹着手机，轻声低语。不一会儿她又从肩上的包里翻找。掏出一管口红或是润唇膏，女孩不确定到底是什么。她旋开盖子，轻轻涂在嘴唇上。她的嘴唇现在变成了深粉色。太阳在她头顶像一枚膨胀的橘色圆球，不远处有一只松鼠咬着一颗松果匆匆跑开。她接着去了灵长类馆，在那里见到了大猩猩科乔比比和卢旺达。她觉得它们的名字比狮子的更合适。她特意读了张贴的标示牌。有一条内容是大猩猩在野外能活三十年左右，但是在动物园里活得明显长很多——五十年。她希望那两个女人会看到这个，因为她们肯定会来灵长类馆，她们走的参观路线和女孩的一样。她希望这块标示牌会让他们重新考虑对动物园的看法。或许她们会发现动物园也有好的一面——也就是能延长动物的寿命。女孩等啊等，但那两个女人没有来。于是她去看吼猴了。

吼猴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们在一天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会发出的低沉的喉音。它们的吼叫可以传播三英里，甚至能穿越浓密的森林。雄性吼猴用它们的声音保卫领土。一只吼猴从一根树枝跳到另外一根，动作非常缓慢，浑身写满忧郁。树枝上几乎没有树叶。女孩看着，她心想或许是猴子吃光了所有树叶。她不知道猴子还吃什么。肯定吃香蕉。还有呢？

那只猴子跳上树枝时，树枝弯了。女孩动了动身体想要去扶住树枝，或者像是要在猴子掉下来的时候抓住它。但是她离得有些远，而且还隔着玻璃墙：她无论如何也救不了猴子。她透过玻璃看到两个女人的倒影，立刻认出她们。

金发女人走到女孩旁边，甚至更贴近玻璃墙。她的手握成筒状按在玻璃上，像透过望远镜似地看猴子，一只只看过来。她说，“你能想象你的小巴克斯特像这样被关在动物园里吗？或者甚至是菲比？他汪汪叫，她喵喵叫，他俩都像这样可怜。”

女孩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巴克斯特和菲比是谁。

红发女人走到她的金发朋友身边。“好了，走吗？”金发女人问。

“好了，搞定了，走吧，”红发女人微微笑着，“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

但是她们在快接近出口的时候停下了脚步。金发女人侧身转过来面朝猴子，开始在背包里鬼鬼祟祟地翻东西，像是要在里面找什么视线看不见的东西。她的脸突然起了皱纹，仿佛她的皮肤变成了皱巴巴的衬衫。

现在那个肩膀上扛着小男孩的男人来到了猴子沙坑。他们一来到玻璃墙跟前，小男孩就兴高采烈地指着猴子。一个年长的灰发女人已经站在玻璃旁边，胳膊交叉在胸口。猴子吱吱直叫，像玩耍的孩子。

女孩转身看着金发女人，她也开始发出轻轻的吱吱声，有点像猴子的尖叫，只是更痛苦。

声音从她那里传来时，她跪倒在地上，仍然在包里翻找。

“这不公平，”她说，“我真的都掉了。那片苜蓿叶。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在沼泽边找到的。那是多少年以前了？我连那个都掉了。肯定是被我拉在桌子上了。我肯定忘记带走了。”

女孩也曾经失去过东西。好吧，她失去过很多东西。但是那一次——那是她所有损失中感觉最像损失的一次——是一双棕色的便鞋，是他们穿过大西洋之前父亲给她买的。他们去了“一英里市场”购物。（到底为什么要叫一英里？）那双便鞋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质地柔软，像兔子的皮毛，鞋面上有小小的闪片，让她想起星星。但是他们穿越大洋时，装着鞋子的行李箱不知怎么丢了。或许事情就是这样了。他们出发前她看到一只黑鸟，眼睛的颜色和那些小小的闪片一样。是在哈科特港他们以前家里的车道上，那只鸟正从两颗石子中间啄东西。它注意到她以后抬头看着她。短短一瞬却感觉过了很久。幼小人类的眼神和小鸟的眼神交汇在一起。鸟可能理解了她身上某些她自己还没有理解的东西。

那个女人现在在啜泣。红发女人用一只胳膊抱住她的朋友。温柔地安慰她，抚摸她的手臂。

啜泣声没有平息，尽管只是轻柔的啜泣，金发女人的眼睛里却有着狂乱。当然会有。女孩想，失去重要的东西一定很痛苦。但是这个女人发狂的样子让女孩心跳加速。女孩想对她说些什么让她不要这样——她的朋友显然还没想到安慰的话——但是女孩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必须帮助它们。”金发女人大声喊叫起来。

现在她引起了那个肩上扛着孩子的男人的注意。那个年长的女人也注意到她了。他们都朝那两个女人走去，询问她是否还好。一切是否还好。

猴子们也察觉到了不安。仿佛一听到“帮助”这个词它们就四散而去，仿佛它们理解这个女人，足够理解，以至于不信任她的意图。它们跳到沙坑远处的角落里。

金发女人站起来，走到隔开人和猴子的玻璃墙跟前。她捶着玻璃，大声哀嚎。

她的朋友把她拉回来。晃着她的肩膀。“好了，安尼特，”她说，像是在哀求，“别这样。别在这里闹了。”

女孩想要朝金发女人跑去。拉住她。拥抱她。或许就像她本应该拥抱那只少了睫毛的小布娃娃那样。

“一切下沉的东西最终都会露出水面。一切下沉的东西……一切，”她低声说着她母亲过去说过的话。她应该对着她的娃娃唱。

然而她仅仅是无法信任眼下的处境。她感到自己的感觉有点像刚刚那些猴子那样，只是她的感受和女人可疑的意图不太相关，而是怀疑整个处境。她振作起来，离开了沙坑。

走到外面不过几秒之后，她听见类似枪响的声音。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猴子们叫得更响了，尖利地大喊，一声嚎叫刺穿空气和她的耳朵。接着传来警报声。她感到一阵微风拂过脸颊。她想象干净的玻璃墙碎裂，坍塌，在地上变成小小的星星。她的脑海中浮现出其他参观者脸上紧张的表情。或许那个金发女人成功“解放”了一只吼猴？她现在清晰地看到了自由。那只可怜的猴子坠入死亡。消散的生命在沙地上变成一摊血淋淋的东西。女孩一路小跑，斜穿过动物园里坚固的小道，跑出大门回家。你的眼角有没有见过天空中像羔羊一样的云朵？女孩抬起头，眼睛笔直往上看，看到天空中满是羔羊！

很快天色呈现出透明的浅红，像被覆盖的伤口，是透过白色薄纱的铁红色。

她跑动的时候，猴子的嚎叫声在她耳朵和脑海中回荡。那个女人忘得了它们持续不断的嚎叫声吗？她肯定会永远记得这个声音。嚎叫声似乎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即便女孩已经回到了家。



奇诺洛·奥卡帕然塔

曾出版长篇小说《在乌达拉树下》和短篇小说集《快乐，如水》。她是 2014 年欧·亨利小说奖的获得者，曾获 2016 年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形象奖小说奖和 2016 年赫斯特 / 莱特基金会小说奖的提名。她的作品见于《纽约客》、《锡房子季刊》和《凯尼恩评论》等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Nick Fewings](#) on Unsplash

小说

孔雀

叶昕昀 | 新书试读

“不完美母亲”独自带娃的光阴故事，
直抵女性心理的深井

《最小的海》是90后作家叶昕昀的首部小说集。八个关于爱欲与宽恕的故事，见证孤独之人彼此贴近的瞬间：瘸腿的女人与独眼的男人，相约去寺庙看孔雀；一对性情水火不容的姐妹相互仇恨也相依为命直到死亡将她们分离开；女人从安稳的婚姻生活中短暂逃离，与渴爱的情人共赴一场结局未知的雪山之旅；失去父亲的女儿与丢了女儿的父亲，依偎着朝一座虚幻的灯塔航行……

经新经典授权，我们节选了第一个故事《孔雀》分享给读者。



她约张凡到大觉寺看孔雀那天是六月十九。到寺庙上香的人很多，流通处厢房买香烛和文疏的人几乎没有间断。她那天脑子昏得很，人家说要一把香，她递两把，说要三道文疏，她递五道，昏头昏脑地到下午三四点，几乎忘了看孔雀的事。四点寺庙关门，人渐渐散去，她一样一样清点货品，发现柜台里的绿松石手串少了一个，不算贵，二十来块钱，去买去图个吉利的，但少了要她补上，多少觉得亏损，只能怪自己不留神，再一想，又怪老刘今天没来，她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大概就是埋怨到老刘头上的时候，张凡到了。他们此前没有见过面，是经常来寺里做事的周娘从中牵线，说让两人见个面，算是没有明说的相亲。她没有拒绝。

他从外面探头进来，大热天还穿一个皮夹克，个子挺高，皮肤是云贵高原紫外线塑造的黝黑。他问，杨非在吗？她点点头，说，在呢，你面前。他一下子就笑了。她看他，你是张凡吧。他说，是，我是张凡。

她注意到他挺拔的身躯和稳重的步伐，然后低下头去，说，你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一会儿，我还有事没做完。她习惯点两遍货品，算是某种强迫症，现在还差一遍。张凡问，这里忙吗？她低着头，说，看日子，香客多的时候一刻也不得闲，你待会儿再跟我讲话，我现在忙不过来。

张凡便不说话，坐在椅子上看院子里的三角梅，他的右眼视力好，看得清相隔二十米对面佛殿牌匾上不大的字，是地藏殿，他想问地藏殿供的是哪个菩萨，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往地藏殿旁边看，佛殿的匾额被一棵贝叶棕遮住了，他将目光收回来，看厢房门口浮着睡莲的青褐色石缸，里面有几尾金鱼，天气太热，一直往外吐气泡。他盯了很久，听到杨非说话，你定力挺好。他回过头去，杨非又说，走吧，去看孔雀。

她把柜台的隔板抬起来，张凡过去扶住，让她出来。她解下身上的墨蓝色罩衫，把身后那条长长的黑发拨到胸前，平视的视线只能达到他的腰际。他系着一条黑色皮革的腰带，印着老虎头的金属闪着光。她说，要劳烦你。张凡就走过来，站在她的身后，微微蹲下，两只手托起她轮椅两侧的手柄，慢慢地抬起来。她比他预想中轻很多，即使加上轮椅的重量也还是很轻，跟他儿子的重量差不多。他感觉到她的双手紧握，后背往下靠，他尽量使自己的步子平稳。他抬着她的轮椅跨过厢房的门槛，到了台阶，那里有专门的木板搭成的小坡，可以让轮椅下去，他没有放下，直接将她抬下台阶，然后安稳、缓慢地让她落地。

杨非对他说谢谢，声音很轻。张凡假装没有听见，预备推着她往前走，杨非用手卡住轮子，说，不用，我自己来。张凡就撒开手。

寺庙的路都是石子铺成，她划动得有些吃力，张凡放慢步子，跟在她后面。她在石子路最里面的禅房门前停下，说，里面的木桶里有玉米粒，你用碗装一点，碗在木桶旁边。他走进去，禅房的案桌上立着一幅观音送子的画像，香已经燃尽。他绕过案桌，在角落里看到木桶，旁边放着一个不锈钢碗，他从桶里舀起一碗玉米。

她看见他走出来，说，把门带上。他回过身去关门，转头时她已经往前走了。他跟着杨非，绕过大雄宝殿，来到寺庙的后院，远远就望见那只被一片铁丝网围起来的孔雀。

孔雀站在罗汉松旁一动不动，杨非划着轮椅过去，将扣住铁丝网的钩子移开，然后回头看张凡，说，放里面吧。

食物就在面前，孔雀仍站在原地不动。张凡蹲下将碗往里面推了推。孔雀警惕地扬起脑袋，头上的冠羽轻轻地晃动。张凡这才注意到孔雀蜷缩着一条腿，准确来说不是蜷缩而是萎缩，它只凭一条腿立在那里。张凡突然想知道它怎么走路，于是又往前走一点。孔雀意识到入侵，往后退，它萎缩的右腿落在地上，右半边身子大幅倾斜，左腿立即向后迈一步，将身子稳住。

张凡觉察到这样有些残忍，他于是向后退去，直到走出它的领地，关上那片铁丝网，与它保持最初的距离。

张凡到杨非身旁，孔雀还是待在退后的位置，没再往前。张凡说，它挺怕生。杨非说，分人。张凡点头，我确实吓人，别人都这么说。杨非说，这挺好，没人敢欺负。张凡笑，它怎么不吃。杨非划着轮椅退后，说，人走了它才吃。张凡说，还挺有个性，养了多少年了。杨非想了想，说，二〇〇八年老马从版纳带回来的，也有十来年了。张凡问，谁是老马？杨非说，以前经常给寺庙捐钱的富源煤老板，后来煤矿倒了，就没再来过。张凡点点头，那也挺老了。杨非问，谁？张凡说，孔雀。杨非没说话。张凡往左边跨了一步，说，这是绿孔雀吧。杨非说，不知道，我不懂。张凡说，这是绿孔雀，我当兵的时候在怒江集训，见过这种孔雀，现在是濒危动物了。你们养得不好，毛色都变了。杨非问，你在怒江当的兵？张凡说，算是吧，滇西那片都待过。杨非问，怎么样，那边。张凡说，不好在，不如东边。杨非没再说话。

张凡退到杨非身后，他们站在松树下面。一片云彩飘到太阳底下遮住光，天微暗下来，吹来一阵风，张凡觉得凉快，又觉得有些恍惚。空气中有着从前院寺庙飘过来的檀香气味，在此刻短暂的静止中，他心里生出一种久违的神秘和平静。

从后院出来，她觉得饿，提议去寺外的清真街吃凉粉。张凡说好，他们便往外走。张凡说，我推你吧。她说，不用，走到千佛塔的时候，又说，好吧。他走过来扶住她的轮椅。她抬手指着千佛塔，说，上学的时候来参观过吗？他说，没有。她问，那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建的吗？他说不知道。她告诉他，是元代。他说，没谱气，历史没学好。她说，有六七百年了。他说，噢，是古物。她身子往后靠了靠，说，我刚来寺庙的时候，每天就在塔下面看，看到太阳刺得眼睛睁不开才回屋，后来视力就降了，总是看不清楚。他说，那你配个眼镜。她说，不用，能看清人就行。他说，人你看不清。她岔开话去，问他，你知道这塔有多少龛

佛吗？他说，千佛塔千佛塔，上千吧。她笑，你回去查查。他点点头，好，塔尖的两只鸟是什么。她随着他抬起头来，一齐看那座二十米高的佛塔，她笑，那是鸡，金鸡。他说，我看倒挺像后院那只孔雀，你看，它也蟠着腿。

他们在凉粉店外坐下来。有几个人在里屋，杨非说热，他们就在外面坐下。杨非是熟客，老板娘笑问，今天吃什么？她说，两碗凉粉，我那碗不要米线，你呢，她转过头去问张凡。张凡说，我要多一点米线。杨非笑，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张凡答，司机，给领导开车，之前跑长途货运。杨非点点头，介绍人没跟我仔细说你的情况。张凡看着她，你想知道什么，随便问。杨非摇摇头，现在不用了。张凡说，我离婚了，有个儿子，跟了他妈。杨非没说话。张凡又说，我爸死得早，家里有个老母亲，现在城里住的房子是我大伯的，我前些年在开发区买了套电梯房，还有辆二手车，大众的。杨非说，吃东西吧。

和张凡分开的那天夜里，杨非发起了高烧。房间里很闷热，她想也许是明天要下雨，然后想起张凡眼睛上的那颗痣，又想起洒在地上的玉米粒和落在泥土里的月季花瓣。她渐渐地在清醒的梦里，小腹传来的疼痛没有减弱过，从子宫右侧的某个点开始，呈放射状地蔓延着疼痛，它不是持续的，大概隔几秒加剧，躯体的痛楚将梦境变成一堆破碎的画面。她有时听见开门声，有时听见有人在耳边低语，有时看见灰褐色的水泥广场和漫长的延伸到铁轨的马路，然后那个男人模糊的身影又开始出现，慢慢靠近，她感觉到自己在坠落，然后是奔跑，似乎有风从她耳边穿过，又拂过她的腹部，她摸到自己的双腿，突然从梦魔中清醒，像是沉溺在海底又浮出水面的一瞬间，那种熟悉而恒久的绝望。

一丝光从蓝色的窗帘透进来，她盯着窗帘上跃动的斑点，很久以后，那种梦境带来的无法言说的感受仍在持续，那种针刺般的、小小的欲望从她腿骨的一处开始蔓延。天渐渐亮起来，光充满空荡的房间，充满她内心某块凄清的空白。

她终于听见父亲起床的声音，她轻轻喊着，但嗓子几乎发不出声音来，她张着嘴吐出无声的语言，然后抬起右手，从空中降落，撞击在床沿，只是发出轻微的响声。过了很久，她听见父亲推开她的门，说，起床了。她没有回应他，他于是走过来，看她暴露出青筋的脸庞和手臂，以及肿胀的眼睛。他摸了摸她的头，说，我去买针水。她感觉到内心突然滋生起来的与悲伤相掺杂的怒火如同躺在床上的拳头一样，软绵地四散开来，散布到身体的每一处。

那天她没到寺庙去，第二天也没去。第三天的时候，张凡找上门来。下午三点，父亲刚下中班回来，他在附近的小区当保安，三班倒。她坐在阳台上吹风，父亲走到她背后，说，你有朋友来了。她转头，短暂的诧异之后，她看见张凡的脸。透过窗户的光在他的脸上，印出三道长长的条纹。

张凡走过来，把手里的水果放在茶几上，父亲咳嗽了两声，走进房间，关上门，将她和他隔绝于那间落满斜纹光影的客厅。张凡站在客厅中央，说，我去寺庙找过你。她没有说话。张凡又讲，阳台上晒，要不要我推你进来。她自己把轮椅退回来，摇到茶几旁边。

她请张凡坐，要给他倒杯水，张凡拦住她，说，我自己来。他在她面前站起来，身体挡住她面前的光，她注意到他今天换了一条腰带，棕色皮质。他握着杯子在她面前坐下来，说，我想了想，觉得我们能处。杨非说，怎么处。张凡转动着杯子，说，你看我的眼睛。杨非看着他。他说，左眼。她就看他的左眼。他说，你仔细看。杨非说，怎么弄的。张凡说，在勐海的时候，抓捕一个毒贩，他拿刀朝我眼睛捅过来，我没来得及躲。她问，勐海在哪里？张凡说，在版纳，对面就是缅甸。她说，挺狠毒的。张凡抬起手摸了摸左眼，说，他没下狠手，他本来可以朝我脖子捅，我肯定死。两人沉默，她又看他，说，这眼睛挺逼真，是马眼睛吗？小时候丝厂大院里有个男孩，被鞭炮炸掉了眼睛，在眼眶里装了一只马眼睛。张凡摇头，不是，是玻璃的。杨非点点头，不仔细看不出来。张凡问，你们以前住在丝厂？

杨非摇着轮椅过去给自己倒了一杯水，说，以前我爸爸在丝厂缫丝车间，做到车间主任，我们就住在生活区，十平米的房子，没有厕所，整栋楼都是尿腥味。后来丝厂倒闭，我们就搬了出来。张凡站起来，在屋子里四处转着，说，丝厂是二〇〇〇年左右倒的吧。杨非说，好像是，想了想，又说，是，那年我初三。

张凡在电视柜的几张照片旁边停下来，他仔细看了很久，转过头问杨非，你小时候跳舞？杨非说，是，从小就学，拿过县里挺多奖。张凡说，真厉害，学过舞气质不一样。杨非没接话。张凡又说，你应该开个舞蹈班，教孩子跳跳舞。杨非说，我这样子怎么教。见张凡有些尴尬，她又说，我不喜欢小孩子。

张凡感觉到杨非兴致不高，他在那些照片旁边停了很久，说，要不然今天出去，你喜欢看电影吗？一中对面的商业中心新开了一家电影院，环境不错。杨非说，我不方便。张凡笑，

有什么不方便。杨非说，我不爱出门。张凡说，要适当出去走一走，外面都大变样了，我带你去看看。

杨非没有拒绝。

她这几年相了很多亲，要遵从彼此匹配的原则，所以对方都缺胳膊少腿，像是照镜子，相互看见都觉得尴尬。她与张凡的第一次会面却不尴尬，这是她少有的体验。另一个觉得不尴尬的是一个乡镇中学的语文老师，右腿车祸截肢，爱读史铁生和路遥，眼镜总是滑到脸中央，笑起来眉头就皱在一起。他们那时几乎快成了，后来男方家里又嫌她工作不好，要她陪嫁一套房子，父亲几乎要妥协，她找到语文老师，说我们还是算了，残缺的地方不一样，彼此补不起来。

张凡是第一个以四肢健全的姿态站在她面前的男人，她观察他，想要发现他的残缺，最后得到的却是他的无比健全，她竟觉得恐惧。她早发现他的眼睛问题，可这种残缺和她的残缺并不对等，和她比起来，他依旧是健全的。她厌恶他的健全，却又贪恋他的健全。

张凡开来一辆吉普，是单位的车。他将杨非推到院子里，上车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但这种犹豫没有持续太久。他说，我抱你上去，轮椅放在后面。杨非同样地犹疑，她看着张凡的腰带到达她的眼睛，突然觉得有些滑稽，她点了点头，双手从扶手抬起来，张凡蹲下来，轻轻咳嗽了一声，靠近她的身体，将她的双手搭在自己肩上，抄手绕过她的双腿，扶住她的后背，轻轻地，将她抱了起来。她轻贴着他的胸膛，大脑里有一瞬间的空白，除了父亲，这些年来，她再没有这么近距离地靠近过一个男人，他的军绿色衬衫上有着炙热的汗味，带着腥气，她的体内突然又升起那小小的刺痛感。

张凡将她轻轻放在副驾，她的重量在他手上消失的时候，他的衣衫上沾湿了一片汗渍。他关上车门，在炙热的空气里轻轻呼出一口气，提起地上的轮椅，放进后备箱。他记得那天热得出奇。

她坐在副驾，看着放置在她前面的车辆通行证，下面印着一个大大的政府红章。她轻轻吐出一口气，一种陌生的未知在她面前展现。

张凡上车，侧脸看了看杨非，说，系一下安全带，最近查得严。她拉过背后那条长长的黑色带子，始终找不到能够扣住的地方，她的脸憋得通红。他终于伸过手来，拉住她的安全带，轻轻扣进去。她没觉得救，而是更重的沉溺。

一路上，他们没有说话。他推着她从地下车库走进电梯的时候，她尽量使自己不低下头去。电梯门快关上的时候，一个穿黑色裙子的女人跑进来，眼神在杨非身上停了很久，她与他们并排站立，毫无掩饰地表达出对于他们的好奇。从地下二层到一楼，电梯的空间始终呈现一种密闭而窒息的状态，从电梯出来，她再次感受到那种从海面浮起来的感觉。

他去买票，她在后面等。后来让她回忆，她完全记不得那天看的到底是什么电影。工作日下午看电影的人很少，售票小姐的声音在空荡的大厅里听得很清楚，售票小姐说，两张是吗？张凡说是，售票小姐问，是后面那位女士吗？张凡说是。售票小姐微笑着说，凭借残疾证可以半价。张凡说，不用，两张全票。售票小姐说，好的，请稍等。

她突然想立刻逃回去，逃回那间此刻已经落满日光的房间，一个人藏在被子里，睡上漫长的一觉，等到黄昏来临的时候，去感受房间空荡的凄清。但她终究待在原地，像她人生中所面临的所有选择。她看见他朝她走过来，她一时分不清他哪只眼睛是真的。他看着她说，我们走吧。

她在梦境里再次沉溺，在梦境那片荒凉的废墟里，那种只属于她的昏黄色调的梦境里，她始终有一种不想再醒来的愿望。

那天从电影院出来，他说，你喜欢看飞机吗？她问，什么？张凡说，城外的军用机场，附近有一个很高的水坝，小时候我经常去那里看飞机。

小城是云南最大的坝子，抗战时期在县城西南边建了军用机场，驻扎美国空军部队，建国后成了空军训练基地。张凡小时候跟爷爷住，就在机场旁边的村子，每天听见飞机在头上轰隆轰隆地飞过。他问爷爷，是不是要打仗了？爷爷抱着水烟筒，你想不想打仗？他说，想，电视里演的可刺激了。爷爷摇摇头，不说话。老家的墙上现在还挂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美国大兵，搂着一个小男孩的肩膀，男孩裸着身子，骨瘦如柴，瞪着眼睛看镜头。那个男孩就是爷爷，爷爷的父亲曾经是修建机场的民工，每天都要拉着巨大的石碾压碾机场跑道。有一次爷爷跑去机场给父亲送饭，美国人给他拍了一张照，后来洗出来送给他，爷爷一直视为珍宝。那个大兵，是开战斗机的嘞，爷爷说。张凡说，那我以后也要开战斗机。

他们最后去了盘江河边。盘江属珠江水系，绕县城四十余公里，这是距城最近的一段。河边新建了一片别墅区，修了宽大的柏油路和河滨公园。杨非小时候来过，那时候这里还只是一条长长的泥土路，在土堆里能找到大大小小的海螺。那些童年的海螺使她相信课堂上老师所说，这里原来是一片海洋，后来海水退去，成了一片平原，一片在云贵高

原中低洼处的显眼坝子。

那时太阳已经落下去一点，没有建筑的阻挡，阳光恣意地、大片地照耀着柏油路大道，他推着她沿树荫走。他原本想沿台阶下到河边，但台阶很高，没有适合轮椅下去的坡道，他就放弃了。他感觉她有些累了，便在一片树荫下的石凳坐下来，旁边是一棵炮仗花树，长出来的花红得像一串串鞭炮。在路的对面，一排排空着的商铺贴着招商广告，中间有一家突兀的小超市，他说，我去给你买瓶水。

她坐在炙热的大地里，转过轮子，去看河水。已是汛期，河水涨了上来，河流裹挟着从上游漂流下来的松木枝和各种垃圾。河岸的斜坡上间杂地长着各色矮牵牛，偶尔有羊群从公路穿过，不听话的几只就跑下来，咬几口岸边的花，再留下一堆小小细细的粪蛋，等赶羊人长长地喊一声，它们又跃跑着追上羊群。

等她转过身来的时候，他已经给她拧开了瓶盖。他指着河对面那片红墙建筑说，我初中就在那个中学。她点点头，九中。他说，你在一中吧。她说是。他喝了一口，看来学习好。她笑，学习不好，小升初是舞蹈比赛保送。他便惊叹起来，真是厉害。她突然愿意谈论这个话题，说，我读书读不好。他说，我更老火，看见字头就疼，天天想着能开飞机。她笑，你想当飞行员？他说，从小就想，但我连高中都没考上。她说，你当兵了，也算是接近。他说，不一样的。他扎你眼睛的时候你疼吗，她突然问。

张凡看着河流上的大桥，那桥算是一个城乡分界线，驶过那座五十多米长的大桥，便算出了城。从前那只是一座不到三米宽的小石桥，每天晚上自习，他就骑着自行车穿越那座小桥，去大伯家里。他借住在那里，留给他的是一个三平方米的小房间，之前是他的奶奶住，最后奶奶死在这个小房间里。大伯和父亲将奶奶从房间里抬出来，她睡得很安详，那对陪伴她大半辈子的、长长的玉石耳坠将她的耳朵坠到了底。小时候他曾问奶奶，你什么时候死？奶奶摸着耳朵，说，等我这个洞坠到底，就死了。他被那把尖刀戳穿眼球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就想到奶奶那只坠到了底的耳洞，他觉得自己的眼睛也坠到了底。

他说，当时没有感觉，后来才觉得疼，觉得自己会死。她看着他的眼睛，说，后来呢，那个毒贩。张凡拍了拍自己的胳膊，抬起头来，肩膀上印着一只虫子的尸体。被战友击毙了，一枪穿破了脑袋，他说，就倒在我面前。

杨非不再说话。

张凡帮她赶了赶面前的飞虫，问，你以前跳什么舞？她看了看他，似乎自己也有点疑惑，顿了一会儿，才说，学的民族舞，老师说我跳孔雀舞好看，后来就一直跳孔雀舞。杨丽萍你知道吗？张凡点头，知道，我妈喜欢吃的那个糕点，包装上印着她。杨非说，当时老师天天让我看她的录像带，我还逼着我爸买了台VCD。张凡说，你爸对你真好。杨非沉默下来。

读书的时候追你的人很多吧，张凡突然问。杨非说，还行。张凡笑，看样子很多，有谈朋友的吗？

杨非说，有一个。张凡问，什么样的？杨非说，长得还行，就是有点胖，都叫他胖子。他爸是县里的官，有钱，每天都给我送早点，买礼物。张凡点头，是，男友有钱就魅力大增。杨非没搭话。张凡说，我能抽根烟吗？杨非说，你抽。张凡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红塔山，点了火，嘴里含着烟说，电视里都这么演，男人没钱，女人就要跑。杨非看着他，你觉得我是贪你的钱么？张凡说，我不知道，我也没钱，但我觉得你贪别的。杨非望着他，什么？张凡不说话。杨非说，麻烦烟借我一支。张凡看她，没说话，拿食指敲出一支烟，把自己的烟头凑近，点燃，递给她。张凡说，你会抽烟。胖子教的，杨非说。后来呢，张凡问，你和胖子。

太阳又落下去一点，杨非往树荫下挪了挪，后来我出事了，休学，没再联系过。张凡说，现实。杨非两只手叠在一起，望着对岸。

两人聊到天已有些擦黑，那时晚饭后到河边散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张凡说，我们走吧。他推着杨非向路边的车走去，打开门，轻轻抱起她，放到副驾驶座上，他碰到她的双腿，觉得异常冰凉，他看了看她，她只是抿着嘴不说话。

她到家的时候，父亲坐在桌边。她叫，爸。父亲点点头，吃饭吧。她扒拉了几口，说吃饱了。父亲说，在外面吃了？她答，没吃，就是吃不下。父亲动了动嘴，没说话。

她回到房间，去抽屉里翻相册。门锁坏了，她就推着轮椅背靠着抵住门，一面听着外面父亲洗碗的声音，一面一张一张地翻照片。照片右下角印着的暗红色的日期在提醒她，在某个时刻，她曾在某个地方对着镜头笑过。与张凡聊天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似乎陷入一种失忆之中，记忆并非她想象中连贯的线条，而变成一些细小的、随时可以丢弃的碎片，这使她感到一种被记忆背叛的恐惧。这是第一次，她涌出一种强烈的、回忆过去的渴望，那些回忆曾被她强制压在脑子某一处黑暗的角落。

她突然听见父亲向她房间走来的脚步声，她左手抵住门，右手将相册往床底下滑过去，露出一个边角，她没来得及过去塞起来，父亲就推门而入。

父亲端着菠萝水进来，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个，用冰糖煮菠萝，放凉以后搁到冰箱里，冷透了再拿出来吃。以前没有冰箱，父亲总是煮好一锅，笑嘻嘻地去楼下的小卖部，放在小卖部的冰柜里，晚上去拿，给小卖部舀了大半，剩下的半锅端回来。

她接过菠萝水，问，今天不上夜班吗？父亲说，待会儿就去。父亲站在她面前，看她吃完几块菠萝，说，今天那个男的就是你周娘介绍的？她说，是。父亲说，还是找个真心实意的好。杨非说，他挺真心实意。父亲递纸给她，让她擦嘴。还是条件相当一些的好，父亲说。杨非吃下最后一块菠萝，菠萝卡在她的喉咙，等她吞咽下去，喉管里却始终残留着一段可感的空隙。父亲接过她手里的碗，转身出去，轻轻关上门。

她把纸巾捏在右手手心用左手划动轮椅到床边，用轮子推了推那本相册，她低下身子去，没有够到相册，她再弯下去一点，还是够不到。她的身子趴在自己的腿上，随即缓缓抬起，她扬起手，重重地捶在腿上，没有一点知觉。

张凡和杨非开始定期见面。一般是一周一次，张凡空下来，就去找杨非，他在寺庙外一条巷子等她，开车去河边，或者是公园。他们第一次亲吻是在月亮湾公园。那是一个废弃很久的公园，荒草长得老高，池里暗绿色的水发出阵阵臭味。是她提议去的，说是小时候去过公园里蹦蹦床，五毛钱两个小时，她很喜欢那种腾空的感觉，比跳舞时的那种腾空要精彩得多。那边，她指了指公园东北角，以前蹦蹦床就在那片空地上。张凡朝她指的方向看过去，现在堆满了一层层破碎的石棉瓦和几个废旧的皮沙发，越过围墙，旁边是一片居民区，居民楼窗户里漏出的光在那片废墟上，能看见灰尘的颗粒在黄色的光晕里流动。

他们选择了一片草比较浅的石凳，他挨着凳子的边沿，扶着她的轮椅。她说，给我讲讲你当兵时候的故事吧，我爱听。她喜欢他那些与此刻不同时空的故事，带着残酷的荒蛮和猎奇，她也喜欢他讲故事时的神态，眼睛微微眯起来，仿佛与这个世界隔着一层主动的疏离，然而她却能穿过那层疏离，轻易地走进他的世界。



叶昕昀

1992年出生，云南曲靖人。本科毕业后进入国企从事行政工作，三年后辞职。2018年开始小说创作，2021年取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小说和评论发表于《收获》《作家》《安徽文学》《文艺报》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Chung Hei on Unsplash](#)

非虚构

争执从何而起 | 一个精英家庭和 它的教育问题②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我们在探讨教育问题的时候，究竟是在探讨什么？

子亮妈妈隐约记得父子之间各种争论大概是从香港问题开始，2014年前后，恰好是柴子亮青春期即将启动，叛逆挑衅蓄势待发的时候。

“你对香港的看法多大程度上是你的真实想法，多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跟你爸爸对抗……只是为了激怒他？”我们听他讲自己的世界观，也从他如何看待香港开始——而且，刚刚开讲就让我们体会到一个巨大的不同：七〇后八〇后说起香港的时候，还有一种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概念加持，而在〇〇后的柴子亮眼中，浦东繁华、现代、充满科技感，香港混乱多元，是个商业社会，全世界的好人坏人都会在这里做生意。无论如何，香港即使有价值，都算不上一个模范生了。

已经相隔六七年，柴子亮对香港看法肯定已经面目全非，不可能单独拎出一段记忆来说“这是我在2014年对香港的理解”，事实上，他说的所有东西都来自于2020年，在这一年他的世界观。有一些说法，就像柴博士会评价的那样，“人云亦云”，但在我们漫无目的的聊天过程中，系统地表达出来，还是让人印象深刻。

香港的地位是上海没办法取代的，即使上海有一天成为纽约这样的世界级金融城市。它毕竟还是大陆上面的一个城市，但它跟香港还是不一样。香港之于大陆，可能像伦敦与美国，它是一个境外的交易场所。很多在美国没办法做的交易可以在伦敦完成，上交所深交所做不了的交易，可能只有在香港才能完成。

香港和上海也不一样。可能我在浦东的原因，我觉得浦东很现代，很科技感，国金啊，金茂啊这一块，西装革履，钢铁森林，比较繁华，人上人那种感觉，所以给人的感觉很紧张。特别有秩序，规规矩矩的，很文明，也给人紧张感。

提到香港的时候，混乱。脑子里，我看港片嘛，九龙城寨重庆森林啊，先入为主的印象，贩毒啊，罪恶都市的感觉，全世界的好人坏人都集中在这里，作生意。

上海浦西也许有这样的地方。相比于香港，上海人说话吴侬软语，感觉更文明一些。东京很现代化很繁华也有那种感觉，外国人相比香港要少一点。

上海是我觉得中国最有秩序、治安最好的城市，垃圾分类也好。电动车各种处罚，骑电动车过斑马线不警告了，直接罚钱，最严格的城市。很多时候上海体现出来的是没有人情味，但很多时候这种区别也很明显。

上海城市以工商业立足，非常看重契约的精神，所有东西都写在白纸黑字上面，不像其它城市。我在爸爸老家开车出过罚单，告诉我爸的朋友，然后这张罚单就取消了。在上海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就是，我觉得很好的，就是对规矩很好的重视。

柴子亮认为自己是一个讲规矩的人，虽然在“取消罚单”这件事上，他也很愿意享受“不守规矩”的好处。柴博士说到他如何帮远房亲戚——那个管他叫老舅的孩子——读研究生的时候，那三个步骤中的每一步都游走在“走后门”的边缘，相对于柴子亮的“取消罚单”，柴博士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毕竟考研是个零和博弈。

不过，更多情况下柴子亮维护了一个爱讲规矩的上海人的公共形象。到武汉没有几天，同学聚餐，手机点餐的餐馆，点心叉烧包之类按时令价，手机点餐上写着0元。他们五六个人，预算800元，最后花到了1200元。子亮的同学纷纷表示算了，他不依，认为这是欺诈消费，找经理，提出解决方案，餐馆不依，他就打12315，“这是我从小在上海找到的解决方案，家长同学告诉我的都是这么做的，有什么亏欠的地方，不生气，不拍桌子，就跟他讲消费者的权益，你就跟他说不行。12315都能解决，没必要吵架”。那场争执以他们付了80块钱而结束，同学们对柴子亮刮目相看，夸他很会说，一方面是说他的口才，另一方面是解决了问题。他只是说，在上海不会被商家坑，欺压顾客这种事是行不通的。

你不能说武汉和上海谁好谁坏。上海白纸黑字，做生意的人会追求这样的环境，没有什么潜规则，不讲人情味儿，我觉得这个好。

明显能看出来，武汉好像很有规则，开始就很大，学校科教在一块地方，商业中心在一块地方，旅游景点在一块地方，还有工厂。很明显。上海原来可能有规划，但发展久了，越来越大，大学城就有几个。

武汉经济发展不如上海，但比上海都大。武汉人，或者其它任何中国城市，都比上海人要野一点。我第一天去学校，坐校内公交车，我问司机什么时候下车，下车之后怎么走，都特别凶，我以为是在骂我，不耐烦。后来我才知道，这地方人说话就是这样子，又急，又冲。

柴子亮说他还蛮能接受这种不同文化的，与他喜欢不吵架讲道理的上海人一样，动辄动手的武汉被他看作“城市气质”，不会将它归类为“素质低”。“上海最初是工业城市，后来变成商业和服务业，但武汉不一样，武汉经济水平没有发展得很高，商业水平不高，但科教程度非常好，他认为武汉商业水平比较低，是一个巨大的优点，“它绕开了经济发展那条路，同时它还有很好的教育和医疗水平，北京上海之外最强的医疗力量，最多的985和211，最好的高中也是武汉的。”

武汉是否“商业水平不高”，这要看从哪个角度来评价。作为九省通衢、东方芝加哥、以码头和汉正街而名扬于天下的武汉三镇，从古到今都有大量商业就业人口存在，它没有发展出成规模的现代金融业、没有大量的以资本、贸易和人力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倒是客观的，这可能是柴子亮对武汉青睐有加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他还是更情愿把自己归到“工业党”人这个范畴里。而且，很显然，这是他看待从城市开始到很多东西的基础。

我觉得相比于武汉，上海还要更浮躁一些，更多的是向钱看，它过于强调市场化的价值。武汉不是以商业立足的城市，并没有多少人从事商业和服务业。很多人从事科研和科教相关的行业。

我不喜欢消费型城市。香港和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可能远远超过武汉，但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工业很重要。我觉得香港衰落的原因，就是工业淘汰出去了。一个服务

业发达的城市必然是一个贫富差距比较大的城市，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一个城市。

尤其是香港，什么人能赚到钱？富人，和为富人服务的人能赚到钱。我不希望上海变成这样的城市。我对武汉的印象就是这样。很多人没做服务业。有很多人在做科研，在做教育，扎实地做一些事。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上海去做商业，全中国的商业中心，其它的城市做其他该做的事，选择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比如武汉，可以芯片，它有光谷，科研的重心可以放在这里……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发展得很快，我们也会变成美国那样，经济是经济的城市，科研是科研的城市，美国最好的大学也是在纽约华盛顿，也不一定要在大城市。

我对于城市，第一档很硬核，就是苏联和东北那种工业城市。我没去过，可能只是纸上谈兵叶公好龙，但在我印象里，就是这样的工业型城市。

他对东北工业城市的印象有一部分来自于《铁西区》。我说我就是沈阳人，我也很喜欢《铁西区》，但欣赏一列喷着蒸汽的火车头带着一列工厂自备车皮开进大雪中的厂区的画面，与把这种蒸汽朋克当作日常生活是两个概念，从这里导出对工业城市的喜爱，似乎过于浪漫主义了。我跟子亮说，你要知道，你喜欢的硬核城市，现在它有更多被时代抛弃的感觉。即使你不去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工业制度变迁，只是从最基本的层面看，工业肯定是要升级的，升级肯定是转型的，但产业工人未必能跟着转型，只要一转型，人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这个生产力要素的修复动辄十几年二十几年时间，但产业转型不会等你这么久，其它的生产力要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早就转移到新兴之地，结果就是既往优势全无，最终总是一败涂地。他对我的这些意见似乎不陌生，不过他并没有想着跟我去争论，只是说，他妈妈也是这种想法，一想到他未来有可能留在武汉，就难受。他说抛开叶公好龙的因素，他也更喜欢非消费型城市。“到美国，我会更喜欢西雅图，不喜欢纽约。纽约是消费型，金融中心就是消费型。北京是个政治型城市。”他为城市做了一个分类标准，消费型，工业科研型，科教型，政治型。在这个谱系中，杭州要高级一些，因为有阿里巴巴这样的前沿型科技类公司，这得益于杭州科教上积累还是“比较厉害”的。但也不好说，就像纽约虽然大学不少，但商科数学这些，“没有直接产生价值的能力”，他说他没去过纽约，但对香港熟，“香港人不怎么开心，生活得很累，它一直在衰败，下滑，说明纯粹的金融性城市是走不通的。”

唔？是这个因果关系吗？我们心里留下一个疑问，本来打算接下来问他，不过，在听他谈了一大通理论之后，好像这也不是最重要的事了。

香港衰败主要是因为大陆改革开放，它最终失去了原来可以发挥的特殊价值。香港原先的地位，来自于中国的封闭。才让香港拥有那么强的竞争地位。从港口角度来说，新加坡比香港优势大得多。中国越开放，境外资金直接流入中国，不必走香港，这是最直接原因。

第二个原因，香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赶走了工业、第二产业。把自己变成纯粹的第三产业的城市。只有第三产业行不通的，发展中药港之类，最后都沦为房地产业。

第三个原因，内地利用了香港。让他们去帮助国内发展经济也好，协调经济危机也好，为了跟香港合作，结果跟香港资本家合作。回归 20 年里，资本家的权力不但没有因为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背景而减少，相反倒是增强了——放给他们更多权力。

好像意犹未尽，他又特意强调了一下第三点，以至于我怀疑他似乎更愿意把这三个原因看作根本：“我们政策上并没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可以限制他们，结果相反，我们为了拉动经济，为了 2008 年振兴，给了他们更多权力。”

“贫富差距成这样，中央政府确实有责任。这是一步步路走出来的。本来应该更加约束资本家，扶持第二产业。结果给了香港资本更多的权力。资本控制了香港。”

听起来相当严重。

“三个原因是怎么总结出来的呢？”我问。

“李嘉诚的生意，超市，地铁，电力这些东西。其它国家资本不怎么做这个。这里的利润非常非常高。即使是在最最最资本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完全是民间资本承担的。比如法国也罢美国也罢，最后还是有国家的资本在其中。国家监控着它，控制着它。”你会发现，他确实对第三个原因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很难在世界上找

任何一个城市，民生也好，服务也罢，这些资本都掌握在某个人手里。”

“香港最繁华最巅峰，是回归前的十年到回归后的五年，后来一直走下坡路。香港各界人士开始表示不满，是在 2013 年，如果从经济上找原因，实际上十几年前就出了问题。据我所知，资本权力越来越大就是在 2005 年到 2008 年这几年。在那之前，还没有掌握在少数几个资本家手里。”

“这些看法都是一点点总结出来的。也包括跟爸爸辩论。”柴子亮总结，“我爸爸会有自己的看法，很多观点赞同，有些还有重叠。他不同意第三点。跟你们想法比较接近。他觉得大陆限制了香港的自由，资本家嗅到了资本危险的信息，结果准备带着资本跑了。他认为资本家掌握这个城市不会产生坏处。”

去年（2019 年）七八月的时候，我爸会说政府对于香港会像以前那样拖延了事，虽然越来越强势，他觉得不会闹翻。我觉得一年内会有强硬的解决办法。因为香港已经不重要了。所有人都在放弃。英美也在放弃。

年初海南要做自贸区，要降税。海南免税店已经开了几年了，好多人排队代购，新的免税港。政治宣传也好，实际政策也好，它传递的信息是，我宁可毁了香港，也得真正回归，实实在在地属于我们。

我爸觉得香港失去自由港的身份，很多东西会转移到新加坡。我觉得，即使没有这些事，很多东西也会转移到新加坡。新加坡的优势太大了。

现在微博上全是骂香港的了。我觉得事情会有一个了断了。个人感受，有一点点悲凉吧。就跟你看一个地方的农村，它突然现代化了，你会为它的现代化而感到高兴，你也会为它失去过去的田园风光而感到一丝丝遗憾，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柴子亮以为一旦有了了断，对香港人可能是好事，就像第一次回归的前五年十年一样，政策会向香港倾斜，“它也不想让香港人民寒心吧，它也想用各种手段增加凝聚力吧？”我想到苏先生的“愧疚”说，还想到了上海的 1950 年代，未来如何，这还真是一个未知数，这世界上何止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柴子亮很快把感慨放到他自身的情绪之中：“我挺喜欢这种迷惘的情绪，不是很积极的情绪，但是，香港的节奏是挺积极的，不是很悲观的感觉。”

这些关于香港问题的探讨会产生很强大的对立情绪？在父亲与儿子之间？

我们差不多弄清楚了柴子亮和他爸爸关于香港看法上的种种差异，从最初的香港话题到如今的香港话题，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激怒他父亲的原因，如果这是引发了将近十年时间里父子之间的对立，每一次发生的时候，到底只是柴博士的一种情绪失控，还是一种两代人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你们在方方这个问题上最大的分歧是什么？她揭露了你认为根本不存在的阴暗面？你妈妈说你认为她只是道听途说？”

“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吧。我觉得从汉朝，国力积弱，文帝景帝那段时间，整个国家都偏阴柔，国家为了经济发展放权给地主，虽然国家发展很快，但确实留下了军阀割据的局面。结果造成很多小的资产阶级，那时候还没有资产阶级，就是封建地主阶级，他们获得了很多权力。国家把这些权力下放给地主。武帝准备侵略的时候，整个国家一下子变得阳刚了。感觉就是留下文学作品都是阳刚的，很直男的那种。”

我听他用了很阶级斗争的语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之类，有股社会发展简史的味道，“你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些信息？”

“历史书啊。我看一本写汉朝人物传记的书。有血有泪，挺中国文人，讲司马迁啊，汉朝文化人之类的。我不是很认同‘文学只能是积极的’这样的观点，但我能理解眼下的情绪：虽然你不能简单地把国家当成一个人，但是大体上说，你把国家当成军队，现在军队要出征了，准备要打仗了，你肯定希望这个军队是阳刚的，不是阴柔的。”

“中国要打仗了吗？”我有一半是真糊涂的，要知道那还是 2020 年，连俄罗斯都没有动手打乌克兰呢。

“我喜欢民粹主义，喜欢阳刚的文学。全世界都要打仗，不只是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子亮有一大半也是真诚地不解，那意思就是说你感觉不出来全世界都要打仗吗？

“全世界都这样，也不等于它就是对的啊。”我倒是觉得这个世界真是有一种被我们这些成年人搞砸了的意思。不过，子亮原谅了我们。

“没关系啊。就是这个世界传递了一个要打仗的气息。所有人都磨刀磨枪，这个时

候你演奏出哭哭啼啼的音乐，大家是会觉得你是一个傻逼的。就比如说，现在马上踢足球了。或者高考了。明天要高考了。没有老师会跟你说你哪里不好，你肯定会跟孩子说，你牛逼，你最棒。你完美无缺。你快上场考吧，自信就完事了。”

“是真的出现了要高考的紧急氛围，还是你的幻觉？”

“这就是一个问题，如果全世界都陷入到这种氛围里，全世界都觉得我们是高考，那可能是真的要高考了。”

“有一些东西呢，它是零和游戏。比如高考，你考得好可能就抢占了另一个人的入学资格。但国家与国家之间，很多时候，这里面有另外一种思路。”我试图负隅顽抗。

然后，他讲起了入关学。

知乎上有入关学。我们比美国发展要落后的，从科技到经济都要落后很多年，军事实力落后三十年。入关学核心的内容在于：类比我们是清军，我们是弱的，两个选择，一个是呆在北方，等着自己发展壮大，比照现在就是觉得中国应该尽力缓和国际关系，卖弱，争取发展更多时机；另一个是现在就入关，原因也很简单，美国人不会坐视给你机会，你要找合适机会入关。

趁着农民起义出现混乱的时候，对比现在就是趁着特朗普上台，趁着他们弱相对混乱相对没有凝聚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去搞他们。如果明朝没有农民起义，清朝绝对打不过。直白解释就是这样，特朗普就是李自成。

“它对你来说是什么？是个思考问题的指导方针？”

“我觉得挺好笑的，确实很多人相信，虽然很多人没有这么极端，但觉得方向是对的。”子亮表现出一种战略上的冷静，“很好笑的原因是，在当时那个年代，生产力的差别带来的战斗力的差别，没有那么大。但现在这个年代，我觉得我们国家陆军空军都还可以，海军想跟人打，怎么可能嘛？我觉得是，人家打我们，我们防御，可以，我们想横跨大海，过太平洋去打他们，太离谱。”

“那你觉得大方向对吗？”

“关键是，我觉得应该准备动手，但应该是他们先动手。他们可能从南海动手。我觉得认真正经地考虑入关学，其实就是两种可能：一个是我们被美国人针对了。要么我们就是剖析我们的问题，重新获得整个国际体系的认可。另一个就是，不管我们付出多大努力，我们都不会得到美国的认可，所以与其我们拉拢美国，不如去拉拢其它人。也不一定是直接要去打，只是我们不要试图去做美国小弟了。美国不可能接纳我们了。”

“2008年的时候，我们跟美国还是不错的，甚至我上初中的时候，跟美国都是不错的。”我算了一下他上初中的时候，应该是在2013年前后了，我这时才意识到他的时空概念与我的理解已经有很大不同了，或者柴博士也是一样。“跟美国决裂的时间就是WTO 20年的时间要到了嘛。人家一看，中国都发展成这样了。经常有人举日本例子，再这么舔美国人，像日本一样舔，但美国觉得你威胁到他们了，立马就会打过来。入关学核心就是这个，既然早晚会有一刀砍过来，那我们就要打。不是要把红旗插到白宫，而是外交上一步一步地脱离美国。第一目标从尽量和平地发展经济，变成先制约美国，就是说和平发展经济已经走不通了。不是说我们真要插旗。而是说这一战不可避免，我们要做好准备。你这样想，入关学是有它的道理的。”

“你如果说广义的入关学，我还是赞成的。”子亮为自己郑重地总结，“早晚要砍我们一刀。文化也好，贸易也好，还是真有一天，军事上的，这一天躲不过去的。没有一个国家不靠战争来赢得世界第一的地位，美国人也靠二战。”

我觉得这里不但有主要次要矛盾之分，还有必然性的问题。没有二战，美国绝对不可能成为第一。我不赞成打到美国去这样的入关学，这完全就是德国纳粹的思路嘛。真要走这条路，我们也不可能避免。

我们憋了一口气，美国人憋了一口气。

入关学的缺点是太简单，但优点也是太简单：所有人都觉得这样的话，美国也这样觉得，它就是要动手。民族主义政治家在利用入关学。入关学也在利用这样的政治家。这东西一旦被挑起来的时候，政治家本身也难以控制，也没有能力来阻止它。

“它没有回头路。”我替他也做了一个总结。

“特朗普上台之前搞民粹主义，上台之后，要继续搞下去。如果我们不回头，他们

大概率也不会回头。”

我头脑当中是这样一个市井画面：我觉得他要动手，他就要动手了，他已经把手伸到自己裤兜里了，他就要拿刀了，他就要杀了我了……如果你带着这个东西思考问题的话，你一定会打起来。中国美国都是这样。“这是入关学？”

“不能简单类比。如果是自己思考的话，不要简单类比。但如果说服别人的话，类比还是有说服力。类比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情绪。”

后来有一句网络上调侃的话，“抛开事实不谈，难道XX就没有责任吗？”这里的“XX”很多时候是美国，也可能是其它拿来调侃的大家伙。在一连串的“类比”中，消失了的是事实本身。如果抛开了事实，我们在说些什么呢？我们和子亮之间心平气和的谈话中间隐含着大量认知上的差异和矛盾，而这很可能同样是柴博士与子亮之间父子争执的症结所在。他们争论的可能“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情绪”。

而且，你很容易就发现，这个“事情本身”，甚至跟传统意义上的教育问题是无关的。那些通常是最直接的教育问题，并不在父子冲突的范围之内，这一方面是父亲与学校教育的疏离，柴博士并不是柴子亮教育的直接责任人；另一方面隐含着更重要的一个可能性：所谓“自由成长”，与学校教育其实关联度并不高。教育实质上只是一种物质投入。如果按布尔迪厄对社会的处置方式，那么，在中国，教育是经济资本，并不是通常理解的文化资本。

“我初三结束的时候谈了一个恋爱，是河南人。我妈妈的一个朋友家的孩子，他们来上海玩的时候认识的。很努力，也很聪明，但因为高考在河南，河南考生多，以她的成绩要是在上海肯定可以去很好的学校了，但在河南也只能去一个很普通的学校，上海理工。很不公平。但在河南这已经算考得非常好了，毕竟能去一本，而且还是在上海。”

对于柴子亮来说，他意识到这是他第一次遭遇“公正”问题，一个来自于身边的、关系密切的人，她遇到了公正的问题，“她应该配得上更好的东西，可是她为什么得不到？”

柴子亮无意当中可能说出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前面提到的问题：为什么教育只是一种物质投入；我们在探讨教育问题的时候，究竟是在探讨什么？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资源，在中国的一线大城市里，是一种可量化的物质性的存在：决定教育质量的是很硬核的资源，学区房、择校的本钱和投入、教育目标的设定、教育目标和教育投入之间的匹配……对于城市里相当多数的家庭来说，它只是表现为一种物质投入，它是可以用钱去衡量的。把孩子放到一个有着若干个控制开关的体系里，家庭只要就着菜单选择，最终结果是可预期的。所以，传统的为了提升学习成绩、增加技能的教育体系，其中矛盾反倒是最少的。你不付补课费，你的这门课的成绩就会差；你选择了一个相对宽松没有压力的学校，你未来可能就不会进到九八五……所谓“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说的就是这样的现实。

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也是父母经常会表达的，“想上什么样的学，家里都支持”，也是这个现实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教育实际上只是一种物质投入。

柴子亮和初恋女友遭遇的不平等局面，是“不可抗力”那一部分，是钱所不能解决的。

所以，最终显示一个家庭里教育能力和水准的，或者是拥有“不是能用钱就能解决的”那部分资源，或者是常规教育之外，比如全球化的视野，比如自由成长的环境，比如开放普适的世界观……

对于柴博士来说也是如此。他不会在学业上与柴子亮产生什么样的争论，一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参与到与学校的沟通和学业的具体问题中来，另一面隐含的更深刻的问题则是，他相信自己在精神上可以塑造柴子亮，竞争优势、差异化、以及冲突都是从此开始。



题图来自 [Tsaiwen Hsu](#) on Unsplash

非虚构 柴子亮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候群 | 一个精英家庭和 它的教育问题③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自由即奴役”，也可以是一种价值观。

对于柴博士来说，他把自己所有的对教育的理解、对儿子的期望和对中国未来的期望，都放在这个真正的决定成败的“文化资本”的竞争中。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有人肯定他，他就会高兴，他也愿意为此花时间。很多孩子，就是因为老师肯定，他那门课就上得好。有的时候没得到老师肯定，这门课都不想学了。不像我们那时候还有忍辱负重，现在他会撂挑子。过去我做老总。七〇后还可以，八十年代的人可能是六十年代的人后代，他们已经不愁吃不愁穿，你骂他几句，人家就不来了。六七十年代的人不会这样。新世纪的年轻人，未来十年的主流，现在他们思考，提醒你，我们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个信息时代。”

“如何发展信息才是重要。有一天柴子亮问我，我们有四大发明，造纸是中国发明的，我们现在用的纸张怎么还都是进口的？我后来说，焚书坑儒，老百姓就不让人看书。现在信息时代，如果建墙，封锁信息，害的是这个时代。我们的信息时代，电子信息图书馆，人家在做什么？人家在筛选信息，不是阻止信息，是找到有用信息，建立数据库，他们给他们大学生，他们网上也有糟粕，也有很多假信息，图书馆里很多老师馆员，值班的时候怎么过渡无用、假的信息，给学生带来的是净化后的信息。而我们是制造编造假信息。信息会害了我们一代人。”

“他们以为他们拥有真理。他们发现很多人跟他们一样对一些事情有相同的评价，然后，他们得出结论这就是对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谁真正参与评价了，这个他不知道。”

“我跟他教育一个东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制定一个法律，你对别人是什么样的要求，你自己也得达到这个要求。我给他讲，你的法律是龌龊的法律还是开明的法律，还是土匪的法律，你不能够说只对底下的老百姓管用，对上面不管用，这就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

柴博士对柴子亮的批评包含了某种“预判”——他预判或者担忧柴子亮向某个方向发展，他必须挺身而出，堵住这种倾向，或者夸大柴子亮身上“错误倾向”的严重性，以更严肃地提醒他对某些问题的重视。

“他比较崇拜丛林法则，有强有弱，为什么是要平等的。我也认可丛林法则是个事实，但这个法则也要有个度。它本身是个事实，老虎吃羊，你不让他吃？公平也是有的，老虎反制能力有限，对羊就更强。”

“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是怎么形成的。可能他的同学啊，朋友啊，自己的思考啊，这些都是原因。他爱看的武侠小说、网络小说之类可能也会给他这种印象。整个社会是个无形的手，最后共同影响了他。他们追求的……怎么说呢，中国是个大国家，会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人统治。”

“对，他自己很明确会说支持集权。”

“我会提醒柴子亮注意，他小时候就说我就喜欢躲在黑暗的地方看光明，我就说你为什么自己不成为光明被别人所看呢？他说那样不好，他就是喜欢躲在黑暗中看光明。他说他不想发光，不想照亮别人，他可能也不一定想成为最好的人。他不想表现自己。”

“你是说子亮是个不爱表现自己的人？”

“现在他也想表现自己。但他表现自己不是为了引导别人，而是恶作剧。把别人带到阴沟里面去，他自己高兴。”

柴博士归根结底还是认为自己的儿子调皮捣蛋。

柴子亮有很多理论。我们在跟他聊天时，经常会被他的理论撞击。看王小波，他跟我们一样看出来对生命的态度：年轻，性，激昂，真实……他特别喜欢，我们也喜欢，引为同道，但很快他就会说，如果没有文革压抑的环境，就不会有这种对生命意识的追求。同样，真正向往自由的文字只有《一九八四》所塑造的环境中才会展现出来，“人们想得到他们得不到的东西。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触摸到自由的概念，因为自由是个很无限的概念。只有当压抑的枷锁套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离自由最远的时候，才有对自由最真实的体验。”

这理论我听着隐约有点“自由即奴役”的味道，一时间我有点转不过来，而且乔治·奥威尔也不是在古拉格群岛里写出来的真理部，只不过他担忧英国政府如果不克制自己，未来很有可能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他的理论与他的生活总是能建立起关联：“高三啊，我手机都被没收了，我啥也没有了。我每天过得都很压抑。它是很重要的一年，真正被约束的一年，也是真正下定决心努力的一年。”他指的是他高三那年去的补习班，巨严格，墙面都是整面的大玻璃，方便老师观察你在干嘛，你不可能在课桌底下做什么。“我在那的状态特别好，所以我想有的时候高压的管理反而有利于一个人，自由状态反而不行。一个人需要特别严格的管理。”

我们如今都已经知道这一年的努力颇有成果。“你推崇这一年是因为得到了一个你希望的结果——考上一个还不错的大学。如果你没实现这个目标，那这一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不会推崇。”他说。

“所以你推崇的是你这一年的努力，而不是极权。”

“它们有关系啊，它是一个关键变量。每个人的人生都要控制变量。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不一样，应试教育有点像短跑散打，只有在痛苦压抑的情况下，才会有成绩。没有人逼着，没有人压迫，人不可能违反人的激素分泌去做违反人的机体性能的训练的。训练本质是一种伤害，超越你的身体负荷。”

“你这个逻辑的前提是你想获得更高的成绩。教育不完全是竞技，教育是成长。”我觉得我的反应有点苍白，毫无力量。柴子亮不跟我一般见识。但我想到了可怜的柴博士，如何面对这个随时准备与他辩论一番——甚至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辩论出一个道理来，只是要“赢”他——的儿子，而且要持续十几年时间……

我们和柴子亮的聊天，最后回到开始那个判断，是“事情本身”，还是“情绪”。他并没有完全回答，只是复盘了他们的价值观。

他跟他爸爸指责他相信“丛林法则”一样，他说他爸爸“其实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真是一个充满隐喻的时刻：两代人在对对方的评价上达成了共识。

场景一般是这样开始的：

“有一个新闻，”我爸爸突然在饭桌上，“你最近有没有听说这样的事……”有的时候是从他觉得某种重要的话题，有利于我们明辨是非，比如说我们要讲诚信。他就突然从中国WTO没有讲诚信开始，然后就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也会是我提出来：“老爸你知道最近这样的事……”

我们家和政治有关的话题讨论大概是从我小学六年级开始的。我爸其实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就是认为个人努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吧，你看我爸就是从农村一路奋斗过来的，每个阶段走得都很好。所以他会倾向于认为时代的因素都不重要，人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靠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你不行一定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我原来也是这样的观点。尤其是我看的网络小说吗，修仙打怪穿越，所有的都是这种弱肉强食逻辑，一直要到我读高二之后，网络小说才会出现那种，谈我穿越回去是用现代的知识去帮助建设古代的社会，而不是用更高级的技能征服一个什么地方之类。而且我从小最喜欢生物嘛，《进化论》也是瞎看，就认为大自然也是优胜劣汰，丛林法则。

改变是在高一高二开始的时候，我意识到了天赋问题。一个人的天赋是很多元的，你看我的英语就没什么天赋，但是我的生物物理就可以比很多人轻松，只要稍微看一看就可以比他们考得好。而且很多时候，努力是不能决定一切的。

我要讲我对政治的看法，大的方面，我支持统一和集权。有的时候跟我爸爸辩论到最后，他就会上升到人身攻击。比如他最后会说，“就你这种要求谁也不要管你的，还要谈集权吗？”我后来仔细想想他说的是有道理。但要我说我还是支持统一。

我跟高中还有初中的一些同学讨论这些事情，我意识到我的生长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我家有更开明的政治立场，就是会探讨这些问题。很多时候你就是想跟别人讨论这些事情别人也不想说，一方面缺乏政治教育，另一方面他们没有政治讨论的习惯。他们在家里是不碰这些问题的。

我的政治立场怎么说呢？你听过哪个两头牛的笑话吗？就是一农民，你问他是不是愿意把一万亩地上交给国家，他说愿意；你又问他是不是愿意把一千幢房子交给国家，他说愿意；是不是愿意把一百两黄金交给国家，他还是说愿意。最后问是不是愿意把两头牛交给国家，回答是这个我有啊，那不愿意。

我爸爸是自由派。他八十年代在法国留学，赶上过一九八九，他那时候才25岁，肯定是支持学生的嘛。他在巴黎声援，发表演讲。中国留学生那时候一共没有多少人，公派的就更少了，其实蛮容易召集起来的，我爸就组织他们，所以他是自由派。

这个立场他一直保持着，大多数时候他分析问题都不是那么激烈的，属于比较缓和的，不过现在越来越激烈了，有的时候没有什么道理就愤怒起来。其实我从其他长辈透露的只言片语里大概知道，那时候我爸回国就在东南大学当正教授，28岁，之所以没有当下去出来经商，还是受到了法国抗议的事情的影响，法国的事可能牵制了他的政治前途。我没有直接问过我爸，他应该不太愿意提起这一段事情吧。我都是通过各种信息综合分析的。

其实我觉得我爸爸吧，本来应该有的地位，他最终没有获得。政治事件还是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的分析，我不会找他印证的。

我爸总体来说是理性的，但是谈到一些问题，比如民主，物权什么的，就会比较激烈。他还是自由派。他会说“等待呗，也许等到有一天有机会他再去从政”。

“你支持你爸爸的价值观吗？如果没有血缘关系，是另外一个人跟你探讨各种问题。”

“我还是喜欢的。我不会讨厌这种人的。只要不虚伪，就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我是那种非常享受与完全不一样的想法的人交朋友的。我认为当朋友，三观一定不能完

全相似，就要不一样，朋友才有意思。我觉得朋友是这样的，遇到了喝杯咖啡，聊一些最近看法，说一些事情。挺好的。”

“吵架以后还能跟他探讨教育方式对不对这类的问题吗？”

“80%的三观问题都来自家庭，我的不对就是他的不对。我这种观点一说，他当然会生气了。”

我能想像柴博士听到“我的错就是你的错”之后，暴跳如雷的样子。

“你感受到你爸爸对你的情感了吗？”

“我爸是有责任感的爱。他是那种内心非常传统非常礼教式的爱，压抑情感表达，放大自己责任义务，他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我看到的是，他非常非常辛苦，会绞尽脑汁去想怎么教育我们，怎么培养我们，他不会表达他对我的爱。他的思维非常简单，爱不是很重要，爱是虚无的东西。扎实的东西是他生了我，要对我负责，养大，教好。责任才是他的核心。如果情感只是用爱来表达和解释的话，确实没有。”

“因为他赋予了自己提升你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就可以罚跪？”

“蛮好的，这是矛盾的，可能璀璨的思想就是来自于这种矛盾。”

“你是说侮辱性体罚中诞生了璀璨的思想？”我觉得我这问题不是很友好，但“自由即奴役”这种思维方式还是让我有些震惊，不过，他还是原谅了我。

“我会很难过，事后也并没有原谅他。我只是理解他。对一个人的爱和恨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它不像游戏，好感度加加减减，正里加负里也加，你跟一个人的纠葛越多，这种爱恨也越多。”

他马上又加了一句：“他让我跪，那时我没有反抗能力。其实还好，十四五岁之后就不让跪了。最后一次跪是十六岁。”

“你妈妈说你前两个月还跪，因为方方。”

“在那之后也跪，说是跪祖宗，跪一下也就起来了，不是两三个小时那种。”

“你别看我爸是留法的，我们家的氛围也很开放自由，但是他的生活观念有时候还是挺保守的，比如说性观念啊、家族观念啊。”

“你怎么知道你爸爸的性观念的？”一般来说，东亚家庭中这绝对是父子交流的禁区。

“高中时我要做一个课题研究报告，我的报告主题是性教育。我主动问我爸的。我爸不跟我聊，我就问他支持还是不支持同性恋。聊着聊着我发现我爸是那种你跟我同性恋我不反对，但如果我儿子是同性恋那就是不行。”

“这是你爸爸的‘两头牛’啊。”

我们认为有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味道在这个故事里。柴博士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开始我以为那是个寓言，后来发现柴博士是作为真实事件讲给我们听的。

有个继父带大的女孩，从来不打孩子。继父每天给她一百块零花钱，奶奶也给她一百块零花钱，每天两百块。突然有一天，她继父出差了，奶奶生病了，这天她没有钱了。她就偷了班主任的钱包，被班主任发现了，就说出来了。我儿子回家跟我说，老爸，你是我亲爸爸。怎么回事呢？我们班一个继父带大的同学，继父从来不打她。你就打我，所以你是我亲爸爸。只有亲爸才敢打人。

柴博士的观点是，打人罚跪，这些都是亲爸才可以做的事。他并不是以“人”为中心来探讨这个问题，而是以出发点来出发。“我是为你好”，“只有我才可以有资格为你好”，“为你好可以采用你不喜欢甚至你绝不可能接受的手段”。

我真的带个孩子，我是继父，我也不敢打啊。

但我跟柴子亮说，就是老实一点啊，要不我揍你了。他久而久之得出一个道理，亲爹才能打孩子。继父是不打孩子的。重要的是亲生的。

柴博士哈哈大笑。老一代的柴博士最终还是轻描淡写地解构了他与儿子之间的争执，但毫无疑问，这完全可以视为另外一个时代隐喻。

“重要的是亲生的。”哈哈大笑之后，柴博士还重复了一遍。



题图来自 [zhang kaiyy on Unsplash](#)

非虚构

通往大众的道路 | 革命者陈一真①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当一部纪录片被举报下架之后。

见到庄女士的时候，她正焦头烂额：一部本来寄予厚望的电视纪录片上线不久就下架了，老板因为疫情滞留在德国，小朋友们的工资还没有着落，在微博上辱骂她的那些人的音量丝毫没有下降。

北京朝外 SOHO，D 座，办公室不大，一百多平方米的样子，有会议室，随意的办公空间，很有创业公司里要强调的人人平等的氛围；有新买的苹果台式机，很大的显示屏，桌子上、沙发上摆着各种杯子，饮料瓶子，还有很新的亮闪闪的锅，可能前一天刚在办公室里搞过火锅聚会——尽管工资几个月没有发，大家还是充满热情，这也是创业公司才会有的局面。

我与庄女士是旧相识，已经有十几年没见面了。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上广几家颇具有影响力的都市报做过编辑，对历史有兴趣，她说有一次看到史景迁的书，《王氏之死》《追寻现代中国》，觉得好看，原来历史可以这么写。继而觉得这样的书或许自己也能写，就从一个历史爱好者走上历史写作者之路，渐渐专于历史类大众媒体，出版过几本与服装、与女性、与历史有关的书，如今已经称得上是历史作家。

因为那部被下架的电视纪录片，我重新联系上了她。这部叫《通往北京的道路》的纪录片分为五集，分别为“威妥玛的野心”、“丁韪良的戊戌年”、“我们的赫德”、“北京的莫里循”和“校长司徒雷登”。从电视剧的名字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这是一部讲述清末在中国的外国人——外交官和传教士的专题片。庄女士是两个制片人之一，同时也是总撰稿，与专题片同名的书刚刚出版，唯一的作者署名就是庄女士，这说明她在这部片子中的主导地位。《通往北京的道路》是她所在这个公司的重点作品，在公司和庄女士的计划当中，这个系列还将会有‘通往世界的道路’和‘通往未来的道路’，但是现在，一切都成了未知数。

《通往北京的道路》下架的直接原因是 B 站上一位叫陈一真的 up 主发布了一个 26 分钟的视频，批评这部剧美化晚清、美化侵略、美化殖民者，在视频的最后号召全网抵制、举报，呼吁播出平台下架，还有，主创人员道歉。

“我是一定要把他写进历史当中的，所以我才要打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庄女士赌咒发誓，但她也就是表示要狠狠地把他“写”进历史。“我是不会原谅这个人的。你并不是没有渠道去批评。”

我们久未见面的寒暄迅速进入到她的愤怒状态。愤怒的对象指向陈一真。现在，对于这个办公室的人来说，陈一真是都市传说里的恶人，围绕着他有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说法：他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他在剑桥学美国文化史；他考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好像没有考过；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很左派，那种受过高等教育但没有分析问题能力的左派；他是一个很实用的人；他会自己发动的革命所吞噬……

他是这部电视纪录片最有力量的发难者。我们前一天刚刚见过他。

在见到陈一真之前，我们在视频里看到他的形象。瘦弱，白净，戴细框眼镜，很聪明或者狡黠，嘴唇有点薄，眼睛流露出来的信息其实是热情的，但整体上又给人一种刻薄的感觉……这可能是刻板印象吧？因为视频从头至尾流畅不绝的攻击性。

我们知道他来自邯郸，是邯郸钢铁公司子弟，它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被简称为邯钢，代表一方势力，关于大型钢厂社区、子弟的刻板印象是莽撞、蛮力和男子气概，在看视频的时候，想他大概很容易被归结为“小白脸”，在钢厂文化里，陈一真大概不会有太好的人缘。

我们知道他大学在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在以往的视频里，我们看到他对学阀的批判，这是一个有点格格不入的人……

我们甚至还找到了两个他的高中同学。有些刻板印象被证实了——这句话有可能的含义是“刻板印象更严重了”。他的高中同学说，陈一真比较有个性、有想法，所以人缘不是很好，有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思，和普通同学合不来。学习还不错，但不是最好的，自主招生去了南开。另一位同学说他，腼腆，爱读书，特别喜欢读“有思想性”的书，高中时就表露出要走学术道路的志向，那时就“感觉很知识分子”。

我们约在北京国贸一间餐馆。很远就看见，所有的刻板印象向我们急匆匆地走过来。确切地说，陈一真一眼看上去就很知识分子，那种非常文科类的知识分子。

“一五计划的时候，邯郸分到两个‘一五六’项目”，聊天从陈一真出生的邯郸开始，他很自然地提起这些东西，而且提起它们，就像是提众所周知的一些事。“一五六”是指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苏联人援建中国的一百五十六个重工业项目。“在邯郸的两个项目，一个是邯钢，另一个是煤矿。我爷爷邯钢建厂的时候，从天津到了邯郸，那时候只有十几岁，跟着苏联工程师，是画图的。”陈一真的爷爷最后在邯钢的身份也是工程师。

在邯钢，他爷爷认识了他奶奶，他奶奶老家在邯郸下面的一个县。陈一真的父母出生在 1960 年代末，都是邯钢职工。

“你们那里也有家属优先先进工厂工作这种福利吗？”我们随便问起。

“有啊。”他的声音突然提高，让我们觉得这问题冒犯了他，“这不是哪都有吗？”

开始聊天就不是太顺利。相比于我们对陈一真的刻板印象，他可能也储备了不少关于我们的刻板印象，是啊，我们通过中间人跟他说想采访“小粉红”，大约陡然就会产生防备与警惕——赵捷曾经跟我们说，当别人问你“你是小粉红”时，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想羞辱你——更敏感的陈一真对此不会无感。我们并没有指责他父母利用了裙带关系、对国营大工厂内部这种底层裙带关系也没有异议——当年就业机会稀缺，接班制度当然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你视为职工福利的一部分，似乎也能理解。

“那你也是子弟学校上学吗？”换个话题。

“当然。”他缓和了一点。

“你小时候也住赫鲁晓夫楼吗？”

“没住过。”他知道这个词，但对于这楼到底什么特征并没有太清晰理解，“那种一层一层垒起来的单元楼？那就也算住过。进门中间是过道，过道这边是两间，过道那边是厨房卫生间，一层有三户。”听他描述，更像是八十年代那种标准的单位分的没有客厅一大一小两间卧室的那种老公房。

“现在房子也在。卖应该能卖出去，但现在住的都是老人，也有我不认识的新面孔。我爸妈家和爷爷家隔得不太远。”

“你小时候跟爷爷奶奶长大的？”这又是刻板印象了。对于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来说，小时候会被交给祖父辈照顾。

他先是疑惑地反问了一句：“长大？”然后，露出不屑的神情，“我小时候在学校长大的，六岁以前跟父母。”

我们决定还是少点自作聪明，闭嘴少说话，听他多讲。

他确实从小性格内向。小时候表达能力有限，觉得与别人交往成本太高。互相理解起来很难。虽然说他知道可能多付出一点时间成本就行了，但实际操作中最后往往还是选择算了吧，交流了又怎么样？从不值得付出到不想付出，就越发显得内向。

很早开始看书，最初也是连环画，启蒙读物跟很多人一样是“上下五千年”一类。爱看书，家里的、爷爷奶奶家的，什么书都看，小说看得不多。记忆力好，小时候是课文，看几遍全文就能背下来，再大一点是《唐诗三百首》，一首诗看几遍就会背，爸妈看出他在这一点上很有天赋，也就不怎么操心他的学习。

总的来说，他属于衣食无忧型，小时候对于每周花多少零花钱没有概念，因为要了就会给——它的前提是父母知道钱不会被乱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工作以后自食其力，家里也从此不用再给他财务支持。但他如今没有压力的生活并非来自于他的工作收入，而是房子，他家在天津有两套房，在邯郸有一套。

他觉得自己数学不好，没考虑过学理科，直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才意识到应该学理科，有点后悔。“理科更有用”，我们问他是哪种有用，“经世致用的有用还是找工作的有用？”他说都有，第一文科不好找工作，他把这种对找工作赚钱的疏忽归结于“那时厂矿子弟家里还是有些闲钱，挣钱意识不强”；第二是对社会也没有什么用。“现代文科没有什么产出的价值，只有附和权威大佬的观点。虽然理科也有这种现象，但理科能产生实打实的东西”。关于附和权威大佬观点，他后来会反复说，就跟他的“大三大四”一样，“国内外都差不多，环球同此凉热嘛。国外学术老师，搞垄断，与出版机构勾结，自我重复几本书的观点，不太创新，都有。剑桥哈佛也都这样。”他说。

大三大四是他眼下这一小片人生的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陈一真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和时间，小有所成。接下来，按正常的路径，他应该是从爱好者向职业的历史学者方向发展。

“当时成绩可以保研，我没保。保研要给老师拍马屁，要写自己不喜欢写的一些文章，不是替老师写，是迎合那些大佬的观点，可以带我参加会议，在各种场合露脸……如果想走文科学术道路，这样就更容易发论文，但那不是我的观点。”

“历史学有国家支持，还有一些社会团体、宗教团体之类的支持，海外归侨基金会、企业性质基金会，如果是它们组织的会，还要说它们的好话。”

“不爱做这些，下场就很惨？”我们对这个领域不太了解。

“前车之鉴还挺多，比如毕业就不能去好大学，博士可能延毕……”

“选这个专业的时候，你了解这里的麻烦吗？”

“报考之前知道一点。我父母家也有在大学工作的，我中学在大学的附属学校嘛，知道一些，但只是很表层的。主要还是选专业的时候一腔热忱。”

“你父母支持你？”

“不支持也没有办法。劝过我，我没听。也就说了，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让我学的。”

高考之前，一门心思学文史哲，可选择的好学校并不多。衡量一下自己成绩，备选的也就是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这几个，南开大学要熟悉一些，就选了南开。

“我跟同学关系也不好，不怎么来往。不是看不上他们……”

“他们觉得你怪怪的？”

“对。”

“这次做 up 主，突然有了一点小名气，你的同学有什么反应吗？”

“不知道。毕业好多年了，我也不在他们的群里，不跟他们打交道。”他决定还是承认这一点，“就是看不上他们。为什么你们能那么谄媚，为什么那么拍马屁，为什么那么趋炎附势。就这样。”

“大学里有跟你关系比较好的人吗？”

“那有，聊天，出去玩，也会喝酒，没怎么跟同学喝，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喝得多。”

“高中比较苦，比较累，基本上什么都能记住。现在差点了，十五到二十岁的时候记忆力最好。”

他比较愿意提及大学前的经历，提到他的记忆力。

“唐诗三百首，我看几遍就会背了。”

“三百首都会背？”

“这就是基本功吧。四书之类，文科知识分子，至少你得看过，通读一遍。我看很多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没看过。新儒家也好，新左也好，有些观点跟我还挺接近，但他们这种基础就很不过关。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素养，也是他最喜欢提的一个话题，哪怕因此要给人留下背后说人坏话的印象，他也会说。“本来喜欢古汉语，从小就喜欢。古文看得多。像古汉语，我比大部分本科硕士都要好，会背会看。这是我的基础啊。因为我有这样的基础，我就很重视知识分子学术过不过关这事。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经典没有了解，如果这都没有的话，你就不配。”

“马勇老师需要过关吗？”鉴于马勇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中出任重要的学术顾问角色，又是陈一真视频里重点关照的对象，我们特意单独拿出来问。

“从现代学术分类上是不用的。但作为一个治历史的教授级知识分子，应该是会的。”他回答得倒是很严谨。

“你用多长时间建立你的知识体系？”

“很久。开始就是《唐诗三百首》，宋词，《古文观止》的后半部分，先秦那部分有点难，《左传》这些要看的。古汉语看了很久。《资治通鉴》写得比较基础，《史记》还看得很进阶的……”

“后来环境种种变化，觉得可能跟生活比较近的近现代史，看得多，这样有战斗性。”他替自己的学术生涯做了一个干脆的转折，他认为古代史对他的治学严谨性有更好的训练，“这是一个基础，不想学古代史之后，跟现代史有关的这一部分，很多判断观点，包括对人的判断和对学者的判断，都有古代史影响。举个例子，审判，近代审判，你是一个大人物，政治审判，有背景，可以网开一面。这种事古代也有，见怪不怪，你近代史大惊小怪什么呢？”

这个例子听起来并不是很充分，“古已有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好坏都有先例，有这种看法很正常。他换了一个说法：“看古书长大的人，和一个完全看现代知识长大的人，判断一件事会有本质差别。除了意识形态，还包括你语言上还是中国人的，还有背后的潜台词的分析，比如分析一个作者的观点和目的，你看过古代史，就会专注于这个人的环境多一点。中国的批评或文本批评，知人论事，要了解这个人和他的背景。现代社会，现代的文学人类学，都是单纯的文本分析，注重解读者。”

“战斗性是什么意思？”

“战斗性，直白一点说就是可以反驳别人的观点。”

“古代史不能这样？不能为了魏晋南北朝的观点而战斗吗？”

“也能反驳。我说司马懿这样，你说司马懿那样，没啥意思啊。”

“中国最好的司马懿专家也没啥不好啊？”

“但是……”

“但是寂寞吗？”

“寂寞倒挺好，就是和现实生活没有关系。解决中国问题，为什么现实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倒更像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为什么现实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问题在大三大四开始考虑……”

“我在这么提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带着一种疑惑或者失望才问的，你也是吗？”

“是。”

“什么东西让你失望了？”

“学术圈，学校的现状，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还是回到了大三大四的那个转折点，还是回到了对学术界的失望。

《通往北京的道路》，正好在他的愤愤不平的交叉点上。

西方中心主义、替殖民主义张目；在张目过程当中，学术又不严谨，他们找的学者本身学术不过关。

马老师要说具体哪里有问题……我不合适讲。在网上我比较尖锐，在生活里比较随和。在背后说人坏话，揭人短，我真的做不出来。

说下我了解的。袁世凯和廿一条。马老师的观点，袁尽力挽救，尽量挽回一下。实际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实际情况是袁的驻日公使章宗祥他们成立了一个银行，有些股份给了陆宗舆，代表袁谈判的时候，肯定是向着日本的，日本给了他那么一大笔钱。所以所谓袁想挽回廿一条，排斥廿一条，从这一点上说是说不通的。你不能通过这一点就给袁洗地。

廿一条是卖国的，你得承认这一点。因为卖国、因为丧权辱国，袁不想承认廿一条，可能是不想。但你要翻案说袁不像历史书上说的那样不那么卖国，这观点是站不住的。实际情况就是，他被日本收买了。他顶多是个人纠结那一下，还有那么多钱那么多好处那么多利益，结果就是批了吧，管你卖不卖国。

现在说有个第五条是袁世凯不认，谈下来了。那是直接控制中国银行业。袁世凯同意就相当于直接招认：日本银行给我钱了。那肯定也不行。日本想通过银行单独控制中国的目的没有实现，其它国家也为会同意，所以最后是成立了四国银行团，美国法国，一块干。

马老师应该了解这前后史料。为什么还要替袁说好话？这就是诛心之论了，他可能就是想翻案，想说革来革去是不对的。但他的事实是不太严谨的。

他对清末的历史学术史不了解。我就说这一点，为什么失望。现在主流社会，政治权威经济权威他们想听什么，知识分子就说什么。——他痛心疾首。

看纪录片里说得比较多的，比如外债问题、修铁路问题，这些的研究有很多。理论上他应该了解，但他为什么不借鉴别人的成果，我就不清楚了。还有一种可能是清楚但有意掩盖或忽视了从民国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研究成果。

学术过关就是对学术史有很好的梳理和理解。新中国前三十年，革命史有相当出色的研究，尤其是太平天国、义和团，你就说是资料，不说观点，你觉得太平天国是革命高潮也好、是屠杀式灭绝也好，不管哪一种，你得有实打实的证据，就证据收集这一部分来说，太平天国领域，西方汉学界完全没办法跟中国前三十年比较。现在一提就是海外汉学家那种半吊子的，他们比罗尔纲茅家琦差远了。

写论文，第一步就应该是梳理学术史，有什么研究成果，那些论文不被引用。

沈（志华）老师，茅（海建）老师这样，自成一家就挺好。有些学者完全不着边际，空中楼阁，这种我也极其讨厌，关键你是要有基础，必定学术积淀了这么多年。说价值观的话，茅老师的书我也看过几本，也听过他的讲座，这说起来就像背后像揭人短一样，（压低了声音）茅海建老师还是有些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私下里说，茅老师自己也承认。

沈老师价值观，可能藏得比较深。

其实沈志华老师，看他的书，看影像访谈之类，学问还是挺好的。英国也有老一辈学者我觉得挺好。南开我也有很佩服的老师，哈全安教授，研究伊斯兰教的专家，懂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挺不容易的，国内首屈一指。但他也是命途曲折，个性比较强烈，说话尖锐犀利，一直没有名。

第一是没有钱，学校不给机会出去开会啊，钱是指经费，学校工资也提不上来。出去开会，文科开会能赚不少钱，他也没有这机会。他也不在乎，他很纯粹，他在意的是自己的学术是不是能得到重视，他2016年还是2018年就去天津师大了，985的教授去一个连211都不是的学校当老师，我觉得很荒谬。南开呆不下去。

哈老师我很喜欢的。学问、做人都很佩服，命运心有戚戚焉，觉得不应该。

陈一真放弃保研之后的最后一次学术努力是想到去留学，回来找个教职。他想学中苏关系，方向很明确，可选择的学校美国有几个，斯坦福不错，但学费特别高，最后选了伦敦大学学院。“家里没有意见，几十万块钱。”他特意强调了一下父母对钱的态度：“他们虽说是厂矿子弟，但没经历过下岗，这样的厂矿子弟比较少。”他的意思是说他的父母有足够的安全感，对单位的福利保障制度有信赖。

“关键节点我都是自己做决定，自己想好做什么就去做了。知道自己要什么。没有不确定的时候，就是有后悔，后悔学文科。”他又说了一次，“再选，我肯定会选理科，应用型的，工科，生物医药地质化学什么都行，真正有用的。”

在伦敦的生活和学习在陈一真的叙述中有很多模糊的地方。本来是最后的学术努

力，也找了自己认可的方向，伦敦大学学院的起点也不能算很低，但最后他还是决定放弃。

回国的时候，毕业论文还没有通过。“不喜欢了。”他说，“写论文的生活挺没有意思的。”我们问是不是有挫折——按理说他对学术圈的失望早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就已经形成，论文通过与否，不会掀起太多波澜，他说：“不是外在挫折，是我自己。要学术上一帆风顺应该还挺容易。要说挫折，是我内心的挫折，和外在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还是放弃吧。”

“不想混这个学术圈。”

“你并没有失去什么，对吧？”我试探着问。

“失去了吧。就是失去了小时候的目标吧。当一个历史学家。”

虽然不足以解释那些还是很模糊的东西，但显然，这是更重大的决定。

所以，陈一真真正放弃了他的学术梦想是在伦敦大学学院。

“我可能一直都在想，从大三大四到出国，要不要读博，到这时候决定不申了，决定了。”

他不肯透露导师的名字，也不肯说硕士论文的方向，他给的理由是以后可能还得改……有可能的理由是硕士论文并不是他最想做的，还有可能是他封闭自己、保护自己的愿望。他是一个很谨慎、也很善于保护自己的人，过多的信息交流没有必要，就像高中时大家认为他“众人皆醉我独醒”，孤傲是一种保护。眼下，保护还有一些特别的意义：他眼看着自己掀起了一股巨浪，那些确实不受他控制的愤怒的观众——他的视频的观众，不是《通往北京的道路》的观众——用各种污言秽语轰炸庄女士的微博，他不希望这样的事有朝一日发生在自己身上，而首要的一件事，就是在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中划分一道防火墙。

回国之后，陈一真在北京找了一个工作，在丰台，一个小公司，建筑遗产保护相关——跟历史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日常工作就是一个文职，工作嘛，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我回国没什么规划，就是找一个工作呗。选大城市。对九〇后来说，都挺开放的吧。”

他说他不讨厌大城市。他说他喜欢“万人如海一身藏”的感觉。陌生的地方，没有熟人的地方，没有复杂人际关系的地方，可以自己生活，没有那么多人干涉你。天津本来也是一个选项，他爸爸据说可以帮他介绍邯钢天铁之类的地方，也是做文案类的工作，“可能也是可以的，但我不愿意。他们也没有非让我回去”。

“我写策划案，三个人，我是最年轻的。建筑遗产，给景区的，给工作人员讲课嘛，找导师，找谁讲啊，找个文物局北大考古系老师讲吧。文物局是我们老师来源。当地文物局是我们的客户。比如一大博物馆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客户。我们找北大考古系、同济建筑系的老师给我们策划顾问。老师也要变现嘛，赚外块。我们包装这个老师。”

“有人包装历史老师吗？”

“有啊，可以当国学大师之类的。北大历史系高端国学班，继续教育，对成人的，带你读《易经》的，挺多。包装历史老师不是我的工作。”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想清楚了不混学术圈，想清楚了不读博，找了工作，但苦闷不可避免。“毕竟放弃了一个从小就有的一个目标嘛。读那么多书都用不上了，没有人听，没有人看了。后来我觉得我做科普搞输出，读过的这些书也是一个动力吧。”

武汉疫情开始的时候，他在家里线上办公，有了摸鱼的时间，一直蠢蠢欲动的做“副业”的想法开始着手实施：去B站，做视频。“之前上班工作很多，工作之后阅读、给自己输入的时间变少了，查资料也困难，现在争取多输出一些吧。”

2月份先是研究技术：看教程，用什么设备，转机软件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怎么用；然后是看其它up主的内容生产：主流用户一般一个月有三四次，周末流量大，学生上学之后流量大，寒暑假虽然空闲时间多，但大家也不会粘在B站上。

我们问他说做“副业”的意思是准备拿它挣钱？他开始说“有”，大概是想说“有挣钱的意思”，转而改了主意，坚决起来，“就是挣钱的意思。B站有打赏，有激励机制，有多少播放量就给多少钱。”

“要有市场分析。B站也逐步增加科普视频的支持。它们也处于起飞阶段嘛。我就

是看看相关的视频，其它的 up 主怎么做。有的好有的不好，有空白，我可以填补。有的是领域上的，比如一战二战历史上，没有人去讲；还有专业程度上的空白，我可能会讲得更深入一点，更专业一点。”

“相对来说，B 站还是入门、初级的科普。好处是受众活跃度还可以。跟着公众号后台差不多，我的受众，15 岁以下的有 10% 多一些；25 到 35 岁的比较多，40% 多。对于他们来说，B 站是首选，用户活跃度也高。抖音快手没用过，短视频不适合科普。”

“知乎都在走下坡路了，并且它们那里做历史科普的人比较多。我在 B 站上有两万粉，还有上涨空间。我看知乎做同样内容，也就两万多粉丝，做好几年了就这么，顶天两万，这是上限。”

“B 站的粉比较真实。知乎、公众号不怎么样。”

“B 站可以有付费推广。给他们钱，我还没试过，以后可能会考虑。”

“我定位专业，做一个视频平均下来要一周时间，查资料找素材写台词，费的时间久，剪辑用不了多长时间。”

他最喜欢的一段历史是魏晋南北朝、三国，但这段历史没有流量，在 B 站上也没有多少人关心。

他会经常说到流量的事。比如他做了一个戴高乐和丘吉尔的视频，我知道他讨厌丘吉尔，问他，你连戴高乐也烦吗？他说他不反感戴高乐，但法国有流量，“辱法”，为什么要辱法？他们就是总干不战而降这样的事。

“肯定是我熟悉的。中国近代史、中国外交史、英国史啊这些。搞科普要考虑受众啊，一战二战这些我不是专业的，但科普还绰绰有余。”

2020 年 4 月，做了第一个视频。

第一次做视频，露脸的时候有点紧张。好在他记忆力好，词看得熟，说的又是他熟悉的东西，一点点做起来了。

做了四五期，粉丝在缓慢增长，这个时候，《通往北京的道路》出现了。

“我关注了一个电影公众号，它们转载了纪录片上架的消息，预热的广告吧。很偶然，错过了这个微信的推送，就不会做这个选题了。”

他做了一期视频。《【美化晚清民国何时休】知名学者为何站台侵华电影，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到底有多严重》，题目很长，流量很大，时间是 6 月 30 日。他掀起了一股“怒潮”。

“没想到会这么热，会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

“是历史话题这么热，还是这部纪录片这么热？”

“没想到对片子的批判会这么热，可能也有现在的情绪在里面。”

“这个视频成功之后，有什么变化吗？比如会有路径依赖吗？比如蹭热点？”

“多做一点，播放量再多一点。”这样可以更快达到目标。“每天都有掉粉，每天也会增加，总体上现在增加得更多，更新的时候涨得快一些。”

“定位不会变化，还是历史科普博主。关注你的人都是希望持续认可你的。关注就是认可。我还是传达我的观点，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我有事实，传达近代史上一部分事实，分享我们对这些事实的观点。”

他的粉丝迅速涨到 B 站历史科普 up 主的中级水准，两万粉丝，他调高了自己的目标，希望到年底的时候能达到五万。

这个视频为陈一真赚了一千五百块钱，纯粹的打赏。



题图为电影《末代皇帝》(1987)剧照

非虚构 学术之争 | 革命者陈一真②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
你说这个东西应不应该下架？”

“这些人很重要，”庄女士用词很谨慎，并不像纪录片中那么肯定。在片子中，这五位传教士、外交官和记者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闭关自守没有出路，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所有文明都是需要需要交融的，你觉得你是伟大独立的文明，从这里可以生长出一个高大的树木，开出灿烂的花朵，但文明是生态，所有文明都是交融的，这样才会有伟大的文明。”

在庄女士的计划当中，这个融合的第一部分是讲西方人到中国，所以有“通往北京的道路”，第二部分是讲容闳、郭嵩焘这些人，讲他们怎么看懂世界，所以是“通往世界的道路”。“中国是个巨大的信息茧房，突破这个茧房，看世界。”

“这些在历史圈算不上什么新鲜的东西。像赫德，大量的资料可以看，我们也采访到大量的内容，很多学者都聊过，以前我们《东方历史评论》也发过，社科院老师的文章，也不是随便说的，他在贝阿法特大学看过大量的历史资料。”

这个转向大众的过程，在庄女士看来，不是早了，而是晚了。

“历史研究很重要一点是它应该转变为大众能接受的形式。八九十年代还有可能，现在机会不是太大。民众的认知和学界的认知隔得更远了。”她的感受可能与实际情况中间有很大的差别。“我跟那些学者说，你们研究半天，与老百姓的认知，相距那么远，老百姓还是那样。”

很显然，实际情况与她理解的有很大差异。在早期互联网，平均受教育水平或者还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所以那时在互联网或者更广泛的舆论场里，学界对历史的把握更容易进入到受众中去，他们对信息的判断和理解力，有一定基础。让·皮亚杰有一个对“成熟智力”的著名定义：即有能力协调多个视角。早期互联网用户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而现在所谓“晚了”并非是“老百姓”的认知水平下降，而是有更

多的人进入到受众范围中来。

还是信息的“民主化”。

“我本来是想架起一个桥梁，想把人家的学术成果向大众做一个转化，就是桥梁作用，这样可以影响更多的人。你看俞敏洪，他就很喜欢，他主持的公号里还推了我们，我并不认识他。”

庄女士也是想借助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大潮流，把她认为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更广泛的人群，但实际过程当中，她高估了学者的影响力，更是高估了受众“多视角”的理解和协调能力，对于接受了中学历史教育的多数中国人来说，侵略者、八国联军、丧权辱国、落后就要挨打……一众概念根深蒂固，寄望于几个高高在上普通话讲得很标准的播音腔来改变具体的认知，有点乐观。

庄女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落差。播放量，在下架之前，“正常，本来就是个小众的东西，四十几分钟，标准纪录片长度，”在被下架之后，他们猛然发现道阻且长，失落之余，又会心灰意冷，这世界上充满了“对牛弹琴”的事。

而同样要在信息传播“民主化”中发挥自己历史价值的陈一真，显然更了解，或者说他对历史的理解更接近普罗大众水准。在这一点上，他精准把握到了那个受众的认知。

所以，你在弹幕上看到的是：

“这帮人太坏了啊”

“直接禁掉不就好了”

“把强盗说成误会”

“公知果然生财有道”

“砸了白金汉宫，因为相互不理解”

“课本上都不是这么写的”

“你把我家的文物还回来”

“握手，这些人良心呢”

“应该抓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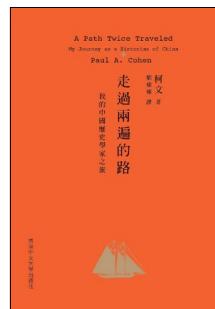
“喷下架了，回来庆贺”

.....

陈一真更掌握流量秘密。

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这个区别对历史学家来说极为关键，但在普通民众的头脑中常是模糊不清的。一般人情感上会更受符合自身先入为主观念的历史吸引，对这种过去更感舒适、有共鸣，而非某种客观“真相”。由于史料匮乏或现存史料不可信，甚至职业历史学家也没有绝对把握确定历史事实，记忆与历史的边界因此更加模糊。（《走过两遍的路》）

上面这段话来自于美国历史学家柯文著作《走过两遍的路》，这本书是柯文的回忆录。他师从费正清和史华慈，毕业于哈佛大学，他因为提出中国史研究的“中国中心观”而成为最重要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庄女士说“我只有了解现在的新闻，才会回到历史的情境”，这可以看作受柯文影响；柯文也是少数能得到陈一真认可的历史学家——得以从“半吊子汉学家”中脱颖而出：“柯文还可以吧。在外国人里用资料还不错，汉语说得还比较扎实，能看文献”。对于陈一真来说，这已经是相当高的评价了。我们在后面还会反复提到这位历史学家，某种意义上我会把柯文作为一面镜子，用他



来观照这两个在学术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立场上——似乎针锋相对的两个人。

“我女儿要是小粉红，我会跳楼的。”庄女士抱着靠枕，坐在沙发上，瞪圆了眼睛，“天哪！我现在都开始胆战心惊了。”她显然是想了一下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严峻的局面，大概真是难以想象。接受过多元主义价值观熏陶的人，总是会表现出一种达观超然的态度，前提是这件事离自己还远。我想起柴子亮说他爸爸，“我爸爸就是那种他说他接受同性恋，但我儿子同性恋那可不行”！我产生这样联想的原因是庄女士刚刚还在说，她能接受各种谱系的人物，不管是左派、右派、中间派、民族主义立场还是国家主义立场，她提出的唯一条件是“逻辑要自洽”。

现在逻辑乱了。

“他说我站在西方中心，我说我站在中国中心。我考虑的问题是中国的命运，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我在想中国怎么进步，怎么实现现代化的转变。你所谓的殖民与反殖民，这些才是西方中心主义，”她觉得还不过瘾，“包括人类学，那也是西方文明对自己的一个修正。对自己文明有修正能力，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丰富，这才是真正的西方中心主义。”

庄女士显然还处在应激状态中，最主要特征是“气不打一处来”。“像文革这种，文革绝对是一个很多人参与作恶的事，怎么最后就只出一个‘四人帮’做坏事呢？干了那么多坏事，所有事都是他们干的吗？不是，所有人都是参与者。但每个人都心安理得觉得自己个受害者。”这是批评陈一真同样是个作恶者，没有人是无辜的。

“现在所有人都在骂，但没有人看到它。你要看不翻墙，就没办法看。这不是很可笑吗？你要批评的东西实际上是没有人看到的！如果没接受过教育的人我倒是能理解，但你是南开历史系毕业生，我就无法理解了。”这是批评陈一真在抹杀历史，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这么做不可原谅，“受过这么多教育，他做事跟一个初中生高中生没有什么区别，太可悲了！”

“年轻人偏左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庄女士说，但她最在意的是，左归左，举报到底是什么流行起来的？“我们八十年代上小学，那时候对文革还有批判，学校里会教给大家说举报报告密这些不符合传统道德价值观，也不符合新的道德价值观。我记得有一个批判，这是一种制衡作用。”

她想了一想，半是自言自语：“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举报是有效的。你这样做是有用的，这是被鼓励的。”

从《通往北京的道路》上线，到引来各种批判，到陈一真重磅文章振臂一呼，到下架，庄女士新学了很多东西。

“主要是在骂我。把我骂到微博的评论也关了。说什么都骂，发个照片也骂，各种污言秽语，”庄女士后来做了一个实验，转了一条央媒的消息，那个新闻下面干干净净，没一条评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清醒的，中央电视台的话筒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得出来的结论是：“他为什么骂我们啊，因为骂我们很安全啊，没有任何风险啊。”

因为这些攻击，她最近被动学习了很多新知识，最震撼的是“加一秒”，这是从同事那里了解到的，“我问他们背后是不是有清晰的价值观。他们说不是的，就是好玩。”她第一个反应是这事是当真的？“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在他们那儿就是一个好玩不好玩的问题。”

她还学会了“锤”与“被锤”，碾压。

“爱国主义也不叫爱国主义，而是叫‘此生无悔入华夏’，下一句是什么？”

她的同事在旁边接，“来世还生种花家”。

“对对，来世还生种花家。还有‘我免’。”

每个人都比赛一样地说到可能很少在他们办公室里出现的这些词，很快说到了陈一真说他“放夜肝了”这一期视频，又说到其实放大这个视频传播效果的实际上是观察者网和那个叫董嘉宁的主播，然后庄女士提到另一个 ID，“这个人是粉蛆里的大 V。”

“粉蛆”是 2020 年出现频率还很高的一个词，方方与反对她的人在互联网上的争吵中经常出现，柴子亮和柴博士之间不断升级的家庭学术争鸣到武力探讨也与这个词有关。显然它是侮辱性的一个名词，是用来称呼小粉红的，除了羞辱也没有别的意义。

“每个骂你的人你都查了呀？”我们问。

“我得了解一下谁在骂我啊。这人据说是流量公司，背后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什么能带来流量，爱国啊！所以他们是做这个生意的。”庄女士有点愤世嫉俗。

“你批评很多东西，这是你的言论自由。如果有一个人跟你探讨，有些东西说得很清楚，但现在标的不见了。或者更直白一点说，你的观点也可能被下架。你不觉得这让一切都无从谈起了吗？”前一天我们与陈一真探讨过关于《通往北京的道路》的下架问题。

陈一真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保持冷静：“首先我没有举报啊。我个人没有举报，是我的观众们点的。”他急于撇清自己责任，表态此事“与我无关”，显然是觉得这样做不妥当。

“我说什么都会有人这么说我。我能做的一是慢慢做视频，更多的可能慢慢了解我，至少粉丝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二是环境可能扭转，可能变化。现在舆论环境，动不动就举报，也是积重难返。”他甚至觉得自己很委屈，“所以我主张，讨论应该比较开放，比较公开的。这个局面说老实话不在我的预期之内。我没有说举报下架之类，只能说是观众或者用户举报了。”

“你会替他说话吗？现在发现《通往北京的道路》已经下架了，你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你说这个东西应不应该下架？”

“不会。”

“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就应该在线上啊。威妥玛啊，莫里循啊，大部分人不了解。你说他们是坏人，庄女士说他们是好人，有说好的有说坏的，大家都说出来，然后自己判断就得了吧。大部分能看视频的人，他们总会有点基本素质。大家都看，陈一真批判的那个片子，噢，是那个，值得批判；陈一真说得不对，庄女士说得对。这样多好，你为什么不说话，下架是不对的呢？”

“这也是我对舆论环境……也包括国家其它的大环境，确实容不下……我做 up 主，也有这个长远考虑。就是避免这种话题被外在的东西压制……”

“对啊，避免被压制啊。像你这种话题本身就有这种气质，如果只许有一个声音，你担心这种事吗？担心这种事落在你头上吗？”他的回答和我们的问题都有点凌乱。

“避免……第一，言论都有，都有，都有自由嘛，我还挺开，开放的。支持各种言论，像这种封号删贴下架会发生在各种人身上。”虽然磕磕绊绊，但我们正在向问题的关键处走。

“还有，也是我们迷惑的地方，这不是问你态度，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纪录片发生的事里，你被工具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首先，我目的不是工具啊，”离开了他的态度，他从磕磕绊绊里走出来，“是不是有人拿我做工具，比如某个官网、某个门派，这个有，我也拦不住。肯定是有不安的，觉得有对不起老师的地方。其实比较宽松的讨论比较好。从一种功利的角度来说，像这种被工具肯定也不可避免。疑似高蹈派也不太现实。”

“如果一个人很珍惜自己学术声誉，特别像你，不肯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保研拍马屁混圈子，但是有人现在给你贴个标签，这个人在学术上的第一次声音，与‘举报’一个电视纪录片有关。当然了，你有两万个粉丝，你会觉得你支持者众。但学术还是有学术的基本的原则，比如别扣帽子别打棍子，客观上给你造成声誉上的伤害，你有过担心吗？”

“我倒不担心我以后在学术圈名誉怎么样。但我担心对老师会造成一定困扰。第二个就是，未来所有人都可能受到伤害，身边会有煽动性的情绪。我批评这部剧举的例子还是比较扎实的，但会有更多的无脑的煽动出现。”

事后，我又看了一遍陈一真的视频，意识到第一遍的时候忽略的结尾，我也知道了他说话突然磕磕绊绊的原因。在节目最后，他说：

“我也是一个影迷啊，我也知道现在电影界（也）很不容易。所以，本期视频刚才只谈内容，不谈宣传渠道。我的要求：第一，这个纪录片，全网下架；第二，媒体宣传，一律撤稿；第三，主创团队公开道歉。

他不是那个亲手举报的人。他是那个发出“呼吁”，希望“抹去”这部电视剧存在的人。我们后来与陈一真指出这一点，他改变了说法：“我是下架之后，要求下架。让观众

看起来更顺理成章吧。让我的视频更符合逻辑，大家更愿意看，更愿意转发。从传播角度看，最后应该是这样。”

这样的事并不单独发生在中国，实际上它现在经常成为处理一些争议观点的方法。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在《娇惯的心灵》——一本探究美国青少年成长的书中提到美国学术圈中发生的一起观点争议事件：

文章发表后没过多久，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收件人写的是《希帕提娅》的编辑以及“广大的《希帕提娅》学术群”。按信中所要求的，该论文必须被撤回——请注意，不是要驳斥，而是要求撤稿。公开信的签署者并不是要求一个回应蒂韦尔的学术机会，从而纠正她据称犯下的错误（这才是学术界之惯例）；他们所要求的，是抹去这篇文章，让它从学术记录中消失无踪（这种情况极少发生，通常只有学术不端剽窃时才动用）。他们断言，这篇文章若“继续流传”，势必会对有色人种的女性和跨性别的群体造成“伤害”。（《娇惯的心灵》）



《通往北京的道路》在全网逐渐消失。播出平台被罚金的理由是播出未取得播出许可的境外电视剧，《通往北京的道路》出品方是一家注册在香港的公司。

“反殖民的立场是真正的西方中心主义，他们是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去反思殖民主义的。他在国外留学，大学接受文科教育，结果常常就是这样。”庄女士在说陈一真才是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的时候，实际上是置换了一个概念：并非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更准确的是“西方冲击 – 中国回应”的模式。

这个模式的核心在于西方中心主义：中国近现代以来种种事件发生，概括起来就是中国如何应对来自于西方的全面冲击。柯文引用天才历史学家列文森的话总结，“中国的转变是一场通过反对（象征帝国主义）从而加入西方（象征现代性）的革命”。柯文在他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指出“西方冲击 – 中国回应”这一理论的不足与狭隘之处，主张以中国为中心重新考量近代以来的变化。

柯文称是在孔飞力的研究中发现问题的：“18世纪中国人口从1.5亿到3亿现象级增长；通货膨胀严重，通胀率可能高达300%；经济越发货币化，农业社会经济竞争加剧”。此等变化规模之大，他因此质疑，这样的变革是否是传统的循环变化；继而提出，“革命很大程度上不被视作回应长期、内生问题的方式，这些问题虽然可能因西方加剧，但西方不是这些问题产生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长久以来的主因。”

魏斐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中明确了重新思考这一点的结果：

社会史家开始逐渐认识到，从16世纪中叶到1930年代整个时期构成连贯的整体。学者们不再把清代看成过去历史的再版，也不认为1644年与1911年是异常重要的界标，他们发现在若干历史过程，绵延不断地横跨最近四个世纪一直伸延至民国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化、力役折银、某种区域性贸易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以及绅士队伍的扩大、地方管理工作的商业化——这一切在晚明出现的现象又推动了若干行政与政治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通过清朝继续发展，在某些方面直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史中才臻于成熟。

它也超越了中国史学家唐德刚历史三峡的时间尺度。我们与庄女士交谈中可以判断，她的立场更接近于唐德刚：“我们说近代史一提起来气得要命，屈辱的历史，那是一部分，比较小的一部分。整个大的是中国两千年来有之大变局，唐德刚说的历史三峡，一直没有完成，到今天也没转完。你现在回看历史，可以为现在和未来提供一点点思考吧？”



《通往北京的道路》对于历史所持的观点就像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所罗列的那个过程，它的实质是试图去探讨到底是“谁解放了中国”：

若干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世史的论著，经历着一个重大变化：一个停滞不前、沉睡不醒的中国，等待着充满活力、满载历史变化的西方，把它从无历史变化的不幸状态中拯救出来——这样一副中国的旧形象终于逐渐消失。中国确实在经历一场解放。只是，它不是从自身解放出来，而是从我们解放出来。不是从事实上的无变化状态中解放出来，而是从一种由外界强加的无变化之看法中解放出来。这种看法的根源在于对什么才算变化，以及哪种变化才算重要的某种特殊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界说。（《在中国发现历史》）

陈一真看到的实际上也是这些东西，但他认为这其中更多的是屈辱：任何美化这些西方传教士、记者、外交官的行为都是一种背叛。

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有一段说到历史学家，后来自己又在《走过两遍的路》中再转述一遍，虽然听起来泛泛，但很中肯，对于庄、陈这些历史学者来说可能值得时时提醒：

历史学家之外的人以为历史不过是一堆过去的事，可历史学家不该这么想。事实当然存在，但事实无穷无尽，有时毫无用处，有用时也互相矛盾，宛如梦呓、令人费解。历史学家的职责是走到混乱的事实巴别塔深处，选择重要的事实，理解它们的意义。（《走过两遍的路》）

庄女士、陈一真实际上都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实际上也都是“西方冲击 – 中国回应”的信奉者，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通往北京的道路》从上线到下架，经历了一百多年各种“排外”历程。他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排外”的思路。

同样借鉴柯文的观点：

如果说政治性的排外主义更多是直接对中国政治情况做出的回应，较少是对西方做出的回应，那么，真正的排外主义又是什么呢？

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因为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排外主义种类较多，来源于不同的情绪，但同样都是真正的排外主义。

首先，是各阶层共有的以忿怒为核心的排外主义；（陈一真视频中选择的态度）

其次，是没有受过教育阶层的以恐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也许将这类排外主义称为仇外、恐外心理更加妥当；（陈一真真正发动起来的互联网上的力量）

再次，是受过教育阶层的以蔑视为核心的排外主义，它的基础是对中国文化极为强烈的优越感；（陈一真所反对的，以钱穆为代表的保守派，比如对理学的尊奉）

最后，是为数较少但日益增多的中国雏形民族主义者所特有的以自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这部分人对西方政治侵略的反感比对文化影响的反感更为强烈，他们往往赞同按照西方的道路进行改革，不同意全面排斥西方。（《通往北京的道路》所主

张的开放态度)

(《在中国发现历史》)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为电影《甜蜜蜜》(1996)剧照

赴港面临的困难和诱惑

1、险遭“朋友”强占

青妹：

昨日中午寄出月历四份，其中一份有台湾明星彩照的是你的，由于分开寄花钱多，所以，我把它们全部寄到了沪生那里。

昨天晚上在公司里发生了一件极不愉快之事。从上一封信中，你已知道，十九号面试是由大立陪我去的。但事情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企图强占我。因公司晚上五点以后便没人了，我拼命喊叫当然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奋起反抗，结果跟他撕打得很厉害，我还受了点伤。不过，在我的“机智勇敢”下，他没能得到我一根毫毛，我逃脱了魔掌。虽然皮肉受了点苦，但是，我保住了清白，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理他，一个野兽、狂徒！青妹，我真的气死了，我没想到会被一个从小在一起长大，彼此感情又不错的人侮辱。不过，通过这件事，我又懂得了不少，香港人真是六亲不认的吗？也许，从这以后，我会改变对香港人的友好态度，我会以新的面貌出现，不过，你可以……

2、大伯的“精神病”性骚扰

青妹：

盼你的来信已有一个多星期了，不知为何迟迟不见回信。最近李霞来信讲了一些有关方、欧之类的事，我深为你担忧。我不在上海，你遇事没人商量。

你毕竟年龄小，好些事还不懂，对于什么是男人你更无法了解。如果你厌恶他们跟你亲热，厌恶接吻，那么你还是不要找男朋友，更不要结婚建立家庭，因为男的追求女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是出于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是人的本性，谁都无法抗拒。

你一直以为，我与沪生之间的爱是纯洁的。对的，谁都不能否认我跟他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是纯洁的，但我们的爱却非常罗曼蒂克，有时甚至是“疯狂”的。虽然我们之间没有甜言蜜语，更没有海誓山盟，但我们把各自最纯真的爱情献给了对方，各自默许了终身。不管走到哪里，天涯海角，在我俩的心中只有对方，谁都不会再爱上第二个，让第三者介入我们之间。目前我为了维护心中默许的誓言，几乎落入困境。因为大伯患了更年期的精神病，在他公司做的女孩子必须卖身于他，我不从，顶了他，还说要他搞清楚，我是他侄女，不是他情人。这终于使我与他反目成仇，现在有极大的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他公司。因为他发起火来实在可怕，现在公司里的人几乎一个月便逃走了。谁能忍受？目前，我已把此事告诉妈妈，妈妈说由我决定何时离开，我准备年底或春节时走。之后，我可能会去读日校，也有可能会去工厂做制衣行业。不管怎样，做工人总比做公司的小职员好，不仅工资高，而且可以不受老板的欺侮。度过这段时间之后，我会帮妈妈、爸爸做电脑，因为不久他们将自己搞公司，我想做电脑这一行是相当不错，在现在这种现代化的社会里，电脑用途很广，做电脑也极有前途。

噢！听说你在上海跟大伯伯关系搞得不错，说实话，我没料到你会有那么多时间陪他。要是早知道，我会提醒你一些问题，以免将来对你造成不幸，可惜一切都已晚了。我不知你有没有受到伤害，不管怎样，你要记住，做事要有限度，跟香港商人打交道切记谨慎小心。像大伯伯这一行室内装修的更要注意，因为他们生意中用的手段就是虚伪、欺骗，在平时生活中也自然地流露了这一点。他们惯用的手段是笑里藏刀，因此，他们也最怕别人用这一手段。我想，你一定懂得以毒攻毒的道理。当然他们对女人不至于那么毒辣。逢场作戏，甜言蜜语，表面真诚，大话许诺是他们的特点，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同样可以战胜他们。我已讲了不少，你也许一下子接受不了，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信，我会教你如何应付。我讲了许多真实的情况，你可能很害怕。其实你不必惊恐，跟这种人打交道，你会学到不少东西，也会长大、成熟不少，但要注意如何对付他们，如何做到让他们不怀疑你在逢场作戏。青妹，你千万不要想得太天真，你第一次开口向他要一条裙，他到香港便把你的尺寸丢给我——倪青要买条裙，你替她去买。不要讲他自己去买，就是一分一厘他都不会拿

非虚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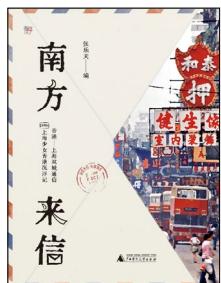
52封真实信件， 一个上海少女的港漂故事

张乐天 | 新书试读

一代青年的迷茫与焦灼，
投射于1980年代沪港对照的时空之镜。

《南方来信》根据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赴香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双玉写给堂妹的信编纂而成。倪双玉，一个青春靓丽的上海女孩，举家迁居香港后，霓虹、时尚、明星，五光十色，齐来涌进。事业理想、爱与被爱，她经历着欢乐与痛苦、沉沦与虚无。1983年至1985年，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香港和刚刚开始解冻的上海。52封从香港寄来上海的家信，一个普通女孩的爱情、欲望、前途，抑制不住泼辣辣的欲望和野蛮生长的力量，原生态展现沉没于历史中无声者的故事。

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八封分享给读者。



出来。到时，他回沪时，他会讲，这是他买了送给你的。我可没那么傻，等天气回暖，市场上有裙买的时候，我会买下来等父亲回沪带给你，但我不会告诉他，我帮你买了裙。我要看他是不会亲自去买，愿不愿意在你身上花钱。青妹，不要害怕，你姐姐可一点都没变，只是这里的社会使我有一种看穿世界的味道。要不是有你真挚的友情和沪生真挚专一的爱情，我真会了却自己的一生，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冷酷，更谈不上有人情味，而我的生活中却少不了精神支柱。唉！算了，不提这些了。

上个星期，我与初中同学刘亚平联系上了。星期日，我与刘亚平、夏永欧一起玩了整整一天，我几乎花了近二百元。要不是刚刚拿到工资，那可太糟了。青妹，我很高兴，在这里我终于有了两个上海同学，我跟刘亚平比较讲得来，跟夏永欧却没有什么可谈的。在上海时，我曾记得你认识他，但我问是否认识你，他讲记不得了。真糟！两年就忘记了。

呀！时间已那么晚了，不能再写，就此搁笔。

祝

安好！

姐

1983年12月5日

3、年长富商的诱惑

青妹：

来信收悉。

刚刚吃完晚饭，由于没有顾客，因此，我便在柜台上提起了笔……

青妹，前晚，我整夜没能入睡，因为我心里实在又乱又烦，理不出个头绪。二十三日是我休假，张先生（上次讲的那位富商）请我饮茶（饮茶是广东人的一种风俗，也就是吃点心那样的，只是有很多很多道点心，又有茶，又有炒面、饭之类），我当然不能拒绝啦。因为他对我的前途会起到作用的。

本来，我已经答应一个男士陪他吃饭、看电影的，结果也只能被我推了。中午，我们在约定地方见面，然后去饮茶。饮了茶出来，他说请我去看电影。我说，我要回去烧饭给弟弟吃。因为弟弟今天开学（补习学校）。张说他以为我今天能陪他到晚上。我说实在很抱歉。后来，他对我说，刚才没吃饱，要我陪他去餐厅喝点什么。结果，我们在旺角一家餐厅里喝了点东西，在此期间，他对我说，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极其微妙的，我当然明白他指什么，但我不回答他。后来，他又说，要我回去好好回忆一下他说的话。我问他：“是不是刚刚你说的那句？”我说：“我不是什么傻瓜，你不用对我说明白的，说半句，或者打个比喻，我就会明白了。”他说：“那最好了。我希望你继续陪我到晚上。”我说：“不行，弟弟读书也很重要，如果你要我陪你吃晚饭，我晚上再出来。”他说：“那好，你几点可以有空？”结果，我们约了时间，晚上再见面。由于我们见面的地方是在海边，因此，面对如此美丽的黄昏景色自然不想离去。我们在海边站了很久，见到海上的船只，他便问我船的英文叫什么，还教我大西洋怎么讲、太平洋怎么讲，真的，我觉得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知道，他是个知识渊博之人，环游世界多次，又会说英语、日语、俄语、意大利语、印度尼西亚语等，还是个十分能干的商人。本来，我是十分佩服与尊敬他的，只是此时，站在我面前的他却充当了我的男朋友”。对于一个可以做自己祖父的人，你让我怎么去喜欢他。唉！真难呢！晚上，我们在香港最高级的尖沙咀东区吃了饭。饭后，又回到海边，他要我在海边的石椅上坐下，我说：“坐在这里？”（因为我有点奇怪。）“这里不好吗？”他反问。确实，这里是不错，香港的夜景本来就是世界有名的，又何况这里是香港最漂亮的地区，又是海边。一坐下，他说：“双玉。”我说：“什么事？”他伸出手，握住我的手，说：“我想告诉你，我开始爱上了你。”我沉默不语。他又继续说：“爱是没有年龄界限的。你看，前面的两个不也是和我们一样吗？”“实在不可思议。”我说。“你有没有读过世界名著？”他问。我说：“当然啦。”他说：“那么，你该明白这是正常的，也是很多见的。”我心想：是的，在这个社会里什么都会发生，什么都会有。今天我就见到了几对像我们这样年龄差距很大的。可是，为什么这一切要发生在我身上呢？他的话又打断了我的思绪：“双玉，告诉我，你爱不爱我？”“不知道。”我叹了口气，又说，“我对于感情的事实在害怕了，我不想再踏进去。”他说：“双玉，我会培养你的。自我认识你之后就知道，你会成为我的助手，你很聪明，我没有看错人。”“不！你估计高了，我的智力很普通，

又是个高中生。”“不要自卑，我相信，你以后一定是个女强人，你很有雄心壮志。”“你怎么知道我有理想，我追求事业？”“我还会看不出来吗？”“是的，你说对了一点，但我将来未必会成功，也未必是个女强人。”“只要你努力、肯学，你一定能的。”“双玉，以后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我帮你移民去美国，那里我有一个高级住宅，有网球场，还有游泳池。”“你太太不管你吗？”“都这么大年纪了，管什么呢？何况她也不会知道。美国的住宅本来是我哥哥的，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之一，但他没有子女。所以，他把那套高级住宅送给了我，我太太和孩子都住加拿大，他们不会去那里的。”“双玉，过两年，你够条件去台湾的时候，我想送你去台北住一年。在这一年里，你跟我学做生意，帮我看管那里的一套住宅，我会在一年内帮你搞好去美国的手续。”“两年？到时再说吧！世界千变万化，谁知道两年后又是什么情况。”“双玉，走走吧！坐着太吃力了。”“好吧！”他拖着我的手沿着海边走，海风轻轻吹乱了我的头发，我望着那夜景，默默地走着……

青妹，晚上，他送我回家，我洗了澡便上床，我希望用睡觉来代替一切。但是，我一晚没能入睡，我觉得一切都太突然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爱我。其实他不说爱我也可以得到我，我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大年纪了还如此浪漫。我不明白，为什么眼前的事实，与算命先生讲的不谋而合，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二十三日我会为秘密恋爱而烦恼。我的婚姻一览中说：“你会和年龄悬殊的对象结婚，并且得到幸福的人生。”我当时只是付之一笑，我觉得是无稽之谈，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年纪大的男士。青妹，我现在有点不相信发生的这些是现实，我希望它是一场梦，一场梦……

青妹，帮帮我，我太苦闷了，我没法接受眼前的事实。青妹，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青妹，我等着你的复信，但记住，最迟在八月一日上午把信寄出，否则，我不会收到。因为八月六日我就搬走了。

姐

1984年7月25日

4、影视圈的经历

青妹：

昨晚上，我甩掉了尾巴便搭巴士去国华影业公司制片组，结果面试顺利通过了。不过，由于我对电影毫无经验，必须接受为期半年的培训，每月交学费一百元。但是，在培训期间会有演出的机会，并会为电视台拍些广告，每拍一次可得四百元，半年期满便可成为公司基本演员。白天，我将照常去大伯伯公司任职。因为半年内每个月的收入是没有固定的，我不能估计每月最低收入会有多少。当然，半年之后就会稳定了。现在，我被分在“国语”组。每周四、六晚上受训一个半小时，期满之后就接受片约担任主要角色。虽然一切似乎很顺利，也合我的意，但是，香港不比上海，影视圈这一行饭更不好吃。妈妈听别人说，入这一圈便和黑社会有瓜葛，所以不支持我入这个圈子，怕我进得去不出来。因此，我现在也很矛盾，是入好呢，还是不入好？我想还是去试一试，因为半年之内，我还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如果这公司真的不正派，那半年期满，我不同公司签约便是了。或者，做上几个月，然后才离去。唉！反正我自己都不知怎么办才好，要是你在就好了，我也不觉得那么孤单，遇事没人商量。噢！这事暂且不要让沪生知道，虽然他知道我有入这一圈的愿望，但我现在的处境会令他担心。而且，他现在需要安定的学习、生活环境，为了他的前途和事业，你可千万跟我合作呀！任何人那里都不能漏风，要不然会传入他的耳朵里，他会误认为我对他的不忠的。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了。

祝 愉快！

姐

1983年10月20日晚

恋情的消亡与爱情观的转变

1、对爱情的坚信

亲爱的妹妹：

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我万分高兴。这些天来，我天天盼着你的来信，天天从四楼去底楼开信箱，可惜始终未能得到。今天，我与妈妈去海边买海鲜，竟意外地收到了你的信。Sorry，我无法形容此刻的激动心情。

到港快两个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深，越来越浓了。开始一个月我还能承受这份分离的苦痛，现在我自感越来越承受不了了。我真想立刻从这里飞到上海，投入他的怀抱。也许是因为彼此爱得太深了，故双方都很难忍受这分离的滋味。我真害怕，他会在回沪之前离开。如果是那样，我们这对如此相爱的情人不知要隔海相望多少年。到那时，我会恨太平洋的波涛把我们隔开，会恨苍天不长眼睛。但愿老天爷能帮忙，让我在他离沪之前再见他一面，让我们在相爱两周年的夜晚，重踏那条永远难忘的小路。

青妹，你不要羡慕我们的真诚相爱，因为真诚相爱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上海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这一点，现在这个问题更突出了。为了爱情，为了精神上的满足，我不得不放弃那些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金钱和地位。有很多女孩子原先在内地的时候和男友海誓山盟，结果不到一年便另抱琵琶，另嫁郎，这是因为他们在物质（金钱、地位）与精神上选择了物质。而我却是个爱情至上者，我需要的永远是精神上的满足，有了这才会考虑物质。虽然到港才不过那么几天，就有一个比沪生更有前途的男孩子追求我，但是，我永远认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沪生之外，不会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爱我，我也不会对第二个男孩子付出这样的真情，所以，无论是谁都不能让我弃下沪生。失去了他，也等于失去了我自己。青妹，我相信，老天爷会长眼睛的，你也能同我一样得到一个如意郎君。

姐

1983年10月19日

2、走向独立的决定对男友开始失望

青妹：

迟迟未见复信，一定等急了吧！

由于近来我心情欠佳，又加工作、事业不如意，再者与父不和，这样便使我成了一个懒笔头。其实不是我懒，是我不想流露当时的处境，令你与沪生，以及我在沪的好朋友担心。就因为这个原因，十二月份的来信，有的到今天才刚刚复信。

今年春节是我二十年来最不愉快的一个节日。不过，在跟父亲大吵之后我下定决心要自立，以及一个人去租房住，不再受他们的气。但愿春节之后，我能在表演方面有所成就，加盟影圈，否则，我会更辛苦。我想，靠父母生活的滋味你现在也尝到了，你也有体会了，会理解我的心情。真的，青妹，这次我下了很大决心，只要我每月能挣两千五百元，我无论如何都要搬出来一个人住。我决不会根据他们的安排去嫁人，去用青春与美貌换金钱与地位，我觉得只有经过自己的艰苦劳动换来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我不愿意这样平平坦坦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我相信，你会支持我的。

青妹，你信中提到你母要你去求姓方的，其实，这一步你走错了。我相信，他根本是没办法的。他父的遗产不可能比金凯之母路道粗，而且，这个人对爱不专一，当时要不是因为我离沪，我非整他不可。我原本想要他两条船一起翻的，无奈我身在港，生活紧张，无法做到。至于方建平，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因为你年龄尚小，好多事考虑不周，而且你想来港或去澳门，我觉得不要找朋友为好。因为在港完全可以找到比上海青年更加有为的人才。再者，你年轻，来港后的眼光、观点都会有很大变化。到时，你或许会像香港女孩子那样喜欢与外国人交朋友啦，嫁到外国去住啦。一切都很难讲的。因为你人高大，这种可能性极大。不过，有一点你要有思想准备，来港或去澳门是要吃苦的，在适应过程中，你要处处小心，当然最关键的

是语言关，最难攻下的也是这一关。不过，姐姐在你身边，不会让你受苦的，我会帮你的。

噢！最近我照了一些相片，但目前尚未拿到手，只是看过第一批印出来的样本。其中有两张我自己满意，但大家都讲另一张更好。到底哪张好，到时寄给你，由你给我打分了。不要急，我会尽快拿底片来印的，印好后即会寄上。

沪生的情况从你这里，从贾小平那里，了解了很多，他自己也讲了不少。开始时，他总是满腹不满，连篇都是工作问题、事业问题。我不知为何觉得他怎么会这样软弱，而且欠信心，所以经常写信去讲他，或许他为此也不太高兴。但我这个人有什么讲什么的，不会藏半句口中不讲的，我自己也没办法。不过，我现在好像习惯了，让他大发牢骚，我不出声，但我心中似乎又不安，好像这样会使我跟他生疏一样，唉！人真是怪物。

噢！你等一下，我记得那张讲解员的照片有几张多的。有了有了，找到了，真的有两张多的，我寄一张给你。其实，这张照片没什么变化的，土到不能再土了，等今年回沪，我一定去买些新潮的服装穿回来，到时，你可不要吓一跳呀！

祝 新年愉快

姐

1984年2月5日

3、感情大不如前

青妹：

你好！

二月十三日的来信已收到。当收到你这封来信时，我的心情已好了许多，也许是因我现在的这份工作使我很少与家人接触。早晨他们出门上班，我还睡在床上，我晚上回家，他们都已入睡了。所以，我现在对这份工有一种满足感。

青妹，每次来信，我或多或少都会讲到沪生。说实话，我现在很内疚，因为我始终瞒着你，我到香港后，与沪生的感情大大不如以前了。不是我来港眼光高了，而是因在两件事上出现过分歧，使我怀疑我以后跟他在一起是否会幸福。第一件，大伯伯的事，你已明白我如何处理了，但他不赞成，他认为我应该顺从他，用手段弄到钱出国读书。青妹，如果你是我，你为了自己爱的人而洁身，而你深爱的人却一点也不理解，你会怎样想。第二件，我爱演戏，这不是什么心血来潮的事，也不是什么为了虚荣心，但他却这样想：我入这个圈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怕我见得多了之后弃他而去。青妹，如果你是我，你为了自己的爱人去奋斗，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奋斗，也为自己的事业奋斗，他却不理解你，你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特别是说什么虚荣心，一个男性对于把心及一切都献给他的女性如此不放心，也信不过她，她的内心又会如何呢？青妹，老实说，我内心痛苦万分。如果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及观点分析我与他的将来，那么谁都会讲，我该忘掉那段情，离开他。但作为一个当局者，我真的无法忘记那段情，我希望那段感情有一个好的结局，但严酷的事实不能不使我陷入深深的痛苦中。不瞒你讲，每当我想起这事，我的心里不知是喜还是忧。有时，我还会这样想，要是当初我不去追他，而在金凯与钟建国中选择一个，那么，结局也许不会如此惨。唉！算了，不提他了，反正我们现在分居两地，一切就顺其自然地发展。我盼望我今年回沪能取得他对我的彻底了解，也希望我与他的感情能胜过以往。青妹，你看完这些不要好奇，也不用为我担心，我现在已彻底想通了，是真的想通了。这要多谢金凯对我的关心，在我最痛苦与最困难的时候，他又一次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非常感谢他。

青妹，不久前给你寄出的“锁式日记本”想必已收到了，不知妹妹是否喜欢，这是我在自己公司买的，很便宜。

噢！上次给你寄的那张沙田照的相印得不好，今天补上一张清晰的。

上海近来的天气有没有转暖？今天香港的气温回升到二十几度，可以穿一件衬衣，明天的气温也有十八度左右，看来已开始回暖了，听讲再过一个月就会很热了。也许上海现在还在十度以下呢，是不是，青妹？

青妹，随信附上的那张照片中的衣着是新潮的，这张照片与我的那张照片对照，你就可以知道我还是个落伍者。青妹，你有没有注意，现在香港流行的裤子式样正

是我们所讲的那种“123 裤子”，只是某几种式样多了一些不规则的大口袋。还有流行平底鞋，我原来打算替你买几双鞋回来的，无奈走了很多店都没这样大的。后来我问了一个香港朋友，他说不用去找了，香港最大的尺寸是 38 码，由于脚大的人少，通常 37 码已很难买到了，38 码更难见到。但我不相信，一定有地方买大尺码的鞋，否则，那么多外国人穿什么呢？你说是吗？

好了，时间已是午夜一点钟了，就此搁笔。

祝 好运！

姐

1984 年 2 月 24 日

4、“以事业为重，家庭为次”

青妹：

两天前刚给你发了一封信，没想到又能收到你的来信。真高兴。

青妹，你是不是很盼望我能回来一次呀？告诉你，九月份，我是一定会回来的。到今天为止，我的请假申请依然搁在人事部，但九月份的连休已经没问题了，我估计假期也一样不会有什问题。只是我的回乡证要到下个月初才能拿，而中国旅行社买火车票一定要凭本人回乡证才行。所以，车票至今还没着落，其他的估计没什么问题了，你就耐心地等着吧！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能见面了，高兴吗？

钟建国一拿到地址就给我来了信，从信中反映不出你讲的这些问题，他对我好像还像以前一样。说实话，如果我自己将来有一天有了事业，有了钱，我是不会忘记他的。如果他没有工作，我更会想办法搞他出来。他实在是个好人。或许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我一直认为钟建国比金凯好。为什么呢？从我与沪生的那件事中就可以看出（陈欢也对我讲过一些金凯的为人）。其实，我与沪生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与金凯之间连同学关系也几乎到了保不住的地步。还在很早很早，大约一九八二年春节之后，我与金凯之间的关系已经淡到不能再淡的地步。而在八一年高考结束，金凯去税务局后，我与钟建国之间的感情明显增长，直到我与沪生的事发生，我与钟建国依然非常之好。钟建国其实也知道我心里很喜欢他的，到底是何原因选择了沪生，他至今不会明白，但他在知道我与沪生一事之后没有半句指责我的话。其实他是有权力讲我的，因为我不止一次不很明白地表示过自己对他的感情。他当初可能从未走入过情场，所以，他是很小心的。在我与沪生感情不断发展的时候，他终于开始支持不住了，接受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姑娘的爱。这件事你应该知道，那晚我还带他来找过你，我们还在肇嘉浜路的花园讲了一会儿。还记得这件事吗？青妹，说实话，这件事，我心里一直很内疚，我是很对不起他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我看见他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我能不关心吗？这次回来，我一定找他好好谈谈。相信他会听我话的，这事你就放心好了。噢！对了，此事千万不能被金凯知道，否则，他一定会恨死钟建国的。

关于金凯的事，我已决定了，等我回来，我找他面谈。我与他最多是好朋友，因为他太好胜，我也好胜，如果两个人结合，且不讲合不来有多矛盾，就是各自的事业也会受到影响。他不该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我也不该找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我在港闯不出一条路的话，我自己没事业，那么，我会早点收山，找个好丈夫，做个贤妻良母。如果我在港有了事业，我一定会以事业为重，家庭为次，我会选择一个像钟建国那样能理家务、会管孩子的人帮我。你说我这样想对吗？至于金凯，我不讲他本身的为人，他对我至少是真心的，那么，沪生不是一样吗？难道沪生不胜过他吗？我与沪生之间的感情，金凯又怎能比呢？尽管沪生身体不好，但他在我心中的位置实在没有人能代替，也永远没人能代替。虽然我知道我不会与他走到一起，但我永远不会忘情。唯有那一次，我是献出真感情的，也尝到了爱情的滋味。纯真的爱只有一次，有的人一次都没有，我得到了，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虽然这不是喜剧收场，但这段情是刻骨铭心的，如果你试过的话，你也会像我这样永远记着他。

青妹，你说与他失去了联系，那么你知道不知道他在什么厂工作，叫什么名字？你能肯定自己真的喜欢他吗？青妹，告诉我，你与他是怎么认识的，你们怎么会相爱？等我回来，我帮你找回来怎么样？

好了，太晚了，不能再写。

祝 心想事成！

姐

1984 年 8 月 30 日



张乐天

1949 年 4 月出生，复旦大学二级教授，曾担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创始副院长。现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代表作有《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性别为本》(2018)剧照

非虚构

性别收入差距的核心究竟为何？以律师和药师为例

克劳迪娅·戈尔丁 | 新书试读

202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尔丁教授代表作

在《事业还是家庭？》中，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追溯了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基于数十年的开创性研究，戈尔丁将 20 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了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

一个世纪前，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必须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且往往只能二者择其一；如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数量大幅增加，她们拥有了更多选择，更有机会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但鉴于社会规范、工作性质、时间约束等，性别不平等问题尽管不如过去严峻，却依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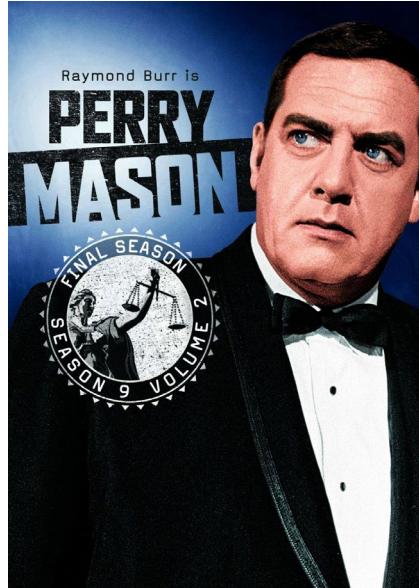
目前关于性别不平等的快速解决方案往往都是从女性方面入手，但作者认为，无论是职场性别平等，还是家庭夫妻公平，都涉及等式的两端，所以解决方法也需要同时从等式的两端入手。作者据此给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

以下中信出版社授权，摘选自本书第九章《律师和药师案例》。



20 世纪 60 年代初流行的一部法律电视剧，讲述虚构的刑事辩护律师佩里·梅森 (Perry Mason) 破案的故事。佩里是位说话温和、思想深刻、善解人意、身材魁梧的绅士。在精明的法律秘书黛拉·斯特里特的协助下，每集故事结束时，佩里都成功破案，为被诬陷的被告洗清了罪名。扣人心弦的情节从伟大小说家厄尔·斯坦利·加德纳的笔下款款流出。

在黛拉担任佩里得力助手的 20 世纪 60 年代，如果她有幸得到一份律师工作，那么法学女博士的年收入中位数就仅为男博士的 57%。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第三组中许多最优秀的法学院女毕业生都无缘踏入大多数律师事务所的大门。1952 年当桑德拉·戴·奥康纳以全班最优秀成绩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时，甚至找不到愿意给她面试机会的公司。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没能获得费利克斯·弗兰克福大法官的书记官职位，因为他不聘用女职员。第三组成员尝试进入职业轨道的女性非常少，而且一般不被重视，哪怕是资历无懈可击的女性。



《佩里·梅森》最终季海报

1966 年原版《佩里·梅森》播出最后一集时，法律系学生只有 4% 是女性。到了 1987 年，即仅仅 20 年后，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中女性突破 40%。2020 年夏天 HBO 电视网播出同名衍生剧期间，全美国法学院校的男生和女生人数已经相当。进律师事务所当律师、在公司或到其他行业当法律顾问，都是受追捧的职业。相较之下，法学院新生几乎是医学院新生的三倍。各领域向女性律师敞开了大门，女性可以成为私人律所的成员，担任企业或公共部门的律师。今天，黛拉·斯特里特自己就可以成为另一个佩里·梅森，只是她还挣不到他那样的工资。（而且她可能没法像佩里那样有幸拥有一名聪明能干的秘书助手。）女性在这个领域的收入也提高了。但由于种种原因，相比男性，这一收入仍然较低。如今，女律师的收入中位数仅为男律师的 78%。

虽然进步是巨大的，可为什么黛拉·斯特里特律师迄今仍挣不到和佩里·梅森律师一样多的钱？是因为资深合伙人不提拔她吗？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了解的，性别收入差距比已知的歧视更加复杂。当然，显性或隐性偏见可能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过去就是如此：桑德拉·戴·奥康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则无法获得最高法院的书记官职位。

但对于今天的黛拉和佩里，这不是事情的全部。一个更隐晦的问题无缝融入现代工作的结构中，被证明更具影响力。假想之 2021 季黛拉与佩里的伙伴关系将解开这个谜团，带我们回到恼人又顽固存在的性别收入差距的核心。

我们不妨把 20 世纪 50 年代黛拉和佩里的秘书与律师角色，重新塑造为更现代的人物：一对来自第五组的雄心勃勃的年轻夫妇，他们在入读顶尖法学院期间相遇并坠入爱河。毕业后，他们揣着学位证书进入现实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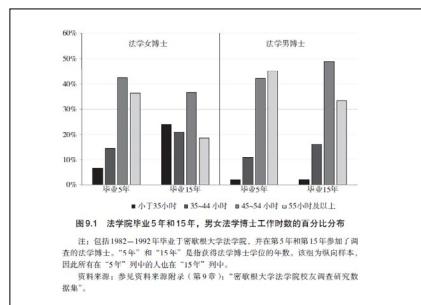
刚毕业的法学院学生有大把就业选择。他们可以在大型公司的法务部门工作，也可以进入擅长家庭法和遗产规划的小型律所；可以在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担任企业法

法律顾问，也可以到法学院任教。他们还可以竞选政治职位，或者奔往法律部门以外的领域。每个选项都提供一系列不同的福利待遇。

黛拉和佩里年轻有理想，他们都决定在私人公司从事高要求的工作（毕竟法学院的贷款可不会自行偿还）。5年后，他们将获得几乎相同的收入。刚拿下法学博士学位时，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大体相当；如果把工作时长和工作经验考虑进去，那么法学院毕业5年后，男女法学博士工资初始数据之间的微小差距就会消失。但是作为私人律所的新手，他们过得颇为辛苦。在这一职业阶段，所有法学博士的工作时间都很长，近80%的女博士和90%的男博士在第5年每周工作超过45小时，如图9.1所示。大型律所或企业法务部门的员工作时间甚至更长，佩里每周工作51小时，黛拉每周工作48小时。眼下，女性还留在这个行业：这些年轻律师中只有6%从事兼职工作，到第5年只有4%退出劳动力市场。

在这5年时间里，黛拉和佩里堪称现代梦之队，工作时间基本相同，收入基本相同。在工资和责任方面，他们趋近平等。鉴于这个希望满满的开端，10年左右的光景，两人应该都能走上正轨，成为各自公司的合伙人。没错吧？

错！在接下来的10年从业中，四分之一的女性会转向兼职工作，整整16%的人将脱离劳动力大军。相比之下，只有小部分男性（2%）会做兼职，也只有小部分男性（还是2%）不工作。对于男女法学博士，都有约20%的人会离开法律行业但仍然工作，只是离职的原因通常不同。



在佩里·梅森即将成为合伙人并最大限度提高其收入潜力之际，同样才华出众、勤奋称职的德拉·斯特里特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概率会彻底离开法律界，要么追求另外的职业，要么成为全职妈妈。即使黛拉继续从事法律工作，她的工作时间也可能没有佩里那么长。毕业15年后，约80%的男律师每周工作45小时以上，而女律师的这一比例仅为55%。刚毕业5年那会，他们之间的差距尚微不足道。最后，他们的收入将大相径庭：第15年的时候，法学女博士的收入仅略高于法学男博士收入的一半（56%）。

黛拉和佩里遭遇了什么？他们职业生涯的这种巨大差异从何而来？当初这对精力充沛的年轻夫妇有着相同的目标、抱负和资历。在5年的执业中，他们势均力敌。到底是什么东西改变了呢？简单的答案是：这个领域历来属于男人的圈子，为拿下大客户，你必须在牛排晚餐时跟他们一起抽抽雪茄，聊上几小时最新的棒球比赛。但事情没那么简单。黛拉和佩里事业上的差距不是因为黛拉不喜欢雪茄；也不是因为在晋升和指导方面，佩里和他的男性合伙人上级保留了歧视性做法。这甚至不是因为律师界演绎了最极端的性别收入差距范例。这个问题的根源困扰各行各业，与劳动力市场歧视无太大关系，而与时间休戚相关。正如我们在伊莎贝尔和卢卡斯的故事中见到的，“罪魁祸首”是工作结构本身。

15年后，由于工作时间比佩里少，黛拉积累的律师工作经验也少了。但即使工作时间相同，她也只能挣得他收入的81%，因为现在她的时薪比他低很多。剩下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虽然黛拉也是位大有前途的律师，但她在律师职业生涯中缺席了一段时间。

仔细审视法律领域的薪酬情况，可以了解到很重要的东西，即黛拉和佩里在所选择的职业中投入多少时间能带来多少回报。

第15年时，律师每周工作60小时的平均收入，是每周工作30小时的2.5倍以上。随着工作时长的累加，收入出现了与性别无关的跳跃式增长。当总的工作时长增加时，男女律师的时薪都会显著增加。之前我们在伊莎贝尔和卢卡斯的生活概览中遇见过这个现象，而这些数字是真实的，是根据大量律师样本计算得出的。

倘若律师的工作时长从每周30小时增至60小时，平均时薪将增加近四分之一。

律师每周的工作时间越多，他们花在工作上的每一小时就越值钱。如果我们保持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时间保持不变，那么这个差异就不存在性别因素了。

人们知道，性别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十分显著。但是，如果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并非性别，那会是什么呢？又为什么这一差距如此鲜明地体现在性别上？为了更好地阐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公司的结构和客户的需求，以及谁在填补家庭的空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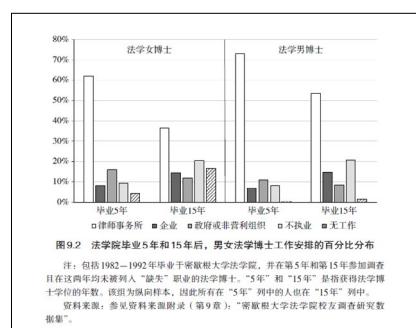
自法学院毕业5年后，女性的工作时间略少于男性，不过没有少太多。然而到了第15年，即便是全职工作的女性，也比男性投入的时间少很多，甚至比她们起初投入的时间还要少。此外，她们并非在第15年突然开始减少工作时间的。对任何一名律师而言，兼职或较短的工作时间都意味着与富裕客户合作的可能性降低。在第15年从事兼职的律师中，只有18%的人所在的公司拥有财富500强客户，但在每周工作55小时及以上的律师中，这一比例接近30%。

同时，律师在私人公司挣钱更多。如图9.2所示，在第5年，大多数男性和女性给私人公司打工。10年后，两个群体都有人放弃私人执业。但是在这10年里，离开私人部门的女性多于男性。

到了第15年，只有37%的女性还在私人公司工作，而男性的这一比例超过50%。

坚守私人部门工作的女性仍然很有可能在第15年以前成为合伙人，只是机会不如男性多。15年后，逾半数女性成为合伙人，男性成为合伙人的比例是70%。可一旦计入时间投入和家庭需求，成为合伙人比例的性别差异便消失了。

自然而然地，许多女性离开了私人部门。如果黛拉在5~15年内离开公司但仍然在职，她可能会从事政府工作，或者在法律界之外就职。从财务角度看，离开私人部门代价高昂。无论性别为何，自私人部门转到政府职位，法学博士都会损失38%的年收入。



如果黛拉留在律师事务所工作15年，但不是作为合伙人，她的收入将比成为合伙人少三分之一左右。由于更多女律师撤出私人部门，而即便留下来的，也很少能成为合伙人，因此她们遭受了沉重的财务打击。

时薪、留在私人部门的可能性以及成为合伙人的概率，都高度依赖时间投入和家庭需求，与律师的性别关系不大。不少律师事务所的确存在偏见，但这并非造成晋升和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时间投入的差异如此之大，对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和事业产生如此严重的影响？另外，几乎所有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5~15年内退出法律行业的女性都有年幼的孩子。但你或许会辩称，很多女律师都有孩子，所以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决定了谁去谁留。

我们不妨假设，黛拉和佩里在职业生涯的7~10年有了一个或两个孩子。如果佩里的收入让他跻身顶层，那么相比佩里收入较低的情形，黛拉更有可能放弃她的工作和职业。有子女且丈夫收入高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是丈夫收入较低（但肯定不是很低）的女性的3倍。（比较起来，没有子女的女性并未因为丈夫收入不同而出现就业方面的差异。）

因此，如果有孩子，佩里的超高收入会导致黛拉的就业发生变化。女律师不会仅仅因为丈夫有钱就放弃工作。丈夫能够挣更多钱，养活一个家，是因为妻子辞了工作。佩里可以攀上事业巅峰，前提是他的时间和精力不被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占据。这并不是说佩里在家里不是位好父亲，他只是不必像家庭“主夫”那样为家庭琐事随叫随到罢了。

就算黛拉和佩里雇用全职保姆，孩子也需要且理应得到父母的陪伴。大多数父母都想要陪伴孩子的时间，这自然产生了一个难题。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就不能花在客户身上。用来管理日托和家务的时间就不能用来写辩护状、出庭和晋升合伙人。我们很快会发现，新冠疫情时期，随着工作、托儿所、学校和食堂一同转移至家庭，这些权衡变得愈发清晰。

黛拉和佩里要直面一个极端抉择。他们可以折中，两人都从事全职工作而不必每周工作 45 小时以上和熬夜。但正如所见，这可能意味着双方将牺牲大量的金钱和经验，不光会在私人部门落后于同行，而且要面临更漫长、更艰难的晋升合伙人之路。

黛拉和佩里没有中断事业，也没有大幅缩减陪伴孩子的时间，而是做出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决定：作为夫妻，他们最大限度地开掘各自的收入潜力。黛拉退出她的职业生涯，也许从事兼职，或者干脆放弃律师工作，全职在家。这让佩里摆脱了耗时的家务和家庭责任，从而投入必要的长时间工作以加速成为合伙人，充分提升自己的时薪，用更高的收入回馈家庭。

在《佩里·梅森》每个故事的结尾，佩里和黛拉都破了案。而在“本案”中，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组建一个家庭并使家庭收入最大化。但真正麻烦的是，现代版佩里和黛拉故事的结局，与他们 20 世纪 50 年代的结局基本没有变化：佩里是身居要职的律师，在法庭和董事会上熠熠生辉；黛拉在孩子年幼时从事兼职，全权负责家务。随着孩子渐渐独立，黛拉增加了工作时间，只是，她早已献出了成为利润丰厚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机会。

如果佩里和黛拉是同一个高收入群体的同事，他们或可收入相近，工作时间相同，成为合伙人的机会不输彼此。但如果他们像很多人一样，是一对教育背景和职业目标相似的夫妇并且想要孩子，那么他们的职业生涯不会同步太久。他们中只有一人能达到高收入水平。当他们的事业出现差异时，几乎完全是因为女性希望工作时间更灵活或更少，或者她们撤出私人或企业部门，以便腾出时间抚养孩子。纵使律师职业取得了性别平等上的进步，但在美国经济中，法律领域依然是性别收入差距最大的行业之一。

黛拉和佩里的烦恼，是许多从事各类职业的夫妻共同的困境，就像我们的朋友伊莎贝尔和卢卡斯。那些一起定居下来的高学历人群：医生和终身教授、首席执行官和参议员、全球顾问和建筑师等，都将面临不同版本的相同难题。

美国劳工统计局创建的大型数据库 O*NET 收集了我们讨论的普查职业的详细信息，并提出一些有关美国劳动力经验的批判性洞见。我们已经知道数据显示，某些工作特征与性别收入差距息息相关，比如工作时间要求的重要程度、工作需要与他人（如客户或顾客）密切接触的程度，以及工作中维持人际关系的重要程度等。职业对时间的要求越高，需要与客户或他人连续相处的时间越长，那么较之男性，女性在这类工作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

现在我们清楚，当员工的工作时间更长、能接触到更多客户时，时间要求较高的职业的工资（甚至时薪）就会不成比例地暴涨。律师事务所之类的雇主愿意花钱吸引职员从事不规律、随叫随到、时间不可预测的工作，甚至加班，原因之一是个人是公司维护客户和各种交易不可或缺的部分。客户可能需要特定的会计师或法律顾问。参与大型并购的律师可能被认为是交易的关键人物。律所、咨询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可能认为，如果特定人员无法跟进交易的每一步，将会永远失去客户。更多的时间要求带来更高的时薪，这就是有些员工“在办公室随时待命”能获得更高薪酬的原因。

但是，员工随叫随到、工作时间长且不规律，并不表示他们就一定能获得更高的报酬。与经济学中的一切事物一样，这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公司需要愿意长时间工作的员工，因为拥有随时可以为客户服务的员工对业务有利。然而，长时间且不规律工作的员工得到的报酬也更高，因为他们会要求额外的补偿。这种补偿有点像“辛苦费”。

职业生涯涉及成为合伙人或晋升终身职位的个人同样面临严格的时间要求。不过这个要另当别论。这类雇员必须在一段固定时间内为某个通常是“赢家通吃”的目标紧张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当期的时薪或许不会增加，但预期收入和未来的工作保障会大幅提升。

当时薪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增加时，一般人会有加班的动力。如果加薪幅度足够大，那么哪怕是家庭责任和希望多陪伴家人的人，也会为了巨大的经济激励为工作付出更多时间。由于两位家长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不能（通常也不想）将父

母的责任全部外包给保姆，其中一位家长必然要减少在办公室工作的时间，而把更多时间留给家里。这位家长将得不到与工作时间挂钩的额外收入，即使她（或他）继续工作。

两位家长可以都选择较难预测的工作，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或者，都选择更可预测和更灵活的工作，尽可能多地陪伴孩子，但家庭收入减少。又或者，他们可以一人从事高薪工作，另一人从事灵活工作，而这就是他们最终的选择。在至少一位家长必须为家庭待命的约束下，他们让另一位家长在工作上随叫随到，从而使家庭收入最大化。

男性从事时间难以预测、较不灵活工作的比例极高，这意味着即便投入同样多的时间，女性的平均收入也会低于男性。而当较不灵活工作的进步空间更大时，女性获得晋升的机会就更少。性别不平等随之产生。大量女性转向时间更可预测和灵活的工作，以便可以花更多时间照应孩子、家庭需求及紧急情况。夫妻不公平接踵而至。但显然，性别规范是女性首先选择较灵活和更可预测工作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对于女性，在家庭之外拥有一份真正的事业是相对较晚近的现象，是我们五个组别演化发展争得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一急速转变下社会对女性拥有事业和家庭的接受程度已大幅提升，但工作场所仍旧极力奖励传统的专业化分工。个人乃至夫妻，其实都有很大的经济激励专注自身的事业，而不是在家庭责任上妥协。但如果家庭也是目标之一，那么就得做出权衡取舍。

根据我们研究的逻辑及数据，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异，与工作场所的偏见、家庭友好型政策的缺失，或者之前提到的任何快速解决方案没有直接关系。那些解决方案致力于让女性在目前的职位上得到应有的待遇。然而她们当前工作的特性，才是她们收入较低的原因。这些工作的各方面，使特定员工比如律师、会计师、咨询师、财务顾问等，变成了账目、客户和交易必不可少的部分。

有好消息吗？有，那就是责任不在你，而在制度。可坏消息也是：不是你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即使女性获得可以被核证为“公平公正”的工资，但假如因为家庭和子女的羁绊，她无法加班或随叫随到，她的收入仍然会低于同行业的可比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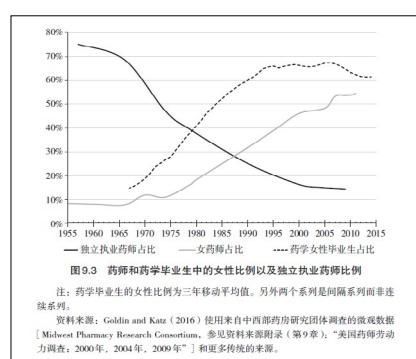
我们用心良苦，在通往平等的漫漫旅途中取得了诸多胜利，可是男女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如今，佩里和黛拉都在翻查各种自助手册和文章，寻找实现事业家庭双丰收的“十步指南”，搜索平衡二者的灵丹妙药。答案不在那些地方，但承认存在问题即表明事情有了一定的进展。

只要两份工作之间的收入差距悬殊，普通夫妇就会追求更高的家庭收入，而往往令彼此沮丧和唏嘘的是，他们也将被迫抛开性别平等和夫妻公平。

如何鼓励夫妻不丢弃夫妻公平？显然，他们需要一种无须付出太大代价就能维持公平的选择。能不能通过改变制度，抑或让制度自行改变，从而实现这一点？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少数职业已经在切实行动。譬如药房，就讲述了截然不同的故事。

药师这一职业不仅平等，而且收入丰厚。据美国全职全年工人人口普查报告，与所有其他职业的女性相比，女药师的收入中位数（在近 500 个职业中）排名第五（女律师排名第七）。女药师不仅比其他教育程度相当的女性收入高，即使按工作时间调整后，她们的收入也几乎与男药师相同。

为什么药师之间实现了性别平等，而法律领域的不平等现象依然严峻？毕竟，女性进入这两个行业的人数经历过类似的增长，并且都需要专门的学士后培训，在培训中女性都得以发展壮大。



关键就在工作的结构上。这些职业曾经具有相似的特征。药师和律师的生活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工作时间长且不规律。两种职业都包含高度的自营性质，承担所有权带来的风险。如今，这些特征仍然决定着律师的境况，却不再适用于现代药师。

最近播出的一部短命的搞笑情景喜剧《瓶子》(Vials)，故事背景设在一家名为盖特慰(Gateway Drug)的私人药房。这家药房归脾气暴躁的里奇药师所有，由各类技术人员和里奇的叛逆女儿丽莎经营，丽莎是一名新手药师。半个世纪前，像盖特慰这样的药房是消费者获得处方药和满足自身药品需求的主要途径。过去的药师和药房老板几乎都是男性。1965年，女药师(主要是第三组成员)占所有药师的比例不到10%(见图9.3)，通常受雇于男药师所有的药店。当年，大约75%的药师要么是独立执业业主，要么是这些业主的雇员(另外的25%在连锁店、医院等机构工作)。女药师的收入是男药师的67%，这主要是因为她们没有自己的药房。

那时候(就连药师都在追电视剧《佩里·梅森》)，工作时间较长的药师的时薪比工作时间较少的药师多得多；个体经营者的收入远高于雇员。而即使工作时间相同，有孩子的女药师的收入也一定远低于没有孩子的女药师，因为她们无法按要求在特定时间工作。20世纪中叶的药师职业看起来和今天金融部门的某些职业非常相似，另外也颇像今天的律师和会计师。

以前药房出售的药品和提供的服务与今天略有不同。药品通常要专门为客户提供配制，药师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药师甚至会在深夜被叫醒，为熟悉的客户开紧急处方。

后来，情况开始改变。药师之间不再泾渭分明。他们不提供太多的个性化服务，也不必记住客户个人的医疗需求。(我想，读到这页的人如果近年有去过药房续药，应该不会要求最初给他们开处方的药师来配药吧。)但是，当我们会见税务会计师或离婚律师时，一般希望和特定的专业人员打交道，而不是他们的同事。

药房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整个20世纪，药店成为大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不断扩张。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私人药房的比例急剧下降，而随着这一转变，独立执业的药师比例也大幅下滑。医疗保健和健康保险制度的变革强化了这些趋势，并促使医院和邮购药店雇用的药师比例日渐增加。

每一个转变都削减了独立执业药师的数量，提升了企业雇员的比例。虽然企业部门通常不被视为渐进变革的推动者，但在这个案例中，它恰恰扮演了这一角色。药房向企业转型意味着所有权与药师的工作不再关联。从前，男性向来是老板，女性主要当他们的助手，所以这一转变还意味着，担任药师的男性和女性可以更加平等。获得企业净利润的人不再是男药师，而是股东们。

另外的几个转变也加强了这些变化。药品变得更加标准化，除了少数特例，不再需要配方。信息技术使药师能够获得客户正在服用的所有处方药清单，这类信息也让男女药师能够就药物的相互作用向顾客提供适当的建议。

与药师私人接触对于单个顾客的健康和福祉已经无足轻重。“深夜药店”意味着药师不必随叫随到。大家不再需要和药师保持密切联系才好在深夜进药店买药。

在上述转变过程中，药师的工作没有变得更容易，这个职位的专业性也没有降低。最近，药师还被召集到管理和实施新冠疫苗接种的前线。实际上，药品和治疗手段已经远比50年前复杂，药师必须掌握比过去更多的知识。药师培训的教育需求与日俱增。曾经，药学本科学位外加一年工作(以及通过考核并积累一定经验)足够炼成一名执业药师，但从21世纪初开始，需要六年药学学位(两年本科和四年研究生)再加各种考核和实践经验。

快进到今天的药房。盖特慰是一个反常现象。只有大约12%的药师在地方私人药房工作。像CVS、沃尔玛(Walgreens)、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连锁店以及众多医院，现在雇用了大多数的药师。和邮购药店一样，这类商店为我们提供大部分的处方药。

如今，超过50%的药学毕业生是女性，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保持这一势头。女药师不再是男药师老板的副手。大家平起平坐，都主要是雇员而非老板。今天的药师大都是某个企业实体的职员。

总的来说，这些变化意味着药师可以很容易地相互替代，这又说明，药师基本不必长时间和不规律地工作。当然，有些药师也会在晚上、周末和假期上班，他们是24小时药店、医院药房和邮购药店的员工，仍然经常挣着辛苦钱。但是，和其他有大量专业人员待命的领域相比，药房“夜猫子”应该是罕见的。关键在于，因为有近乎完美的替代者，所以没有哪个药师在工作上多花时间就能让自己更具价值，而所

有人依然是有价值的专业人士。

随着药师成为彼此更好的替代者，兼职工作的时薪惩罚几近消失。现在，女药师的收入中位数是男药师的大约94%。药师是少数没有显著兼职惩罚的专业职业之一。企业药房的经理人是比非经理人挣得多，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更长。工作时间更长的药师工资更高，但时薪并没有增加多少。药房的工资与工作时间接近线性关系，这说明如果工作时间翻倍，收入也会翻倍(任何倍数都一样)。

因此，对于今天长时间工作的药师，不存在明显的时薪溢价。倘若丽莎一周工作60小时，其收入就是一周工作30小时的药师的两倍。如果药师丽莎或黛拉想挣更多的钱，她就要工作更多的时间，但她的时薪没有变化。而正如我们知道的，律师的情况远非如此。

因为延长工作时间不会增加时薪，所以很多女药师从事兼职，尤其是妈妈们。大约三分之一的女药师30岁时每周工作少于35小时，并且至少在未来10年维持这一状态。由于职业灵活，药师妈妈很少会在有了孩子后频繁休假。相对于律师和金融家，女药师鲜少出现职业中断。

另一个惊喜是，药房行业发生了三大变革：企业部门崛起、药品标准化，以及启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变革的原因与大量女性涌入这一行业几乎无关。目前，约有65%的药学博士是女性，与1970年的10%相比，跃升了55个百分点。

今天，药师的待遇很好，且较之其他专业人员的相对工资也有提高。从1970年到2010年，全职药师的年收入中位数相比律师、医生、兽医(男性和女性专业人员)均有增加。总之，药师几乎成了彼此完美的替代者；进而，配药业已然成为高度平等的行业。不仅收入可观，而且就算进驻这个行业的女性人数创下纪录，薪酬也并未下降；这与通常认为女性一旦进入某个职业，收入就会暴跌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反差。

一个更广泛的结论就此诞生：工人之间的替代性，是降低长时间和随叫随到工作过高时薪的关键。如果两名员工彼此能很好甚至完美替代，那么当其中一人不得不休假时，另一人可以无缝接替前者的位置。客户、病患、学生和顾客可以由某一熟练员工移交给另一熟练员工，不会丢失信息，不会改变信任度，也不会产生效率差异。

这种转变不需要革命、社会运动或剧变。它自然地发生在配药行业，原因很多，但是没有一个原因直接涉及任何具体的事项。这并不代表其他部门和职业必须或者将会自发发生类似的变化。配药行业的案例告诉我们的是哪些变化可以促进性别平等和改善夫妻公平，而不是这些变化必须如何实现。

拥有完美(或接近完美)替代者的理念，对女性和夫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通过研究配药行业的案例，我们得以了解该行业如何消除了性别收入差距，以及其他行业可以如何缩小这一差距。我们能够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才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所有职业都像药师一样，那么今天的黛拉和佩里就不会陷入两难境地。黛拉不再是唯一一个为了照顾孩子缩减工作量的人。没有黛拉，佩里不会有动力长时间工作，或在周末埋头案子。

作为夫妻，他们无须在律师和家庭之间做选择。他们将能实现夫妻公平和性别平等。

当然，问题是大部分职业都不像药师。当长时间工作是获取高时薪的唯一途径时，个人就不得不为了更可控的工作时间付出更多，夫妻就要面临更艰难的抉择。相对工作时间不可控的人，工作时间更可控的人挣得更少，甚至时薪也少得多。譬如法律领域，甚至有云泥之别。在法律行业，休假、缩短工时甚或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工作，都意味着时薪的悬崖式下跌。而药师休假，不会出现收入断崖，顶多像是闲庭信步。

当某一职业的工人可以互相替代时，每个人都将受益。想想，假如员工拥有完美的替代者，结果会怎样？苛刻的客户、紧急会议、午夜并购终场，或任何需要员工在场但他(她)无法现身的时刻，都可以由完美的替代者处理。由于完美替代者可以在紧要关头接手，她或他就可以平滑时间要求。工作时间长、工作要求高的人将没有理由必须获得额外的时薪，因为不再需要某个员工应对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这些时间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能力相当的替代者分担。

配药行业几经变迁，药师终于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且几乎不损失时薪。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得益于技术变革，例如信息系统方面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同样影响了其他领域和行业。

不久前，企业实体接管了配药行业和许多医疗机构。最近，企业和私募股权公司通过收购小型诊所，成功闯入验光、牙科和兽医领域。虽然大量企业得以幸存，但

对许多人来讲，友好的独立所有者转变为陌生疏远的公司，终究仿佛苦涩的药片难以下咽。

产品标准化和更好的信息传输使药师能够与广泛的客户合作，药师成为彼此的完美替代者。在一定程度上，类似的变化也开始影响银行业和金融部门。例如，许多大型银行不再为顶级客户提供一位私人理财顾问，而是启动私人银行家团队。有多少次你被（我希望是得体地）告知，将由团队另一位成员为你提供同等的服务，而不是之前跟你联系的人？

拥有替代者绝不意味着一个职业、专业或职位沦为大宗商品，并把工资压至最低。这种替代不会像山寨的爱马仕铂金包那样降低真品的价值。医生、兽医、药师、律师、金融家和会计师如若配备优良的替代者，将能增进灵活性，且他们的收入未必会下降。“分身”不会削弱这些专业人士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就像我前文提到的，具有高可替代性的配药行业正是一类高薪职业。

另一个好消息是，这种变化也开始发生在其他行业，只不过是以一种非自然的方式，但结果与配药行业的改变相得益彰。在某些领域，工人日益要求对工作时间有更大的掌控权，并迫使公司、医院等机构提供这类权利。咨询、会计和金融等行业的公司渐渐认识到，年轻员工无论男女都会因为工作时间长和不可控而辞职。亲手栽培的人才可能流失，这种威胁或能刺激雇主做出改变。在各种技术类和健康类职业，工作本身是独立的，很少需要与客户或患者反复进行个人互动，这意味着具有类似技能的员工可以相互替代。此外，新冠疫情期间，对父母特别是对女性的需求日益增加，这进而极大地提升了在工作中拥有良好替代者的价值。

每集《佩里·梅森》结尾时，佩里总能找出罪犯并破获案件（通常少不了黛拉的协助）。眼下，我们揪出了“罪犯”，却没有解救被告。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卫生、技术、金融领域的一系列职业中，雇主为雇员提供时间灵活性的成本已经降低，并且，这些职业的员工正逐渐成为彼此的完美替代者。



克劳迪娅·戈尔丁

哈佛大学 Henry Lee 经济学讲席教授，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女性劳动力、性别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因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对女性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分析”荣获 2020 年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2023 年她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其“发现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背后的关键因素”。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Andrew Alexander](#) on Unsplash

能闻气味，能压碎黑暗的土块，这就够了，此时知更鸟再次唱起秋日之乐的悲歌。

——爱德华·托马斯

在一粒沙子里看见宇宙，
在一朵野花里看见天堂，
把永恒放进一个钟头，
把无限握在你的手掌。
笼子里关着一只知更鸟，
会引起天上神灵的恼怒。

——威廉·布莱克

我要散步一回，
来镇定我的跳动的心。

——威廉·莎士比亚，《暴风雨》

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比欧亚鸽更随处可见、容易辨识且让人心安的存在了。欧亚鸽是英国国鸟。并且它这个称号实至名归。在任何一个城镇乡村，公园、花园走几步路，不看见一只欧亚鸽都难。即使你没看见它，它也一定已经看见你了。你可能已经侵犯了它的领地，它肯定不同意，又或是你正在庭院里松土，多半惊扰了一只被欧亚鸽当作午餐的小虫。

再也没有比用欧亚鸽开启你重新认识鸟类旅程更具代表性和特色的鸟儿了。不仅因为没有其他鸟类比欧亚鸽和你有更近距离的接触，如果你给的东西足够诱人的话，它们甚至会直接从你手里叼来吃掉。欧亚鸽既勇敢，好奇心又强。

说实话，我会蔑视任何不爱欧亚鸽的人。我想，这种爱源自欧亚鸽对我们人类来说是永恒的存在：它们胸前一抹浓墨重彩的橘红色特别好认，而且它们永远离我们不远。并且，在我们心中，欧亚鸽永远和圣诞节有着紧密的联系。自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人们发明了圣诞贺卡之后，几乎每一张圣诞卡上都有欧亚鸽的身影。欧亚鸽和圣诞节的联系起于最初邮递员身穿的鲜红色制服大衣，这样的着装让他们有了红胸知更鸟的外号。自然而然地，欧亚鸽开始出现在邮递员派送的贺卡上，尤其是圣诞期间，一眼就能看到光秃秃的树枝上的欧亚鸽，在那些寒冷短暂的白天，它们用陪伴温暖我们的心灵。

不知多久以前，人们就从欧亚鸽的陪伴中获得快乐，也会向它们学习。历史上最成功的童书，莎拉·特里默 (Sarah Trimmer) 的《知更鸟的故事》(The History of the Robin)，从 1796 年一直到 1914 年都在不断重印。这本书讲述了四只勇敢的知更鸟教导他们的孩子如何过好一生。特里默女士写道，自然历史和她的知更鸟们“充满了愉悦和指引”。我完全同意。在她写下这句话 116 年之后，也有一只欧亚鸽给我带来了指引，排解了烦忧。它也给我上了如何过好人生的一课。在一个了无生气的医院停车场，当母亲的病让我不堪重负时，是一只欧亚鸽陪伴了我。这件事让我真正懂得，即使在嘈杂的城市中心，在内心的暴风眼，在大自然中喘口气能带来怎样的好处。

在遇到这只欧亚鸽的两周前，一个清晨，我醒来时感觉好像有个胖哥把一架钢琴压在我的胸口，之后自己还一屁股坐了上去。我喘不过气来。而且我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伸手想抓住玛丽让人安心的手，但床是空的。我一下子记起玛丽出差在外，这让事情变得更糟。我动弹不得地躺在那里。被我自己的汗水黏在床单上，肺里的氧气都不够支撑一只老鼠。通常我不是那种总怀疑自己生病的人，但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想过：“这辈子就到这里了，老弟，你要死了。”

在说服自己也许能撑到过完三十七岁生日之后，我决定先自己做一些调查。但是谷歌医生是一个危险的朋友。你搜索几个轻微症状，接下来你就发现你得了三种不同的癌症，并且你的多个器官都已经或者快要衰竭了。这让我想起了杰罗姆·K. 杰罗姆 (Jerome K Jerome) 的《三怪客泛舟记》(Three Men in a Boat) 里一个经典片段。杰罗姆感到一些“轻微的病症……可能是花粉热”，结果犯傻去医学辞典里查找他的症状：“我忘了我最先陷入的是哪一种瘟疫，某种可怕的、骇人的灾祸，然后，我看到了伤寒，阅读了伤寒的症状之后，我发现我得的就是伤寒，而且一定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当然，他发现辞典里的每一种病他都有，除了一种叫“髌前囊炎”的病，他对此感

非虚构

人生短暂， 你也应该听听欧亚鸽的歌声

查理·科贝特 | 新书试读

生而为人，你是否焦虑？

停下脚步，让鸟儿带给你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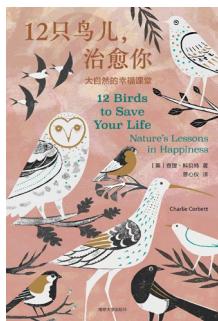
你能辨认出家麻雀欢快的叫声吗？或是欧歌鸫在冬日至暗时刻的高歌？那么杓鹬萦绕不去的美妙歌声呢？

母亲突然离世后，查理·科贝特经历了一段焦虑不安的时期，他的人生观产生了动摇。在绝望的一刻，他不知不觉躺在了一座孤零零的山上，忧郁的细雨渗入他的灵魂深处。

刹那间，他听到了云雀的歌声，那高亢欢快的清脆叫声在空中回荡，让他得以从黑暗的思绪中抽离。大自然的美景让他着眼现实，一下豁然开朗了起来。

通过 12 种个性十足的鸟儿，查理向我们展示了只要我们知道去哪里寻找、怎样去倾听，就能找到快乐。从独来独往的云雀到争吵不休的家麻雀，《12 只鸟儿，治愈你》探寻了这些鸟类在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景观中的地位，并标注了鸟类的外形特征以及在哪里最有可能遇见它们。

经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第二章《欧亚鸽》分享给读者。



到很受伤：“这让人讨厌的保留是何必呢？”谷歌医生也是如此。而我当时的身心状况让我相信，我像杰罗姆一样，在世上已经时日无多了。

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我陷入了一种像得了癌症般的阴阳魔界：我还记得人们和地点，但景观变得模糊又陌生。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在试图将一幅难度极高的拼图强行拼在一起，但每一片拼图都不匹配。我要让我的大脑不为我快要死去的母亲担心，下一秒就无缝转接到成熟的、非常严肃的关于金融商业未来的报告（我的本职工作）上面，这是极其困难的。最终我工作日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徘徊在弗利特街上发疯似的抽烟，永远在和凯蒂、理查德打电话商量怎样解决我们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我下定决心不在工作上迟交一篇稿子。我的报告还是会每周像时钟一样准时送去印厂。我不会让个人生活的悲剧影响到我的社会生活。坚强的人不会这样，他们只会默默渡过难关。

想要讨好所有人，这种内耗极大的想法胜过一切。不论工作多忙，我都从来不会错过家人打来的电话，如果爸爸跟我说妈妈的状况有哪怕一点点恶化，我都会直接放下手中的事情，跳进车里，立刻从办公室赶到（160 公里外的）医院。然后我会加班到十点做完剩下的工作，不是因为我多么害怕领导责怪，而是不想给撰写和筹划我编辑的这份报告的同事添麻烦。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我被这些事情折腾得筋疲力尽。但是，让人恼火的是，越是累，晚上越是睡不着。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像个活死人一样回到家，趿拉着走来走去，把储物柜门开了又关上，恹恹地看向冰箱，好像我会在冷藏室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样，或者直接瘫在沙发上发呆。当我躺在那里，对着空气冥思苦想的时候，玛丽会走过来。

“我真的有点担心你。”

“我没事，我向你保证。只是今天工作不顺利而已。我喝两杯就恢复了。”

然后我会走到厨房，躺在桌子上，朝天花板大叫。

有时我会约上几个老友喝到不省人事，然后凌晨回到家，一头倒在沙发上，用电脑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歌。我对七十年代的音乐从没有特别的嗜好。但是在我酒醉和思绪纷乱的阶段，极力想要逃走，只要不是现在，什么时代都好，我只想一遍又一遍地听七十年代的抒情歌：《阳光下的季节》（“Seasons in The Sun”）、《美国派》（“American Pie”）、《滑坡》（“Landslide”）、《往日时光》（“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通向天堂的阶梯》（“Stairway to Heaven”）。奇怪的是，就属彼得·萨斯泰特（Peter Sarstedt）这首《亲爱的，你要去往何方》（“Where Do You Go to my Lovely”）我听得最多。

我会在早晨昏昏沉沉地醒来，发现玛丽不知何时已经帮我盖好了毯子、摘下了耳机，把我从酒后的时光旅行中抽离出来。

我们结婚才六个月。在一段正常的婚姻里，现在应该是蜜月期：平安幸福的日子，没有哭闹的孩子，没有夫妻之间的吵架，每周末都会去迷人的欧洲小城度过放松的小长假。我们本来的计划也是这样的。我们两人的“新婚”手册里也是这样写的。但是现在，我们婚姻的托盘里放着的是恶性胶质瘤四级，以及一个正在崩塌的家庭。我向玛丽承诺了各种美好的愿景，但是她在我婚姻开始时没有过“同甘”，全都是“共苦”。

整个过程中，我依然尽职尽责地从我们的癌症病房向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息，强调我们是多么乐观，妈妈是多么坚强。但真实的情况完全相反。妈妈的症状从确诊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恶化。不论我多么希望能有转机，从来就没有过好消息。我会把接到的坏消息像橡皮泥一样捏一捏，改造一下，然后违背它的意愿，强行把它变成好消息。我想尽一切办法拒绝接受现实。

妈妈经受了一系列痛苦的调强放疗和化疗。我觉得她所承受的，能让一辆小型邮轮沉没。而且，就像理查德说的，她正在服用的药物比巡回演出时的基思·理查兹吃的药都多。

在一个湿漉漉的掉满落叶的阴天，我回到家，妈妈刚接受完一轮放疗和化疗，正在静养。她躺在床上，背靠着几个软垫，在看电视，而她惹人喜爱的黑色西班牙猎犬小墨，正趴在她的小腿上。小墨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身边，一次也没有。除了我父亲把它带到外面解决生理排泄，这只懂事的小狗，我家的小小南丁格尔，总是陪在母亲的病床边。即使是灵犬莱西，在小墨面前都显得没心没肺。小墨让我们想到了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一首诗，在几个月后在妈妈的葬礼上，我们也朗诵了这首诗。

日复一日，一整天中——

每当道路开始倾斜——

四脚兽说：“我跟你一起去！”

小跑着跟在我身后。

现在我必须去向别处——

我再也不会找到——

这里没有

四脚兽在身后小跑的声音。

在过去的六周，妈妈经历了极其艰难的治疗过程，然后是第二轮。在此基础上，现在要做第三轮了。治疗癌症，或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尝试控制癌细胞扩散的问题是，治疗比癌症本身还要难熬。这好比用机枪取出嵌进身体的小碎片。碎片是会被取出来的，但你的手臂也被炸没了。事实上，治疗才是压倒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健康严重受损，不仅是化疗和放疗，还有几周前进行的脑部手术，让她有了一些不良反应，医生后来用冷冰冰的术语向我们描述为“一次发作”。实际上，她已经开始有规律地“发作”好几次了。就在这个尤其阴冷潮湿的下午，她又开始了一次发作，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上一秒她还清醒着、能够连贯地说话，下一秒就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被一场凶恶的高烧扼住生命的脉搏。

我连忙跑去隔壁房间叫救护车，然后回去照顾母亲。她的状态非常不好。最让人不安的是，现在床上躺着的妈妈，和几分钟前与我谈笑风生的样子判若两人。真让人惊诧，病痛能让人变得那么陌生。在这紧急关头，当她的身体拼命想要活下去的时候，我熟悉的老妈去了别处。我很害怕她再也回不来了。

再说，爸爸到底去哪儿了？我的老天爷。我给他打了无数次电话，一直转到语音留言。更糟糕的是，我爸爸的语音留言是妈妈帮忙录的，因为他技术上比较落后。于是，在我拨出的每一通电话最后，都是妈妈开朗的声音。“这里是彼得的电话，请留言。”她的声音属于在电话里听见仿佛就能看见她笑容的那种。但是当她说出这些话语，从电话里冲我微笑的同时，妈妈就在我面前，“面目全非”地躺在那里。

“上帝啊，这该死的救护车到哪儿去了？”我的大脑在飞速运转。我感到很无助。我打出的电话没有一个人接，救护车也没有要来的迹象。终于电话打通了，记得是理查德接的，他说他会立刻赶来。这多少给了我一丝安慰。接着，我看到窗外有一辆神圣而美妙的救护车打着灯开进车道。但它突然不动了。恐怖的是，它顺着来路又回去了。我崩溃了。我不理解。我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到医院。当我终于连线到可以帮助我的人时，他们说救护车很有可能是被调去处理更紧急的情况了。更紧急的情况？有什么能比我的情况更紧急的呢？我恨自己没有在叫救护车时表现得更强硬。我应该明确地说明我这里的情况很危急，迫切需要第一时间救援。我成了自身家教的受害者。那种从小根植在我心中害怕小题大做、强人所难的感觉。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最该大发脾气，在电话里大吼、强烈要求立刻救助的时候，我却退缩了。最讽刺的是，我这种“不要小题大做”的基因可能就是从妈妈那里遗传来的。

等到救护车再回来，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的事了。而此时妈妈的情况已经恶化到需要紧急救护的地步。这是最后一程的开始。我永远无法真正原谅自己没有做更多，没有追上那辆开走的可恨的救护车，敲打着车门直到他们掉头回来。我才不管其他人呢。妈妈后来住进了南安普敦综合医院（一个永远刻在我们一家脑海里的名字）的 4C 病房。她再也没有能在家里度过一晚。

内疚将我吞噬。当你的至亲受苦时，内疚便成了产生压力的机房。内疚让你日日夜夜都在医院度过。内疚偷走了你的睡眠，内疚迫使你屈服。内疚成了你的主人。

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确保妈妈在加护病房中永远有人陪着。晚上也是。爸爸每天都在她的床边陪夜，没有一次缺席。凯蒂每周会从爱丁堡进行两三次（往返整整 1000 英里）的“通勤”，同时还要照顾她年幼的孩子。

理查德永远在 4C 病房的走廊里晃荡，他会用岳父农场的新鲜培根和香肠贿赂护士，确保她们给予妈妈必要的关注。我们还给护理人员买了超大装的咖啡和茶，竭尽全力讨好她们。真是疯了。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对不对？我们只能竭尽所能。但这些努力似乎永远不够。而我只是一个无助的旁观者。

我觉得自己没有尽孝。我责怪自己不是一个更懂事的儿子。不只是妈妈需要特别护理的现在，而且包括我的整个童年和青年的前半段时间：我调皮捣乱的学生时代，

闷闷不乐的青春期，以及不在家的二十多岁，当时我要做的只是给妈妈打打电话，告诉她我的生活近况。但我几乎没怎么打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当然，我应该做的是充分休息和锻炼，这样才能真正帮到妈妈。但我真正做的是自暴自弃，直到无法承受。我不能让别人发现我的异样。我不断想起我的祖父和他那一代人，他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以及二十世纪的无数公私悲剧，但他们还是挺过来了。我要向他们学习。他们的幽魂永远萦绕在我的肩头，穿过岁月向我低语。我不能表现出软弱。最重要的是，我得为了妈妈坚强起来。然后，不可避免地，我发现自己凌晨五点躺在床上，胸口重得像压着一架三角钢琴，在想自己的葬礼上该放哪一首圣乐。

白天和黑夜不再有边界。时间和地点的概念变得模糊。从我家到医院那条路仿佛刻在我的额叶皮层里，就算我蒙着眼睛、一只手绑在背后，喝着金汤力都能开过去。我甚至喜欢上了医院的劣质咖啡。尽管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到让咖啡比岩浆还热，且持久保温。

有一天，我在医院附近散步，在 4C 病房度过分外煎熬的几个小时让我有些恍惚。就在这时，我遇见了一只欧亚鸽。这只小欧亚鸽住在铁矿泉巷，一条开着一家私人诊所的死胡同，离医院步行不到五分钟。在我有空或者压力太大的时候，就会来这里躲一躲。这是我的小小避风港，虽然我承认这里的混凝土和红砖墙不是特别吸引人，但我可以在这里散步、思考，偶尔抽支私烟。这里的一角还有一大片不规则的林地。我的欧亚鸽就在那里栖息，它就那样明目张胆地观察我——它是个好奇的小东西。我不能假装那天我的欧亚鸽给我带来了什么奇迹。它只是看着我。我抽着烟，也看着它。

每次回到铁矿泉巷时，我都会留意欧亚鸽在不在。随着时间流逝，它成了我可靠而沉着的朋友和陪伴者。它不关心我的困苦，但它是一个令人安心的存在：就像以前驻守在街角的警察一样。这只小鸟让我的内心平静下来，它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方式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这比充满一氧化碳的丝卡香烟有效得多。

而且，如果我观察得久一些，在铁矿泉巷，这个英国南部小镇相当单调、温和的角落，其他鸟儿也会逐渐出现在我面前：蓝山雀、大山雀，偶尔还有欧乌鸫。运气特别好的时候，还有难得一见的红额金翅雀叽喳着掠过。红额金翅雀有一种惊人的美，红、金、黑三色制服和温和的叫声，你绝对不会认错。以前，有些地方会把红额金翅雀叫作雀雀（因为它们喜欢吃葡萄）。而在我看来，“戴红帽的国王哈里”这个名字更加合适。在维多利亚时代“国王哈里”特别受欢迎，以至于捕鸟者会踏遍全国捕捉它们，当作宠物鸟出售。事实上，到 1860 年代，红额金翅雀濒临灭绝。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大家，这种说法早就作废了，现在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都能听见许多红额金翅雀清脆的叫声。

但是，在这群欢乐小鸟之间，占据中心位置的还是我的欧亚鸽。它像一个守门人。是它的存在提醒了我，比起掐灭烟头一头栽进 4C 病房的混乱之中，停下脚步观看倾听可能更有好处。

有一次在铁矿泉巷，我和那只欧亚鸽靠得特别近，以至于我可以看到它鸣唱时胸前羽毛的颤动。它好像完全不在意我离它这么近。听着欧亚鸽的歌声，看着它那小小的橘色胸脯随着优美的旋律起伏，我甚至可以看到每一根羽毛的颤动，我所有的压力都消失了。4C 病房，我努力同时应付工作、家人和朋友，时速一百英里的生活；所有非理性的愧疚，甚至妈妈和癌症，都默默退居幕后，那一刻，我躁动的内心安静下来。我找到了心灵的安宁。

欧亚鸽是为数不多全年鸣唱的鸟类之一。大多数鸟类只有在春天繁衍的季节才会用鸣唱的方式捍卫自己的领地，但欧亚鸽的领地意识极强，以至于它们一年四季都

会自信地宣告自己的存在。与大多数鸟类不同，雄性和雌性的欧亚鸽看起来完全一样，而且在冬天的几个月里，它们都会鸣唱。人们认为欧亚鸽的歌声带有金属感，是忧郁的，这和我在铁矿泉巷的感受十分契合：“欧亚鸽又唱起秋日之乐的悲歌。”

欧亚鸽会在各种地方筑巢。长篇累牍的论文都致力于讨论欧亚鸽筑巢的各种不寻常的地方。除了在树上，它们似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筑巢，比如棚屋里倒空的油漆桶、废弃的蜂箱、旧帽子，甚至有一回，在某人的床上。

我觉得能够如此接近这种野生小动物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它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创造的奇迹，小巧、比例完美又凶猛。我喜欢欧亚鸽和其他野生动物，单纯因为它们是野生的，和我们没有感情。它们既不会问问题，也不会回答。有时，这正是我们人生所需要的。

欧亚鸽带来的宁静让我醍醐灌顶，以至于我决定斥巨资购入一整套野鸟喂食器。我想把铁矿泉巷的平静带一点儿回家。以前，我觉得野鸟喂食器是小老太太和寂寞单身汉的专属，但这次消费改变了我的想法。成功饲养一群野鸟的过程就像服用解压药，只是用鸟儿代替了药物。自从喂食器安装完毕并开始吸引访客后，我每天都痴痴地望着：蓝山雀、大山雀、麻雀、苍头燕雀、欧金翅雀、红额金翅雀、欧乌鸫、鵙鶲，偶尔有黄雀、欧亚鸽（当然有它们），还有好多其他的鸟。每天它们都在提醒我早已忘记的一件事——我们有幸生活在如此多样的鸟类中间。我可以一连看上几个小时。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在温暖的厨房里观察野鸟喂食器。说到这个，有个邻居每次碰见玛丽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在我看来相当不公平）：“查理最近还好吧？还在看他的鸟吗？”

据说诗人 T. S. 艾略特 (T.S.Eliot) 可以听见绿草生长的声音。我一直很喜欢这个说法。它让我想起我听过的最好的建议：如果想要理解和热爱自然，你要做的非常简单，那就是找时间静坐。我已经记不得上一次在树荫下休息，坐着看周围的一切，让自己沉浸在景色之中是什么时候。不是繁忙中抽出来的几分钟，而是一段持续的时间，甚至一个小时。置身于自然之中，什么也不做。

我年轻的时候经常阅读二十世纪伟大的作家、博物学家丹尼斯·沃特金斯皮奇福德 (Denys Watkins Pitchford) 的书。他写下了许多自己带着狗和枪在北安普敦郡的乡村散步时，大自然中发生的日常事件。在每本书的扉页上，他都会引用在坎布里亚郡的一块墓碑上发现的铭文：

世界的奇迹、美与力量，事物的形状、颜色、光与影，这些我都看到了。人生短暂，你也应该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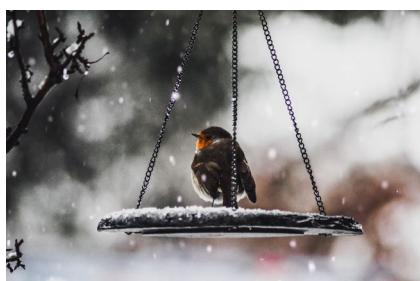
我下定决心要找到符合这段话的标准的一种安宁，即使当时我也意识到这是有点矛盾的。这听起来多容易啊。写一种“静坐观察”的生活态度是既简单又深刻的。写诗人听见草长的声音，建议大家与自然平静地相处交流，告诉大家“你也应该看看”。但我发现，现实情况大不相同。事实上，当我开始在大自然中实行我的树下独坐计划时，我发现与自己的思绪独处不仅令人气馁，而且有些恐怖，并且一点也不平静。

我本能地想要逃离（或者通过喝酒度过）这些无声的时刻，害怕我在寂静中的发现。我尝试过很多次坐下来，观察、听草生长的声音，都以失败告终。手机就像我口袋里的一个电子警报器，只要有一条我无法忽视的工作信息，或者一条不立刻回复就很不礼貌的来自朋友的好心关怀的信息，我就会被召唤过去。有时在我发呆的时候，一些阴郁的想法会像午夜小偷一样偷走我的平静。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在大自然中独处。一动不动。有时候我还是做不到。但当我真的做到了，一切都不同了。其他事情都变得不重要。我获得了一些读书或者看纪录片时不会注意到的小小的兴趣点，在这样的近距离之下，这变成一件很私人的事，而鸟儿变成了我的日常叙事的一部分。

观察喂鸟器让我深入了解了鸟类的等级，字面上说就是它们生活中的啄食顺序。我发现麻雀是出现在喂食器上的最主要的品种，体型较小的大山雀和苍头燕雀耐心地在后面等待。在等级的底部是精致的蓝山雀和煤山雀，大自然中漂亮的雾都孤儿。我们不要忘了不起眼的林岩鹨，一种身上穿着棕灰色条纹制服，有点腼腆、谦逊的鸟。它们可不能被低估。雌性的林岩鹨总是会和两只雄鸟交配，谁都不知道雏鸟的父亲究竟是谁。在繁衍季节，两只雄鸟都会照顾林岩鹨夫人和雏鸟。这太聪明了。

不同的鸟会在不同的时间来到我的喂食器：一家会在上 9 点左右出现，就像钟



图片来自 Clever Visuals on Unsplash

表一样准确。然后是几只欧金翅雀，有时是黄雀。黑白相间的大斑啄木鸟是山雀和雀中的巨人，它们的到来会引起四下惊慌。这是个大恶霸。我还发现，如果我把小油菊种子放在一个喂食器里，肯定会吸引红额金翅雀。我可以随意召唤红额金翅雀！一想到这里，我就浑身发热。

光有铁矿泉巷和喂鸟器是不够的。在被搬钢琴的胖哥折磨了几天和几周后，我需要更多的排解方式。即便我倾力研究，我也从来没有完全弄清楚那个令人不安的早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有人向我提示这可能是一次轻微的由压力引起的心绞痛。但不管是什么，它都吓坏了我，我决定为自己创造时间。我可以在一天中挤出几个小时外出，到一个人少的地方散散步。在老橡树下休息一个小时左右。如果幸运的话，我能抽出时间摆脱困境，然后小心地放下我的内疚，把手机放在家里，把自己带到有野趣的地方。我知道如果我等待下去，我不需要找到大自然，大自然也会找到我。



图片来自 Jamie Street on Unsplash

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但我已经认真地开始了。我开始想有一天可以像艾略特一样，聆听小草的生长。它帮助我逐渐形成与周围野生动物重建联系的理解力，与季节也是如此。那是秋天。秋天的特点是内在的平静。盛夏和假日带来的巨大压力过去了，世界又回到了它的日常。大自然伴随着一种幸福的叹息开始慢慢衰落至冬天。八月酷热难耐和暴雨雷电的日子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进入暴风雪的冬季黎明。包括大自然在内，每个人都能喘口气。我也一样。

多年来，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大自然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壮观的。有时也会给人启迪。但往往都被忽视了。现在是我们的鸟类朋友在世界各地迁徙的时节。当一群群鹅从北方飞来，天空变得黑压压一片。每一个河口和海湾都站满了留胡子、戴便帽、拿着高倍望远镜的男人，他们睁大眼睛看着这些稀有的迁徙动物。他们这样兴奋是有道理的。鸟类大规模迁徙有种远古的神秘感，非常震撼人心，不只限于春季从非洲返回的夏季迁徙动物。从九月开始，天空又变得生机勃勃，北半球的鸟类向南迁徙，以迎接更暖和的冬天。

如果你有幸目睹过一次迁徙，它会让你心跳加快。几年前一个凉爽的十一月夜晚我就遇到过。我和玛丽及她的母亲在暮色中朝海边走去，去一个海滨处纪念玛丽外祖母的地方。我们陷入沉思，默默无语。然后，我们听到了一种独特轻柔的雁鸣声，嘎嘎，雁逼近的嘎嘎声。突然间，空旷、泛红的天空一片漆黑。一支黑雁的空降部队从西伯利亚飞过来。这是 3500 英里长途旅行的最后一站。这些了不起的生物一波又一波地从我们头顶的空中掠过。它们不断飞来。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们的脖子抽筋了。当欣赏这大自然的奇迹时，我们嘴巴有三十秒合不拢。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然后，当最后一个 V 形波浪升空时，我的岳母转向玛丽说：“四十年前，离这个地方很近，你死去的父亲向我求婚。那天晚上，黑雁也是这样飞过。”我们都觉得心里暖暖的。

在妈妈生病期间，散步变得不可或缺，它能缓解压力，以及让我悸动的心平静下来。不仅仅是风景带给我安慰，气味也一样：气味激发了我的感官，像箭一样带我离开充满痛苦的当下，进入更快乐、没有压力的时刻。我知道这已经成为了一种陈词滥调，约翰·济慈（John Keats）将秋天描述为“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时节。

这些秋日的散步复活了我平静的童年记忆。远征队在灌木丛中寻觅黑莓和榛子。事实上，这是妈妈病得走不动之前，我和她做的最后一次户外活动。我们和玛丽带着狗一起到小时候去过的农场周围的老地方四处转悠，为周日的黑莓和苹果酥皮水果甜点寻找黑莓。腐烂的树叶散发出浓郁的胡椒味，这让我想起了慵懒的星期天烟熏和烤牛肉的味道，闻起来有一股父亲在弗格森拖车上穿的沾满油污的破旧夹克的气味。这辆破旧不堪的拖车上装满了苹果（还有凯蒂和理查德）在路上颠簸前行。

它唤醒了我的记忆：在一位朋友的花园里找到七叶树，或是当我和妈妈从学校回来时夜幕降临，从我们家窗户里发出的温暖光亮。这是我曾经熟悉的生活，每天都那么忙碌。这个季节还有那些鸟儿不断提醒我，我也许有一天还会有这样的生活。但我必须调到正确的频道把它找出来。

随着阴影变长，空气变得凉爽，大自然都沐浴在一种棕褐色的微光中。鹪鹩和叽喳柳莺在晚秋的旋律中胜出，燕子和西方毛脚燕聚成一大群在空中跳舞，从电报线上俯冲下来，准备迎接它们再次南下的长途旅行。我想，这就是我想象中一年某个时间段天堂的样子。如果不是，那我可不想去天堂。

我开始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沿着布满树叶的小路蜿蜒而行，田野里结满了果实，矮树篱里充满了生机。我发现这样做可以没有任何内疚感。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周围四季的变化和鸟儿上。周末，玛丽会加入进来，和我一起走进大自然的友好与和谐，并沉浸其中。

欧乌鸫会对我们的接近发出愤怒的叫声，然后带着勃然大怒消失。成群的北长尾山雀会与玛丽和我并排沿着矮树篱顶向前行进。一只不起眼的小戴菊（最小的一种鸣禽）尾随其后。多疑的欧亚鸽会从邻近的树枝上疑惑地盯着我们。就像读一首感动心灵的诗。它们停顿了一下，让我在更深层次上进行评估。或如约翰·济慈曾说过的那样：

在园中

红胸的知更鸟就群起呼哨；
丛飞的燕子在天空呢喃不歇。

我那时便意识到，这是宇宙的声音。它是免费的。它就在我家门口。从那之后，无论我的生活压力有多大，哪怕像这个季节一样，我即将进入我生命中一个更黑更冷的时期，但那个搬钢琴的胖哥却再也没有压在我身上。



查理·科贝特

自由撰稿人、记者和演说家。他出身于畜牧耕种的家庭，童年在北威塞克斯山和马尔岛的农场中度过。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历史专业后，他离开了自家的农业基地，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他在全世界各个城市从事商业金融报道，但他在心底仍是个乡村男孩。现在，他与妻子、两个儿子，还有一只云雀，一起居住在威尔特郡的普西丘陵地区低处。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乡愁》(1983)剧照

非虚构 知识分子应该承担以及 如何承担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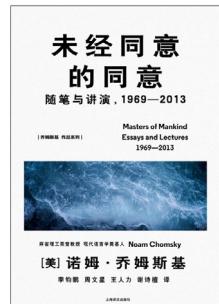
诺姆·乔姆斯基 | 新书试读

知识分子的基本关切，

必须是“道破真相，戳穿谎言”。

《未经同意的同意》是诺姆·乔姆斯基从1963年到2013年所发表的部分文章和讲演稿的合集。在本书中，乔姆斯基秉承他一贯以来的辛辣风格，挑战权威，质问并探讨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实践责任的方法。在这些文章中，乔姆斯基审视了国家权力的本质、冷战背后的意识形态争论、战争与恐怖主义等论题，并重新强调了长久以来经常被忽略和歪曲的道德和争议因素。乔姆斯基对盛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论点进行了批判，并打破了那些保护少数人的权力和特权而忽略多数人利益和影响的神话。同时，他还对“人类智慧与环境”“知识分子与福利—战争国家”以及“现存资本主义下的文明现状”等带有现实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我们节选了第一篇《知识与权力：知识分子与福利—战争国家》分享给读者。



“战争是国家的良药，”伦道夫·伯恩在一篇写于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经典文章中写道：

它自动地在全社会调动那些不可抗拒的力量，要求统一，促使与政府的密切合作，迫使那些缺乏更广泛群体意识的少数群体与个人服从。……艺术创作、知识、理性、美、生活的改善等其他价值观都立即、几乎一致地遭到舍弃，而那些以国家的业余代理人自居的显赫阶级不仅为自己牺牲这些价值观，而且强迫所有其他人也做出牺牲。

为社会中“显赫阶级”服务的是知识阶层，他们在“务实的制度中得到训练，为执行命令做了充分的准备，却对结果的智力解读或理念关注毫无准备”。他们“忠心耿耿效劳于战争技术。战争和这些人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特殊的亲和力。好似战争和他们互相期待已久”。

伯恩强调国家动员的意识形态后果，即“不可抗拒的一致力量”，促使人们服从国家，屈从于“显赫阶级”的需要。战争动员还可以带来物质利益，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终结了大萧条，并确保经济的“健康运转”广泛服务于破坏和浪费的社会目标。之后的事件证实了伯恩的预言：战争动员将使知识阶层通过“效力于战争技术”获得权力和影响。他的这番话可以与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六年间任国务院和白宫东亚问题专家的詹姆斯·汤姆森的言论相比较：

对越南越来越多的投入还受到提出反游击战理论并急于见到这些理论接受检验的新一代军事战略家和社会科学家（其中一些人加入了新政府）的推波助澜。对一些人而言，“平定叛乱”似乎是一种应对世界不稳定的万能新药。……我们的越南政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构成了潜在的危险：出现了新一代将越南视为其学说终极检验的美国空谈家。

对于这一观察，我们可以结合另一个关于近年来广泛讨论的类似现象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已经从它与土地的古老联系转变为与资本的联系，在近期又转变为构成技术专家体制的知识和技能的综合体……（也就是说，这种体制）欢迎所有为（政府与企业中的）集体决策带来专业知识、才能或经验的人（群体）。”

在“服务于战争技术”（或太空竞赛这类替代物）并且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经济部门的决策过程中（政府保障这些部门的安全和增长），技术知识阶层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从而，不足为奇的是，技术知识阶层通常致力于巴林顿·摩尔所说的为“装点门面的国内改革和国外的反革命帝国主义”提供“主动出击的解决方案”。在另一处，摩尔对“美国国内外的主流声音”——一种表达美国社会中经济精英阶层需求的意识形态，它由许多美国知识分子以不同但差别不大的方式提出，并且得到“在富裕社会中占有一定比重”的多数人的大力拥护——做出如下总结：

你可以尽情用语言抗议。我们乐于鼓励的自由只有一个前提条件：只要你的抗议不起作用，你就可以放声抗议。虽然我们对你的苦难深感遗憾并乐于做些什么——事实上，我们已经认真研究，并就这些问题与你的统治者和直接上司谈过——但你以武力赶走压迫者的任何企图都是对文明社会和民主进程的威胁。我们不能也不该容忍这种威胁。如果你诉诸武力，我们将在必要时做出慎重回应，如从天而降的火焰一般将你从地球上连根拔除。

一个以这种声音占主导的社会，只能通过某种全民动员来维系，这种动员的范围至少可以涵盖从投入大量资源的承诺到确实有效的武力和暴力威胁。鉴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这种承诺在美国只能通过发出某种特定声音的国家精神错乱来维持，例如现任国防部长认为，我们“陷入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加入了战场上的殊死搏斗，每个斗士都在设法取得优势”——一场敌人有多种伪装的战争：克里姆林宫官员、亚洲农民、拉丁美洲的学生，不消说还有国内的“城市游击队”。还有一些清醒得多的声音，表达的是并非截然不同的认识。或许这种主流声音所宣告的国家行动能取得成功。摩尔给出了富有见地的判断，认为这种体系“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操作空间，包括战略撤退”。无论是什么情况，这都大差不离。要想成功，必须付出道德败坏的代价，这会使跻身富裕社会中的人生活失去意义，就像生活对于危地马拉的农民来说毫无希望一样。也许“战争是国家的良药”——但只有将凝固汽油弹、导弹和防暴装置、

监狱和拘留营、人类登月等费用纳入提升的国民生产总值时，一个经济体才算“健康”。

即便是这种意义上的“良药”，现代国家的良药也不是战争，而是永久的备战。全面战争意味着失败。连“有限战争”也可能是有害的，不仅对于经济而言，就像股市和航空航天界高管的抱怨所表示的那样，而且对诉诸武力的长期承诺也不是好事。可能和平运动在限制进攻越南方面的胜利并不来自它当时的力量，而是来自摩尔的正确判断，即“主流声音”可能遭到彻头彻尾的挑战的危险。当不同意见关注的仍是发生在越南的具体暴行之时，最好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对于一场如果放任自流可能会对美国社会及其国际角色提出严重质疑的运动，最好将它转移方向。所以我们现在听到轰炸北越（这引起了道德上的愤慨，从而威胁到国家 [body politic] 的稳定）和征兵攻打殖民地的错误；我们还听到以“市场价格”组建志愿军的提议，为的是当越南战争在其他地方重演时，不再有那么多抵制活动。

我想把伯恩的两个观点再说明一下：备战在保障国家健康方面的作用，以及这种情况为“新一代美国空谈家”所提供的机会——并补充一些历史视角和评论，说明知识分子可能希望采取什么行动来对抗这些趋势。

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与效劳权力之间左右为难。他乐见自己成为一个辨别真理、直言不讳并以行动——有条件时集体协作，必要时单独行动——反抗不公和压迫的人，一个促成更良善社会秩序的人。如果他选择了这条道路，他很可能成为孤家寡人，遭到无视或憎恨。另一方面，如果他以自己的才干效劳于权力，他就能获得声望和财富。他也许能成功地说服自己——或许有时出于正义——认为自己能让显赫阶级的掌权变得人性化。为了效率和自由的终极利益，在社会管理角色上，他也许会希望与这些阶级合作，甚至取代他们。渴望担当这一角色的知识分子也许会采用革命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社会工程的辞令，以追求知识和技能带来权力的“贤能主义”理想。他也许会自我呈现为带领人民走向新社会的“革命先锋队”的一分子，或者是把“渐进技术”运用于社会管理从而无需巨变即可解决问题的技术专家。对有些人来说，如何选择可能仅仅取决于对不同社会力量的相对实力的评估。从而，角色屡屡转换并不为奇：学生时代的激进分子成了平定叛乱的专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的主张必须接受质疑：他主张“贤能精英”这种为自身服务的意识形态；用马克思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用于资产阶级）说，贤能精英将“其解放的特殊条件（界定为）拯救现代社会的一般条件”。如果给不出合理的辩护，我们只能相信这些质疑。

很久以前，克鲁泡特金观察到：“现代激进分子是集权者、国家主义者和本质上的雅各宾派，社会主义者是他的效仿者。”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正确的，因为他呼应了巴枯宁的警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可能被扭曲为“一个由真正的或假装的专家所组成的少数新贵族对劳动群众的专制统治”。西方批评家族即指出，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是如何承担起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所概述的角色的——正如罗莎·卢森堡在半个世纪前被德国社会主义政府的军队杀害前几个月所意识到的那样。罗莎·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既体恤又友好，但同时鞭辟入里，对今天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饱含深意。

除非全体人民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决定，除非新社会是由他们的创造性经验和自发行动发展起来的，否则它将仅仅是一种新的镇压形式。“十几个知识分子将在几张办公桌后面颁布社会主义”，而实际上它“要求在被几个世纪的资产阶级统治所削弱的群众中进行彻底的精神改造”，这种改造只能在扩大资产阶级社会自由的机构中进行。社会主义没有明确的处方：“只有经验才能纠正和开辟新的道路。只有畅通无阻、充满活力的生活才能融入到千变万化的新形式和即兴创作中，才能激发出创造力，它本身纠正了所有错误的尝试”。

因此，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的作用，必须是评估和评价、劝说和组织，而不是夺取权力和统治。“从历史上看，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所犯的错误，比最聪明的中央委员会的绝对正确要多得多。”

激进思想家们一直理所当然（而且也理应如此）地认为，威胁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利益的有效政治行动，将导致“对抗”和镇压。相应地，左翼寻求构建“对抗”是知识分子破产的标志；这清楚地表明，组织重大社会行动的努力已经失败。对明显的暴行表现出的不耐烦和恐惧，可能促使人们寻求与权威的直接对抗。下列两种方式之一可能极具价值：对执行特定政策的人的利益构成威胁；或者使别人意识到一个太容易忘记的现实。但寻求对抗也可以是一种自我放纵，可能会使一场社会变革运动流产，并将迫使其变得无关紧要甚至成为灾难。从有效的政策中产生的对抗可能

是不可避免的，但认真对待自己言辞的人将设法推迟对抗，直到他希望取得成功，无论是在上文提及的狭义层面上，还是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即通过这种成功实现制度的实质性变化。尤其令人反感的是设计对抗的想法，以便操纵不知情的参与者接受一种观点，而这种观点不是从有意义的经验和真正的理解中总结的。这不仅证明了政治上的无关性，而且正是因为它具有操纵性和强制性而成为一种适当的策略，该策略只适用于一个旨在维持精英主义和威权主义组织形式的运动。

相反的危险是“吸纳”，这也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即使是最激进的计划也无法逃脱这种危险。想一想工人委员会这个主意吧！生产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不是尝试采取一种全新的管理形式，而是管理福利计划，或者甚至改进工厂纪律。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种可能性被那些关注更有效的“工业管理”的人视为理事会组织的潜在优势。因此，在介绍斯特姆塔尔的研究时，在工业仲裁领域赢得相当声誉的哈佛经济学家约翰·托·邓洛普写道：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人们都对工厂，对工人及其上级、劳工代表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地的政府、管理者和劳工组织都关心如何提高付出和绩效；他们正在探索培训和监督劳动力的新方法，并寻求新的程序来加强纪律、解决投诉或驱散抗议。工人委员会的各种经验，提供了那些塑造或修改劳资关系和经济制度的人普遍感兴趣的记录。

更确切地说，对工人委员会的描述符合对现有制度进行彻底重建的任何其他尝试。事实上，有些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其主要目的是使无产阶级社会化，并使之更有效地融入工业社会。那些仅仅以“吸纳”的较小可能性（即使很可能）为由而反对计划的人，仅仅表明他们反对一切可以想象的东西。

大学前所未有的成为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阶层的聚集地，不仅吸引了科学家和学者，甚至还吸引了作家、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人们可以争论其产生的原因及后果，但事实相当清楚。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合会发表的《休伦港声明》表达了一种希望，即大学能够成为“社会变革运动的潜在基地和机构”；允许“政治生活成为学术生活的附属品，且行动由理性支配”，有助于产生一个真正的新左派，这个左派将是“一个拥有真正的知识技能、致力于将审慎、诚实和反思作为职业工具的左派”。许多新左派人士现在认为，这些思想是他们“自由主义过往”的一部分，鉴于已经实现的新意识，这些思想将被抛弃。我不同意这个判断。左派迫切需要了解当今社会，其长期趋势、社会组织的其他可能形式，以及对社会变革如何发生的合理分析。客观的学术研究有助于这种理解。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大学不允许进行范围广泛、诚实的社会研究，正如我们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认真地、思想开明和独立地从事学术研究将得出激进的结论。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几乎没有尝试过。到目前为止，主要的障碍是学生不愿意从事所需的严肃工作，且教员们普遍担心他们的行业协会结构可能遭受威胁。假装问题的根源——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受托人和管理人不愿意容忍这种尝试，这也许很方便，却是错误的。可以找到镇压的案例，它们令人愤慨，但不构成问题的核心。我认为这场运动已经被某些关于这个真相的幻想所笼罩。

例如，考虑一下一位消息灵通的活动家的论点，即大学鼓动的目标应该是进行“反帝斗争，而大学行政部门是一个明显的敌人”。这太容易了。事实上，不管组织结构图看起来如何，大学——至少“精英”大学——是权力相对分散的机构，其中大多关于教学和研究的最重要决定由教员作出，通常是在系一级。只有当行政命令（或受托人干预）阻止大学内部严肃而坚定地尝试创建替代方案时，这种判断才是合适的。就目前而言，这种情况是例外。如前所述，最大的问题是未能认真地进行这一尝试。当作出这样的尝试时，发现它被阻止了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尽管我倾向于推测，教员将被证明是比受托人和管理层更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有原则的和有意义的行动也可能导致对抗。人们既不应寻求，也不应在适当的时候避免这种对抗。

仅举一个例子，如果尝试组织科学家们寻找颠覆其学科的有意义替代方案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么就完全可以假设这一行动将成为一个“非法阴谋”，正是因为它以前文提到的方式威胁到“国家的健康”。到那时，这样一场运动的组织者将意识到他们必须展开抵抗。如果事实上他们的政治威胁到根深蒂固的社会力量以至于导致镇压，他们将不得不设计各种形式的行动来防止这种镇压。

知识分子参加真正的社会变革运动的机会各式各样，但我认为某些一般原则是明

确的。他们必须愿意面对事实，避免轻易幻想。他们必须愿意从事艰苦而严肃的智力工作，这是为理解作出真正贡献所必需的。他们必须避免加入压迫性精英的诱惑，并且必须帮助创造大众政治，抵制——并最终控制和取代——根深蒂固但并非不可避免的集权和独裁的强烈倾向。他们必须准备面对镇压，并采取行动捍卫他们所信奉的价值观。在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中，民众积极参与控制主要机构和重建社会生活的可能性是多方面的。与企业精英结盟或从属于企业精英的技术官僚精英统治似乎并非不可避免，尽管并非不可能。因此，很难理解人们无法作出超出最低信任度的预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创造未来，而不仅仅是观察事件的发展。考虑到这些利害关系，错过未经发掘的真正机会将形同犯罪。



诺姆·乔姆斯基

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政治评论家，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教授，被称为现代语言学奠基人。

乔姆斯基被《纽约时报》称为“可能是目前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从 1967 年开始，他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时局和美国政策的文章和书籍，议题涉及全球政治、恐怖主义、气候问题和核扩散等。乔姆斯基一直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坚持批判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的“阴谋”和西方民主的伪善，代表作包括《霸权还是生存》《世界秩序的秘密》《是谁在统治我们这个世界？》《美国梦的安魂曲》《人类的主人》等。杰出政治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认为，乔姆斯基是“不公正势力与谬见的最重要的挑战者之一”。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Declan Sun on Unsplash

专栏

074 大智 一个云南旅游区店主 经历的这两三年

杨樱 | 接力访问

和所有一样，他正在经历着前序各种大事的后遗症，

但他有自己的定力。

聊完之后半个月的样子，大智发来一张微信群聊截图。当地一位老人走失，大智所在的蓝天救援队组了个工作群。聊天里队长说，人还没找到。估计已经忙活了一阵子。队长又说，这家人估计没说实话，恐怕人已经没了。

大智发完图片，说，总是面对死亡，我今晚回家也把遗嘱写下。

上一次他面对死亡无能为力，是聊天前不久，他在路上经过车祸现场，想着自己有急救知识就第一时间冲过去，看到人已经被抬出来了，口鼻和耳朵都在出血，外伤倒是不明显。伤者是一名中年男性，因为违规超车导致事故，车里只有他一个人。“当时就麻爪了，给我们队医打电话，问我应该做什么。他说这种情况下咱们什么也做不了，没有设备和药品，无能为力。颅内出血，基本上是救不过来的。”他按照队医说的，拿一些衣服垫在事故人头下，“让他走得舒服一点”。

“现场我没啥感触，等到车开出来一段时间之后，我就绷不住了，把车停到一边，眼泪就流下来。你看着一个人没的，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很强。后来我联系了心理疏导，因为自己那个劲过不去：我为什么救不了他，为什么不多学一点？”

这是大智第一次直面死亡的发生。之前的救援里，最常见的是外伤、走失和溺水。打捞溺水者肯定知道那已经不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不像眼前的，以为自己还能用急救知识去挽救一个人。

到了老人走失的时候，我没问他具体的感受，他只是说压抑。估计这一次感受到了更复杂的人际关系下生命逝去带来的冲击。

大智是 1985 年出生的河北保定人。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是一个在云南古镇里开店的店主，也是当地蓝天救援队的成员。我们的聊天基本上就围绕这两个身份展开——[提名他接力的人是似玉](#)，“他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存和对社会的关心想得很清楚的人”——为什么会在云南做起了生意，为什么会加入一个公益救援队，是哪些事情和机缘把他的生活安置在了如今的状态：一个平常人的状态，但是和所有人一样，正在经历着前序各种大事的后遗症。

大智说，他加入救援队是因为需要一个身份。“你救援的时候会有一个身份，而不是个人，个人你可能会承担一些责任。所以我不是因为参加救援队而去救人，而是因为想救人去参加的救援队。”

蓝天救援队是公开招募，无论参与任务与否，费用由成员均摊。参与者的社会身份各种各样：医生、公职人员、企业员工、小商铺店主……大多数都有可支配的时间，也有点钱。除了出任务的费用，还有每月的月捐，用来支付固定成本。

大智是来大理之后参加的蓝天救援队。他之前下水救过人，在秦皇岛工作的时候当过红十字会志愿者。“秦皇岛红十字会就一个人，没有培训。”后来大智参加河北省红十字会志愿者聚餐，还代表秦皇岛上去说话——因为除了他没有别人了。大智最终离开了红十字会，因为想学的东西和想做的事情都得不到满足。那是 2010 年前后的事情。

大智的大部分生活都在秦皇岛。他在那里工作、成家、有了孩子。如果没有疫情，他生活过得不错，基本生活欲望都可以满足，也没有把自己压迫得很累。这是大智的人生哲学，他只做自己认定的有价值的事情，其他的无论别人如何劝说，或者无论身边做的人有多少，他都不为所动。“我想要做的事情必须去做，别人影响不了。我认为不行就是不行，再好也不行。挣多少钱跟我没关系，挣着钱的我也不眼红，你做得好，我给你鼓掌。”

大智出身农村，在秦皇岛读书，第一份工作是做字画装裱和鉴定的学徒，干这份工作前，身上一共有 120 元。他蹭住在已经租好房的同学那里，打地铺，一个月给他们 50 元。

字画装裱的客人里有一个觉得大智不错，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公司，所以大智就进入了房地产行业。当年的秦皇岛房子还不错，但不错的时间没有持续很久。秦皇岛是移民城市，作为“出关第一站”，是一部分东北人的购房目的地，这是“不错”最主要的原因。就本地经济而言，“港务局也不行了，玻璃厂也不行了，首钢也迁走了，就当地老百姓手里边没什么钱”。

大智在这家房地产公司里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采购、装修、拆迁、销售。第一份活是盯装修现场，他遇到了之前没遇到的问题：有人塞钱要不要拿着。他知道身边拿的人不少，“房地产公司就是这样，比如正常采购 8 毫米的瓷砖，你收了回扣，最后用 5 毫米的瓷砖。它贴到墙上、地上你是看不出来的。”回扣大智没拿过（他收过一个 200 元的红包），但他也没去告发别人。“大家都不傻，你做你的事，我不坏你的利益。但是跟你穿一条裤子，那没必要。”大智想另一个原因，他觉得自己农村出来，有点怕拿回扣失去工作，或者惹上麻烦。“都有贪欲，但是权衡一下，万一出事儿，所有的都没有了。”

不过他的权衡结果同事们都不喜欢，他们觉得大智是异类，又是老板亲自招来的，排挤很自然地就发生了。大智后来离职，和老板说了这个处境，老板也很无奈。他不能因为留住大智失去更多干活的人。其实那会儿大智做得不错，最好的一天卖了 12 套房，他后来总结销售经验，是他不会硬劝别人买，总是把话说到那儿了，就让别人自己考虑去了。

第三份工作跳到了互联网，做团购。大智觉得这都没啥差别，都是卖东西，只不过卖的方式和平台不一样。他应聘了糯米网秦皇岛站负责人。名号听着挺大，其实整个站连他一共五个人。当时团购正起步，各自抢资源，大智和同事们要做的就是地推，和商家签约，给商品拍照上传。不过这份工作也没做很久，一年之后，秦皇岛的资源大致成型，公司就辞退了大智他们，换上了薪水更低的本地人。大智想过维权，但是他也不懂劳动法，就作罢了。

第四份工作一直干到疫情时期，是做户外广告的销售。这份工作他做了将近 9 年，一度相当不错。因为之前有地产公司的资源，他第二天就开张做了大单。和传统媒体广告不同，户外广告总有一些“刚需”客户，“比如快消类的，它总会投放，得让老百姓知道他们上新了，知道他们还活着。”

但是疫情改变了一切。疫情让人从街道上消失了，从楼宇里消失了。“我们这个行业基本上这两年是废掉的。2020 年就没人投放，因为秦皇岛所有景区都是关闭状态。酒水类不投，地产类不投。没人坐车没人看广告，就都不投了。”“后来我们是把之前赚的钱都补贴到租金里去了。因为（户外广告）位置我们是租下来的。”

到公司倒闭的时候，大智去过最南方的城市是泸州。因为那里有泸州老窖，酒类投放

客户。他一直挺喜欢爬爬山之类的活动，在秦皇岛的时候没事就带着女儿去爬山。公司不行了之后，他出门散心，先在大理待了两天，本来计划去香格里拉之后就回秦皇岛，结果一个在云南沙溪开店的朋友请他去玩，还给他定了两天民宿。

“住两天之后，我说你再给我续两天，后来又续两天。一开始我用的是北方时差，就是7点多起床，出来一转，大街上没人，早餐都没有。后来我学会了，10点起床，晒个太阳，喝个茶，各种店铺转一转聊个天，吃个早午饭。一天吃两顿。很舒服。”

续到10天的时候，他索性住了一个月，然后回秦皇岛，处理了家里和工作的事情，就搬来了沙溪。

沙溪是一个小地方，“你们大城市里的大型小区，可能就这么大。”沙溪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商业比较发达的站点，大家在这里交换商品，行路歇脚。直到今年它才有开车进入的公路。当地人以农作物为生，玉米和烟叶，或者外出务工。

大智那会儿没有什么一定要办的事情，下一步怎么走也没有太具体的计划。他手上还有一点钱，但工作这么多年，也只有这点钱了。

他决定和朋友合伙开店。先开始定在凤凰，还有人想投资，但是疫情解封前后，房租从可投变成了疯长，再犹豫就到了不理性的程度，大智就放弃了。他倒不是怕失败，而是觉得得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后来就在沙溪开了一个饰品店，做蜜蜡翡翠之类，有一些自己的设计，生意还可以。

到了2023年，他兑出了那间店铺，换成了4家店，除了一直在做的饰品之外，还有一家贝果专卖店、一家民族服饰店和一家竹编手工艺品店。

就在这个过程里，他看到了沙溪疯长的商铺租金，以及并没有那么乐观的消费状态。

我们看上一个铺面，最初跟我们要3万，都交了定金了，有人出4万。我说4万我也能认，然后人家又退了，最后（成交价）是9万。超4万我肯定不做，沙溪是一个很小众的地方，今年只是借了电视剧火了一下，还有疫情放开，人多了，但是真正的高品质游客还是那些人。它没有玩的地方，没有酒吧，没有KTV，没有商场，都是一些手工匠人在那，就很安静。

来的游客，观望的很多，真正消费的人很少了。2022年我们开店的时候，北上广深的顾客消费能力确实高，就80%的成交率。今年的话，能在20%、30%就算高的了。我原味贝果10块钱一个，还有人砍价，整体看下来大家都没钱了，也可能是有钱不想花。客栈老板也是这样，今年满房率很低，去年还在疫情，基本上都是满房。而且吃住是必须的，其他消费可以斟酌一下。

其实，我跟武汉人和四川人的消费观念应该是相似的，我就认为这钱赶紧花出去，万一哪天啥事啥的把自己弄里边了，这钱还没花出去。四川这边很多顾客他们消费能力可以，不是那种很有钱的可以，而是我口袋里边有100块钱，可能出来之后我会花掉50或者80。因为四川遇到过地震。他们消费观念就变了很多，武汉那边也是，因为这疫情。我们很多顾客，有武汉的，就说我们现在消费观念也变了，万一哪天再出点啥事。

而且，就咱们这岁数你花完之后你还能挣。虽然压力比较大，但是创造力或者说对社会的贡献也应该是最强的。

大智说，他不是一个会“卷”自己的人。“大家晚上喝酒应酬，你也跟着应酬，就没有自己的路了，你活给别人了，没有活给自己。”沙溪这个地方挺好，他的员工第二天说第二天有事不来，哪怕不给假也不来。大智有点无奈，但是也没认为这是多大的缺点。

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教育部把急救知识纳入小学日常课程，从小培养救护的常识。他觉得这个十分重要。

敬。

Q: 你想找谁来接力？

A: 徐峰，自驾环游中国，见过很多不一样的生活，遇到了很多有故事的人。

Q: 最近遇到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

A: 我去南极洛之前，许愿看到云海和彩虹，都碰上了。彩虹还有三道。南极洛是一个野山，没开发过，还有原本的味道。

Q: 你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

A: 感情问题。我离婚之后有一个女朋友，我可能高估了自己，就想改变这个人，但到最后是失败的。她是一个边缘性格，做事很极端，我就想灌输我的想法，但都是徒劳。所以有时候就想着，很多事不是我能掌控的，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

Q: 你要解决的感情问题是再找一个女朋友还是不如改变自己？

A: 还是改变自己。我现在很自由。在南极洛看到瀑布的时候，我就往那一坐，下着雨，我坐了一个多小时，正常人就是拍个照就走了，我就在那看着。尤其登山，你到那地方你就感觉自己很渺小，这大山经历了上亿年才形成这个背景，拍个照就走是对自然的不



题图来自 [Nicholas Swanson](#) on Unsplash

#200417

我和顺顺大部分时间都在谈她如何和自己、和周围的事物相处。话题中心是[邀请她接力的 Zebra](#)说的，“顺顺心里有一朵小火苗”。我们从她为什么要从河北搬到成都说起，一直聊到她现在做事的方式。和很多人一样，顺顺希望自己没有浪费自己拥有过的时间，为此她渴望价值感。价值感和方向有关，为了寻找她想要的东西，她更换环境，尝试从未尝试的事情，也在不断检视自己的内心。

和 Zebra 一样，顺顺也是环境教育 NGO 的从业者，但她加入 NGO 的契机是做公众号。顺顺很早就开始自己练习排版、写作和编辑公众号，一开始是出于所在公司的电商内容运营需求，后来发展为一个固定技能，可以用来谋生。这项技能改变了她工作的方式，但是也改变了她和周遭事物的关系。作为一个对自己状态敏感的人，她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挺喜欢听顺顺分析自己的状态。这是一种能力。她说话并不大而化之，也不会过分自我，甚至有时候对自己还有点苛刻。有一些行之经年的感受，会被她翻出来反刍，用来总结为何现在的自己和当初有所不同，是否对当下要做的事情有所助益。

另一方面，顺顺反复提到成都。这个城市帮助她探索了自我，并以一种更泼辣、更直接的方式展示了人与人的连接。顺顺回忆了她在成都如何获得公共生活上的启示，又如何将之转化成自己的行动力。

顺顺的口述整理如下，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公共性是如何被触发的。

专栏

075 顺顺 2008 年到成都之后， 这个城市改变了我

杨樱 | 接力访问

其实从头到尾我对工作的需求

都是想确认我的价值。

聊完天之后过了一会儿，顺顺发来了几页她的日记。日记从电脑文档里打印出来的，很整洁地装订在一本墨绿色的线圈本上。其中有几句话是这样的：

自问，

以后该以怎样的角色面对这个世界呢。

我想要成为人们的通道、出口和镜子。

我要试一试。

#191129

有的时候真的很觉得孤独，真的很害怕，家人不够爱我，我跟这个世界的连接还是太少了。养一盆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连接。一方面我渴望连接，一方面我又很害怕，害怕我没有很好地去处理各种关系。我害怕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也害怕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我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良性的支持系统。我想要去实现它，在我自己身上，在别人身上。记得自己的初心，去支持别人，去成就自己。

#200824

我不（完全）是我自己，
就像是装在容器里的水，
不知道自己是可以流淌的。

我是河北人，2007 年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在保定，那个时候我跟我身边的人都不一样，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然后就聊结婚生孩子买房子什么的事儿，我就不感兴趣。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我工资才 800 块钱，然后我就买那种我看不懂的杂志，还用电驴什么的下独立音乐，听都听不懂，然后在豆瓣上看书评影评。

对当时的我来说，保定是没有夜生活的，公交车 7 点就没了，我感觉自己很怪，也没人聊天。当时我工作的那个地方有个经理，50 多岁了，现在说起来叫做“性骚扰”，他可能性骚扰了我，我都不知道那算什么，就觉得我要赶紧辞职了，不能再在这个地方待了，好可怕。

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处在“说不出来”和“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的状态里，（遇到问题）我不能识别它、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框架里去表达，在后面慢慢地，我才学习和练习出来。

当时有个网恋在成都。但是我心里清楚，虽然那个关系对我来说很重要，其实我当时离开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保定生活下去。

我刚来成都的时候觉得成都特别好，河北降水是非常少的，如果小时候下一场大雨，涨水了，大家都会当成观景一样去看。来成都之后，我就被成都的河给惊到了。我站在府南河边，觉得天哪，河好好，河流是城市的血液一样，是灵魂一样的东西。其实当时从饮食上来说，我是完全吃不下成都的食物的，太辣了，又油又辣。

从小我被教育成了一个非常乖、非常听话、非常懂事的女生，大脑空空，什么都没有，然后也没有人去跟我讲一些人情世故，或者是说我需要怎么样去面对社会上的一些问题的，什么都没有。

成都是一个很直接的城市，和河北相比。公交车上有两个人吵架，有一个人要下不下，跟另一个吵架。我就想让车快点开，有点烦躁，但是车上的乘客全部加入了吵架，然后过路人也过来围观帮腔，觉得好奇怪。现在我觉得不爽的事情我也会说出来。我妈来看我，觉得很担心，说一个女孩这样在外面会不会吃亏。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我得把我的态度表达出来。是成都让我有了这种感觉。

成都对我来说就像是第二故乡一样，它影响了我的三观。2008 年的时候，我不太了解成都有什么玩的，那个时候小酒馆就很有名了，看了很多本地乐队的演出，还有李志当时在小酒馆的现场。

到了 2009 还是 2010 年的时候，成都出现了一个无主题青年空间，在高升桥那边，叫做“树舍”。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所谓的公共空间。我的性格很内向，有的时候会害怕陌生的场域，但是树舍是让我觉得很舒服的地方。那个时候活动也非常简单，要么就是读书会，要么就是观影会、桌游，大家出去玩也很简单，后来才越来越丰富。树舍的主人没有定义这是一个做什么的空间，他只是建了很多群，跟大家说谁想来分享，他都欢迎，来了之后就是一人一杯茶水钱，对于大家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相当于免费的。

我也在那边做过活动，我也参加过非常多的活动，后面我敢跟陌生人讲话，也是在树

舍实现的转变。我在树舍当导赏员。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好奇树舍到底是什么？它当时在豆瓣上会发那种同城活动，很多人很好奇，会过来拜访。导赏员负责接待，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讲，大一点的房间干嘛，小一点的房间干嘛，我们现在有什么活动。我发现我在那是可以说话的，很安全，很自在。

有一天我骑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感觉我没有“恐惧陌生人和场域”这个障碍了，好像心里面一下子把这个东西给卸掉了。很搞笑，我跑去跟朋友说，我现在能跟陌生人讲话了，然后为了证明，吃饭之后我去要了发票，以前我是不敢跟店员说话的。

树舍在一个住家型的房子里，一楼，那个是成都比较早的商品房小区，楼层不高，楼间距也很大，不像现在的房子密密麻麻的。它的创办者叫大树，是一个北京人，但我不太清楚他那个时候为什么在成都，为什么做这个事儿。

有四五年时间我都在那里。我到成都之后在一家私人的纯净水公司做，它自己有一个网站，后来我做公众号。2012年底我开了一家二手店，2014年关掉了。

树舍给我的感受，相当于一个线下三次元的兴趣小组，比如说观影、读书、某些问题的探讨，像这种探讨，其实也就整个树舍的一小撮人会参加。所以树舍并不是要把大家聚到一起来完成什么，而是很开放、很包容。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现在在做协作，我知道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有所知和有所能力的。大家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并不需要一个权威式的人在那里发号施令，而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提出想法并且去行动，所以树舍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支持者，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场地，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感上的支持。

而且你知道成都有很多农家乐是吧？很多人喜欢吃个烧烤，钓个鱼游个玩什么的。玩耍、放松，这种娱乐活动是一直都有的，但是（对我来说），它没有办法满足另外一种需求，就是聊点有内容的东西，不是闲聊的那种聊天。

后来我在环保 NGO 做事情的时候，每周日都要开会，大家的聊天对我来说就很好吃，”我感觉自己没有“吃饱”，我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很有营养的东西，所以我需要用这种方式去补充。

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但有些人没有这个需求，他会跟我说，你的生活可有意思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做点什么，我什么都不喜欢。哈哈。他不“饿”。我可以推荐 ta 来参加活动，或者去干啥，但是他不动。那他可能没有需求和驱动在。我现在知道，人跟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工作已经很累了，你很难要求 ta 在没有电的状态下再去参加活动，再去输入输出。

在这之前，不管是当时的工作，还是之前的工作，还是开店，所有的这些尝试，我其实都有点不太知道我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能做什么，这对我们来说是最要命的一件事。

可能家人对你的期待是毕业了，找一份过得去的工作，嫁人生育。也没人期待我去赚钱。所以我不知道我能在这个世界上能做什么，我以为所有的工作不管在哪都是一样的，无非是在这打工或者在那打工。所以在去环保机构之前，我尝试了一段时间自由职业。我对上班已经很厌恶了，觉得自己也可以赚钱，就学新媒体，那个时候做新媒体的人也少，后来我就自己接单子，不需要去上班了，觉得自己很自由。但是后来就发现，我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呆久了，变得有点没有锚点。每天三四点我就醒了，就开始工作，把要做的事情交付了，然后天亮了之后等对方回复，我再处理一些事情，可能中午我就去睡觉了，等我睡醒了之后，就是傍晚了，我又出去跑步了，我跟这个世界的节奏很不一样，这个时候我突然间就产生了一种怀疑，就觉得，会不会我自己认为的一些事情是错的，我对一些事情的判断就只有我自己的声音，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就是要出去工作，并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是需要把自己又放回到和人在一起的状态里面。我也是因为做公众号加入现在这个机构的。我发现，天啊，工作的形式有那么多种，你既可以不遵循某一种模式去做事儿，还可以和其他的人一起。你可以完全由兴趣的驱动去合作，也可以带着一个预算去工作，我就发现自由度就大了很多。

其实从头到尾我对工作的需求都是想确认我的价值，也希望能给我的小伙伴创造价值，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我做不到，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我应该在哪。

2018 年我加入了一个环保项目，和食物、物品有关。比如怎样吃得更健康，大家探索手作食物，再从中寻找环保相关的东西。社群也很年轻。比如说，我们会举行剩食派对，把家里吃不完的食物想办法让它变得好吃。在放松的聚餐氛围里，我们会聊到食物浪费、食物溯源。

2019 年这个项目结束了。2020 年我开始在项目所在的机构做全职，然后就是三年疫情，觉得至今没有缓过来。一个是觉得生命其实很脆弱，第二个生活突然变化，有很

多对未来的担忧，觉得不安和难受。2020 年的时候，我当时跟同事的伙伴说，我感觉“推”不出去，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产生更大的行动力。

以前我会简单理解成我自己没有领导力，但是我现在就发现说，好像也不完全是领导力。我发现人跟人的关系，不是说我一定要自己变得很强，然后去带领别人，而是大家相互去协调，搭配着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没有谁能够独立地完成事儿的。我还是没能成为一个“领导者”，但我这两年经常会收到一些朋友们的正面反馈，我有支持到他人呢。人原来是需要其他人对 ta 多一点肯定，多一点就是回应，然后他就可以做得更多、走得更远，他根本不需要你去说服他或者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

一团小火苗是说内心某种渴望，也许每个人都带着一些使命，内心中你觉得那个东西对你最重要，你愿意去做的。“小火苗”对我来说，一方面是我的生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对外去推动的价值感。

这几年因为疫情和环保政策的关系，可持续生活这个原本“小众”的话题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人被逼着一下子停下来，然后回到了生活里面，或者是回到了家庭关系里面。这个过程其实重建了我们和家人的关系，还有和居住的小区的关系。

所以我们会把可持续发展和身边的人结合起来，我的家庭，我的朋友，也许有所谓的社群，我生活的小区，同楼栋的邻居们，共同去实现对环境友好、也对人友好的生活方式。疫情的时候我有感受到这部分，邻居关系比以前更近了，会互相关照，比如说要分享一些药品。

我老家在一个小县城，在那里我更容易获得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持，但是我也被消耗，不管乐不乐意。直至疫情，在社区、社群里面，我们看到了新建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支持系统的可能，它可以是一种更尊重彼此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是很有帮助的。我一直希望在我的小区里做一些公共的事，但现在还差了点感觉。

我自己会发起一些环保主题的活动，比如说旧物交换、旧物改造、阳台种植，还有一些手艺方面的，就是要自己学习动手制造。除了做消费者，我们还可以去创造。

我还在学习把这些我会的东西变成有人愿意买单的产品。我也接一些“散活儿”，比如有社区 / 同行机构有需求，会购买某个活动或者服务。我现在没有在执行一个长期的公益项目，但我一直在积累能力，也一直在支持身边的小伙伴。

Q: 最近你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A: 今年植树节我们去山里捡垃圾，捡了很多，然后拿不了的就放进路边垃圾箱。下山的时候被一个清洁工姐姐骂了，因为她的工作只是打扫游人栈道，并不是打扫大山。我们捡了很多不在她工作区域的垃圾，却给她造成了负担，她需要徒步把垃圾运下去。我们捡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当时骂了我们，还骂得挺难听的。

当时另一个小伙伴是发起者，我是协助者，我们现场也没回应，一边挨骂一边走。下山之后我们决定聊一聊这件事，就在旁边的茶馆聊了一两个小时。我们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的，后来就总结了一个规则，就是上山不捡下山捡，山上的垃圾往下带，能自己带走的都自己带走。我后来挺开心的，因为现场没有人吵架，大家接受了批评，复盘改进了，我就觉得很好。我发现更能面对冲突了，有了丢弃勇气去看到和想的不一样的东西。对很多人来说垃圾桶就是垃圾的“归宿”了，但我们忽略了之后发生什么。之后还有很多事，需要真的从行动上“考虑到”。

Q: 你最近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

A: 多喝水。这个月我和朋友有一个好好喝水的活动，每个月我们都有一个不同主题，比如好好写字，好好画画。这个月是喝水。

Q: 你想找谁来接力？

A: 一位参与过我的活动的小伙伴，她在以志愿者身份参与视障人群跑步陪伴的行动。虽然提及残障群体时，我会很容易认同一些“道理”，但真正在陪伴过程中，我才知道每一句道理的落地都是不容易的。她是真诚的行动者。她的视角是很宝贵的。



题图来自 [Hans Isaacson](#) on Unsplash

专栏

076 大鹏 明明什么人都不想搭理， 他却开放了自己的家

杨樱 | 接力访问

他觉得，一个人要有向好之心。

大爱让我去找大鹏接力的时候有过预警：他不是很爱说话。但也有过诱惑：他真是太有意思了！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大爱发来一个 B 站视频，是朋友们给大鹏拍的，大部分场景是他在自己家的活动，比如在门口蹲着喝酒，还有确实谈不上热情的寥寥数语。让视频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活动空间，大家来这里做什么都可以，住也可以，不消费也可以。在我聊天那会儿，这个地方刚刚上了锁，不过对熟人来说也是个形式而已，常来的人都知道怎么开。

把自己家和某种形式的工作室 / 活动空间结合起来没有太新鲜的，对于想做事预算又不高的人来说，这肯定是一个经济之选，而且还带有相当程度的坦诚。不过大鹏并没有什么特定的事情想做，他完全不热衷于表达、追求、完成什么——因此有的朋友会说大鹏超级“佛”——哪怕是开店，也对营业额之类的事情毫无追求。

“闲散”，“避世”或者“躺平”。标签化形容大鹏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一类的说法。这类形容之所以炙手可热，主要还是大家想闲散 / 躺平而不能，被生活紧紧扼住喉咙的人没有资格谈论这些。不过如果仅仅这样标签他，大鹏的做法又很“可疑”：一个人自己闲散就可以了，穷有穷闲散，富有富闲散，为什么非要让各种不可预测的人进入自己的生活，尤其是，他也并不真的想认识他们？

大鹏一口气说完一些话，到他下一轮说的话出现之间，有很大的间隙。一开始我把握不住节奏，会不小心踩住他要说话的话头，赶紧刹车。聊了一会儿懂了，要是语音那边一时悄无声息，等一等话就会跟上来。大鹏可能在喝酒，或者抽烟。他说他在和我聊天之前，先垫了二两伏特加。

大鹏是 1987 年出生的南昌人，大学毕业之后来厦门，那是 2011 年。一开始他在一

家技术公司工作，公司业务是网页外包设计和服务器托管，也卖卖网址什么的。业务做得早，规模迅速做大。大鹏负责管理服务器，他管自己叫“修电脑”的。一年之后，他离开了这家公司，因为觉得老板心猿意马，对公司业务毫无追求。老板爱炒比特币，和公司业务一样，这事做得也早，让老板产生了一种幻觉：作为一个有远见的人，我会发财。后面的故事是老板把公司卖给了另一家更大的竞争对手，一心炒币，然而从未发财。

大鹏辞职后玩了几个月。那时厦门的旅游业还处于原生态阶段，人和商家都有初心，曾厝垵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大鹏住在那里，也认识那些开店的人。晃来晃去，就被一个靠冰激凌赚钱的小酒吧老板找去干活了。曾厝垵很小，来的游客会把此地所有的店都转一遍，所以一定也会买冰激凌。到了差不多 2016 年的时候，生意不行了。和很多景区一样，“主流游客”蜂拥而至，房租上涨，店铺猛增，商品同质化，大鹏工作的店被“埋”了起来。

“然后我们就进入流量时代了你知道吗？就被埋没了。然后我们也什么都没做。扛到扛不下去了，就滚蛋，就是这样。”大鹏三言两语总结了自己的第二份工作，其实他当时已经入伙了那个酒吧，算是老板之一。“我不知道要做什么，能混一天是一天。”

大鹏的话让我有一种线上线下同时开始“流量时代”的感觉，仔细想想也是，手机普及带来了这一切，互联网上的主流内容把主流人群带到了主流景点。“主流”是大鹏的说法，但显然也不是他一个人这么说。他不喜欢后来那些盲目的人群和商店，如此四年之后，疫情出现了。曾厝垵一个人也没有。大鹏说，管控倒也没那么严格，他要翻墙出去转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整个景区没有一个游客。

关店之后大鹏去了大社，集美下面一个村子。这里是陈嘉庚的祖宅所在地，不过若是作为一个景点，似乎“卖点”又不够多。道路狭窄，连村民都把车停在村子外面的大路上。开发商来了又走，来这里的多是散客。好处是租金便宜，所以大鹏搬到了这里。

大鹏没有再开店——这个说法不太准确，但可以稍后修正——而是在附近餐馆做服务生。他住在一个 20 平方米不到的房间里的阁楼上，阁楼刚好摆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阁楼正下方是厕所。那进门那间房间，也就是客厅，被大鹏用作了开放空间。他的私人物品很少，如果有的话，大多数也拿出来公用。有的时候来的人会帮忙洗碗，大多数时候大鹏洗。他半个月拖一次地。

关于这么一个地方的出现，我们的对话如下：

“你到底为什么要把家开放出来，让不认识的人进来？”

“我看起来非常开放，其实非常不开放。如果朋友来，或者新人来，我是不会跟他们产生交流的。我只是让别人观察我而已，我并不会想要去认识他们、服务他们，但我不介意被打扰，我也没什么隐私，我不介意别人知道我任何事情，但不代表我要主动去告诉你，也不代表我要去了解他们。”

然后他补充：“自己觉得这也是一个选择，或者说自我洗脑带来的东西，天天跟自己说什么都无所谓，吃喝拉撒睡就好了。”

“这还是不能回答你开放你的家的原因。而且，你训练 / 洗脑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可能要想一想……”

他开始现场回想。这个回想颇为持久，以至于我认为他倾向于回避这个话题。于是我开始絮絮叨叨说其实放弃隐私观念是很难的事情，因为至少 80 后是从小都有这种意识的，所以……这个时候，大鹏开口了：“我想到了一些。”

“我是来开店的。我觉得如果店可以养活我，我就不用去工作了。但我不想服务别人，也不想卖太贵，就觉得自助比较好。最主要的想法是，不管我在不在，提供一个别人愿意去的地方，喝酒玩耍都可以。我是一个爱喝酒的人，我觉得找一个我愿意喝酒的地方挺难的。讲得大一点的话，是一个规则下的自由问题。有几个我爱去的喝酒的地方就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方，也没有标准化服务，可以认识老板和员工，比较破比较小。”

“感觉是你自己需要这么一个地方。”

“我有办法和我认识的理性的人沟通交流，但我不一定要这么做。那些人有追求，可能只是我的个人理解，自由、美、真、善，这些只是词语，我很难讲清楚，至少就是想要更好。就是这种地方我才愿意去。一个人很难什么都做好，有很多不可抗力对不对？但追求这个好的态度，我是比较看重的。”

他继续说：“比如审美。很多人没有审美，不是说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没有追求，他们没有在这条路上走。至于一个人能走到什么程度，那大家的知识教育和资源都不一样，对吧。但至少要有追求。”

我渐渐开始明白,大鹏按照他理想中的原则,以力所能及的标准,做了一件自己认为“好”的事。这就是这个客厅来历的全部。因为觉得“自由之地”是个稀罕的存在,所以他按照自己的标准做了一个,即便它并不赚钱。

如果从生意的角度看,大鹏只能拿回房租,水电还得自贴。来的多为年轻人,有的时候过来沙发上躺着午休,有时候晚上喝酒聚餐打游戏。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一个女生过来问大鹏电视遥控器在哪里,另一个人让大鹏帮他打游戏。前者得到的回复是“我也不知道,你慢慢找。”后者听到的是,“我现在没有脑力和精力做这件事”。怎么看都不像做生意的人。

如果有游客误打误撞进来,他们都会觉得惊吓,一个看着像店但确实是个客厅的地方(而不是相反)。有胆子大的进来,坐一下,发现不会有任何人招呼自己,也就走了。渐渐地,有些不爱喝酒的年轻人也来,因为这里的氛围足够自由。

大鹏总是喜欢把表述放得很低,比如“我不开心不难过,偶尔开心一下,就可以有足够动力活下去了”。他说自己不属于“有一个事情愿意做”的人——比如大爱,会为自己的家乡办独立杂志,但能看出,他羡慕有事做的状态,否则就不至于要劝说自己,很多东西都不重要,即便做事也不需要那么勤快。他还是在训练自己。

“对,我不追求结果,但还在往那个方向走。这是我认为重要的东西。宽泛来讲就是追求好。我也会做不好的事情,我也会迅速原谅自己。我觉得人类无能脆弱渺小,所以我对别人也没什么要求。总体来说就是这样。”

“有些东西我想但我也做不到,价值观上,我最近几年想的比较多。这种东西建设花了不少时间,但是要摧毁它也是非常快的,我坚持的东西它可能很容易就被摧毁了,而且它不是说我想这样,我就是这样了,我得每天这么想,每天按这个做,我才是这样。”

大鹏小时候有轻微的自闭倾向,有大约10年的时间,他基本不和人交流。他说这样成长比较慢,但也带来了一个好处,就是精神上不太容易被“勾引”。对于什么是精神,大鹏有一个简洁明了的定义:肉身之外全是精神。一个人能拥有的物质仅仅是自己的身体。其他即便是物质追求,也是一种精神折射。比如说朋友关系,就算那些很好的朋友,他也并不会按照世俗意义上的方式“关心”别人。大部分时候,他不信任语言。就好像小时候写作文,800字的要求他从未到达过,有的时候交白卷。至于现在身边大部分人的聊天,他都觉得无聊,既不想参与,也不想知道。

碰到我表达认同的时候,他会说:“比如你说我讲得很好,但也不一定是我想要讲的。我可能也讲不清楚。这就是沟通。”

就是这么一个人,把自己的大部分所有开放了出来。

Q: 你最近有遇到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吗?

A: 我想一想,最近……好难。没有。

Q: 你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 也没有。

Q: 推荐一个没那么自闭的人吧,相对比较外向,叫33,非常独立的、很强大的女性,

比我大蛮多岁的,她是福建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女性。我们不常见,但我很敬佩她。



题图来自电影《逃亡》(2021)海报

专栏

077 怡宁 通过身体探索，让人性互助 不只停留在一些危急时刻

杨樱 | 接力访问

她想创造一种机会，
让人重新认识身体，和身体所在的环境。

聊天的时候怡宁的手臂在跳舞。她坐在我对面，一家面包店里，上海刚刚下过大雨。手一开始还没抬起来，但是随着“身体探索”、“身体介入”、“穿针引线”、“建立连接”之类的词语蹦出来，她的上半身就加入了聊天，手臂在空中蜿蜒扭动，帮助解释一些曲折复杂的心境和遭遇。一直到聊天结束都没怎么放下来过。一个灵活的人。

之前在丸子那里了解过他的“接触即兴”，相比之下，怡宁甚至连对外活动的名号都没有，合作的小伙伴有两个，小黄和小黑，三个人管自己叫“臭皮匠身体协会”。没有公众号，从未在正经的舞房做过活动，也从未自己发起过什么活动——他们以一种松散、游牧的方式接受邀请、支持朋友，同时结识不同的人群。

怡宁在2023年才开始用“接触即兴”来表达自己的种种思考，在此之前是做学问。她是一个人类学者，从大部分生命时间来看，她都在学界度过。她1990年出生在浙江金华下面的浦江县，本科学了日语，在日本读了硕士，又去德国读了第二个硕士，田野在荷兰做，然后回到德国，签下人生第一份工作合约，在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人类学界知道这个机构的分量。怡宁说，对于有长期或者终身合同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天堂。

不过这份合同怡宁只做了三年。她有自己过不去的东西。

事情还是要从她在荷兰做田野开始说起。怡宁到荷兰的时间是2015年的四五月份，她在北部一个叫格罗宁根的地方做难民研究，具体的落脚机构是当地一个彩虹组织。组织会有不同的团队做不同的主题，比如老年、青少年等等，而怡宁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了难民团队。该组织总部在阿姆斯特丹，和总部不同，格罗宁根的分部在政治上相对保

守，强调大家在此以社交和促进友谊为主，不能和难民申请有过多牵连。

怡宁一边做志愿者，一边眼看着团队领导层从荷兰白人换到曾经的难民申请者，也目睹了组织中的种种波折。这些成为她深度田野的基础，并以此为项目开始博士研究。她和经常参加团队活动的一些资深成员住在一起，看到“水面下的讨论”：虽然不能和政治或难民申请挂钩，但大家不可避免地在团队活动中进行相关讨论，因为团队活动本身就是参与者难民申请过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点。比如如何证明自己的性取向——进入这个组织、拿到活动参与证明本身是一种证明，只是在法律上不具备效力。

那一年我做的主要内容就是帮他们收集这样的证据，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我跟他们一起去寻找不同的朋友去写一封信件，这个人他可以在信里面写——不能用断言的方式说我知道他就是同性恋——而是说我认识他、我跟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事情使得我们怎么样，反正对通过他们的人脉关系网，搜罗这些东西，要收集几封信件。我们只知道我们不能写什么，但具体要写什么，找什么人、多少人，才能在官司里面起到作用，则是完全未知的。

我的朋友大多数是来自非洲，这和2015年起整个欧洲的难民潮所关注的群体，比如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有非常大的不同。主要来自尼日利亚、塞拉利昂、乌干达。他们在荷兰生活，打黑工，这样他们跟荷兰当地各种各样的联系就慢慢地浮出水面。我进入的方式就是（替他们或者和他们一起）去找他们认识的人写信，以及把口述的信件写下来（很多人不识字或不太会写信）。

在这个过程中，怡宁渐渐意识到了两种世界观的冲突，用她的话说，她透过不同人的生存方式看到了现代性、全球化和西方殖民视角在自己身边的演绎。但是让她最后走到一个情感临界点的事情，还是一个在荷兰“黑”了20年的朋友在她面前被警察拉走，强制遣返；而另一个朋友也处于胶着状态。此时规定的田野时间已经到了，她必须返回德国。与此同时，新冠爆发，荷兰社会开始讨论对策，虽然官方还没有措施，但怡宁开始担心难民朋友的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她知道他们的社会健康保障和荷兰公民完全不同。

她感到焦灼而混乱。一方面她的老师跟她说应该好好写论文，另一方面朋友们遭遇非常现实的冲击。“这和我躲在书斋里的天堂感和安稳感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割裂。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产出的东西到底是为了谁，为了什么。”

还有更深层的质疑：她的学术到底是否建立在一种可靠的真实性之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人类学的问题，就是你有一个学术目的。裹挟我的就是学术目的和整个难民制度。我会带有预设地和难民朋友们相处，想要去框架化我们的共事，会批判和从心理上疏远我在的彩虹组织和难民制度，并希望（朋友们）可以成为从某种意义上的行动者。但是同时他们的第一要义肯定要先解决生存问题，他们和难民制度，特别是彩虹组织的心理距离相对亲近许多，甚至是依赖的。我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地和他们一起做申请，也没有办法对我们所在的组织产生信赖和更深的情感。在这样巨大的割裂感里，我不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相遇，有没有产生过连接。这么多年的互动，这么多年的共事，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也很亲密，但我仍然觉得我们是在各自的困境里找不到出路。

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困扰我的议题可能就开始慢慢浮出水面：就是人跟人可以怎么样连接，困境和困境可以怎么样对话。

怡宁是导师的关门弟子。在那一年，她的导师发现怡宁无法产出任何成果，交来的田野报告也毫不学术，而是非常情绪化和个人化。加之俩人在难民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都有不同，最后导师放弃了。怡宁开始尝试去投别的项目。换句话说，没有马上离开学界。

但困扰并没有消失。也许是一种事后总结，她对我说：“我没办法在书斋里做事。包括语言，我就觉得当语言被说出口的时候，本身就是在划定界限，就是一个有区隔性的东西。我会想，如果我们有更为身体性的相遇，也许就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连接。当然，只是我的遐想。”

就在那个时候，怡宁知道了樱井大造，日本帐篷戏活动家，知道他如何以帐篷戏为切入口做社会行动。“天，我觉得，这就是我缺乏的东西。”她在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为何如何让自己认同的理念和更广泛、更多元的圈层发生关联，如何落地。

比如之前在进行博士时期的性别研究和酷儿理论和后殖民研究的时候，她就尝试过和同事合作，试图改变知识传播的方式。

其实酷儿理论、性别研究和后殖民理论都是从血肉经验出来的。我和正在进入这些理论的朋友们聊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知道他们在说的是什么，不知道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在过去我就觉得，你连这种基本同理心都没有，我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但后来我就开始换了一个方式，就是，怎么样才可以让他们觉得这些东西跟他们有关系？

我一开始是在理论方面去考虑这件事情。虽然说马普所不教书，但是我有一些同事仍然会在大学里担任一两门课。有个非常好的朋友当时是在哈佛，在设计学院教 urban studies，城市理论和其他各类议题相结合的一门课，然后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想法。

通常我们进入理论都会读一些经典著作，通常这些经典理论更具理论性，以及白人视角。我们当时就换了一个方向，先从相对不太知名的有色人群学者进入，特别是跟他们血肉经验相关的这样一些东西。后来这门课大家都答得很好。

当时我们就意识到一点，如何进入一个领域，或者说，如何讨论公共议题，前面的步骤是很重要的。这个话题如何触碰到人的内心，把人本身的脆弱性给挖掘出来，也是尤为重要的。

在从书斋到身体的思维转换过程中，怡宁到了上海。这是一个偶然——新冠时期回国手续复杂且混乱，恰好所里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兼同事可以结伴而行。回来随即进入一个茫然时期，用她的话说，遭遇了“反向文化冲突”：在陆家嘴这种地方会产生巨大的“我是谁我在哪”的抽离感，因为一开始住的酒店公寓，远离居民区，仿佛生活在一个玻璃罩子里，也加剧了这种迷失感。后来她觉得，这种对“玻璃罩子”的反感和她离开学界的本质原因是相似的：她需要体验真实的连接。

她甚至不记得自己具体是怎样开始“接触即兴”了，这个开端对她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结束了那种迷失感。

身体既是一具社会性的身体，又是一具物理性的身体，对吧？社会性的身体会有一张社会性的地图，比如说，有一些禁忌的部位，它可以让你更加清晰地看见我的身体是如何被定性的，在一个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当中如何存在。然后“接触即兴”可以让你去发现物理性的身体。这两个结合要在一起，两边的工具同时作用，两张地图碰撞。

你的第一个舞伴是地板，但是你们两个人是在跟一个看不见的第三者——重力一起跳。重力是一个在绝对意义上平等、无处不在的东西。你只能学着去觉察，慢慢跟它交朋友，慢慢调和，这是一种非常本能的生存技能，也是一种更为有机的关系。就像一面镜子，去映照出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明明我觉得这样更轻松，其实我是在不自觉地用力。

当你有了这样一面镜子的时候，它既是一个分析工具，又是一个可以让你把限制变为可能的工具，它具有开拓性。

之前跟库布里克书店一起做了一个以《始于极限》为主题的工作坊，差不多持续了5个小时左右。

先打开身体，用身体去碰撞，然后用身体去做支撑，让大家放松以及打开，再开始分享各自的问题，有人在中间穿针引线，把他们往一个更大的或者说无法触及到的东西上面引。这样一种场域的建立非常重要。

因为比如当我在说话的时候，是我在主导整个空间，我在主导大家的注意力，是很有侵略性的。但是“接触即兴”是反的，你跟一个东西接触，你既可以说“我站在地上”，也可以说“地板在承载着我”。什么东西影响你，以及你在影响什么东西，是一种非常具身性的经验。

几乎所有“接触即兴”工作坊都有这么几个方面。“接触即兴”的创始人发起这样一个身体探索的时候，其实引领他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在我毫无觉察的时候，我的身体在做什么？

当你慢慢去做这样的觉察的时候，你跟世界的关系开始产生变化。你会发觉原来我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我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走路，我会有一种习惯，在这个场景里面，我的身体会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然后你也许就会开始问，为什么我会是这样，我还可以是怎样，以及，这个环境本身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接触即兴”其实玩的就是身体结构、重力及动能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同时能够引发的思考是无边无界的。

我们一直所接受并不断延续的是一种家长式的控制。“接触即兴”是反控制的路径。斯蒂夫·帕克斯顿，“接触即兴”的创始人，每当有人需要他给出一个更为权威的回答，或者需要他成为一个类似支柱一样的角色的时候，他都会避开这样的场景，绝对不可能给答案。但

是这不代表他不能自由表达他的观点——你如何区分自由表达和成为权威之间的微妙差异，已经很难了，而且你还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警惕自己。

我会看到身边的人越来越多进入“权威”语境，很恐怖、很可怕，而且你也无法告诉他。一个人在反对更大的权威，自己却在成为权威。从某种意义上，比如说你要去论证世界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给大家普及，这条路是不太可能行得通的，因为它是一种权威的方式。但是你又要力所能及提供你的智识支撑，就是你得做事，但是你要避免教导别人。

我会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放弃过，虽然脱离了学界，但只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持续解决同一个问题。无论是让人生发出一些自主性也好，一些别样的关系也好，就是让这种人性的互助和关怀不只停留在一些危急时刻。

怡宁和深圳机构“握手三零二”有过一次合作，核心内容是带着大家行走体验南头古城。其中一个参与者在最后分享感言里说，“最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老师，而是每一位参与活动的人。”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真的很开心。”怡宁说。

Q: 你最近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A: 什么都很好奇。

Q: 什么都很好奇？

A: 真的，什么都很好奇。最近有一个身体练习，（身体斜过去靠向墙面）比如我现在靠的地方有几个点，跟人在一块玩会比较好玩。比如你把一只手放在我身体某个部位，然后你会施力，我就只用这个地方和你接触的面，给你提供对等的力量。然后你会发现原来我的身体的力是这样流过去的，我身体在单面的膨胀感原来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其他部位放松、一个部位紧张是这样的。因为你要去感知力，你关注的方向就变了，就不是我在靠这面墙，而是墙如何推着我，它推着我的地方有什么感觉，它的支撑力是怎么一点点进入我的构造里的，就不会是殖民主义侵入式的那种。

Q: 你最近有没有想解决的问题？

A: 在想要不要给我室友的小狗买保险。最直接的问题是要不要买以及买什么，接下来是“我们在以怎样的方式介入狗生”，然后你会想它原本会过上怎样的生活。

Q: 你要找谁来接力？

A: 一个是我之前去贵州认识的“自然关系 The Knot”，文心和 Joy。她们通过户外运动来做人和人的连接、人和地的连接。她们在一起合作的方式，在我看来看的确是非常女性主义的一件事。

还有潍坊的牟昌非，他在自己村里做乡村戏剧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一般都是感兴趣如何去做。而且他做了很久，我也很想知道让他持续下来的是什么。



题图为电影《一一》(2000)剧照;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说什么。

长辈到底想说什么以及可以说出什么, Lucan 还是很想知道的。他之前给外婆做了一份纪录片, 又做了一本小册子, 不过家里的人似乎都没太在意。“他们都太忙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更大的背景, 可能他想更多了解这一大片他谈不上了解的文化。其实当时他曾经想去深圳工作, 因为喜欢科技相关的工作, 还喜欢那种创业氛围。不过当时他拿到的聘书, 一份来自新加坡, 一份来自上海。上海老板决定马上签约, 他也就来到了这里。在此之前, 他对内地的了解可能仅仅来自一些改良过的菜式, 以及伦敦读研究生时候在中国城吃到(也许更为改良)的、同时是他没见过的菜式。比如说, 酸辣土豆丝。

这个起点其实还蛮微妙的。明明觉得自己知道, 但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自己, 但你要说什么都不知道, 但又知道一点。无论如何, Lucan 觉得想多了解一些这里。“我不想让人家感觉我就是个过客。我或许是个过客, 但是去了解过你的。所以其实做脱口秀是想走进他们的内心, 虽然和这些长辈辈份不一样, 虽然我只是一个新居民, 但我觉得在做脱口秀这件事上我有触动他们的内心。就还蛮开心的。”

脱口秀的完整说法其实是, Lucan 参与新华路大鱼营造(一个做社区营造的组织)的“一平米计划”, 借由大鱼和家附近的居委介绍接洽, 在社区里发起了 55~70 岁年龄段的脱口秀表演者的征集。他对每个参与者都给予很大的时间投入: 一共见面五次, 其中包括两次家访、两次见面和一次共创。每次时间大约是两三个小时。这些长时间的聊天会让 Lucan 了解参与者的生平和人生感悟, 他们会让他们以某种自己舒服的形式, 最后站在观众面前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

其实在 2021 年他就想做这件事, 但经历过多次变动。除了“让长辈说故事”这个目的是明确的, 形式不明确(可以是纪录片、桌游、脱口秀等等), 责任制也不明确。最后发起者 Lucan 觉得自己应该更坚定主张, 此时大鱼出了主意并建议联系妇联的赞助, 因此“专案”在最后一次成员改组之后就得以顺利推动。Lucan 就这样找到了若干信任的中介人, 帮忙把整个局面打开。即便这样, 他在面对居委的时候, 也会被对方皱眉怎么是个“个人”来要求合作, 如果是公司会顺利很多。



2023 年 9 月, 脱口秀落地 Lucan 跟我说起和他已经成为朋友的几位脱口秀参与者, 有相当的亲近感, 似乎是他们曾经的人生也成了他的人生的一部分。其中一位是书报亭的经营者, 让 Lucan 补全了下岗潮和支援边疆的时代背景。还有一位是早在三十多岁就因伤退休的物业工人, 后来在公安借调的时候如何摔断了腿, 都让 Lucan 拼上了一些他并不知道的信息版图。“这些历史其实比课本上的还重要, 因为正是这些在真正影响我现在周遭的朋友们, 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他们还谈到了粮食灾害”。

不过到了上台的时候, “很多有趣的东西都没出现”, 毕竟他不是一个人张罗了这件事。脱口秀得是一个“正面”的脱口秀。“但是长辈都很看得开。他们会觉得没出现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是很认命的。”



专栏

078 Lucan 给社区长辈做脱口秀, 是他了解历史的一种方式

杨樱 | 接力访问

让个体记忆出现在更当代的语境里。

Lucan 住在上海一个老小区里, 街对面的饭店卖的包子经常有叔叔阿姨大排长龙, 他还蛮中意这个住处, 一住就是三年。其中包括 2022 年上海封控的 2 个多月邻里互助, 打破了上海给人原本的印象冷漠。“可能是因为大家要一起抢菜, 对各种事情也很不开心, 所以好像越来越团结了。”Lucan 觉得, 这段时期他感觉到的社区气氛, 关系要比上班的时候近很多, 虽然谁都见不了面。

封控结束之后, 他立刻着手去做一个“专案”。“专案”是他作为台湾人的说法, 不过也有可能是本职做惯了。上海是 Lucan 在台北之外第一个工作地, 工作是为新消费品牌做用户洞察和文化研究。说起来, 这也是一个从台北绵延到上海的“专案”, 它起源于 Lucan 想为自己家里的长辈设计一个桌游包, 类似于卡牌游戏, 来探访他阿公(爷爷)的亲戚如果要陪他聊天, 用抽牌的方式可以任意挑选话题。作为一个工业设计师出身的人, Lucan 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他其实并不了解他阿公, 只知道他出生在台湾, 之前做生意, 以及很多亲戚来看望他的时候其实只是尽一份陪伴义务, 并不会真的去听他

“你刚刚问我长辈会不会向我提问”，Lucan 说：“其实他们有一些是不问的，可能事情做到一半也不会问我的初衷。就是默默接受这件事。但他们会想了解我，小伙子在上海干嘛，还有人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商业变现。有一些长辈是使命必达型，虽然很诚恳，但主要是配合居委。但大部分长辈们都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活动）。”

比较让他惊讶（但其实又很合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有不少人找到 Lucan，问他是怎么挖掘到这么多不同的长辈故事，以及是不是可以合作，比如介绍给他们做调研。

“调研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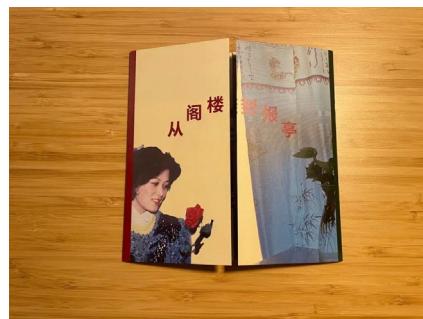
“比如想要了解这群喜欢玩乐的长辈的生活方式，然后让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内容。”Lucan 说，这是他很排斥的事情。“因为这些长辈好像一直看起来很无趣，很被边缘化，却好像因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活了起来，突然有故事，突然变有趣了，对品牌就是加分了。”

“我觉得还是可以让品牌介入，因为大家还是要生存。但我很在意消费的尺度，他的生活方式如果能够为你添砖加瓦，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他的生活方式只是你的一个棋子，我就很讨厌。”

他也不喜欢市面上某些针对长辈开展的活动。“就像网红打卡似的，给长辈拍个照，做个塑画像，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操弄刻板印象，快速拉开一个所谓的思考维度。”一开始他还担心长辈脱口秀第一季做完以后被抄袭，后来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做类似的事情。“因为大家不关心。大家有一些创意，更愿意放在小朋友身上。长辈的话，大家只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在养老院活着就好，有钱的话送你出国去玩，给你买东西。但你的故事、你每日的自给自足的消遣，其实是不被在乎的。”

“长辈脱口秀”之所以设置了年龄限制，比如说以 70 岁作为参与者上限，是因为有一些年纪过大的参与者 Lucan 只能做到陪伴，共创的空间或可能性会被大大地压缩。

“我带着长辈用不一样的方法说故事，他是共创者、参与者、甚至创作者，我不想要他们做观赏者。脱口秀是他们的故事，还有他们添油加醋的共创，我觉得这是最有意思的。我根据口述起草文本，然后他们会自己来修改，可以背也可以念。物业叔叔讲话很慢，会用两个字或三个字做强调，他会讲一下停一下，看大家的反应，然后会做一点表情。书报亭阿姨还会回想到以前她在法华镇路那边开书报亭遇到的顾客，她和顾客的对话口气会出现，每个长辈讲话语速也都不一样。”



这个如今被叫做“叟话抒”的“专案”，如今已经发展到第二期。严格来说，是第二期的试验阶段：Lucan 的瑜伽老师把妈妈介绍给他，他带领阿姨共同创作一本书，全部内容都由自己用 PPT 软件完成。

我跟她上了 5 次课，一次课 3 小时。然后我教她用 PPT 做排版，讲什么是拍照，到怎么去叙事，怎么去做构图，你怎么说故事，创作主题可以怎么发展。最终她做了一个路上观察学的东西。

这个阿姨很有意思，很喜欢看书，讨厌热闹，喜欢在路上去观察一些落叶和花花草草。

她欲罢不能，现在已经写了五六十页的创作。她女儿会想要帮她印 50 本。一开始她很懵，问什么是一本书，我跟她介绍什么是 zine。然后带她看大大小小的书本，看印刷、纸张。

中间有个比较触动的故事是，女儿说，她妈妈终于不再只是一个做菜难吃的妈妈，还是这么有观察的妈妈。她妈妈好像真的做菜很难吃。有一次她妈妈花了 3 小时做出一道菜，本来应该做出 5 道菜（的材料），她把 5 道菜融合在一道菜当中，然后不能吃。女儿很生气，觉得妈妈是不及格的做菜人。

但现在女儿发现妈妈文笔很好，拍照也很好，还把这些给她朋友看。朋友说那你妈妈还是多发展文艺专长，不要做菜了。

其实我做这些叙事是服务于心理健康的，未来是想要做到让它不只是抒发，不只是一个有趣的活动，而是叙事治疗。所以我在过程当中，都会跟阿姨聊一下对做这件事情的想法，问阿姨这件事对她的亲子关系有没有影响。冥冥之中也在完成我本科心理学专业没完成的事情。

这其实是我最关注的事情。阿姨说她的妈妈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从小很怨恨妈妈，那个年代也许重男轻女，也许小朋友不懂，家里有很多的生计或杂事要处理，她妈妈好像是到四五十岁才慢慢了解当时妈妈的一些为难之处，就很遗憾了。所以她觉得和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让自己的女儿有机会去走进她的内心。

其实我做的事情都是一个切口。这次的拍照可能只是一个媒介。有些人可能比较文静，可能是透过拍照写字，让别人去了解 ta 在想什么；有些人比较活泼热闹爱闲聊八卦，更适合讲脱口秀来表达。

阿姨的父亲之前过世了，阿姨其实在心里一直难以平复，当下不好讲。有一天突然跟我讲了一个梦：有一天阿姨突然遇到梦到爸爸到梦里来找她，讲了一些话，后来离开了房间，然后她就释怀了，知道爸爸终于走了。

我回想起那个状态，都有点稍微起鸡皮疙瘩。阿姨的女儿都没听过这个故事。这个阿姨跟我说，这是她第一次跟别人说这个梦。

她选择当下跟我说这件事情，是因为她说很多事情说了就没了，因此她反而不说，可是当时的氛围去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会让感觉消失，所以她说了。

Q: 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A: 非常有趣，我最近参加了小老虎在外滩美术馆办的说唱工作坊。我们大部分都不是嘻哈爱好者，有一些是剧场表演者，有一些是画家。期间有各种游戏与竞赛，比如说 6 个人根据同一个主题，或者是三个人接力，或者是一对一 PK，或者一对一个人表白。我参加的工作坊的缘由是我最近在做一个给妈妈的纪录片，我妈妈以前是钢琴老师，我想要在里面放一些我写的诗或者 rap，然后我不会写 rap。在工作坊里，小老虎也给我机会把给妈妈的 rap 念了出来，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 rap。

Q: 你最近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

A: 我在思考我在做的对长辈有益处的事情，同时发展出一种模式。因为我希望它不只是一个兴趣，而是自己可以可持续且健康运行下去。

Q: 你想推荐谁来接力？

A: Itsuki，之前因为做“叟话抒”做小册子结识的朋友，当时对她的文字印象深刻，没什么磨合两周内就做完了。后来辗转知道，她现在一个人摆摊帮陌生人写诗，想为城市注入一点诗意。很多写诗是个人抒发，但她是面向大众。



题图为电影《醉乡民谣》(2013) 剧照

专栏

079 董吗子 哪怕挣钱， 我都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杨樱 | 接力访问

我不停地拼命，

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喜欢的东西跟这个世界交换些什么吗？

叠贵给董吗子介绍“接力访问”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大抵是说，这个栏目希望了解“每个人怎么活着”。在聊天之前，有的时候我会问问对方是怎么被介绍进来的。董吗子除了上面这句高度承上的总结，又说了一句非常启下的话：在别人的世界里，或者在朋友们的世界里，我是一个音乐人的角色。因为我会出席一些活动，都是以“做音乐的”这个身份去出席的；而我自己活着的状态，或者观察世界的角度，恰恰又不是音乐。

叠贵是这样给我介绍董吗子的：高中毕业之后开始当大巴车售票员，做过厨师，这些年一直做音乐，是我最喜欢的贵州音乐人，认识多年，一直共勉。又补充，“是个话痨”。

后来我看董吗子（鉴于大家都叫他“吗子”，下文省略姓氏）的介绍，他还会说自己“贩牛马”。他写过一首歌，叫《我嘞家》，因为家乡情浓，据说让很多人哭过。他和朋友们做过“贵州乡土民谣工作室”，做过巡演，不过确实如他所说，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和吗子聊天就从他“失去音乐创作状态”开始。他说话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不惮于谈论自己的内心，这个很多人都做不到，至少做不到那么直白，因为会觉得肉麻；第二是他遣词造句有一种寓言的感觉。因为直白地罗列事实，词句后面的含义会自己浮现出来。我很爱听他讲话。

吗子是贵州织金人，90年生，家里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弟弟也是音乐人。《我嘞家》就是被弟弟唱出名的。后来吗子不做音乐，弟弟或许觉得他不可理喻。“一起做的时候就很不可理喻地无法交流，不做应该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感觉吧，我无法知道弟弟最根本的看法，也就什么都没有解释。”

吗子没有用过“才华”这两个字，他总说自己写的音乐很烂，有把之前的自我完全推翻

重来的意思。这种自我颠覆的冲动和他思考“为何工作、为何活着”有关。从2015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他都用来完成这个命题。据说完成了。

以下是董吗子的口述。为了阅读方便，一些内容在顺序上有所调整。

我最开始做音乐是因为秉持着某种热爱。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或者是你自己内心的想法，都能通过音乐表达出来。这些表达你反复看到，你就会开始质疑。质疑自己的这些表达，这是应该的表达么，我发现无法去做一个完全“自我”的创作者。因为当你想写一个民谣的时候，你会发现对身边的生活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对人们的状态也是一无所知的，你写出来的歌词有时候都不像你自己，所以就失去了创作状态。但是人们又觉得你是一个音乐人，你又需要创作。

这就得从我的内心说起。我对自己过去的每一个心情和状态都很熟悉。上高中之前，我压根就不知道“活着”是什么。包括读书。我从小到大念书，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念书，也不需要我知道，因此我的成绩不会特别好，老师们都觉得我挺聪明，学什么都能学得好，但是我自己又无法进入一个学习的专注状态。

高考过后我连志愿都没有填，因为我不知道填志愿意味着什么。所有的人都在选大学，但是任何大学我都不知道它们是干嘛的，专业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以后我就没有读书了。但是我不忧伤，我似乎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没上大学你就得工作吧，世界就是这样推着你走的对吧。我除了织金的县城都没去过别的地方。所以我的叔叔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我叔叔有很多客车，我就给他做售票员。他本来安排我学开车，我也没学会。有一些钱的话，我就会拿来买乐器，因为我从小喜欢音乐，但这都不是促成我做音乐的缘由。后来我开始觉得不太对，每个月我就挣这点钱，每天却这么辛苦，直到有一天，我不太想做这个事情了。

我另外一个叔叔在贩牛马。我又去和他贩牛马。我叔叔们在干嘛，我就陪他们干一下，但我似乎也感觉不到叔叔们的状态。我没有学会做牛马生意。后头我就离开了他们的圈子，但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世界是怎样的。我的命推着我，身边的人知道可以去厨师，那这次我就去了一个学校去学做厨师。但我依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做厨师我的工资稍微高一点，我就给弟弟一些钱作为读书时的生活费。

弟弟很聪慧，他去高中时在县城就接触到了独立音乐，会写自己歌，词曲他都写得好棒，我比不上他；我会弹吉他，也学着写一点歌。那时候弟弟在兰州念大学，他也很勇敢，把我们录的 demo 拿给那些音乐人听。从兰州回来他说要办巡演。我觉得挺好，所以自己画了海报，自己写了歌，又认识了一些音乐人。当时贵州要办迷笛音乐节，我和弟弟去参加了，这时候我感觉到生命的一种快乐了。之前任何事情都是社会推着你去做，你都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你会不会喜欢，但你也不会烦，就每天早上起来做这些事情，但你没有自己的意愿。做音乐认识一些人之后，他们邀请我们一起去西南巡演，说你来，我们一起。我就跟酒店的厨师长说我要走了。厨师长挺喜欢我，觉得我能帮他，还想把我带去北京。其实在我心中，我也不知道北京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更高级的厨师可以拿更高工资，但那些工资我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反倒是看到那些拿了高工资的厨师，因为去外地，没办法和家人在一起，生活也不是特别愉快，我就不向往那样的生活。所以我就说我要辞职了，不再回来了。

巡演两个月回来，我就没想再做其他事情了。巡演会有一些钱，但还不如一个月上班的工资。但也没差什么，就这样待着。

那时候我认识叠贵了，我和朋友们说，要不要我们也做一个音乐会，把贵州认识的人都拉在一起。结果真的做了，做得还挺好，很多人来看。虽然演出一般，音乐也一般，你不知道别人享受的是音乐创作还是舞台，但还是有人来了。你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事。



董吗子的画

2015 年的时候，我弟弟录了我写的一首歌的视频，叫《我嘞家》，然后贵州很多人都在唱了。我很多年都（为此）崩溃。因为这只是我一个时期的表达，即便它现在还符合人们的内心，但我的内心早就不是那样的人。而有的人会因为这个歌过来跟你说很多话。我不喜欢这种状态。

写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在做厨师，下班很晚，半夜一两点，然后七八点就要起来。但一两点我还在写这首歌，真是热爱。也因为我弟弟唱了，这首歌才被知道。现在我弟弟在音乐公司上班，他比我小两岁，我们关系不错。

我和兄弟姐妹关系都不错，虽然姐姐们不能理解我。现在我打电话给我妈妈，说以前性格不对，我妈妈说你还知道，我说我一直都知道，只有到现在才承认，以前我不在乎，我不需要任何人评价。现在我意识到人和人之间是要交流的。然后我妈妈就笑了。其实她不知道，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性格不对”，我只是说给她听的。

他们觉得我“性格不对”“无法交流”，是因为他们试图让我去工作赚钱，我拒绝和他们聊这些问题。我姐姐是科学家，生物医学的博士后。她问我，我这样不工作有什么科学依据吗？我说我有哲学依据。她说你还是唱歌，你不是搞哲学的人。我说我没有搞哲学，只是在开玩笑。不过他们即便不理解我，也对我很好。

我现在了解了社会的逻辑，既不会让社会压抑到我的内心，也能理解了社会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会（那样）告诉我妈妈，只是为了让我妈妈安心。而我会更轻松。

我后来知道，原来社会上的人需要以某个逻辑去和他们相处，包括你的亲人。你得拥有这一套逻辑，但是当你进入自己的作品和内在世界的时候，你会非常清楚知道，这就是你自己的逻辑，是你从诸多习惯逻辑中筛选出来的结果，是你想要的表达。

就这几年，我反复坐在人群中，但没有办法和他们交流，因为大家关心的事情不一样。以前总是很尴尬的，别人带我去吃个饭，他说，你是个歌手，小董，你助个兴。回来我就会很生气，我说助什么兴！我就会很生气。后来我就跟朋友说，我再也不会陪你去玩了。

到后来我就明白了，原来他和你是朋友，他以为他和你是朋友，他带你去参加他的朋友的聚会，然后你也以为你和他是朋友，然后你就去了，结果你发现似乎是一个圈套，但是你又在圈套里面要全身而退，所以你就变成这样了。后来我就很聪明了，我就不再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了，别人一开口，我大概就知道今天他们要聊挣钱的事情，而我并不是他们的生意伙伴，明显这事跟我没关系。我就得走了。

（虽然我不做音乐了）这种事情总会有的。比如有人会找你演出，你会遇到人家介绍你是歌手，别人会说小董我们加一个微信，我就认识了莫名其妙的人。毕竟我总会有一些演出、一些音乐制作这样的活来供给我的一部分生活。

最近 8 年简直太困惑了，像独自一人走在黑夜里一样。我几乎走到了自己内心最绷紧的那根琴弦上了，因为我不仅不满意自己的作品，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让我觉得幸福开心的地方。我找不到我活着的必要，但我并没有低落。

以前我一直在有很多好朋友的状态下活着，朋友们后来去了成都，才发现友情只是一直充满着我的内心，我忘记了自己，然后我就试着去找一个存在的感觉，我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可以让我存在的。所以我对我的另外一个朋友说，我说你知道吗？我在这个世界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觉得不孤独。

我不喜欢待在成都。我去过，又回来了。和另一些朋友待在一起。

在那一段时间我是很崩溃的，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除了最亲近的人，最亲近的朋友，他们能理解我，会一起吃饭。虽然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但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很紧缩的状态。很惨。要三五年。

走出来是这样的。后来我读书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以前我还批评过一个朋友，说他在上面讲课的样子很虚弱，他都被我批评哭了。但人家是博士啊，将来是大学教授啊，我们现在依旧是好兄弟，将来也是。他争辩说我读了几万本书，你一本都没读过。我就觉得好像我是站不住脚。我不服气。

我就找书来读，一读发现读不懂。我学弹古琴，老师给了我一本书，叫《中国美学史大纲》，他说你要看这个。我们乐队的吉他手就说，这个书，序论你都要读一个星期。但我也不行。

我就又去买《如何阅读一本书》。发现对我也没有什么帮助。后来我发现我的问题是记不住。我就说不行，我得研究一下怎么记住一本书，然后又抛锚了。这时候，突然脑子里面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最致命的问题。我说，记忆到底是什么？

我在追问记忆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崩溃了。因为我也试着和朋友们探讨，记忆到底存储在哪里，他为什么到了我们的脑子里。因为我的问题，他们也崩溃了。那是 2016 年到 2018 年。我们住在花溪夜郎谷……后来，我发现一切都和我的大脑状态有关，我

就不再使用记忆这个该你那，而是换成了信息和图像，对他们进行分类。然后我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谁在记住这一切？我试图去寻找主体。

（这一段吗子探讨了他对记忆和意志的探索、分类和认知。出于相关性和篇幅起见，在此略过）我就会发现，好像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主体和客体交织出的生命状态，比如，一个人明明想要对自己的母亲好，却忍不住被自己的自尊激怒，又伤害了自己的母亲。

人类就是这么纠结。当我发现这个状态以后，我就能理解他们了。

我不工作，钱有时候会（是问题）。我只能这样说，别人问我，你怎么活过来的，我说我扛。

我做音乐挣了一些钱，但是我母亲会担忧，我母亲说你得买个房子，我父亲也说你得买个房子，我挣了一些钱，十几万块钱，只够交个首付。不知道是我的父亲带着我，还是我带着我的父亲，就这样在整个贵阳市穿梭，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要不要这个东西，就像最开始的那种生命状态一样，我就去买房子，然后买了一个房子以后，只能去贷款。我也不知道贷款是什么，也看不来那么多的条约，我就签字。对，人家问我有没有工作，我也没有工作，人家不知道怎么给我做了贷款，做完以后，也就意味着我得还钱了。甚至到现在我都没有收那个房子，因为我现在还没用上它。

我为了让自己很安逸地活着，我还留了好几万块钱，够我还一两年的房贷，但时间过去之后，你会觉得，天，银行追着你还贷怎么办？然后我就试图在没有钱的时候，去找一个工作做一做，做了一个月，我拿了几千块钱，又回来了。

我就发现这一系列确实是买房子带给我的，也是贷款带给我的。但我不想这样思考问题。因为每当早上起来，我就在想怎么去还债，又在想去哪里找工作，会完全失去自己。一天早上起来我就对自己狠狠地吼了一大声，我说不要让我变成一个穷鬼，不要让我思考这些问题。

结果第二天我又思考了。

我不停地这样思考，不停地吼，直到我把房子或我欠钱对我的影响从我的意识里面赶走了。我拒绝思考这个，不是我拒绝挣钱，我就知道我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也知道我不能失信。那么我就重新再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会还你的，但是我要做我的事情，我一定要做我的事情。

我认为哪怕是挣钱，我都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不停地拼命，难道我就没有一点点喜欢的东西可以跟这个世界交换一些什么吗？后来好像还真有人找我做音乐，并且对你的要求也没有那么糟糕，既不绑架你的意志，不绑架你的人生，我发现时代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年轻人火起来了。至少养活我没问题（我还想养活我的朋友，让他就只用写毛笔字就得）。哪怕他不写也行；总之，做不来很多事情就不要做嘛）。

我不会再担心我做出来的音乐好或者是不好，因为这对于我来说不太重要了。我理解到很多东西的反应模式以后，我靠这些理解去支持我的创作。

我开始知道我该怎么去创作了。就是像一个英雄一样。如果我写作、写歌，如果说精神负担给人们制造了一种奴性，我想在有限的时间里，追趕这些洪水猛兽，看看我的作品能不能让人们去驱赶掉这些洪水猛兽。所以我选择表达一种勇气和一种决心。

叠贵说跟我聊天会有信心，是因为我选择了表达一种勇气，因为我知道可以和一切困惑战斗的唯一力量，就是勇气。我能以这种勇气作为开始，来进行我的创作，无论创作出的东西好或者不好，我在做我自己，非常喜欢地去做好它。

这就是我这几年的完整历程。

Q: 你最近觉得什么东西比较有意思？

A: 我们所有的人都被一个东西拴住，也就是“如何去挣钱”，然后你会发现那些没有被拴住的人，往往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音乐和美术或者是一些跟利益毫无相关的事情，又是自己内心最喜欢的事情，我认为这样的事情是有的。哪怕一个人只喜欢陪着妈妈，也是可以的啊。

Q: 你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 我重新进入了创作状态，是因为我解决了影响我进入创作状态的实际问题，但其实我（的创作能力）并没有得以提升，只是说我更勇敢了。所以我想解决的问题，是尽快进入一个创作模式，进入音乐写作的状态，我一直在努力重新调整它。

就在昨天，我以前的吉他手来找我，他帮我解决了我创作的思路问题。

Q: 你想邀请什么人来接力？

A: 贺子珂。我们是朋友，她是我感觉到活得平常，却又奇妙的人。



题图来自 [Ananya Bilimale](#) on Unsplash

专栏

080 33

她的生活， 就是一次次尝试完成某种 看似不可完成之事

杨樱 | 接力访问

不仅是励志之类的事，关键是，为何如此？

给 33 打过去的时候，她还在回家路上。这个聊天约了好几次，有时候因为她客户应酬耽搁了，这次也是，晚上八点多将近九点，她才回到家开始做饭。

没想到一个生活方式近似全职极限运动员的人同时还是正常上班族。33 的朋友圈几乎没有除了运动之外的信息，即便是带着爸妈玩腾冲，也是因为她在腾冲跑马拉松。她自己也说，很多人并不知道她是有工作的。

[大鹏推荐 33 的时候](#)，说她独立、强大，是自己敬佩的女性。一个完全不拼的人会推荐一个很拼很拼的人，这本身挺有趣的。

了解 33 做过什么并不难，因为福建爬上珠穆朗玛峰的女性不会太多，何况她在最陡峭的地方还被暴风雪吹了下去，又自己爬了上来。叙说 33 的故事也不难，2018 年，她登顶珠峰，在此之前不过七八年，她还刚刚做完癌症化疗。这些信息累加起来，确实是极为强韧的人，如果读一读[公众号里写的她经历的险境](#)，那就更是了。

看完这些之后，我想问问 33 对死亡的感受。她日常离死亡很近，生命中至少还有几个状态，离死亡特别近。她为何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又从这种生活方式里获得了什么？你可以从接下来的口述里看到她的回答。

33 可能跟很多人讲述过这些，但同时又在不断刷新了解这些人对她的感受。发稿前不久，33 要完成两场越野赛和一场马拉松。而这个艰巨历程刚开始，她就摔伤了膝盖，韧带撕裂，在这种情况下，她跑完了 75 公里越野赛。即便我知道她之前做过什么，也得问为何非得这样？

答案可能我也知道：33 不曾把寻常人畏惧的痛苦当作压力，而是转化成了某种人生肾上腺素和原则。她反复提到的是，想把事情做好，并且确实喜欢。和她聊完，我觉得我几乎目睹了一个人在穿越不可完成之事，不是爬上某个巅峰，而是一次次让自己置身于某种看似不可完成之中。

我是在曾厝垵认识了大鹏。那是 2010 年左右的梦旅人客栈，我因为癌症化疗，抵抗力很低，又无聊，朋友叫我去泡茶看看风景。那时候曾厝垵人还很少。咖啡馆有一个临水的阳台，还有一棵很大的榕树，一个很文青的地方。大鹏常来，有时候一起做糕点，一起弹吉他唱歌，就认识了。其实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他们开客栈或者做一些文创，我们朝九晚五上班，看问题都不太一样，他们可能觉得朝九晚五的人就是特别无聊。那之前我就一直在爬雪山了，厦门很小，因为以前爬雪山、徒步，还去国外爬，那时候这样的人也很少，所以我们还算彼此吸引。我觉得他们那种生活也挺好。

我是个销售，有客户要应酬，以前做技术咨询类的工作。户外是个爱好。现在的工作不需要坐班。基本上晚上和朋友去跑步，周末上山，日常拉练。其实我是有工作的。

我是 1975 年的。大学毕业之后在上海上班，有个邻居是徒步爱好者，上海周边自驾爬山，就一起去这些地方。最初爬雪山就是为了体验一下。2003 年上了稻城亚丁，没有高原反应，雪山很美很震撼，图片里的风景突然出现在眼前，就默默想要去爬一座雪山才算完美。第二年爬了哈巴雪山，爬完了觉得很喜欢。

以前上班接触客户，总难免会遇到不喜欢的人，或者总会有很多负能量在身上，每次去完山野之后就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在山里比较纯粹，然后回到公司觉得心胸也变宽广了，不能容忍的事情暂时也能容忍了。其实以前就是为了隔一段时间散一下心，回来工作就更有激情。后来随着进入的种类越来越多，然后财务也随着工作年数变好了，户外经验也丰富了，阅历也上去了，就会往更高阶的户外去走。后面工作也有很多机会去外面，然后就去国外爬山，去做更多自己喜欢的练习。

爬雪山其实很危险，真的会死人的，慢慢就觉得要更重视这件事，花更多时间去训练自己，去了解这个运动。这么多年在爬山的过程中，还是潜移默化做了一些事情，比如看到别人高反了每次都会想帮助别人，所以我就去考了红十字会的会员，方便施救。就还有一点责任感在里面。

最早有户外论坛，我当年写的攻略过了七八年还会被人翻出来置顶。一个是当时有些山爬过的人少，另一个是资讯不如现在有很多平台可以看见，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座山可以爬。很多朋友都是在我的攻略下留言之后认识的，可能十几年、二十年我也不认识他，就这样一直在朋友圈，但还是会交流户外的问题。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爬山，爬珠峰，其实就是水到渠成你想去做这个事，然后想把它做好，一步一步这样做。我并没有把爬珠峰作为一个目标，一个是我以前觉得费用很高，五六千的雪山也很好玩，会觉得一定要挑战珠峰。然后突然有个机会，朋友要去爬，刚好碰到我生日，我就去了。这种 8000 米海拔级别的雪山，每次攀登周期都要在一个月以上，那里网络是非常差的，甚至没有手机信号，我其实很喜欢没有任何干扰的时刻，很珍惜，我们在营地会交流攀登技术或者其他很纯粹的东西。爬山很有趣，每一座雪山都不一样：危险之处不一样，冰川不一样，路线不一样，每次爬其实都是在探索，不是说你之前爬过那么多雪山，经验比别人丰富就一定会比别人安全。其实每座山对我们来说都是未知的，随时会发生危险，我也很喜欢这种感觉。每次都能学到新东西，都有一些新的经验。

登山的魅力就在于未知，你得逼着自己去探索，然后你会越来越想把事情做好。

其实不管是登山还是潜水，极限运动里最好的就是伴侣制度，就是至少要有两个人。这样你出现危险才会有人知道、有人施救。爬山越多，胆子其实就越小，因为看了太多事故了。我爬山是没有执念的，很多人觉得今天一定要登顶某个山峰，其实对于一个成熟的攀登者来说，放弃登顶要比登顶难很多。我现在肯定会选理智该放弃的时候就放弃，因为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中间会出现很多不可控因素，我就会放弃这根线下撤。因为山在那里，下次我还可以去爬，但如果把命交代在这里，那就没别的事了。

所以我和我专门的一个拍档，一起爬了很多山，很多未登峰，其实都能达到一个共识，就是当任何一个人觉得有任何不对劲要下撤的时候，哪怕另一个人觉得自己状态很好还能上，只要对方表示要下撤，那就一起下撤。这种情况一定是一个人觉得什么地方有危险，或者身体出问题了，这个时候是不能勉强的，不能觉得快到顶了一定要上去。只要一个人表示不行，另一个绝对不会劝，一定会陪着下去，不会问对方明天快到了，明明天气这么好，为什么要下撤，不会问。这是我们爬山的基本态度。一个成熟的攀登者就是在自己或者同伴要放弃的时候，不问为什么，直接放弃。

珠峰一年能爬的窗口期也就是三四天，不会超过一星期，所以就要计算登顶的时间。每年去爬的可能有两三百人，但是这两三百人只有希拉里台阶这一个通道能走，而且集中在两三天的时间通过，有一个人堵住，就所有人都堵住。

我爬珠峰的时候分了三列队。我们那队比较特殊。你认不认识夏伯渝老师？他有一个片子，叫《无尽攀登》。夏老师没有腿，69岁了，要去爬珠峰，已经五次都没有上去了，所以他登顶的欲望会更强。我和夏老师在一个队里。当时我们跟的队伍的领队，那是他创立公司第一年，他很想让第一支队伍登顶，以及他想保证登顶率，所以那天我们抢一个小窗口。买的天气预报说暴风雪会在上午11点左右到达，正常的话商业团队不会去冒险，都会等另外一个窗口期，但那一年可能领队评估下来觉得我们队伍能力很强，就预期在上午8点前所有人都能完成攀登下撤，就能躲过暴风雪。但是没想到那一年暴风雪提前三个多小时，正好8点多到了，就是我们在希拉里台阶的时候，最陡峭的地方。

珠峰的暴风雪很可怕。厦门刮了一个木兰台风已经这样，珠峰顶上，只限一个人通过的地方发生了暴风雪，躲都没地方躲，气温迅速下降到零下四五十度，我就直接被刮下去了。那一次还是比较冒险的，如果不是平时经验丰富，人就基本上交代在山上了。我们那次两个当地向导都是靠救援下山的，还死了一个人。

我掉下去的时候是挂在绳子上的，背朝山，风又很大，绳子在动，我又抓不到岩壁。但是因为我掉的地方是个凹槽，我就往前移，听到氧气瓶咣当一声，就知道已经碰到岩壁了。这样的情况下伸出一边手抓住了石头，才转过身来抓着石头慢慢往上爬。

掉下去的时候怎么讲，就在想，妈的怎么办，怎么爬上去。而且那时候手套掉了，脑子里过了一万个这种念头，就是命交代在这里怎么办。身上装备基本上都有二十多公斤——鞋子一只就是四斤，很重，因为还连着冰爪，还有氧气瓶。氧气很稀薄，重量那么重，平时七八米相当于两层楼高的岩壁花个几分钟就能爬上去，在那个情况下风又那么大，真的觉得很艰难了。还好平时训练得多，力量还可以，最后撑上去了，要不然真的就交代了。

当时，包括后来我都没觉得害怕过。因为登山的危险我们碰到了无数次，虽然没有这么危险，但次数也很多很多，还各种各样，所以没在害怕什么。真正觉得害怕是隔了一年，有一个当时跟我一起爬珠峰的朋友，他看到了一个视频。那一年登珠峰的队伍里还有一个老外，他请了一个摄制组拍纪录片，他是看着我掉下去的。夏老师英文不好，所以夏尔巴在说英文的时候，他没听懂在说什么。但是老外就听到了夏尔巴说，风这么大，我们没办法一直等，否则大家都得死。所以他们计划是割断我的绳子。如果当时割断了，我百分百掉下去。所以当时我觉得最恐怖的事情就是，我还在自救，但是别人要割我的绳子，还好我咬牙爬上来了，如果晚一点绳子就让人割了。就我明明不会死，但是被人搞死了，他们还用负法律责任。其实走那条路不需要绳子，他们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我在那个时候觉得人很可怕，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别人。

对，人才是最可怕的。别人可以决定你的生死，还不用负责任。

我觉得登山其实可怕的就是这个，人的因素。那一次真的是直面死亡，客观上也是，高度在海拔将近8800米的地方，路况很难，而且没有人能提供帮助。这几年爬山下来，只有这个经历让我恐惧过。

我是一个很小心的人，那次掉下去之后还滑倒了，软组织有很严重的挫伤，脚肿得两倍大，但是骨头和筋没有受伤，只有严重的淤青。包括我滑雪，大家不是说滑雪尽头是骨科吗，我现在也没受伤过，各种地形都滑过，也没被人撞过。我玩极限就是很谨慎的，把技术练到扎实才敢去做，要保证自己安全第一。

很多人我不是理解，跑越野赛也好，马拉松也好，赛前得拼命练才能完赛，这还是在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爬雪山是真的会死人的一种运动，但好多人去爬反而平时不锻炼。我不准备登顶，不准备站领奖台，但我一定会做比百分百更多的努力。

对，癌症治疗的那一年我不能再爬山了。我以前体能算好的，但第一年我操场一圈是走不下来的，梦旅人的朋友很热心，他会带我在厦大的操场慢慢走一圈，我基本上是一两百米就得坐下来休息，然后再走。当时我觉得我可能再也爬不了山了，因为它又要力量又要体能。

疾病对人的威胁和在珠峰上的那种威胁还不大一样，珠峰时你觉得你会死，觉得自己会留在山上，但生病是很漫长的过程，每一次化疗医生都会跟你家里人说挺好，但每一次你都有可能挺不过去，而你可能只是觉得自己虚弱了一点，并不会直观地看见死亡，只是会有心理压力，觉得自己在拖累家人。其实那时候家人会更痛苦，他们的压力会远远超过我，我觉得。但那时候生病我一直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从来没觉得自己会死，虽然已经晚期了，但我还是每天开开心心的。

认识大鹏那几年也挺有意思的。那时候那里有个俄罗斯人，在曾厝垵那边玩桨板，在

海上玩。我就借他的板去玩，后来发现它比较休闲，像划船一样，在船上练一些动作也不是很辛苦，就自己买了一块。有一两年身体不是很好的时候反而经常在海上玩桨板，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水上运动，人也很放松，慢慢地化疗在身体里的毒性就过去了。后来我发现我可以去练个潜水，就去考了个潜水证，因为潜水也很休闲。从此就开始开拓了，去了各种地方，那几年没爬山，就玩各种东西去了。

我刚开始爬雪山的时候看过一本书，《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写1996年珠峰山难的事。其实我们那天遇到的暴风雪和他们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这本书是登山圣经，但从来没有被拍成电影，直到2003还是2004年，它变成了电影《绝命海拔》。我化疗那一年去看了（这部电影），看到他们从南坡上珠峰，那条路我很熟，以前爬很多山都走那条道——就看到他们走在那条我熟悉的路上的时候，我突然泪流满面，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完之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就知道自己还是要去爬山。



《绝命海拔》剧照

后面身体慢慢恢复，发现自己又可以开始爬雪山了，就明白自己对雪山的喜爱，是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喜欢。疫情的时候我开始跑马拉松和越野赛，因为之前都在爬山，但是出不去了。

今年11月我有三场比赛，一场在香港大屿山的百公里越野，一个是腾冲的马拉松，还有一场四姑娘山的75公里越野。雪地越野我是很喜欢的，而且擅长。这三场比赛都是硬骨头，我从七八月份就要备战，业余时间除了上班应酬没办法，几乎都花在了准备工作上。其他运动全部停止了，就会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

对，很多人会问你为什么要去爬雪山，花这么多钱，还可能随时死在山上。但我觉得人生在世总要有自己喜欢的事情，想干的事情，总要有一个目标想去达成，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有的时候我给自己的人生定义很简单，就是要去体验很多东西，把一两项我最喜欢的东西去做到一个极限，看看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也算一个目标。因为生活其实很平淡，有时候有点无聊，你自己给自己一个目标的时候，就会一直很有活力去做这些事，也很开心。在我坚持下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挺酷的。

我走了那么多地方，突然发现地理很重要，因为我以前地理历史都不是很很好。爬山也要看气候，你会知道天气也得要懂一点，对我来讲，玩的过程就是不停让自己变得更好，修炼自己的一个过程。

Q: 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A: 原来人决定放弃的时候身体真的一下子会瘫掉，就好像电风扇拔掉插头一样。最近徒步有个女孩在山上说自己不行了，我们都要打救援电话了，她还是决定自己走下山。刚下来还在公路上马上就不行了，一步都走不到了。很有意思。

Q: 最近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A: 顺利把几场越野赛跑下来吧。

Q: 希望找什么人来接力？

A: 厦门北极星的队友含沙，经常参加救援这些公益活动。和接力访问主题挺契合的，“关心社会的人”。关心什么、关心的方式，以及为何会有这一切。



题图来自武老白微博，摄影：杨文彬 Wenbin

专栏

081 武老白 我不光在面对 一个公共事件， 我是在不停地打开自己

杨樱 | 接力访问

一个人的公共行动力来自何处。

2019年，《好奇心日报》记者陈莉雅坐在武老白的车上，[采访那个后来被叫做“恋人”的艺术项目](#)。时值好莱坞电影《三块广告牌》上映，武老白在三辆货拉拉车身上安排的红底白字大标语，也让“三块广告牌”成为项目的代称。那三句话分别是：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仍保留“性指向障碍”，以及，“19年了，为什么？”三辆车，按照这三句话的顺序，开过上海的世博中国馆，开过南京城墙，开过天津眼，从南至北去了几十个地方。[一条“彩虹路线”](#)。莉雅跟的是最初的上海、南京两站。我是陈莉雅的编辑。



三辆货车在上海

武老白后来说，那是他最焦灼的阶段，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具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会面对怎样的干预，最早的时候，那三句话都还没想好。陈莉雅坐在他旁边，“是很重要的陪伴”。

在项目执行的第二天，微博上“突然就有了疯狂转发”。“大家的临时协作——包括货车司机，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一开始还被朋友圈的人说不要参与这个，会被掰弯——后来他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参与者，特别兴奋开心。在大多数媒体缺席的状态下，这对整个项目是很重要的。”

就“接力访问”而言，武老白是我知道但并不了解的对象。“恋人”的行动力和影响力让人印象深刻。他和朋友们把类似艺术项目的执行视为媒体性质的表达；“把艺术视为媒体”，准确说，视为传播。他们会通过前期调研掌握事实证据，通过田野获得感性的认知，同时提炼问题作更精准的触达。他当然希望媒体可以帮助扩大影响力，“可以让媒体不直接接触碰议题本身，先触碰艺术，再慢慢了解艺术背后表达的问题所在。”

但媒体不是他的伙伴。伙伴是协作者，是一起把事情完成的人。对武老白来说，早年在西安认识的满宇、郑宏彬都是很重要的协作者。他们，还有更多的朋友，从未形成组织或者团体，只是因为不同的议题临时组队。“永远在项目和事件背后”，这句话适用于武老白的自述，其实也适合用来描述他和朋友们行事风格。

武老白出生于1990年，山东人，第一份工作在西安美术馆。去之前他对美术馆有一种想象，就是希望藉此找到某种出路，关于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他学的是摄影，最初希望以此为创作媒介，每个月三千多元工资，大部分都买了胶卷和摄影画册，其实拿起相机拍照至今还有让他放松解压的功效，至于身份解惑的效果，那就少了一些。

美术馆的工作完全没有满足武老白的期待，“那份工作没有自我意识，只是重复”。于是他在每天晚上下班之后——有时候是7点，有时候是10点——拿着一台135相机边走边拍，闪光灯不停地闪，他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拍，也不知道要拍什么，就觉得闪那一下会爽。“好像就在那一刻逃离了所谓的美术馆体制，或者说我现在经历的生活”，一个转瞬即逝的出口，一个下班之后人工窗口。

这种拍照带有很强的侵犯性，武老白明白这一点，但没打算回避它，[最终他因此和人发生身体冲突](#)，挨了一拳。这一拳意义非凡。“让我突然清醒：这些行为我可以结束了，没必要再继续了。”后来他在做别的项目的时候也总是期待有人给他来上这么一拳，也许只是象征意义上的，但从未再有过。不过后来的武老白再也没做过类似盲目的创作，也不再陷入不见出口的困惑，就算有时候谈不上对自己多满意，也是就事论事的那种。

他始终有自己关心的人：城中村里的打工者，殡仪馆里的未具名尸体，小区里跳楼的清洁女工，新冠疫情里变成统计数字的各种具体的人……在被打了那拳之后，他和之前去拍照的西安兴庆宫公园里的大爷阿姨聊天，又把聊天变成了一个小册子。2015年，他开始重新理解自己身处的世界。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在进行一个城中村有关的项目，这是多年前[“死亡身份证”项目的断点续传](#)。他觉得自己当年只是平面化地呈现了现场，如今可以继续追问，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类似情况的发生。

“通过活着的人去构建死去的人生前的生命状态到底是怎样的，这些人遭遇了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双重瓦解，就是在一种流动的生存状态里，和家庭越来越疏离。我就是想知道，他们从离开家乡到不同的工厂，到大城市的这些时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追问总是危险的。关于危险，他只能常学常新。

“做事”是我们聊天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他把自己的一些行动——比如试图质询同性恋扭转治疗的艺术项目“恋人”，试图探究不知名死者过往生活具体为何的“死亡身份证”项目，还有和坚果兄弟、郑宏彬以及其他更多人一起完成的和污染、饥饿、新冠有关的各种项目——统称为“事情”。“事情”是他的生活，是他存在的方式和意义，但与此同时，“事情”的具体应对方式和风险，也让他一次次直面未知。这种生活带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他异常珍惜基于“事情”构建起协作关系的朋友，这不仅是友谊，还有对世界的共识。正是这样的共识让人感到慰藉。

在呈现他的自述之前，有一个也许“很武老白”的细节可以讲讲。武老白小时候的身份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出生在山东体制内家庭里的第二个男孩，家人要以某种方式隐藏他。所以他从小跟着姥爷姥姥生活，用的是另一个名字，说话带着口音。等到12岁回到父母身边上学，他开始启用另一个名字，作为父亲的“远房亲戚”见人作客，因为在学校说一口土话被疯狂嘲笑而苦练普通话。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后来在做“恋人”的时候，他坐在上海一家提供同性恋扭转治疗的诊所里，对着医生开始自述生命故事，包括自己作为“二胎”的内心感受，他是真诚的，带着艺术家进入现场

之后的敏感，也带着对自我经历的坦白。他说他甚至感到了紧张，不是因为害怕自己扮演同性恋角色被发现，而是进入这种自带压迫感的氛围本身就会让人紧张。

荒诞的部分是他后来听录音才感觉到的。医生听完他的生命故事之后紧接着就开了治疗方案。“他真的想治我。也想赚钱，也想治我。当时他看我有些动摇，就说在这边治疗的还有哪些上流人士。他很有自信地来跟我讲这些。”

到了 2023 年的时候，武老白把重新剪辑过的“恋人”在不同空间放映。他也就是在这一年才慢慢意识到这个项目其实不仅仅起了社会呼吁的作用，还帮他看到了自己可以变成怎样一种人。从最开始认识一名同志警察，到希望为 LGBT 群体做一些事，再到自我身份的某种觉察，武老白在被“恋人”这件“事情”不断地改变。他期待这种改变。这是另一种慰藉。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被世界无限往前推的一个人。具体的事做框架其实我是没有的。遇到不同的事情，就发现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做。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

我好像对自己一直没有特别满意，所以才想持续做事。很多的时候，其实我面对一件具体的事件的时候，总觉得可以做到某个程度，但总好像没有做得特别好，就会特别困惑和焦虑，一直是这样。

“恋人”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认识了一名同志警察，特别欣赏他，当时就想是否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当时我对国内的同志遭遇稍微有一些了解，但还不是特别清楚，也是在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之下开始合作。

逐渐开展工作的过程对我来说，影响特别大。在此之后我就一直在关注性别议题，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它是对我自身有很大的影响。我不一定非要做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山东男性的角色。我觉得我会变得更加自由一点。这种影响的后坐力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此之前我的想象可能更多是这个项目可以有持续的影响力发酵；让一件事情可以被看到。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需要被看到的、或在这个项目里面收益最大的还是我自己。我自己并没有说脱离于项目之外。

亲密关系上，现在我可能会更加注意所谓的男性身份和一个直男的角色。我开始意识到“直男”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而我不一定要在这样一种方式和节奏里生活。对，也没必要进入主流的生活秩序里面。但这些一直都是困扰着我，即便自己能想清楚，仍然是困扰我的。

家里人不知道我具体在做什么，我没有完全政治出柜，他们知道我一直做艺术，但也没试图弄明白。这么多年我们想各种办法筹集经费。养活自己这事儿简单，比如这一年我一直在不同的城市蹭住，一直是流动的。我从 2019 年之后就再也没租过房子。

这几年重要的是和朋友们在一起，某种程度上会抵消那种无力感。发现自己还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对我影响特别大，一边做事，一边维持友谊。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持续做事的时候，你会在这个过程中遇到有趣的人，之后围绕项目的交流过程里也会遇到有趣的人。我的理解，就是一个人要持续去做事，才能维系住“有趣”的关系。因为做事本身就是一种临时链接，在某一刻，它可能会转化为一个重要的陪伴。

有时候面对很多棘手的问题，我也不会享受这种工作状态。每次都想，做完这个之后是不是可以不按这种生活状态去生活了，后来发现还是不能。往往想做轻松的项目的时候，做着做着就把它变沉重了，总是觉得做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但多和好其实是没有具体定义。我们之前一直说，这叫“无限朝向改变的行为”。你说改变能有底线吗，有程度吗，还是某个具体时刻才能改吗？那不知道，就是随机的，没有定义的。

和新闻调查记者一样，我也觉得自己可以通过实践和项目去推动一些事情的转机，实际上不清楚，有时候可能会有，大部分时候没有。但这样想的时候，你必须要朝“能”的方向去做，你才可能尽全力把事情做好。

有时候你也会想，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但你深陷其中，你会发现不是事情和你有关系，而是你在做这件事本身，这个意义对自身意味着什么。你不光在面对一个公共事件，你会觉得是在不停地打开自己。

“恋人”这个项目，不管面对社群的朋友也好，面对别人也好，你会不停地认识到自己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环境之中，不停地重新理解自己的状态，我只不过觉得在某一刻，我可以变得越来越有贡献能力，一直在不停学习的过程里。因为当你不理解、不了解一件事的时候，是很难有所贡献的。而你了解了之后，你就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世界。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实践的过程中不停学习，算是探索一种未知，我想从中看到问题本身到底存在于哪里，还有就是不停打开自己，后者很缓慢，可能到最近才有意识到。

艺术它在那个时刻就是一个桥梁，连接了世界与更广阔的公共资源。我们试图在这个空

间里面制造一点点浪花，然后让浪花背后的问题展现出来。

其实就像你做接力访问，很多事一开始都是不明确的，但你在做的过程中会慢慢理解这件事对自身的重要性。而且大家在一起协作交流，这也是一个慢慢改变和陪伴的过程。每个人在这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共同面对的人。

Q: 你最近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A: 想不出来。我今年一直是一种流动的生活状态，这个城市生活一段时间，那个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基本上哪里有事我就待在哪里。以前不这样，以前还比较固定。

倒也没有什么困扰，因为你在做事，所以你到了一个地方必须静下心来去面对事情，如果不做事我估计会有很强的不安全。

Q: 你有什么想要解决的问题吗？

A: 想把当下的事情顺利完成。我一直在想怎样更换工作方式，比如尝试拍一个长片，这是以往不太擅长的。

Q: 你希望邀请谁来接力？

A: A 鬼，滴滴司机。之前在工厂做工，同时也是重 D 音乐队的主唱。他会在生活的缝隙中尽可能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他现在会边开车，边聊音乐，偶尔也会卖自己乐队的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小鸟文学出品
卷三十五，2023.11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